

目 录

民族·语言·宗教

- 3 赵爱国 / 俄罗斯“斯拉夫主义”哲学思想的学理内涵
- 35 戴艳梅 刘肖岩 徐祗朋 / 《2025年前俄罗斯国家民族政策的战略》解读与分析
- 58 杨素梅 高寒 / 俄政府对顿河哥萨克政策的历史演变
- 89 张宏莉 赵静 / 摩尔多瓦语言政策及相关问题分析
- 104 赵小华 / 全俄罗斯圣徒拉多涅日的谢尔吉崇拜经久不衰原因探析

比较经济研究

- 133 杨佩桦 侯敏跃 / 多维视野下的中俄、中澳资源合作比较研究
- 172 王小龙 / 成败之间：战后苏联新卢布改革与中国金圆券改革比较研究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单位：

《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主 编：冯绍雷

副 主 编：陈大维（常务）

杨 成

刘 军

本期执编：贝文力、肖辉忠

封面设计：王 洪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 A403
电话 021-62233816 62238113

Email : russiastudies@163.net

邮政编码：200062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9—721X

印刷：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5 年 8 月 28 日

俄羅斯研究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2015 年第 4 期 (双月刊)

Оглавление

Чжао Айго

Теоретическая коннотация философской идеологии «славянофильства» в России..... (3)

Дай Енмэй, Лю Сяоянь, Сюй Чжипэн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я и анализ «Стратег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и РФ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25 г.»..... (35)

Ян Сумэй, Гао Хань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эволюция политик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оссии по отношению к Донским Казакам..... (58)

Чжан Хунли, Чжао Цзин

Анализ языковой политики и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х вопросов в Молдове... (89)

Чжао Сяохуа

Анализ причин неувядаемого преклонения Преподобному Сергию Радонежскому.....(104)

Ян Пэйхуа, Хоу Миньюэ

Многоаспектное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ого и китайско-австралий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сфере ресурсов..... (133)

Ван Сяолун

Между успехом и провалом: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послевоенной советской денежной реформы и реформы «золотого юаня» в Китае ... (172)

俄羅斯研究

RUSSIAN STUDIES

2015 年第 4 期 (双月刊)

Contents

Zhao Aiguo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of Russian “Slavism”(3)

Dai Yanmei, Liu Xiaoyan, Xu Zhipeng

Interpretation and Analysis on “the Strategy of the State National Polic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for the period till 2025”..... (35)

Yang Sumei, Gao Han

The Evolution of Russian Government’s Policy towards Don Cossacks..... (58)

Zhang Hongli, Zhao Jing

Moldova Language Policies and Analysis on Related Issues (89)

Zhao Xiaohua

Analysis of the Enduring Worship of Russian Saint-Sergius of Radonezh... (104)

Yang Peihua, Hou Minyue

A Multidimensional Comparative Study on China-Russia and China-Australia Cooperation in Energy and Mineral Resource Sectors (133)

Wang Xiaolong

Between Victory and Defeat: Comparative Study on Soviet New Ruble Reform and China’s Currency Reform in 1948 (172)

民族·语言·宗教

俄罗斯“斯拉夫主义”哲学思想的学理内涵*

赵爱国**

【内容提要】研究俄罗斯，“斯拉夫主义”是一个绕不开的视角，因为它是俄罗斯民族所特有的看待世界的哲学基础和思想方法论。尽管学界对斯拉夫主义的研究已经很多，包括哲学的、政治学的、历史学的、社会学的和经济学的视角等，但仍缺乏在学理内涵上对该理论体系的生成和发展演化情况作进一步的发掘。研究表明，斯拉夫主义学说的基本学理蕴含着俄罗斯思想史上带有“革命性”意义的哲学价值，那就是建立在对本民族文化自信基础上的思想自觉和民族自觉。只有深刻领会该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才能对过去、今日乃至明日之俄罗斯有更加理性的把握和全面的认识。

【关键词】斯拉夫主义 俄罗斯思想 俄罗斯文化 俄罗斯民族自觉

【中图分类号】D75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5)03-0003(32)

19世纪被誉为俄罗斯“经典哲学”(классиче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繁荣的世纪，其主要标志是：俄罗斯从这个时期起才开始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哲学”，该哲学的核心内容即“斯拉夫主义”(славянофильство)。正如俄罗斯著名哲学家施佩特(Г.Г. Шпет, 1879-1937)所说，“斯拉夫主义的问题

*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俄罗斯人类中心主义范式语言学理论研究”(项目批准号：12YJA740113)以及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语言学视阈中的俄罗斯百年符号学史研究”(项目批准号：14AYY023)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意见，文责自负。

** 赵爱国，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俄文系主任，教授。

是唯一独创的俄罗斯哲学问题”。^①因此，可以肯定地说，从 18 世纪的“欧洲主义”（европеизм）到 19 世纪的斯拉夫主义，俄罗斯完成了由“拿来主义”向实现民族自觉的重大转变。这一转变在俄罗斯思想史上无疑是一件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标志性事件，它宣告了贴有俄罗斯标签的统一民族意识的形成。这一民族意识不仅规约着俄罗斯整个 20 世纪所走过的历程，同样也影响到今日俄罗斯政治、经济、外交和思想变革的基本走向。鉴于此，本文不想重复学界已有的众多有关斯拉夫主义的研究成果，而只是从其生成机理、学理内涵和发展演化等视角来考察斯拉夫主义的哲学价值，以从一个侧面来深化对今日俄罗斯之现实的认识。

一、斯拉夫主义学说的生成机理——文化自信

斯拉夫主义作为 19 世纪 30-70 年代俄罗斯哲学和社会思想的一种思潮，从一开始就是在与 18 世纪俄罗斯占主导地位的欧洲主义或“西欧派”（западничество）的对立中形成的，其核心思想是俄罗斯在历史文化方面相对于欧洲的“独特性”（самобытность）。但任何新的思潮或理论的出现都不可能是无由来的，而是有着深刻的成因机理，包括思想的、文化的、社会的根源等。白晓红曾在自己的专著中将斯拉夫主义产生的背景归结为“历史背景”和“社会背景”两类。^②而在我们看来，斯拉夫主义的生成机理无疑是思想、社会和政治因素“三位一体”相互作用的结果。

首先，从斯拉夫主义的思想渊源看，学界通常认为它发端于中世纪俄罗斯“禁欲派”（нестяжатели）与“约瑟夫派”（иосифляне）之间的那场著名的“争辩”。15-16 世纪时，以约瑟夫派的代表人物约瑟夫·瓦罗茨基（Иосиф Волоцкий，1440-1515）为一方，与禁欲派的代表人物马克西姆·格列克（Максим Грек，1470-1556）、阿尔捷米·特罗依茨基（Артемий Троицкий，?-1571）等为另一方，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论战，论战的核心是有关东正教会与“异教”（ересь）的关系以及教会的道德问题。约瑟夫派

① Шпет Г.Г. Очерки развития рус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Сочинения. М.: Правда, 1989. С.53.

② 白晓红：《俄国斯拉夫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年，第 5-36 页。

主张君主专制和坚守东正教传统的神学思想，与异教作坚决斗争；而禁欲派则主张秉承拜占庭的宁静主义传统，提倡远离世俗而坚守人的精神自由。由于前者的主张受到当时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Иван III Васильевич，1462-1505）的青睐，因而占据了上风，其标志是俄罗斯教会开始脱离拜占庭教会而建立自己独立的莫斯科罗斯教会。后来，“约瑟夫派”学说思想由其追随者菲洛费依·普斯科夫斯基（Филофей Псковский，约 1465-1542）所继承和发展，他提出了著名的“莫斯科—第三罗马”（Москва—Третий Рим）的重要学说，从而为 19 世纪斯拉夫主义的最终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菲洛费依·普斯科夫斯基所处的时代正是欧洲乃至世界大动荡的时代。在中世纪的数百年间，西方世界笃信的一种理论认为，巴比伦、波斯、希腊和罗马“四个君主制”（четыре монархии）的更替是合乎规律的，而东罗马帝国（拜占庭）由于土耳其军队的占领宣告瓦解也似乎印证着这一理论的正确性，于是，“世界末日”论笼罩着整个世界尤其是基督教世界。但事实是，没有了拜占庭，世界依然存在，人类并没有由此发生根本的变化。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开始对基督教的“正义性”（правота）产生了怀疑。在西方，这种怀疑演变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艺复兴”（Ренессанс）——自由思想和世俗化的运动。而那时的莫斯科罗斯却丝毫没有为此所动，它力图以坚守东正教的正统性来向世界证明上帝学说的真理性。“莫斯科—第三罗马”的学说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根据这一学说，整个罗马的历史在对基督教的认识中可分为三个阶段：“旧约”（ветхий）时期为“第一罗马”；君士坦丁堡时期为“第二罗马”；由此应该还有一个“第二罗马”的继承者——“第三罗马”。先前曾提出罗斯古公国“诺夫哥罗德”（Новгород）为“第三罗马”，但该公国于 1478 年瓦解后，“第二罗马”遗产的唯一继承者就只有莫斯科了。这就是菲洛费依·普斯科夫斯基提出的“莫斯科—第三罗马”思想的主要依据所在。他在给伊凡三世的信函中如是说：

“由于旧罗马的教会不信异教（这里指‘新约全书’，引者注）而崩溃了，君斯坦丁堡的第二罗马教会的大门也被阿加尔人的后代用斧头劈开了。而在你所统治的第三新罗马的国度里，神圣的大教堂圣徒教会
在世界信仰东正教的每一个角落却闪耀着比太阳还要亮的光芒。我虔诚

的君主，你应该知晓你的统治权：基督教信仰中的所有东正教王国都已经归并入你所统治的国度，你是普天下基督教徒唯一的君主……”。^①

从以上不难看出，19世纪俄罗斯的斯拉夫主义学说，其思想渊源主要源自约瑟夫派的正统基督教思想，后又发展成为较为完整的“第三罗马”学说。上述学说又与16世纪出现的“神圣罗斯”（Святая Русь）的思想在内涵上完全一致^②，强调的都是俄罗斯相对于西方世界（包括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独特性和纯正性。应该特别强调的是，菲洛费依·普斯科夫斯基的“第三罗马”学说，其核心并不是“世界末日”的思想，而是俄罗斯应该“走什么路”的问题，因此，一经提出便受到东正教界的追捧和执政君主的赏识。尽管18世纪俄罗斯盛行的是“欧洲主义”，宗教界和思想界也试图用“俄罗斯欧洲”（Российская Европа）的概念来取代“第三罗马”学说。但扎根于东正教传统和民族文化根系的这一学说思想，却始终没有因此而沉寂下去，而是作为俄罗斯意识中占主导的成分顽强地延续了下来，并作为一种“民族精神”始终在政治、外交、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起着支柱性作用，最终发展成为具有民族自觉性质的斯拉夫主义学说。

其次，从社会成因看，斯拉夫主义的生成机理源自俄罗斯传统文化中的“村社”（община）组织形式以及由此生成的精神遗产。对此，国内外学界有比较一致的看法。作为一种组织形式，村社本是与广袤的俄罗斯平原的地理生存环境密切相关、并能在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共同体，它从13世纪一直延续到20世纪20年代末，几乎贯穿了整个俄罗斯社会史。在俄罗斯人的传统观念里，村社既是他们的社会和联盟，也是他们的“米尔”（мир）^③。在俄语中，“米尔”既是世界的意思，也是和平的意思。久而久之，原始而古老的村社组织逐渐演变成为全体俄罗斯人观念认同和心理依附的一种民族文化符号，成为俄罗斯精神和民族性格的代名词，它集中体现了俄罗斯人“独

① Послания старца Филофея// Памятники литературы Древней Руси. Конец XV-первая половина XVI века. М.: Худ. лит.,1984. С.437.

② “神圣罗斯”的称谓首次出现在何时，学界有不同的看法，通常认为出现在俄罗斯的中世纪时代，开始时多使用于民间口头创作，后逐渐成为一种民族思想，其内涵与“第三罗马”的思想基本一致。

③ “米尔”作为农村公社组织，这一称谓最早出现在11世纪诺夫哥罗德公国的《雅罗斯拉夫尔法典》中。

立自主”、“和谐共处”等思想特质。而这种组织形式及其所反映的思想在西方社会和文化中是根本不存在的，因此，俄罗斯具有不同于西方的“独特性”。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村社的组织 and 思想之所以能够成为俄罗斯人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与东正教的核心概念“聚和性”（соборность）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聚和”（собор）即教堂，也有“协商”和“共处”的意思，其实质是由“精神自由”、“有机性”和“神的爱”构成的“多样性的统一”。^① 村社的“独立自主”和教会的“聚和性”相互契合，就成为了俄罗斯人最终走向民族自觉的两大精神土壤。

其三，从政治背景看，斯拉夫主义是在俄罗斯民族“精神复兴”（духовное возрождение）的大背景下诞生的，其直接动因则是俄军于 1812-1814 年打败了入侵的拿破仑军队和欧洲远征军。当时，整个俄罗斯都弥漫着“西方衰落”的政治气氛，认为这是传统的“专制制”（самодержавие）战胜西方“立宪制”（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ализм）的结果。俄罗斯著名诗人丘特切夫（Ф.И.Тютчев，1803-1873）曾于 1848 年写下《俄罗斯与革命》（Россия и революция）一文，唱响了西方衰败的挽歌：“西方在消失，一切都在燃烧中崩塌和灭亡：查理大帝的欧洲，1815 年和约的欧洲，罗马贵族和所有的西方王国，天主教和新教，早已丧失的信仰和毫无理性的理智，从此后不可想象的秩序和不可能有的自由，以及在这些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欧洲文明，都被欧洲亲手毁掉了”。^② 这一“西方世界在衰败”的挽歌声，无疑极大地激发起俄罗斯的使命感。俄罗斯社会中重新燃起了对本国制度、本国历史、本国文学以及本国语言的兴趣，斯拉夫主义由此成为一种时尚。例如，正是在这样氛围下，沙皇专制制度得到进一步强化。如，当时的沙皇尼古拉一世（Николай I，1825-1855）授意其教育大臣发表了“东正教、专制制度、民族性”三位一体的“正统民族论”（теория официальной народности），宣称东正教是社会幸福和家庭和睦的保障，专制制度是国家的基石，而民族性就是对东正教的“虔诚”和对沙皇的“温顺”。史学界把尼古拉一世统治的 30 年称为俄罗斯专制制度的“顶峰”时期；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俄罗斯史学家、文学家

① 徐凤林：《俄罗斯宗教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19-23 页。

② Тютчев Ф.И. Россия и революция// Тютчев Ф.И. Русская звезда: Стихи, статьи, письма. М.: Русская книга, 1993. С.284.

卡拉姆津（Н.М.Карамзин，1766-1826）编撰出版了 12 卷本《俄罗斯国家史》（Истор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го）（1818-1828），该巨作被斯拉夫派誉为俄罗斯民族“过去时代的复活”。^①再如，俄罗斯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Ф.М.Достоевский，1821-1881）用多篇小说呐喊出对“人性的拷问”，提出了“神性与人性”有机统一的基督教人文观；又如，俄罗斯语言学家达里（В.И. Даль，1787-1867）用 35 年时间编撰出版了 4 卷本俄语词典——《鲜活的大罗斯语详解词典》（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живого велико-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成为语言学领域最先推行斯拉夫主义思想的典范。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当然，尼古拉一世的独裁、专横的黑暗统治，也引起社会的剧烈动荡和社会各阶层的极大不满。尤其是 1825 年的“十二月党人”（декабристы）起义受到当局残酷镇压后，俄罗斯社会精英们开始重新思考国家的命运，是实行沙皇的专制制度还是西方的立宪制，成为斯拉夫派和西欧派纷争的焦点。

正是上述思想的、社会的、政治的三股力量的合流，为斯拉夫主义的生成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社会基础和政治基础。思想渊源主要是东正教的。东正教作为基督教中最为原始、最少规范的一种形式，其传统精神向来与经院式的繁琐理论相背离：它不注重推理演绎和逻辑论证，注重的是具有道德自由的思辨，因此，被斯拉夫人认为是正统的基督教。社会成因主要是民族传统，俄罗斯人独特的生存环境“村社”组织赋予其独立自主的意识，“米尔”成为俄罗斯人独立的世界，一个与西方不同的世界。政治背景则像催化剂一样，提振起俄罗斯精神，使俄罗斯人似乎进一步认识到数百年来实行的专制制度的优越性所在。在斯拉夫派看来，其优越性并不在制度本身，而是能够产生“聚和性”作用的“道德力量”（нравственная сила），也就是所谓的“精神专制”（идеальное самодержавие）。时至今日，多数俄罗斯人依然对伊凡雷帝（Иван Грозный）、彼得大帝（Петр I）、叶卡捷琳娜二世（Екатерина II）等“强势”沙皇充满无限的敬意，更对现任俄罗斯总统普京（В.В.Путин）的铁腕治国方略拍手称好。而这一切，应该说都无不源自斯拉夫主义哲学思想中所包含的对传统专制制度的民族认同感。但问题是，

① Замалеев А.Ф.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СПб.: СПбГУ, 2012. С.145.

又是什么力量构筑起上述三大基础的呢？或者说，构筑起斯拉夫主义学说大厦的内在力量又是什么呢？在我们看来，三大基础的生成归根到底是由民族文化的自信力支撑起来的。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对东正教、村社制度和专制制度“优越性”的足够的自信，就不可能形成相应的思想基础、社会基础和政治基础。从这点上讲，文化自信无疑是奠定斯拉夫主义学说基础的基石。

二、早期斯拉夫主义学说的学理内涵——思想自觉

上文已经提及，斯拉夫主义的学说思想是在与欧洲主义或西欧派的斗争中逐渐形成的。开始的时候主要是在学术沙龙进行口头辩论，后来发展成为在报章杂志上的论战。两派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上：西欧派强调俄罗斯应该融入西欧，而斯拉夫派则认为西欧的道路“不适合俄罗斯”。那么，斯拉夫主义所谓的“俄罗斯道路”究竟有何特定的学理内涵呢？该内涵对俄罗斯过去和今天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是我们下面需要审视的具体内容。

早期斯拉夫派的领袖人物，学界公认有基列耶夫斯基(И.В.Киреевский, 1806-1856)、大阿克萨科夫(К.С.Аксаков, 1817-1860)^①、霍米亚科夫(А.С.Хомяков, 1804-1860)、萨马林(Ю.Ф.Самарин, 1819-1876)等4位。尽管他们的职业及兴趣、爱好等不尽相同，但却“志同道合”，为奠定斯拉夫主义学说的基本原理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一) 基列耶夫斯基的学说思想

基列耶夫斯基早年推崇欧洲主义，为此曾亲自创办了《欧洲人》(Европеец)杂志。由于该杂志被禁，基列耶夫斯基本人也被剥夺了在莫斯科大学讲授哲学的教职，使其“被迫沉默”达十余年之久。其间，他的思想逐渐由西欧派向斯拉夫派转变，并在霍米亚科夫和奥普塔修道院长老们的影

^① 此处用“大阿克萨科夫”的称谓，是相对于其胞弟、同为斯拉夫派成员“小阿克萨科夫”(И.С. Аксаков, 1823-1886)而言的。由于将他们的姓翻译成中文时都是“阿克萨科夫”，读者无法区别他们的长幼以及相关学说思想究竟属于哪位阿克萨科夫，故用“大”和“小”区别之。

响下成为斯拉夫派的著名思想家之一。其学说思想主要反映在 1852 年发表的《论欧洲文化的性质及其与俄罗斯文化的关系》(О характере просвещения Европы и о его отношении к просвещению России)^①和 1856 年发表的《论哲学新原理的必要性和可能性》(О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и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новых начал для философии)两篇文章中,学理上包含着以下两种学说:

一是“文化区别”论。基列耶夫斯基通过对俄罗斯文化传统与西欧文化传统的比较,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而造成该差异的根源有二:所走的道路不同和所传承的世界古典文明的文脉不同。他认为,俄罗斯和西方从一开始就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渗透到西欧各民族头脑中的基督教是通过罗马教会的一家学说实现的,而在俄罗斯,基督教则是在东正教的多座烛台上点燃的”,因此,基督教在进入俄罗斯时,并没有遇到像在西方大地上那样的巨大障碍。而西方神学与东正教学说之间又存在着诸多不同:前者具有理性抽象性,后者保持着精神的内部完整性;前者的智慧力量是分裂的,后者则渴望智慧力量的有机总和;前者通过逻辑概念的组合同向真理,后者则通过自我意识的内在提升而追求心灵的完整性和智慧的聚合。^②在基列耶夫斯基看来,正是这些不同才造成了两种文明的精神和文化的一系列差异。此外,基列耶夫斯基还认为,尽管俄罗斯文化的“根系”是在东正教的土壤上形成的,但它并不像西方文化那样展现得如此明显,因此还应该从“希腊教父”所赋予的“基督教哲学”中寻找“本源”(коренные начала)。

他指出,在基督教哲学中,“我们不仅丝毫看不出对亚里士多德的偏向,相反只看见对柏拉图的明显偏爱”,这就决定了基督教哲学在思维方式上与西方经院哲学有本质的区别:东方教父更关注“思维人的内心状况的正确性”^③,而西方神学家更看重“概念的外在联系”,它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

① 俄语 просвещение 一词有“教育”、“教化”、“启蒙”的意义,此处译为“文化”,是因为当时社会大众还不熟悉“культура”一词,所以很多学者就沿用 просвещение 一词来代表“文化”。

② Киреевский И.В. О характере просвещения Европы и о его отношении к просвещению России// Киреевский И.В. Критика и поэтика. М.: Искусство, 1979. С.228, 288-289.

③ 在“斯拉夫派”与“西欧派”的争辩中,俄罗斯学者通常把俄罗斯称为“东方”,这是相对于“西方”的概念。此处的“东方教父”即指东正教哲学-神学家。

思辨，不可调和；东方教父成功地将希腊哲学变为基督教文明的工具，而西方神学则把亚里士多德视为不可动摇的权威。为此，基列耶夫斯基提出，俄罗斯哲人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让这一“精神哲学”复兴，否则就谈不上科学的“自主原则”，谈不上根植于“自然根系”的艺术，也谈不上有别于西方的社会生活。^①

二是“哲学新原理”学说。基列耶夫斯基哲学新原理的理论前提是建立在对西方哲学的批判基础之上的。他指出，以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思想为灵魂的西方经院哲学，认为可以依靠独立自我运动的理性力量而达成真理；而以柏拉图的学说思想为内核的东方教父学，则认为只有寻求理性的内在完整性才能达成完整的真理，因为精神的各个方面是一个有机统一体；西方思想家习惯于抽象的逻辑思维，在他们看来，人类的全部知识都有赖于思维对象的形式发展，全部意义也都被思想的表达形式所吞没。而实际上，理性是一种内在的力量，它是超越逻辑联系的形式对象而进行思维运动的，因此它总是伴随着思维，又超越于思想表达。^②据此，基列耶夫斯基认为，无论是亚里士多德（Аристотель，前 384-322）、黑格尔（Г.В.Гегель，1770-1831）还是谢林（Ф.В. Шеллинг，1775-1854），都不适合用来建立一种新哲学的要求。这是因为：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体系割裂了理性自我意识的完整性，将人的内在信念的根转移到道德和美学意义之外，转移到推理性质的抽象意识层面。黑格尔的哲学与前者的思想完全相同，但走的却是另一条路——他进一步发展了人的自我意识的自我发展体系，使逻辑定律达到了彻底的完满度。谢林的学说尽管看上去最适合用来建构俄罗斯哲学的自主体系，但也不完全符合哲学要求，因为他的哲学“既不是基督教的，也不是哲学的”：它与基督教的不同是其基本原理，与哲学的不同是其认知方式。^③鉴于此，基列耶夫斯基将“信仰原则”（принцип веры）作为其哲学新原理的基础。他依据福音书对信仰的界说，赋予信仰以新的内涵，认为它不仅仅是知识，同时还是与

① Киреевский И.В. О характере просвещения Европы и о его отношении к просвещению России. С.274, 292-293.

② Киреевский И.В. О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и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новых начал для философии// Киреевский И.В. Критика и поэтика. С.307.

③ Там же. С.304, 331.

生活有关的、能够赋予其他思想和概念以特殊色彩和特殊方式的信念，人的举止、愿望和情感等都要靠信仰来决定。他说，信仰的主要力量不在于精心地选择对生活最有利的东西，而在于超出一般逻辑过程的信念之中……东正教会对理性与信仰关系的理解与罗马教会和新教的信奉有本质的不同，它表现在：在东正教中，神的启示和人的思维是不相混淆的，无论是科学还是教会学说都不会逾越神与人之间的界限……神的启示界限的不可侵犯性，旨在保障东正教信仰的纯洁性和坚定性，从而不仅使信仰学说免遭自然理性的曲解，又可防止教会权威对理性的干预。^①以上可见，基列耶夫斯基所希冀的哲学，既不是从前的经院式神学所起的附庸的作用，也不是新教教义的问答式的逻辑支柱，而是处在科学与宗教之间的一种“中间”哲学。因为在他看来，哲学既不是一门科学，也不是信仰，哲学是所有科学的一般总结和基础，是所有科学和信仰之间的思想向导。具体地说，其哲学新原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依据民族文化传统创造和发展新思想；与东方基督教传统相联系；精神完整性原则；理性从属于信仰等。^②

基列耶夫斯基提出的上述学说思想，成为后来俄罗斯许多思想家、哲学家关注的焦点，其中包括提出“万物统一”哲学（*философия всеединства*）的索洛维约夫（В.С. Соловьев，1853-1900）和提出“自由精神”哲学（*философия свободного духа*）的别尔加耶夫（Н.А. Бердяев，1874-1948）等，其影响之广由此可见一斑。

（二）大阿克萨科夫的学说思想

大阿克萨科夫与19世纪俄罗斯文学批评家、西欧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别林斯基（В.Г. Белинский，1811-1848）同出一门，关系非常密切。^③1837-1838年间曾积极参与由别林斯基担任编辑的《莫斯科观察者》（*Московский наблюдатель*）杂志的各项活动。但自1839年起，其政治主张开始与别林斯

① Киреевский И.В. О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и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новых начал для философии. С.316-317.

② 参见徐凤林：《俄罗斯宗教哲学》，第8-13页。

③ 大阿克萨科夫与别林斯基是莫斯科大学校友，都毕业于该校语文学部，后来又都成为“同学小组”（*кружок товарищей*）成员。

基产生严重分歧。他提出的“俄罗斯民族的非国家性”政治思想，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其于 1855 年呈给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报告——《俄罗斯内部状况》（О внутреннем состоянии России）以及 1956 年刊登在《俄罗斯谈》（Русская беседа）第 1 期上的《论俄罗斯观点》（О русском воззрении）等文章中。

《俄罗斯内部状况》一文被学界看做是斯拉夫派的政治宣言，它大致包含以下一些思想和主张：（1）俄罗斯民族的历史和特性证明了其民族的非国家性，即不寻求参与执政，不希望用条件来制约执政当局，没有任何政治元素，甚至也不拥有革命的萌芽和立宪的制度；（2）俄罗斯民族早在准备接受基督教之前就形成了村社生活，从而使它远离国家的执政，而将社会生活留给了自己，并授权国家把享受社会生活的机会赋予民众；（3）俄罗斯民族不想执政，只想过人的生活。不寻求政治自由，只寻求道德自由、精神自由和社会生活；（4）没有人民干预的国家政权只能是君主制；（5）把国家政权和政治权力归于君主制政府，把完全的道德自由、生活自由和精神自由归于民众；（6）俄罗斯公民制度遭到破坏不是源自民众，而是源自政府；（7）应该解除政府对俄罗斯施加的道德和生活压迫；（8）俄罗斯需要言论自由，应该解除对言论和文字的压迫；（9）恢复古代时期的政府与民众、国家与民众之间的联盟关系。^①上文所说的“公民制度遭到破坏源自政府”的话语，指的是彼得大帝执政以来的俄罗斯状况。在大阿克萨科夫看来，俄罗斯传统的君主制是维系国家和民众之间平衡的保障，而这种平衡已经被彼得大帝所破坏，因为在其执政后，政府与人民开始分裂，国家干涉民众的事务，因此已经由人民的公仆变为要求绝对服从的偶像，这也是宗教分裂、农奴阶层和贿赂等“内部溃疡”在俄罗斯出现的原因所在。

《论俄罗斯观点》一文中所反映的思想与上述有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前者强调的是君主制对俄罗斯的适用性，后者则从俄罗斯文学角度来阐释全人类与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主要观点有：（1）“俄罗斯观点”与全人类的观点并不相悖，民族的就是全人类的，文学作品即是如此；（2）那种认为俄罗斯民族没有为人类作出过任何贡献、因此也不应该有“俄罗斯观点”

^① Аксаков К.С. О внутреннем состоянии России//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1. М.: тип. П. Бахметева,1861. С.72-91.

的说法和想法是完全错误的；（3）俄罗斯民族有充分的权利成为全人类的，而不需要通过西欧或得到西欧的允许；（4）俄罗斯民族对西欧持批判立场，只接受人类共有的财富而摒弃西欧的民族性；（5）欧洲主义尽管有全人类的意义，但却具有很强的民族性；（6）斯拉夫派捍卫的是全人类的东西，而西欧派捍卫的是极端的民族性。^①不难看出，《论俄罗斯观点》一文是一篇捍卫斯拉夫主义的檄文，旨在澄清或批驳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对斯拉夫派的一些不正确认识，并从民族性和全人类性的辩证角度阐发了作者本人对斯拉夫主义和欧洲主义的基本看法。

值得一提的是，大阿克萨科夫还在《俄罗斯谈》杂志的第2期上发表了《再谈俄罗斯观点》（Еще несколько слов о русском воззрении）的文章，对第一篇文章中提出的观点进行了重申和补充。他说，一个聪敏的人也会受到他人的影响。对这个聪敏人而言，这个“他人”就是绝对正确的导师或老师。这样的人总是看着自己的导师，重复着导师的思想甚至话语，说这些思想和话语有多么的睿智等，但这种人是靠他人智慧生活的，对事物并没有独立的看法，也没有自己的观点……殊不知，导师有新思想，也正是因为导师是独立的结果……那种认为“观点不应该是自己的、而应该是全人类的”说法是虚伪的，因为“全人类的”本身是不存在的。要懂得全人类的东西，首先要有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一个没有自己观点的人而靠别人思想活着的人，是什么也不会懂得的。^②显然，大阿克萨科夫在该文中对西欧派的“崇洋媚外”思想和行为进行了批判，不仅揭露了其思想的虚伪性，更强调了俄罗斯走独立道路的必要性。

（三）霍米亚科夫的学说思想

彼得堡科学院院士、著名历史学家别斯图热夫-留明（К.Н. Бестужев-Рюмин, 1829-1897）曾称霍米亚科夫为“有大智慧的人”，认为在俄罗斯思想界只有罗蒙诺索夫（М.В. Ломоносов, 1711-1765）和普希金（А.С.

① Аксаков К.С. О русском воззрении// Русская беседа. 1856а, кн. 1. Смес. С.84-86.

② Аксаков К.С. Еще несколько слов о русском воззрении// Русская беседа. 1856б, кн. 2. Смес. С.139-147.

Пушкин, 1799–1837) 可以与其齐名。^①的确, 作为哲学家、文学家和史学家的霍米亚科夫, 他对斯拉夫主义学说的形成曾作出过决定性的贡献。他于 1838 年撰写的文章《论旧与新》(О старом и новом) 是斯拉夫派兴起的奠基之作^②, 而生前没有完成的巨著《世界史札记》(Записки о всемирной истории) 是斯拉夫派历史哲学观的集中体现, 成为后人学习和仿效的经典。

《论旧与新》一文反映的是霍米亚科夫对“旧”的基辅罗斯(Киевская русь)和“新”的莫斯科罗斯(Московская русь)两个不同国家形态的基本看法, 深刻折射出他对守护俄罗斯民族传统和反对西欧化的坚定政治主张。归纳起来, 其观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对基辅罗斯的社会和政治状况予以大力褒扬, 认为在那个时期的古罗斯国度里, “村里有读书声”(грамотность в селах), “城里秩序井然”(порядок в городах), “法庭上有真相”(в судах правда), “生活上富足”(довольство в жизни), 道德、智力和物质等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 二是对莫斯科罗斯“罗曼诺夫王朝”(Династия Романовых) 以来的社会和政治状况进行了尖锐批评, 认为“新”不如“旧”, 在俄罗斯已经不存在善、高尚和值得敬仰的东西, 处处呈现出“没文化”(безграмотность)、 “不真实”(неправдосудие)、 “敲诈勒索”(разбой)、 “叛乱”(крамолы)、 “人身攻击”(личности)、 “压迫”(угнетение)、 “贫困”(бедность)、 “混乱”(неустройство)、 “愚昧”(непросвещение)、 “道德败坏”(разврат) 等乱象; 三是认为彼得大帝的改革以及此后历代沙皇所实行的政策割裂了俄罗斯民族的历史, 使俄罗斯丧失了原本的基础, 从而改变了俄罗斯的发展道路。由此他提出, 一个民族不能脱离自己的历史, 一个社会也不能根本改造本国的法律和主张; 五是认为尽管彼得大帝开创了新时代, 使俄罗斯融入西方, 但这并不是民众的意愿, 西方的道路对俄罗斯来说是行不通的, 西方正处在灾难的前夜。^③

《世界史札记》被收录在 1900–1904 年出版的霍米亚科夫 8 卷本《作品

① Замалеев А.Ф.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СПб.:СПбГУ, 2012. С.154.

② 该文章是霍米亚科夫在 1838–1839 年期间为基列耶夫斯基在莫斯科自己的家里举办的文艺沙龙所写, 并没有准备发表。

③ Хомяков А.С.О старом и новом// Русская идея: сб. произв. рус. мыслителей. М.: Айрис Пресс, 2004. С.112-129.

全集》(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中,并占据了其中第5-7卷的篇幅。贯穿该著作的核心思想是所谓的“斯拉夫主义意识”,因此它不仅被认为是作者本人哲学思想的中心内容,更是斯拉夫派历史哲学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归纳起来,其思想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提出信仰以及自由与必然、精神与物质两种原则的对抗为历史推动力的思想;二是认为宗教史是国家乃至地区史的最重要的方面,欧洲史和亚洲史就离不开对基督教和佛教的认识,因为信仰决定着文化的程度、性质和来源。此外,历史同时又是一个有机整体,财富和传统的沿袭与民族生活密不可分;三是把世界民族区分为两种相互对立的宗教类型:伊朗型(иранский тип)和库希特型(кушитский тип)。它们的区别并不是礼仪和诸神的不同,而在于不同的精神原则:前者起源于农耕传统,是一种承认上帝为创世主并具有精神自由、责任和道德的部族世界观。它包括古波斯拜火教、旧约学说和东正教等;后者代表的是征服者民族的生活样式,是一种承认泛神论基础上的神的部族世界观。它包括印度教中的湿婆教和佛教,以及亚里士多德学说、天主教和新教等。前者崇尚精神自由,提倡通过口头言语、文字、祷告以及对肉体的蔑视等来传承文化,而后者主要通过建筑术、象征文字、念经诅咒和崇尚肉体来传承文化;四是对基督教和理性主义的本质进行阐释,认为基督教是伊朗型宗教精髓的最高表现形式,它充满着自由创造之上帝的思想,使人感到精神的亲近。上帝化身为耶稣,它宣扬博爱而蔑视财富和权势,把一切幸福留给信徒,而罗马则歪曲了基督教的精神,变基督教为一种契约性宗教。于是,信仰变成了法律,教会也变成了一种世俗和社会现象,精神的自由被披着法律外衣的理性主义所摧毁;五是对俄罗斯的基督教以及由此生成的俄罗斯精神作了深入分析,认为俄罗斯正统地继承了基督教的精神实质,完好地保留了圣徒教会的核心思想——“聚和性”,俄罗斯精神不仅建造起广袤无垠的俄罗斯精神家园,确立了“米尔”村社这一共同生活的最好形式,把家庭视作整个社会大厦最稳固和最纯洁的基础,还培养出民众的道德力量、对神圣真理的信仰、坚强的耐力和绝对的克制力等;六是阐发了世界文明样式具有多样性的观点,认为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历史哲学推行的是一种“单原质民族”理论(теория «одностихийных народов»),该理论提出每一个古代民族都是由一

个原质构成的，都属于人类大家庭，只有包括德意志民族在内的“优秀民族”（избранные народы）才能够推动和引领世界其他民族的发展。但事实上，人类文明绝不只有德意志一种样式，世界其他民族的贡献也很多、很大，如斯基泰人的军事术、埃及人的建筑术、腓尼基人的航海术、中国人的治国策等。因此，仅仅用德意志的文明与俄罗斯的文明状况进行比较是有失公正的，俄罗斯也为提升世界文明作出了自己的贡献。^①

霍米亚科夫正是从上述诸方面来阐释他本人的斯拉夫主义学说、并由此得出俄罗斯和西欧都具有独特性的结论的。应该说，《世界史札记》的面世对俄罗斯斯拉夫主义的复兴具有重大的文化价值，也推动了当时俄罗斯刚刚兴起的其他人文学科——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宗教学和哲学史的发展。该著作的着眼点是用浪漫主义的原理来解决斯拉夫各民族的历史文化的独特性问题。但霍米亚科夫的浪漫主义与德国的浪漫主义既有相同之处，也有相异之处：相同的是它们都是在评价历史，把理想归结于历史渊源；不同的是霍米亚科夫探究历史的立场有别，它更加注重具体的事实，少有理想化原理的论证和审美的因素，强调的是世界史与民族史的相互关系以及俄罗斯民族发展的独特性。霍米亚科夫的历史哲学观正是建立在对上述关系和独特性的深入思考基础上的，因此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因而成为俄罗斯思想的重要遗产。

（四）萨马林的学说思想

萨马林在 19 世纪 30-40 年代曾追随黑格尔的学说，但 40 年代中期与霍米亚科夫和基列耶夫斯基结识后开始转向斯拉夫主义。与其他几位斯拉夫主义先驱不同的是，他不仅提出了具有鲜明斯拉夫主义色彩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改革的主张，而且还作为政府官员亲自参与了俄罗斯于 1861 年实行的废除农奴制改革，这在一定意义上使斯拉夫派的学说思想得以付诸实践。萨马林的哲学思想以及有关拥护俄罗斯君主制以及解放农奴的政治主张，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他给霍米亚科夫《作品全集》第 2 卷所写的“前言”和《里加来信》

^① Хомяков А.С. Записки о всемирной истории//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1-8). М., Типография П. Бахметьева, 1900-1904.

(Письма из Риги) 等文章中，主要是：

关于人的个性思想。萨马林在该“前言”中对霍米亚科夫提出的信仰即真理的思想予以很高评价，并就人类学问题发表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认为，人类学先于认识论和形而上学，因此应该成为认识和思想学说中的本体论。他坚持把人类学中作为认识手段的“个性”(личность)与将个性变为评价标准的个性概念区别开来^①，并坚决反对一种个性——个人主义，认为它“苍白无力”和“悲哀地认可人类个性的非独立性”。^②在他看来，“个性作为永恒真理的射线可以穿越的透明介质，可以温暖和照亮人类”；而个人主义之上还有更高级的村社制度，“村社制度是建立在弃绝个人私利意识这一高级行为基础上的”，因此，“克服个人主义只有在弃绝个人私利的行为中才能实现”。但村社制度并不是没有个性，而在于“自觉地弃绝个性的无限权利”。^③也就是说，个性的展示并不在于封闭的个性自身，而在于服从于更高的因素——宗教因素。他认为，个性与上帝的联系是个性存在的基本事实，因为每一个人来到人世时，灵魂中都带有上帝所赋予的光亮。因此，只有承认上帝与个性的这种联系，才能懂得为什么在人的自我评价中总会出现对生命的“意义”(смысл)和“理性”(разум)的扭曲。如果否定“天意”(промысел)这个前提，决定人生命的所谓神话就会取而代之。^④总之，在萨马林看来，只有人的灵魂与生命的源泉进行直接交流，人的意识才能够不灭；也只有承认人的灵魂是由上帝照亮的，才能够保持灵魂的完整性，否则将陷入个人主义。由此不难看出，萨马林有关人的个性的思想，是与人的灵魂完整性密不可分的——所谓个性，即灵魂完整性。而这个关于灵魂完整性的思想，正是基列耶夫斯基提出的“哲学新原理”的立论基础——理性的内在完整性思想。所不同的是，前者与人类学的个性概念结合了起来，而后者则与东西方哲学的实质联系在一起。不同的侧面，印证着萨马林对基列耶夫斯基学说的继承与发展。

① 从现代术语学看，这种区分就相当于将“人格主义”(персонализм)与“个人主义”(индивидуализм)相对立。

② Самарин Ю.Ф. Сочинения Ю.Ф. Самарина. (т.1-10). М.: Типография А.И.Мамонтова, 1877. С.38.

③ Там же. С.64.

④ Там же. С.507.

关于政治改革的主张。萨马林在《里加来信》中^①集中阐述了对沙皇专制制度下地方自治政策的一些看法，认为政府所标榜的各项改革举措在外围地区并没有得到实际执行，如政府于1844-1848年通过的关于限制地主对农民的权力、缩减地方立法特权、强化中央政权对地方（贵族）机构的控制等决定，实际上都被取消了。尤其是苏沃罗夫（А.А.Суворов, 1804-1882）公爵接替原省长戈洛温（Е.А. Головин, 1782-1858）的职位后，施行的是与地方贵族阶层相勾结的政策，这在萨马林看来不外乎是政府对波罗的海沿岸各省贵族的投降。他在1848年的《里加来信》中这样写道：

见证政治体制遭到破坏总是令人沮丧的。我们同情该体制，是因为相信它与国家利益和民族自尊相关联。更为糟糕的是，这种变化让反民族的和极端自私的一群人得意洋洋，这不仅表现在行政当局基本走向的一种变化中，还反映在对俄罗斯人的心灵所珍惜的一切进行徒劳无益和不太文明的侮辱中。发生这样的情况并不是有什么社会目的，而是无意识的，源自想出名的自尊心，或者说得好听些，是用各种牺牲和让步来收买名声。而且，这一切就发生在我们的眼前，在里加，在苏沃罗夫公爵到任的两周之内。原以为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是很难在政治活动中表现自己的，但新省长却做到了……。^②

《里加来信》除表达上述对地方自治的看法外，更为重要的是第一次鲜明地阐述了俄罗斯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变的政治纲领。在萨马林看来，波罗的海沿岸人以本民族世代形成的传统为借口来维护自己的特权和特殊的法律地位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这已经涉及国家的历史和政治体制等重大问题：

对自己懊恼、从德国那里学来的对俄罗斯的鄙视以及伸手向政府要援助的意识等，所有这一切都汇聚在一起，并用下列声调喊出这样的声音：我们只想和政府打交道，但不想与俄罗斯有关系……如果突然想起我们并因此指责我们，那我们就用下面的话堵住指责者的嘴：我们是忠于国王的，我们为国王效力不比你们差，你们从我们身上再也无权得到

① 里加为拉脱维亚首都，当时萨马林在“波罗的海沿岸各省”任职两年，故才有“里加来信”之说。

② Самарин Ю.Ф. Сочинения Ю.Ф. Самарина. Т. XII: Письма 1840---1853. М.: Товарищество типографии А.И. Мамонтова, 1911. С.258.

任何东西。波罗的海沿岸人就是这么想的和说的，但并不聪敏。我得承认，当看见出自那些没有祖国的人之嘴的想法不仅没有引起我国社会的不满，反而得到赞赏时，我是多么恼火和沮丧……莫非有人认为，俄罗斯沙皇会允许有人来侵犯其利益与民众福祉的不可分性，想从自己身上卸掉我国历史赋予他的俄罗斯民族第一人和东正教会第一子的意义，从而把祖先留下的不可转让的财产和无法抹掉的圣油换成西方附庸国对其国君的私人关系？^①

萨马林的政治主张在这封《里加来信》中体现得十分清晰，那就是：拥护沙皇君主制，反对西方的立宪制；沙皇的利益与民众的福祉不可分割，更不允许受到侵害；整个俄罗斯都要无条件地服从于俄罗斯民族第一人、东正教会第一子；俄罗斯不做西方的附庸等。正是这些主张，成为早期斯拉夫派政治纲领的核心内容，同时也成为后来在波兰问题上与西欧派争论的焦点。

从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出，早期斯拉夫派代表人物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东西方”之间的关系，这就决定了其学说的学理内涵离不开对“东西方”最根本的差异——宗教和历史两大领域的聚焦。斯拉夫派奠基人正是在该两大领域内，分别从哲学、宗教学、史学、政治学、文学、民族学等不同视角对斯拉夫主义学说作出精辟而务实的阐释的。应该说，尽管俄罗斯的历史源远流长，但俄罗斯人的自主形象和自觉意识，直到基列耶夫斯基、大阿克萨科夫、霍米亚科夫和萨马林等先辈们勇敢地提出“什么是俄罗斯？”、“俄罗斯的本质何在？”、“俄罗斯的使命是什么？”、“俄罗斯在世界上占有何种地位？”等问题的那一刻起，才真正开始形成。因此可以说，这是俄罗斯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具有哲学价值的思想运动，它不仅标志着俄罗斯民族的文化自信开始结出带有思想自觉性质的丰硕成果，更向世界宣告贴有俄罗斯标签的斯拉夫主义已生成为统一的民族意识。如果说统一的俄罗斯民族形成于16-17世纪的话，那么其统一意识的形成直到19世纪中叶才真正完成。

^① Самарин Ю.Ф. Письма из Риги и история Риги(т.7)// Сочинения (т.1-10). М.: Типография А.И. Мамонтова, 1889. С.41-42.

三、斯拉夫主义学说的发展演化——民族自觉

早期斯拉夫派的代表人物到 19 世纪 60-70 年代相继去世，但其提出的学说思想却没有因此“寿终正寝”，而是作为优秀的俄罗斯思想遗产被后人继承和发展，从而形成了 19 世纪俄罗斯斯拉夫主义学说的完整理论体系。

（一）小阿克萨科夫对大阿克萨科夫学说思想的发展

小阿克萨科夫作为大阿克萨科夫的胞弟，几乎与胞兄一起出道，其斯拉夫主义的学说思想不仅与胞兄一脉相承，而且在某些方面有所发展，被学界公认为斯拉夫主义后期的领袖之一。小阿克萨科夫曾于 1858 年担任斯拉夫派的主要杂志《俄罗斯谈》（《Русская беседа》）的编辑，并于 1859 年和 1861 年起开始担任周报《帆》（《Парус》）和《白天》（《День》）的编辑。他对胞兄提出的有关思想和主张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将民族性树立为斯拉夫派的旗帜。1859 年，他在谈到《帆》的出版纲领时，曾直言宣称：“我们的旗帜是俄罗斯民族性。民族性既是独立、精神自由、生活和发展自由的象征，也是迄今那些为维护个性权利、但没有将权利上升到民族个性意识的人受到压制的权利的象征。俄罗斯民族性是新原则、生活充分表达和社会真理的保障”。^①“我们的旗帜是俄罗斯民族性”这一思想，不仅是小阿克萨科夫全部学说思想的高度浓缩，更成为俄罗斯民族世界观中带有标记性的丰碑之一。

二是提出俄罗斯的使命是拯救整个斯拉夫的思想。例如，他将《白天》定位为斯拉夫的共同报纸，并邀请多位俄罗斯和斯拉夫的政治作家为其撰稿。他本人还曾在该报首期上发文声称，“要把斯拉夫各民族从物质和精神的压抑中解放出来，并在强大的俄罗斯雄鹰翅膀下赐予它们独立精神或政治生命的才能，这就是俄罗斯的历史使命、道德权利和责任”。^②特别是在

① Аксаков И.С. Наше знамя – русская народность. М.: Институт рус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2008. С.45.

② Там же. С.50.

1875-1878 年的“东部危机”期间^①，小阿克萨科夫为维护斯拉夫人的利益竭尽全力。他反对俄罗斯外交使团在与土耳其的谈判中屈服于西方列强的压力，并在 1878 年 2 月 19 日签订的《俄土和约》中将君士坦丁堡及其海峡划归土耳其所有。在 1878 年 6 月 22 日召开的“莫斯科斯拉夫委员会”（Московский Славянский комитет）会议上，作为该委员会主席的小阿克萨科夫就发表了长篇演讲，强烈表达了他作为一名坚定的斯拉夫主义者的政治主张。他说：“今天我们是不是准备埋葬和断送百万民众、众多国家、保加利亚人的自由、塞尔维亚人的独立，毁掉俄罗斯的荣誉、名声和良知呢？……用任何话语都无法有尊严地来痛斥这一叛变行为，痛斥这一对历史传统以及俄罗斯使命和责任的背弃……”。小阿克萨科夫在演讲的最后还向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进言道：“如果我们在看到相关报道时都会热血沸腾，对历史负有责任的俄罗斯沙皇该有何种感受呢？难道不是他本人说我们与土耳其的战争是‘圣战’吗？……俄罗斯不希望战争，但更不希望耻辱的和平……。忠君者的天职促使我们不能保持沉默，那些目无法纪和满口谎言已经形成了沙皇与民众之间、沙皇思想与民众想法之间的障碍。”^②小阿克萨科夫用这种“反政府”的言论来结束自己的演讲并非偶然，因为他清楚，社会对和约的不满情绪是直接指向沙皇的。他的演讲引起强烈反响，被多家东欧报刊转载并迅速传遍整个欧洲，他本人也遭到莫斯科省长的严厉警告，并被撤销了莫斯科斯拉夫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三是提出东正教会精神统治下的“民众”（земля, Земля一词的意思在古罗斯文化中相当于народ）、“国家”（государство）、“社会”（общество）“三位一体”原则。他认为，民众不能随意地听命于沙皇（国家的化身），而应该有自己的权利，尤其是表达个人意见的权利。他坚定地践行斯拉夫派所奉行的“把说话权交给民众，把政权交给沙皇！”（Силу мнения-народу, силу власти-царю!）这一基本准则。但由于当时的政府也时常利用所谓的民

① 1875-1878 年发生的所谓“东部危机”，是指 1875 年爆发的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反对土耳其压迫的起义、翌年爆发的保加利亚起义以及随后相继发生的塞(尔维亚)土(耳其)战争(1876-1878)和俄(罗斯)土(耳其)战争(1877-1878)。

② Аксаков И.С. Наше знамя – русская народность. М.: Институт рус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2008. С.56-60.

意来从事实质为反民意的勾当，因此，小阿克萨科夫又在斯拉夫主义有关“民众”和“国家”的学说中添加了第三种成分——“社会”。在他看来，所谓社会，就是“能够用民族的全部精神力量创造、培养民族自觉并进行自觉智力活动的人群”，或“民族发展的第二阶段、第二要素，是具有自觉意识的民族”，“是民族自觉的活动，随着它的不断增长和发展，使民众接近最终目标——自觉”。^①而俄罗斯缺乏的正是社会的力量，“我国的内部生活和社会生活不足，坚信程度不足，独立性不足，社会力量不足！”于是，他呼吁俄罗斯社会要清醒过来，认为俄罗斯要做的就是“唤起和创造社会力量”。^②不难看出，小阿克萨科夫眼中的社会，既指具有民族自觉意识的社会精英，它与所谓的“知识分子”（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的概念有本质的不同^③，同时又指民族自觉的社会活动。他认为，彼得大帝所施行的改革，使贵族阶层与民众发生了背离，教会也因蜕变为国家官僚机构的一部分而使“文化程度高的阶层”与民众和民族信仰相背离，这必然会导致反民族的“知识分子”这一中间阶层的出现，其结果是“文化程度高的人群”与民众相分离，俄罗斯国家也由此发生变化——由地方自治蜕变为与君主专制格格不入的官僚和独裁国家。为此，他提出，“必须摒弃彼得大帝式的独裁及其合法的产物——奴役制、西欧政治的自由主义……俄罗斯历史的彼得堡时期应该结束了”。^④“民众”、“国家”加上具有“民族自觉的社会精英”（社会），这就是小阿克萨科夫的社会政治学说的基本内容。他曾多次疾呼“该回家了！”（Пора домой!），他所说的这个“家”，指的是“原有的罗斯”（исконная Русь）。应该说，恢复原有罗斯的传统，不仅是小阿克萨科夫本人的意愿，也是整个斯拉夫派为之奋斗的最终目标。

① Аксаков И.С. Сочинения И.С. Аксакова. Т. II: Славянофильство и западничество. 1860–1886. Статьи из «Дня», «Москвы», «Москвича» и «Руси». 2-е изд. СПб.: Типография А.С. Суворина, 1891. С.36, 42.

② Там же. С.30-31.

③ 有趣的是，在小阿克萨科夫几乎所有的文章中，凡是说到“知识分子”或“文化程度高的人群”的词语都带有引号，这恐怕是在当时俄罗斯标榜为知识分子的人群中有许多是西欧派的缘故。

④ Там же. С. 36-48.

（二）达尼列夫斯基对霍米亚科夫学说思想的发展

达尼列夫斯基（Н.Я. Данилевский，1822-1855）是19世纪俄罗斯著名的社会学家、文化学家和政论家，泛斯拉夫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1868年出版的《俄罗斯与欧洲》（Россия и Европа）一书^①中提出“历史文化类型”理论（теория культур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типов），修正并发展了霍米亚科夫的人类历史文明的相关思想。

达尼列夫斯基与早期斯拉夫派领袖之一的霍米亚科夫的思想有很大不同。后者把俄罗斯民族视作人类文化的真正载体，认为它负有全世界历史的使命；而前者则否定历史有所谓全人类的使命，认为俄罗斯和斯拉夫人仅仅是一种特殊的历史文化类型，尽管该类型具有最广泛和最完善的性质。他提出的历史文化类型理论主要有以下观点：

一是西方不了解俄罗斯，因此无权决定人类的进步。他说，西方知晓从梵语到北美印第安部落的易洛魁人、从星系复杂的运动规律到细小组织构造的一切，唯独不了解俄罗斯；西方只想看到俄罗斯扮演一种角色——欧洲文明在东方的拥有者和推广者。^②在达尼列夫斯基看来，西方所赋予的俄罗斯的这种角色是一种谬论，因为西方自身已经处在衰败的境遇中，不再有力量来决定人类进步的路线。

二是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文明类型。他依据达尔文（Ч.Р. Дарвин，1809-1882）的进化论学说，认为地球上的一切生物，无论是植物还是动物，也无论是个体还是整个部族，其生命都是“有定数的”；人类文明也不例外，如埃及和拜占庭文明的起源和消亡就是如此，时下又兴起了西方文明一日耳曼—罗曼文明。^③据此，达尼列夫斯基得出结论认为，根本就不存在所谓单一的、对世界所有民族来说统一的文明，构成人类历史活动的“场”（поле）源自于不同的方向，因此，不同时代生成着不同的文明：（1）埃及文明；（2）中华文明；（3）古闪族文明；（4）印度文明；（5）伊朗文明；（6）犹太文明；（7）希腊文明；（8）罗马文明；（9）阿拉伯文明；（10）日耳曼—罗曼文明

① 该书对当时俄罗斯知识界和思想界影响颇大，被誉为斯拉夫派最出色的著作之一。

② Данилевский Н.Я. Россия и Европа. Взгляд на культурные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лавянского мира к кутрманно-романскому. М.: Мысль, 1991. С.50, 63.

③ Там же. С.74.

（欧洲文明）等。以上所有的文明都属于某一语系，从而构成自主的民族语支。^①他认为，以上每一种文明都会体现出反映该文明本质的相关民族思想。例如，日耳曼—罗曼文明是靠自然科学的发展实现的，希腊文明的主要成果是艺术，罗马文明的标志是法律和国家政治组织，而犹太文明则主要由统一的上帝这一宗教思想的发展来体现等。^②达尼列夫斯基将这些反映民族性质的文明称为“历史文化类型”。

三是对历史文化类型的转换机制和规律进行分析。他认为，任何一种历史文化类型都不具有“无止境进步”（бесконечный прогресс）的特权，因为每一个民族都会走向消亡；人类文明不断劳动的成果，会促使文明类型发生及时更替，以获得超自然的基督教的恩赐，并远远超越像中国和印度那样的完全与世隔绝的文明，这就是对西方的进步和东方的停滞最简单和最自然的解释。^③但达尼列夫斯基同时也认为，中国和印度这两种与世隔绝的历史文化类型，在生活的某些方面又是那些较为成功的竞争者所不具备的，由此促进了人类精神体现形式的多样性，人类进步的含义也正在于此。历史文化类型的有益活动，或让衰老文明消亡的上帝的惩罚性活动，或作为民族史料用作其他目标的活动，这三种角色都可能降临到民族命运上。在达尼列夫斯基看来，人类所有的文明都要服从于5种基本规律：（1）部族或族群交际语言的同一性或近似性；（2）政治的独立性；（3）一种历史文化类型的文明之源难以移栽给另一种历史文化类型的民族；（4）在保留民族成分条件下，应该展现其在联邦政治体制范围内的一定的独立性；（5）持续增长的不确定性及繁荣期和结果期的相对短暂性。^④据此，他认为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任何一种人类文明或迟或早都会消亡，因此，任何一种文明也就不可能像霍米亚科夫等学者提出的那样可以解决任何一种全人类的使命。

四是对斯拉夫历史文化类型的形成依据和特点作出界说。确定世界文明的类型会发生更替和消亡，并不意味着达尼列夫斯基否认不同文明（尤其是

① Данилевский Н.Я. Россия и Европа. Взгляд на культурные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лавянского мира к кутрманно-романскому. С.113.

② Там же. С.128.

③ Там же. С. 88.

④ Там же. С.90-92.

基督教文明)之间存在着某种传承性。恰恰相反,他认为新的文明在替代旧的文明的过程中,会保留旧文明中有益的部分或将来具有历史意义的部分。他坚信,能够替代西方文明的只有斯拉夫历史文化类型,主要依据是:(1)斯拉夫人属于雅利安族群^①,该族群中的5个民族已经创造出“完整程度不等和完全独立的文明”;(2)多数斯拉夫人(不少于三分之二)在政治上形成了独立的整体——大罗斯国,这足以彰显斯拉夫文明。他认为,整个历史类比法都证明,斯拉夫人与早先的其他雅利安人一样,不仅可以而且也应该创造出独立自主的文明。斯拉夫人与希腊化时代人、古罗马人、欧洲人属于同一时期,它作为包括俄罗斯、捷克、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在内的一种历史文化类型,应该具有与法国、英国、德国、西班牙相对于欧洲以及雅典、斯巴达、忒拜相对于希腊相同的意义。如果斯拉夫人没有如此崇高的意义,就不会有千年的民族积淀、多个世纪以来的民族国家生活和斗争以及用如此多的牺牲换来的政治上的强大,而只会如肥皂泡沫一般,空洞无实,毫无目标,犹如霜打的幼芽,这是因为一种历史文化类型的民族文明是不能移栽给另一种历史文化类型的。如果斯拉夫人由于内外因素而不能创造出独立自主的文明,即不能跻身于发达的历史文化类型之林的话,那么他们就将一无是处,就会土崩瓦解……。在达尼列夫斯基看来,斯拉夫历史文化类型与世界其他文明类型一样,将体现出完全与俄罗斯民族性格相吻合的民族思想,即“将接受文化活动的宗教方面”。但斯拉夫历史文化类型并不像犹太文明那样呈现为“一元性”,俄罗斯民族除了恪守东正教思想外,还在已取得巨大成就的“科学”(наука)这一竞技场上大放异彩……。而科学知识具有传承性,一个民族在一个世纪中所创造的,可以成为其他几个世纪和其他民族的遗产……。每一个独立自主的劳动人民都会从遗产中选择更适合本民族习惯和才干的东西,并用本民族所特有的思维方法和方式将其改造。^②达尼列夫斯基由此得出结论认为,俄罗斯与欧洲所走的道路早就不同,但俄罗斯在政治

① 雅利安人(арийцы)属于印欧语言共同体。在19世纪的种族史文献中,该族群(主要是日耳曼人)被世界上第一个提出种族概念的法国社会学家戈比诺(Ж.А. Гобино, 1816-1882)称为“高贵的种族”(высшая раса)。他将人类种族区分为“高贵”和“低下”两类,认为只有“高贵的种族”才能够创造出文明。

② Данилевский Н.Я. Россия и Европа. Взгляд на культурные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лавянского мира к кутрмано-романскому. С.125, 131.

和艺术方面却丝毫不逊色于欧洲，以它为代表的斯拉夫历史文化类型具有“四元性”，即雅利安类型文明所拥有的四大“原质”的组合。^①

总之，达尼列夫斯基的历史文化类型理论与早期斯拉夫派的相关思想已经有很大不同：如果说后者强调的是俄罗斯相对于欧洲的独特性而并不看重其在人类发展中的意义的话，那么前者则强调了斯拉夫人并不是注定要更新整个世界、也不需要担负为人类寻找解决历史使命的思想，斯拉夫人只是与其他文明并行的一种历史文化类型，他们的过去和现在丝毫不比欧洲人差，完全有资格和权利与欧洲人平起平坐。从俄罗斯的独特性或欧洲的不同，到斯拉夫人的独立自主性或欧洲人相同，这就是达尼列夫斯基的历史文化类型理论的学理内涵所在。该理论的出现，标志着经典斯拉夫主义已经走向衰败，开始转向“大俄罗斯主义”（великорусизм）或“亲俄主义”（русофильство）的新轨道。

（三）列昂季耶夫对斯拉夫主义学说的发展

达尼列夫斯基的历史文化类型学说为斯拉夫主义的转向提供了理论支撑，但该学说坚守的依然是“斯拉夫统一”观，因此还无法成为唤起俄罗斯民族主义的一面旗帜。这一任务后来由俄罗斯著名思想家、哲学家列昂季耶夫（К.Н. Леонтьев, 1830-1890）来完成，他用“俄罗斯拜占庭主义”（русский византизм）这一全新的宗教学说来替代斯拉夫主义学说。

列昂季耶夫的拜占庭主义学说，是在与“泛斯拉夫主义”（всеславизм）的对立中生成的。在他看来，泛斯拉夫主义仅仅是一种模糊不清的、自发和松散的概念，而拜占庭主义则与之相反，看起来像一座宏伟的大厦，它是由宗教的、国家的和道德哲学的若干思想融合而成的。他在《拜占庭主义与斯拉夫人》（Византизм и славянство）一文中写道：我们知道拜占庭主义在国家中代表着君主专制，在宗教中代表与西方教会、犹太教和分裂教派有别的东正教。^②在道德界我们知道，拜占庭理想并没有像被日耳曼封建制度载入

^① 此处的“原质”（стихия）指希腊哲学所说的构成万物的“火、水、气、土”四大原素，达尼列夫斯基认为俄罗斯人就是具有这四大原素的“高贵民族”。

^② “分裂教派”（раскол）指17世纪中叶从俄罗斯东正教会分裂出来的派别，它们不承认当时施行的宗教改革，主张保留旧礼仪，因此也称“旧礼仪派”（старобрядчество）。

史册的人类至高无上的概念那样崇高，拜占庭道德理想倾向于对人间的一切都不失望，包括幸福、我们自身纯洁的稳定性、我们对道德完善的能力（这里指天职）等。拜占庭主义（概括地说是基督教）拒绝一切人民过幸福生活的期望，它是对全人类一律平等、人世间完全自由、人类完美无缺和人人满意等思想最有力的反叛。^①列昂季耶夫认为，可以成为俄罗斯国家支柱和力量的只能是拜占庭主义，因为该主义不仅将俄罗斯国家组织了起来，还与俄罗斯的牧首制以及古老和粗糙的斯拉夫原料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了俄罗斯的辉煌。因此，想改变拜占庭主义的任何意念，就是扼杀俄罗斯。^②

列昂季耶夫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无一例外地都要经历三个阶段：（1）初始简约阶段；（2）繁荣复合阶段；（3）再度调和简化（毁灭）阶段。这是一个“三位一体过程”（триединый процесс），它不仅为有机世界所固有，也为时空中存在的一切所固有，甚至为天体及其演化史和人性所固有，并在艺术、绘画、音乐、建筑风格中，以及哲学体系、宗教历史、部族生活、国家机构和整个文化世界中彰显出来。^③列昂季耶夫的反西方思想正是建立在该“三位一体”学说之上的。根据他的计算，国家的历史通常不会超过1000-1200年（尽管中国是例外，但他按国家形态将其分解为若干个千年史），欧洲的历史最为典型。比如，欧洲的国家体制发端于9-10世纪，15-18世纪处在“繁荣复合”阶段，然后“复合开始退色”，社会再次出现“调和”，标志是：宗教对立减弱，所有区域和国家越发趋同，等级制度开始消失，多样的观点、教育、性格等变得失色。西方已无可挽回地接近“调和简化”阶段，正在丧失自己的历史文化意义。^④列昂季耶夫正是从上述“欧洲不会长久”的结论中看到了俄罗斯的未来和希望：俄罗斯不应该屈服于欧洲，而应该坚持自己的独立性；少考虑“幸福”而多想想“力量”，只要有“力量”，就会有“幸福”和其他的一切。他始终坚持认为，俄罗斯更多地属于东方，而不是欧洲。

① Леонтьев К.Н. Византизм и славянство// Россия глазами русского: Чаадаев, Леонтьев Соловьёв. СПб.: Наука, 1991. С.171-172.

② Там же. С.198.

③ Там же. С.253.

④ Там же. С.277.

以上不难看出，列昂季耶夫的斯拉夫主义学说与经典斯拉夫派的思想已经有本质的区别：其一，他在宗教哲学上坚持俄罗斯的纯正“血脉”——拜占庭传统，且认为俄罗斯拜占庭主义也有别于其他斯拉夫国家的拜占庭主义；其二，他在国家学说上并不赞成过分强调斯拉夫人的共同意义和作用，而是主张俄罗斯人与斯拉夫人的不同，突出其在斯拉夫世界中的特殊地位。

（四）索洛维约夫对斯拉夫主义学说的发展

如果说列昂季耶夫的“俄罗斯拜占庭主义”实现了斯拉夫主义转向的话，那么这一转向后的顶点则是由索洛维约夫（В.С. Соловьёв, 1853-1900）来完成的。作为俄罗斯历史上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索洛维约夫开创了俄罗斯哲学史上的“第一个哲学体系”——“万物统一”哲学（всеединство），内容几乎包括了一般哲学的所有领域，如认识论、形而上学、人学、自然哲学、历史哲学、伦理学、美学等，这一理论体系不仅为 20 世纪初俄罗斯宗教哲学的复兴提供了思想源泉，也对整个 20 世纪俄罗斯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有关索洛维约夫对斯拉夫主义学说思想的发展，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他关于历史哲学的著述中，主要包括：

一是提出“世界三种力量”的思想。他在 1877 年发表的《三种力量》（Три силы）一文中，将人类文化分为三种类型——穆斯林的东方、西方文明和斯拉夫世界。他认为，第一类文化的特点是对宗教统一原理的绝对服从，否认形式的多样性和任何个性的自由；第二类与第一类相反，不仅发展异常迅速，还具有自由力量和各种成分的独立性和自我肯定性。如果说穆斯林的东方是完全毁灭人类、只肯定“不信人的上帝”（бесчеловечный Бог）的话，那么西方文明追求的首先是对“不信神的人”（безбожный человек）的绝对肯定。^①但在索洛维约夫看来，人类历史的发展不应由上述否定的结果而终结，还应该有新的历史力量登上舞台：该力量不仅能够用“高级调和机理”来激活和升华原先的两种成分，还能为其提供一般性质的必要内容，从而使其摆脱绝对自我肯定和相互否定。这就是“第三种历史力量”（третья

^① Соловьёв В.С. Три силы// Избранное. М.: Советская Россия, 1990. С.47-53.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сила)——斯拉夫人和俄罗斯人。他认为,只有斯拉夫人尤其是俄罗斯人始终处在不受上述两种“初级潜在力量”(низшие потенции)的控制之中,因此才有可能成为第三种力量的历史向导。^①

二是提出“自由神智”说。他认为,宗教信仰是自由创造性探索的结果,而不是盲目仿效传统或权威的结果。盲目信仰并不是人类的优点,而更多的是狗和动物之本性。为此,他提倡用一种新的“自由神智学”(свободная теософия)来替代传统神学,其基础是一切存在之源泉的万物统一本体论。在他看来,神学的本原是“自在物”(Сущее)和“统一物”(Единое),即某“绝对物”(безусловное),在哲学中等同于“乌有”(ничто)的概念。“乌有”不是随便什么事物,也不是某确定物,而是高于一切和摆脱一切的事物。“摆脱一切存在的事物”(肯定的乌有)不是“剥脱一切存在”(否定的乌有)……神之本原就是摆脱一切存在,从而是一切存在的肯定力量……神之本原即万物。^②那么,“乌有自在物”如何变成万物,统一物又如何变为多样物呢?索洛维约夫提出可以在“本原”中分出第二极——“存在极”(полюс Бытия)或“逻各斯”(Логос)。自在物与逻各斯相互关联,如同人的“个性”(личность)与“思想”(мысль)相互关联一样。^③这样一来,自在物与存在、统一物与逻各斯、个性与思想,相互间不相等同,但又不能单独予以认识:没有思想的自在物是乌有,而没有自在物的思想只是纯抽象概念。在本原中区分出两极——自在物与存在、统一物与多样物之后,索洛维约夫又推测出第三极——“多样物中的统一物”(Единое во Многом)和“存在中的自在物”(Сущее в Бытии)。他将该极称为“精神”(Дух)。这样,索洛维约夫提出的“自由神智学”中的本原就由三个成分构成:自在物、存在、精神。这三个成分对应于基督教的“三位一体”(Троица)——圣父、圣子、圣灵。乍看起来,“自由神智学”似乎与斯拉夫主义学说的联系不甚紧密,但实际上却蕴含着索洛维约夫对基督教这一根本问题的深入思考,因此具有深刻的认识论价值。该理论突出强调的“存在”的思想,为20世纪“存在主义”(экзистенциализм)哲学的兴起起到了引领作用。

① Соловьев В.С. Три силы. С.56-58.

② Соловьев В.С. Чтения о Богочеловечестве// Соч. В 2 т. Т.2. М.: Правда, 1989. С.47.

③ Там же. С.67.

三是提出“智慧”说。“智慧”(София)一词是索洛维约夫“万物统一”哲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他把“智慧”视作一种最完美的、精神化了的人类形象和永恒的美丽女神,认为它不仅是世界历史发展的目的所在,也同样是基督的世俗本质,基督就是逻各斯和智慧:作为逻各斯,基督是“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体“圣子”,从而拥有全部的神之本质;作为智慧,基督又是人类之子,从而拥有全部的人之本质。逻各斯和智慧的统一,就构成了神人合一的本原。^①上述“智慧”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智慧,而是最高级的“神的智慧”,强调的是逻各斯即理性主义的作用,从而体现出强烈的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索洛维约夫的“智慧”说,后来被20世纪初的俄罗斯哲学家布尔加科夫(С.Н. Булгаков, 1871-1944)和弗洛连斯基(П.А. Флоренский, 1882-1937)所继承和发展。

四是提出“人类统一整体”说。1888年,在泛斯拉夫主义的代表人物达尼列夫斯基出版《俄罗斯与欧洲》(1868)20年之后,索洛维约夫在《欧洲学报》(Вестник Европы)杂志上发表《俄罗斯与欧洲》的同名文章,对达尼列夫斯基的“历史文化类型”说进行了批判。他认为,达尼列夫斯基学说的本质,是以历史文化类型的多样性来取代人类的统一性,以历史文化类型的孤立发展来取代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性。而在索洛维约夫看来,人类是一个活的整体,人类对它的种族或民族关系不是类对种的关系,而是整体对部分的关系,是实在的活的有机体对自身器官或肢体的关系。这种有机整体的观念就是基督教观念,是神的启示,其本质是全人类的观念和超民族的观念。^②索洛维约夫对达尼列夫斯基学说的批判,并不是要否定文化的多样性和民族精神的存在,而是要坚持普世真理的存在,即强调高于民族个性的人类共性的意义,以防止用“民族利己主义”(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эгоизм)来替代人类的共同理性和良知。为此他提出,世界各国人民都应该走向统一,俄罗斯人的使命和俄罗斯精神的深层含义即在于此。俄罗斯就其自身的地理位置、历史命运以及民族的宗教性质而言,理应为全人类的统一作出自己最重

^① Соловьев В.С. Идея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у Августа Канта// Соч. Изд. 2-е. В 2 т. Т.2.М.: Мысль, 1990. С.577.

^② 索洛维约夫:《俄罗斯与欧洲》,徐凤林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58页。

要的贡献，而要达成此目标，首先要克服民族利己主义。^①

不难看出，索洛维约夫在上述一系列问题上都发展和完善了斯拉夫主义的基本学说，甚至在以下一些关键问题上有重大的修正，如：

(1) 从 15 世纪的“第三罗马”学说以及 16 世纪的“神圣罗斯”思想发展而来的“第三种力量”的思想，是 19 世纪后期俄罗斯思想家对俄罗斯在世界格局中的基本定位。相对于前两种学说所宣扬的“救世主义”、“正教精神”等思想，它更加强调俄罗斯所具有的“高级调和机理”的作用，因此既是对传统斯拉夫主义的继承，又是对西欧派相关学说的吸收，具有鲜明的理性主义色彩。

(2) “自由神智学”就其本质而言是科学、哲学、神学完整知识的统一，其宗旨是要建立一种既包括世界的理想模式、又包括人的行为准则的完整世界观。这是对传统斯拉夫主义神学观宣扬盲目信仰的一种反叛，从而把信仰提高到理性意识的新高度。

(3) 建立在“万物统一”哲学基础上的神学本原既是自在物、又是“逻各斯”的思想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按照他的这一思想，神学中既包含万物，也包含纯精神的东西——人的理性，这就赋予了基督教的永恒内容以新的理性形式，变传统斯拉夫主义对理性主义的否定为肯定。

(4) 所提出的神之本原由三极构成的思想与经典斯拉夫主义有很大的不同。俄罗斯东正教教义中通常只承认“圣父”一体的存在，这是它与罗马天主教主张“三位一体”学说的根本区别所在。但索洛维约夫并不是一味地强调东正教与天主教的区别，甚至也不赞成带有多神教特征的东正教信仰，而是积极吸收包括天主教在内的西方基督教的合理部分，不仅为“三位一体”学说寻找到宗教哲学的理据，更从神学角度强调了人类（存在）和理性（精神）在宗教学说中的重要意义，是对传统斯拉夫主义学说思想的一大发展。

(5) “人类整体”说较之传统斯拉夫主义强调的民族主义思想，无疑是认识论上的一次飞跃。在民族利益与全人类利益这对关系中，究竟孰先孰后、孰轻孰重，究竟是共性决定个性还是以个性抹杀共性，这不仅是历史哲学问题，同样也是俄罗斯民族选择什么样的历史道路的问题。显然，他所主张的

^① Соловьев В.С. Русская идея// Соч. В 2т. Т.2. М.: Правда, 1989. С.229.

俄罗斯民族的历史道路，既不是纯粹自己的，也不是简单模仿西方的；既不是纯粹斯拉夫派的，也不是纯粹西方派的，而是一条“人类大同”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讲，索洛维约夫与早期斯拉夫主义者之间最大的不同，就是对斯拉夫派和西欧派学说思想同时实现继承和超越。

可见，相对于早期的斯拉夫主义学说而言，19世纪后期的斯拉夫派学者在许多方面都有了比较明显的发展：无论是小阿克萨科夫提出的“民族性”和“三位一体”说，还是达尼列夫斯基提出的历史文化类型理论，无论是列昂季耶夫提出的“俄罗斯拜占庭主义”学说，还是索洛维约夫提出的“万物统一”哲学和“人类统一整体”说，其学理的内涵和外延或多或少都实现了对早期斯拉夫主义学说的超越，从而将原有学说中所蕴含的思想自觉的特质上升为更符合俄罗斯未来发展的民族自觉。显然，民族自觉在学理内涵上比思想自觉更具有张力和生命力，它不仅将俄罗斯的命运与整个斯拉夫乃至欧洲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更为重要的是，还吸收了西方理性主义的合理成分，从而完成了对俄罗斯哲学体系最初范式的构建。

综上所述，在与欧洲主义的抗衡中发展起来的斯拉夫主义学说，总体看，其基本学理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特点：（1）以传统村社制度的优越性来抗衡西方的道德观念；（2）以东正教信仰的优越性来抗衡西方的经院哲学；（3）以君主制的优越性来抗衡西方的立宪制；（4）以“救世主义”来抗衡西方道路模式；（5）以“唯实论”来对抗衡西方的“唯理论”；（6）以“精神共性”来抗衡西方的“个性至上”。但如果我们透过这些特点表象对斯拉夫主义学说的学理内涵作进一步的透视，就不难发现，有一种内隐的巨大力量始终在起着“扛鼎”的作用，那就是由文化自信走向思想自觉，并最终再走向民族自觉。也就是说，斯拉夫主义学说本质上是俄罗斯实现由思想自觉到民族自觉的第一个完整理论体系，它是俄罗斯民族的“魂魄”之所在，也是该民族看待世界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Abstract】Slavism is an imperative perspective for Russian studies due to its uniqueness to Russian national views and methodology on the world. Although there are various academic researches on Slavism, including

philosophical, political, historical, sociological and economic perspectives, still they lack further exploration of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of the gen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According to researches, the basic doctrine of Slavism contains “revolutionary” philosophy in Russian intellectual history, which refers to intellectual consciousness and national consciousness based on their cultural confidence. Only through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intrinsic links between these three, can we have a more rational and comprehensive perspective of the past, the present or even the future of Russia.

【Key words】 Slavism, Russian Ideas, Russian Culture, Russian National Consciousness

【 Аннотация 】 Неминуемым подходом в изучении русских идей является славянофильство, представляющее собой свойственные русскому народу философские основы и методологию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я. Несмотря на больш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философских, политологических,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х,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и т.д.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славянофильства, наблюдается нехватка более глубинного анализа эволюции развития данной 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й коннотаци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казывают, что основные принципы учения о славянофильстве содержат в себе определённые философские ценности, обладающие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м» значением в истории идеологии России, и являются построенными на национально-культурной уверенности идейным 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м самосознанием. Только посредством углублённого анализа внутренних связей вышеуказан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возможно более рационально и всесторонне понять прошлое, настоящее и будущее России.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Славянофильство, русская идеология, рус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национальное самосознание в России

(责任编辑 阎德学)

《2025年前俄罗斯国家民族政策的战略》 解读与分析*

戴艳梅 刘肖岩 徐祗朋**

【内容提要】民族问题是俄罗斯国内最复杂的问题。冷战结束后，叶利钦政府1996年出台的《俄联邦民族政策构想》是当代俄罗斯国家解决这一问题的首次尝试，但是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普京重任总统后着手推出新的民族政策战略。2012年12月19日出台的《2025年前俄联邦国家民族政策的战略》阐释了俄联邦民族（种族）间关系状况，规定了俄联邦国家民族政策的目标、原则、优先方向与任务，并构建了实施俄联邦国家民族政策的机制，试图以此塑造俄罗斯国家民族意识，重振大国雄风。

【关键词】俄罗斯民族问题 俄罗斯移民问题 俄罗斯民族政策构想

【中图分类号】D752.1; D633.0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5)04-0035(23)

当前，国家内部冲突已经取代国家间冲突成为导致动乱的重要原因，因此，着力解决国内民族问题成为当代世界各国政府最重要的施政方针之一。尽管民族问题不是导致前苏联最终解体的最重要原因，但无疑是其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故解决民族问题一直是历届俄罗斯联邦政府的工作重点。2012年12月19日，普京总统签署第1666号总统令，公布了《2025年前俄联邦

* 本文系河北省社科基金《重大体育赛事反恐预警研究》（项目批准号：HB14TQ004）的阶段性成果。

** 戴艳梅，武警学院边境与出入境安全研究基地教授，军事学博士；刘肖岩，武警学院边境与出入境安全研究基地教授，文学博士；徐祗朋，武警学院边境与出入境安全研究基地教授，民族学博士后。

国家民族政策的战略》（以下简称《战略》）。该战略是继 1996 年《俄联邦国家民族政策构想》出台后的第二个纲领性的国家民族政策文件。1996 年的《构想》虽然早已过时，但新战略久经研究、争论，却始终难以出台。普京重任总统前就开始新战略的构思，上台后迅速推出新战略。战略拟定时间虽短，但前期酝酿时间颇长，因此，也可以看作是对俄罗斯近十六年来民族政策的总结和对民族政策各派不同观点的努力整合。

一、俄罗斯国家民族战略出台的背景

苏联解体后，针对积重难返的民族问题，俄罗斯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加强各民族的国家认同感，以期为国家安全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必要的内部环境。这次民族战略规划，既是对以往民族政策的一次检视，更是一种法制性的规范。

（一）巩固俄罗斯各民族国家认同思想基础的需要

俄罗斯是世界上民族最多的国家，据 2010 年人口普查的统计，俄罗斯共有 193 个民族和 40 个族群，其中 7 个民族（俄罗斯族人、鞑靼人、乌克兰人、巴什基尔人、楚瓦什人、车臣人和亚美尼亚人）的人口超过了 100 万，俄罗斯族人口数量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 80%。当时俄罗斯共有 83 个联邦主体。2014 年 3 月，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加入俄罗斯后，俄罗斯共有 85 个联邦主体，其中 22 个是民族共和国。由于民族众多，各民族间发展不平衡，使得俄罗斯成为世界上民族问题最为复杂的国家之一。苏联的解体与大规模民族分裂主义运动有着直接的关系。对此，雷日科夫甚至称民族关系是“摧毁苏联的攻城槌”。^①

因此，和谐的民族关系和强烈的国家认同感，是维护俄罗斯国家安全稳定的重要筹码。普京当然认识到其重要性，2012 年 1 月 23 日，他在《独立报》发表题为《俄罗斯：民族问题》的纲领性文章。文章指出：“对俄罗斯

^① [俄]尼·伊·雷日科夫著：《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 年，第 17 页。

来说，其语言、传统、种族与文化的多样性都是民族问题。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具有根本性质的问题。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都应当知道，我们国家生存的主要条件之一就是公民与民族的和谐。”^①这篇文章阐述了俄罗斯所面临的民族关系紧张局面、俄罗斯各民族统一与融合的历史传统、作为国家文化象征的俄罗斯文化、强力机构在民族政策中发挥的作用、移民融合问题等等。《战略》中有关民族政策的一些核心用语在文章中都已经有所提及。

上述认识不仅是政界的共识，在俄罗斯学界也有大量的讨论。一个比较有共识的认识是，需要形成国家民族认同的思想基础，并认为俄罗斯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国家没有明确的意识形态体系。莫斯科人文大学校长伊利英斯基（Игорь Ильинский）指出，俄罗斯没有意识形态体系，只有经济（而且主要是石油管道和石油），而没有意识形态体系就没有民族。只有当意识形态可以支撑任何足够大的人类团体时，部族才会变成民族，这是以国家共同命运联系起来的人群。对俄罗斯来说，找寻新的意识形态就是找寻能大规模团结人民的意识，这是超越民族、统领各民族的俄罗斯人的意识形态。目前俄罗斯社会和当局在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下面临的政治任务，是设计并有针对性地形成新的俄国民族。^②

（二）根除恐怖主义滋生土壤的需要

对俄罗斯预防恐怖主义来说，最重要的任务是形成有效的国家民族政策。2008年出台的《俄联邦反恐构想》指出，恐怖主义在俄罗斯扩散的主要原因包括民族、宗教等社会矛盾，以及民族、宗教极端思想在俄罗斯的扩散。^③早在1996年6月15日，第909号总统令就批准通过了《俄联邦国家民族政策构想》。该构想旨在解决以下问题：发展和完善联邦关系，使联邦主体的独立自主与俄罗斯的统一和完整这有机地结合起来；发展俄罗斯各民

①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Росс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вопрос. http://www.ng.ru/politics/2012-01-23/1_national.html

② Ильинский Игорь Михайлович. О российской нации// Знание. Понимание. Умение. 2009. №3. <http://www.rikmosgu.ru/publications/3559/4825/>

③ Концепция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ия терроризму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www.rg.ru/2009/10/20/zakondok.html

族语言文化，同时加强全体俄罗斯人共同的文化特征；从政治和法律上保护少数民族和小民族，保障他们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利和自由；保持和巩固北高加索地区的稳定，达成当地各民族关系和谐；支持居住在境外的俄罗斯同胞，加强他们与俄罗斯的沟通。^①该《构想》的实施保障了俄罗斯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

随着新世纪普京当选为俄罗斯总统，以及一系列巩固国家的措施，强化了俄罗斯人民同一命运的认识，为形成俄罗斯公民意识创造了条件。俄罗斯重新走上稳定发展道路，促进了俄罗斯各民族的和谐与国家认同感。在政策落实方面，俄罗斯在保障北高加索的政治稳定上取得了实质性成果，通过了保障少数民族原住民权利的法律。在发展民族文化自治、保障教育领域的公民权利与民族认同方面也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但该构想实施以来，因民族问题引发的冲突仍此伏彼起，俄罗斯应对因民族分离引发的恐怖主义威胁仍以强力手段为主，未能从根源上解决极端民族主义问题，需要制订新的《战略》以进一步缓和民族矛盾，消除恐怖主义滋生的条件，这是《2025年前俄联邦国家民族政策战略》出台的重要原因。

（三）进一步调整规划国家民族战略方向的需要

普京在2012年1月发表的《俄罗斯：民族问题》中提出，必须通过一部民族政策战略。在起草民族政策战略前，总统提出要突出下列方向：（1）强调俄罗斯是一个独特的世界文明国家，其特点是民族的多样性。俄罗斯拥有193个民族，使用277种语言和方言。国家教育系统使用89种民族语言，即学校教授89种语言，这种保护公民民族文化权利的水平在欧洲国家是独一无二的，他号召大家珍惜这一财富。（2）加强俄罗斯多民族人民的公民团结，发展俄语作为主要语言的联系纽带。普京指出：“我们各民族的祖先团结一致，创立了统一的俄罗斯人民和俄国民族，这个遗产一定要珍惜”^②。（3）创建和谐的民族关系、预防民族冲突。因为极端分子活动加剧，他们

① Концепц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http://www.russia.edu.ru/information/legal/law/up/909/2051>

② Президент РФ определил основные направлен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и// Областная газета. 28 августа 2012.

打着民族和自由的幌子，高喊俄罗斯、鞑靼、高加索或其他地区的民族主义口号，为防止社会割裂，最重要的是社会要形成宽容、尊重其他民族文化的风气。

（四）解决移民问题造福俄国社会的需要

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人口多年持续负增长。因此，俄罗斯长期以来实行着较为宽松的移民政策。据俄罗斯移民局统计，到 2011 年底，在俄罗斯正式登记的移民为 900 万，加上没有登记的非法移民，数量更为庞大。国家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与原住民和新移民的冲突构成了无法调和的矛盾。俄罗斯的外国移民主要来自中亚、高加索等贫穷国家，国内迁徙移民则多为北高加索居民因战乱或贫穷到俄罗斯其他城市谋生。多数移民受教育程度低，不了解当地语言文化，又以低廉的价格挤占劳动力市场，因而受到当地居民的排斥；而很多移民觉得只有依靠本民族的力量才能在当地立足，因此他们按民族聚居，完全照本民族习俗生活，拒绝融入当地生活，形成移民飞地。近年来，俄罗斯发生过多起原住民与移民的冲突：2006 年 9 月的光大波卡事件、2010 年 12 月的莫斯科马涅什广场事件、2012 年 6 月的杰米扬诺沃居民与达吉斯坦商人的冲突、2013 年 7 月的普加乔夫事件、10 月的比柳廖沃事件、12 月的阿尔扎马斯事件等，所有这些事件都引起了大规模的骚乱。不仅如此，移民还按照民族原则或者地域原则结成移民团伙，抢占当地劳务市场。比如，中亚劳务移民多在建筑工地谋生；而露天市场多为北高加索人经营；斯塔罗波尔边疆区的农田多被车臣人承包，形成民族性行业，其他民族的人很难挤进去。移民中的年轻人常有吸毒、卷入黑社会等违法犯罪活动，引起了国内民众的不满甚至抗议。因此，制定相应的民族政策，让移民文化融合，让移民快速掌握当地语言、文化和法律常识，成为俄罗斯不得不高度重视的主要社会问题，需要俄罗斯进行战略规划。

（五）处理“俄罗斯族”问题与防止民族分裂主义的需要

早在 2011 年，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发表了一份

文件——《俄罗斯新民族政策》。^①其中罗列了俄罗斯当局对俄罗斯族的三种歧视：（1）对俄罗斯人的“行政歧视”。文件认为，俄罗斯统治集团拒绝承认俄罗斯族为立国民族，1993年的宪法中没有提及俄罗斯人民等。这份文件还称，“目前俄罗斯人的地位还不如苏联的俄罗斯加盟共和国时期，因为尽管当时这是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境内设立了许多自治地区，但俄罗斯族在意识形态上还被承认是俄罗斯共和国的主体民族。比如在学校画各兄弟民族时，还有穿俄罗斯民族服装的人，而今天俄罗斯人从形式上不被承认。”（2）对俄罗斯人的“法律歧视”。这份文件指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国家，但俄罗斯人作为一个民族，几百年来第一次成了无国籍人，是现代世界上最大的无国籍人群。俄罗斯国内任何民族都可以实现民族文化自治，只有俄罗斯族不能。（3）对俄罗斯人的“财政歧视”。自由民主党的这份文件认为，俄政府在高加索花钱买稳定，仅车臣2025年前就将从联邦预算中获得4980亿卢布，其中1562亿用于补偿居民在军事行动期间的住房损失，事实上北高加索变成了联邦预算的黑洞，但局势也没稳定。北高加索居民只占俄罗斯人口的6.3%，但中央花在那里的资金却占22%。此外，北高加索各共和国的预算平均补贴为69%，车臣和印古什达到了91%，俄联邦花在每个车臣人身上的钱为4.7万卢布，而花在每个俄罗斯族人身上的钱平均只有5000卢布，这种情况让很多人觉得不公平。而且，获得联邦资金的北高加索共和国并不稳定，是向中央地区输出犯罪和恐怖主义的地区。

上述观点表达了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对现行政策的不满和诉求。基于上述见解，俄罗斯自由民主党认为，在俄罗斯领土上存在其他民族国家，是践踏俄罗斯族人的权利，因此建议改变俄罗斯的民族地域体制。在多民族的俄联邦内设立民族共和国，必然要寻求主体民族的作用，因此建议回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的方式：一元俄罗斯国家，内部可以有民族自治地区，将民族地区体制转为“省”的体制，俄罗斯只能有一种地区——省，它是行政单位，不带有任何民族地位。文件建议改变国家体制，以宪法肯定俄罗斯族“立国民族”的法律地位。2010年马涅什广场发生骚乱后，自由民主党领导人伊格尔·列别捷夫（Игорь Лебедев）提出，通过修宪确定俄罗斯族“立国民

^① Новая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М., Издание ЛДПР, 2011.

族”地位，随后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表示支持这一提议。时任总统梅德韦杰夫强调的是多民族和多元文化的价值，威胁要制裁在选举中试图“打民族牌”的人。但是，大部分的议会政党，包括公正俄罗斯党等，仍在选举纲领中正式提出授予俄罗斯族“立国民族”的地位，其目的是要国家优先关照俄罗斯族，认为整个俄罗斯及 192 个其他民族的幸福与安宁都取决于它，这是唯一的最特殊的民族，没有它也就没有俄罗斯。

与此同时，俄罗斯境内的其他民族分裂主义意识也日益强化。如，车臣历史学家哈桑·巴卡耶夫（Хасан Бакаев）强调民族独立、国家主权的重要性，他的观点在少数民族、特别是苏联时期受过迫害的民族中具有代表性。他说，对车臣人来说，民族独立高于政治，高于意识形态，每个车臣人的神圣使命就是做车臣民族生存的捍卫者。^①他表现出对民族被同化、失去民族特色的深刻担忧。巴卡耶夫认为种族灭绝有不同的方式，有镇压类的粗暴形式，也有同化类的温和形式，同化一个民族首先是同化它的语言，因此保留和发展车臣语言是民族自我保全战斗的前沿阵地。新《战略》纠正了上述各种说法，对各民族的地位与权利义务都作了界定，对打击大民族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是一种法律武器。

（六）新建立的民族问题管理机构加速了新《战略》的出台

1996 至 2012 年期间，一直未能出台新的民族政策战略的原因之一，是 2001 年取消联邦民族和移民政策事务部后，俄罗斯没有专门负责民族问题的部门。民族问题改由地区发展部负责，而这个部门的首要任务是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协调民族关系的任务居于第二位，导致对诸多民族问题拿不出及时有效的解决方案。近年来俄罗斯一直在研究恢复民族事务部，2011 年 10 月，时任总理的普京指出，国家必须有一个负责民族关系的机构。2012 年普京再次就任总统后，于当年 5 月 12 日签署了第 602 号《关于保障民族和谐》的总统令，次月即成立了民族关系委员会，目的是完善国家在民族关系领域的政策。民族关系委员会是隶属于俄联邦总统的协商和咨询机构，成

^① Хасан Бакаев. Для чеченцев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больше чем политика. 31.3.2012. chechenpress.org

立该机构的目的是，保障联邦国家政府机关、俄联邦各主体国家机关、地方自治机关、社会团体、科学和其他机构之间在审议涉及落实俄联邦国家民族政策问题时的协调工作。委员会成员除官员外，多数为公民代表、民族组织和非政府团体的领导人、专家和学者。根据第 602 号总统令，民族关系委员会成立了专门的工作组起草《俄联邦国家民族政策战略》草案。2012 年 9 月 27 日，草案完成并发往俄罗斯各联邦主体，并定于当年 10 月 1-25 日期间在立法机构、科研机构和社会组织内进行讨论。

二、俄罗斯国家民族战略的主要内容

《2025 年前俄联邦国家民族政策的战略》（以下简称《战略》）共四个部分三十三条：总则，俄联邦民族间（种族间）关系状况，俄联邦国家民族政策的目标、原则、优先方向与任务，实施俄联邦国家民族政策的机制。

（一）总则部分

总则规定了制定战略的目的、依据及实施要点。制定该战略的目的，是保障俄联邦国家、社会、个人的利益，巩固国家的统一与领土完整，维护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保障公民的宪法权利与自由，使俄罗斯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相结合，旨在全方位促进俄联邦各民族的合作，发展民族语言与文化。战略依据俄宪法、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及俄罗斯长期以来的政治历史经验制定。战略的实施要点是，维护并发展俄联邦各民族的文化与语言，加强其精神的同一性；保障原住少数民族的权利；保障北高加索稳固的民族与民族间和平与和谐，构建社会经济与政策的良好环境；支持海外侨胞，促进其与俄罗斯关系的发展。

（二）俄联邦民族（种族）间关系状况部分

这部分提出了“俄国民族”的概念。指出，“俄罗斯国家是由各民族团结而成的，这个民族系统的核心历来是俄国民族。俄国民族起到了黏合作用，通过长期的文化与民族融合，在俄罗斯形成了文化多样性与内在精神的同一

性。”现代俄罗斯有着统一的文化（文明）符号，其基础是俄罗斯文化、语言及各民族的历史与文化遗产，共同的特征是对真理与公正的强烈追求，它吸纳了各民族文化中最优秀的部分。政策将俄罗斯民族与宗教的多样性、文化与宗教合作的历史经验、对传统的保持与发展，视作俄国民族的共同财富，认为这是巩固俄罗斯国家性的因素，决定着俄国民族关系未来发展的积极方向。

该部分还指出了国内民族关系存在排外、民族不宽容、民族与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等状况，指出影响民族关系发展的因素是：贫富分化严重；传统道德价值观被侵蚀；法律虚无主义、高犯罪率与腐败；民族歧视；民族政策教育与科研滞后；管理机构不协调；移民工作不力等。这些问题与国际个别文化全球化、各种难民移民问题泛滥、国际恐怖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的扩张、国际犯罪集团扩大一起，加剧了俄罗斯国内民族问题的复杂性。

（三）国家民族政策的目标、原则、优先方向与任务

国家民族政策的目标共 5 点，主要以巩固全俄公民意识与精神统一为基础，发展各民族文化，协调民族关系，保障个人的平等权利与自由，并促进移民的融合。

国家民族政策的主要原则共 18 条，主要是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与政权的权威；保障各民族的平等与自决，个人的平等权利、自由与民族尊严，消除因社会、种族、民族、语言或宗教信仰而产生的歧视，及挑起此类冲突的尝试，禁止成立以种族、民族或宗教属性为标志的政党；保护俄罗斯民族文化与语言；保护少数民族的权利；帮助俄侨自愿迁居俄罗斯，加强联系，维护其文化与语言；促进移民融合；明确民族政策领域国家管理机关的职权，加强协调；国家机关与公民团体在实施国家民族政策时相互合作；继承俄罗斯各民族团结与相互帮助的传统，及时与和平解决民族矛盾与冲突等。

国家民族政策的优先方向共 13 点，主要是：完善国家管理机构；保障民族和谐；保障公民的平等权利与宪法权利的实现；创造移民融合条件；社会经济保障；加强民族团结与精神一致；维护并发展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保障人民在社会文化领域的权利；发展未成年人教育及公民爱国主义教育体

系；维护与发展俄罗斯人民的语言，使用俄语作为官方语言；保障实施民族政策的信息宣传；完善国家机关与社会团体的合作；国际合作。以此为依据，俄联邦国家民族政策的任务规划了 13 个优先方向的具体任务。

（四）实施国家民族政策的机制

在国家民族政策贯彻落实的保障机制方面，《战略》也进行了规划：由俄联邦政府负责制订计划和实施，并向俄罗斯总统负责；为了解决以往的政策落实过程中资金难以保障的问题，《战略》规定在实施这一构想的过程中，经费纳入联邦及地区预算；为了更好地体现俄罗斯国内民族情况，制定出切实符合俄联邦实际的民族发展政策，俄联邦国家民族关系委员会有向总统提出民族政策建议的权利和义务，同时国家委员会^①向总统提供建议；《战略》同时还规定了国家民族政策实施的其他途径，包括签署相关国际条约，通过国家各层级法律法规对执行主体进行权利与义务的制约等，确保把国家民族政策构想的贯彻落实纳入法治轨道。

三、《2025 年前俄联邦国家民族政策的战略》解读

《战略》本身既是对俄罗斯联邦国内林林总总的民族问题的综合审视的结果，也是对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民族政策系统化规范化的结果，同时也是吸收各种修改意见而形成的一种“集大成”的新世纪俄罗斯国家未来发展战略文件之一。

（一）《战略》正式文本与草案之间的差别

《战略》在形成过程中充分吸纳了来自各阶层的意见和建议，这是俄罗

^① 俄联邦国家会议（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совет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是据 2000 年 9 月 1 日第 1602 号总统令《关于俄联邦国家会议》组建的咨询性机构，它不是国家权力机关，主要任务是协助总统保障国家权力机关的协调与合作；讨论对国家有特殊意义的问题，向总统提供建议；据总统建议研究联邦法与总统令草案；讨论预算草案与干部政策问题等。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от 1 сентября 2000 г. N 1602"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м совете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http://base.garant.ru/12120571/#ixzz3hvBovcXW>.

斯近年来为数不多的经历大规模讨论而形成的官方文件。对《战略》草案进行讨论期间，共收到修改意见 1500 多条，起草委员会根据这些意见和建议对草案进行了大量修改，修改多达 3500 多处，^①从文本结构到内容都有非常大的改动。《战略》草案分六章，除了目前保留下来的四章外，被删除的第五章是“民族关系状况主要参数(指标)”，第六章是“战略实施的阶段及预期结果”。其中对内容进行了实质性改动的地方有：删去了草案第一章第五条的概念界定。草案中共定义了 11 个基本概念：“俄联邦民族政策”、“俄国民族”、“同胞政策”、“全俄公民认同”、“民族团体”、“民族”、“俄联邦原住民族”、“俄联邦原住少数民族”、“民族关系”、“部族冲突”、“民族关系和谐”。在讨论中，学术界倾向于保留这些概念，毕竟这是法律文件的通常做法。但由于各民族从自己的利益和角度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分歧太大，无法统一，最终还是删除了所有的概念解释。

《战略》新增了国家民族政策需要注意的四个方面的问题：1.保留和发展俄联邦各族人民文化和语言，加强其精神统一；2.保障当地的小民族和少数民族的权利；3.为保障北高加索民族内部和民族间的和平与和谐创造额外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4.支持居住在国外的同胞，协助其发展与俄罗斯的联系。草案中陈述俄罗斯境内居住着 193 个民族时，使用的是“民族共同体”这一说法，这引起了俄罗斯族的强烈不满，因而在《战略》的正式文本中没有提“民族共同体”的说法而改为“民族”。尽管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对草案中未提及俄罗斯族的“立国作用”提出强烈抗议，但在最终的《战略》文本中并没有采纳这些意见，而是保留了原先使用的俄罗斯民族的“黏合作用”这一表述。草案中对苏联时期民族政策造成的负面结果的表述，在正式文本中都没有保留。毕竟除了斯大林时期对少数民族进行大规模镇压和迫害外，列宁的民族政策、民族关系中讲究国际主义、民族友谊的做法都是深得人心的。

《战略》在第三章增加了国家民族政策的优先方向，共 13 条，具体列

① Зорин В., Аствацатурова М. Стратег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и укрепление духовной общ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наци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прикладной и неотложной этнологии №.236. Москва, 2014.

出了实施民族政策的主要做法。国家民族政策的主要原则在草案中只有 9 条，但在正式文本中列出了 18 条，增加了 9 条，如相互尊重各民族的传统和风俗；保障少数民族权利；保障迁至俄罗斯长期居住的外国公民和无国籍人士融入俄罗斯社会；及时、和平解决民族冲突和矛盾等等。这样就比较全面地考虑了民族关系现阶段面临的困境，为解决问题和冲突提供了思路。在主要原则这部分删除了“每个公民有权自愿决定并指出自己的民族属性”这一条。按说每个公民确实有权指出自己的民族属性，但俄罗斯护照上未设这一栏目，为了淡化民族属性，《战略》回避了这个敏感的问题。在《战略》实施部分，新增了经费保障和来源的内容。

（二）《战略》突出强调的几个方面

一是《战略》提出了“俄国民族”的概念。尽管“俄国民族”（Российская нация）这一说法早就存在，但《战略》是第一个正式提出该概念的官方文件。《俄联邦宪法》使用的是人民（народ）一词。^①在俄罗斯，与“俄国民族”有关的概念还有“народ”、“народы”、“нация”、“этнос”等等，俄罗斯人自己在使用中也比较混乱，难免引起争论，甚至出现народы в народе这种不符合俄语语法的表述。从《战略》的角度来看，“俄国民族”（Российская нация）是俄罗斯各族人民的内在同一性的集中体现，其基础是俄罗斯多民族（多种族）人民，是自由和负有责任感的公民的共同体，它建立在精神道德的原则上，建立在保障安全、保护全国所有公民切身利益和财产的基础上，不突出公民的民族、宗教和政治观点。普京在《俄罗斯：民族问题》一文中讲道，“事实上俄罗斯人是国家的形成者。俄罗斯的伟大使命是团结融合文化。这一文化认同感建立在维护俄罗斯文化优势上，俄罗斯文化不仅是俄罗斯族，还是这一文明身份的各个民族的承载者”。^②《战略》将这种文明定义为：“在维护与发展俄罗斯文化与语言、俄罗斯所有民族的历史与文化遗产基础上，对真理与公正的强烈追求，尊重

① 见《俄联邦宪法》宪法第一段：我们，在自己土地上由共同命运联合起来的多民族的俄罗斯联邦人民，确认人的权利和自由、公民和睦与和谐……

②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Росс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вопрос. http://www.ng.ru/politics/2012-01-23/1_national.html

俄罗斯各民族独特的传统并能够将其中最优秀的部分整合进统一的俄罗斯文化。”^①

二是《战略》强调公民的平等权利和相互尊重，淡化狭隘的民族意识。《战略》多个条款涉及这一点。如主要原则“俄罗斯人民的平等与自决”；“制止并根除任何形式的因社会、种族、民族、语言或宗教信仰而产生的歧视”；“俄罗斯各民族相互尊重彼此的传统与习俗”。俄罗斯的民族关系要建立在平等、互利、团结的基础上。“社会问题往往以民族紧张关系为出口”，淡化民族意识，有利于不同族群的和谐相处、融合与统一，当社会矛盾出现时，不至于立刻表现到民族关系上，引发冲突。

三是《战略》指出要完善负责国家民族政策的管理机制。在“任务”部分，从立法、国家机构、公民社团、协作、培训等方面进行了规定。这是因为，社会经济问题、政府效率低下、腐败等都可能成为民族冲突的借口。治理民族关系的紧张，营造民族和平、和谐，需要综合措施，需要跨部门的协作，要在平时构造稳定和谐的社会，要以对话、合作来缓解民族关系，不造成使用暴力的机会。“护法机关已经证明，不使用暴力，也能清晰而迅速地处理问题”。在《俄罗斯：民族问题》一文中，普京建议成立一个与总统、政府首脑互动的合议机关。他就任总统后，2012年5月7日发布的第602号总统令，就要求在6月1日前准备成立直属总统的民族关系委员会。历来民族政策实施的掣肘就是财政支援不足，为此，《战略》也将“为有效实施国家民族政策提供社会经济条件”列入了优先方向。

四是《战略》详细规划了移民问题的解决办法。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表明，移民和少数民族问题是影响俄罗斯安全稳定的重要因素，新《战略》对这两个方面的问题给予了特殊的关注。统计数据表明，俄罗斯在2003年时就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移民接纳国，其外来移民以独联体国家居民为主。^②

①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Росс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вопрос. http://www.ng.ru/politics/2012-01-23/1_national.html

② 俄罗斯成为第二大移民接纳国，青年参考，<http://news.sina.com.cn/o/2003-08-20/1307601881s.shtml>

时隔十多年，情况仍然如此。^①俄罗斯内部移民也十分盛行，如俄罗斯人从北高加索地区的迁出、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移民社区的形成等。但由于排外与对外来文化的抵制，同一民族移民的抱团居住，使移民难以融入当地社会。例如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就形成了多个不同民族的移民社区，甚至形成了具有种族特征的移民飞地。《战略》目标列入了使移民适应并融入当地社会与文化的内容，在原则、优先方向、任务中也将此作为重点，将其作为完成2025年前俄联邦国家移民政策构想中社会经济与人口任务的一部分，要求从机制、文化、教育、公民社团等方面促进移民的融合。在任务中，提出借鉴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经验来实施移民政策。普京在《俄罗斯：民族问题》中提出了欧亚一体化的概念，要以后苏联空间紧密的一体化替代不受控制的移民潮。他指出，欧亚一体化的任务是创建能够使移民正常流动的重要制度，引导移民流向最不容易引起紧张的地区，让原住民觉得正常而舒适，使俄罗斯能够对所有人都具有吸引力，认为俄罗斯是自己的祖国。

五是特别关注少数民族问题。俄罗斯联邦的少数民族问题依然比较严重，成为产生恐怖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的重要根源。新《战略》规定，国家相关部门应该保护境内少数民族的权利，对其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提供支持，保护其原有的生活资源与传统生活方式。俄罗斯193个民族中只有21个有自己的民族共和国（至2014年2月），由于历史原因，以前聚居的少数民族大多散居各地。生活在同一个地区的各个民族，由于有着历史恩怨与现实利益矛盾，极易引发民族冲突，甚至是暴力事件。因此，1996年《民族政策构想》已经关注到少数民族的利益，新《战略》亦将此列为需要解决的问题，提出在构建共同的俄国民族意识时，保护少数民族，帮助他们缩小经济差距，满足他们的文化需求，发展其民族传统，保留其语言。

四、针对俄罗斯国家民族战略相关问题的讨论

《2025年前俄联邦国家民族政策的战略》草案是在总结了1996年《俄

^① Михаил Малыхин. Россия заняла второе место в мире по числу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мигрантов. 2013-09-12. <http://www.vedomosti.ru/management/articles/2013/09/12/rossiya-zanimaet-vtoroe-chislo-v-mire-po-kolichestvu>

联邦国家民族政策构想》的实施情况，综合考虑了保障国家安全的需要，参考了经济、地区发展、对外活动、移民、青年、教育与文化等涉及民族问题的政策后起草的文件，是新的俄罗斯国家民族政策战略。参与讨论的有各联邦主体的执法机构、科研机构和社会组织、官员、宗教界人士、知识分子、各党派领导等，涉及面非常广。总统国内政策管理局副局长别洛索夫（Михаил Белоусов）指出，从收集上来的反馈材料看，社会讨论意见基本上是建设性的，只有一些激进分子和民族主义者发表了不满的看法^①。各民族地区均认为，在民族冲突日益严重的今天，出台这样一个纲领性的文件是非常必要和及时的。民族问题不很突出的联邦主体也原则上同意该《战略》，如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在都从未发生过大规模民族冲突的后贝加尔地区、俄罗斯中部的萨哈共和国等。在这次讨论中，争论的焦点主要有以下几个：

（一）俄罗斯族的地位问题

总的来说，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集中表现为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是：“俄罗斯是俄罗斯人的俄罗斯”。持这种观点的团体和人士认为新《战略》危害了自己的利益，因而对其效果持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全世界俄罗斯人民大会”^②对《战略》草案直接给出否定的结论。它认为，草案忽略了俄罗斯人民自我意识的增长，忽略了它的历史和当前利益；其主要目标仅仅是偷换了以前“新苏联人”的概念，从前的提法就没有成功，而现在则换成了没有种族认同的“俄罗斯人”，没有提到俄罗斯族，尤其是哥萨克人作为立国民族的特殊法律地位。该团体作为俄罗斯族和俄罗斯南方哥萨克的代表，坚决反对通过《战略》作为国家文件，认为它没有反映俄罗斯人民的现实问题，也没有提出解决办法，甚至认为它只是 16 年前车臣战争最激烈时通过的《国家民族政策构想》的更加退化的版本。^③

萨哈共和国议会对草案的反馈意见是，他们认为在新《战略》中“俄罗

① Официальный сайт Собрании Федерации. В Совете Федерации обсудили проект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и замечания к проекту стратег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и РФ. 2012-11-09. <http://council.gov.ru/press-center/news/15040/>

② 该“大会”是获得俄罗斯东正教庇护的国际性社会组织，主席为东正教大牧首基里尔。

③ Александр Суходолов. Проект власти-Отклонить! http://communitarian.ru/novosti/npsr/proekt_vlasti_%96_otklonit_07122012/

斯民族已被降低到‘民族共同体’（этническая общность）的地位”，担心对六万人的小民族与一亿多人口的俄罗斯族同等地使用“民族共同体”的概念，可能会造成利益和认同方面的冲突，这样不利于实现《战略》的既定目标。

还有一些俄罗斯族人认为，必须标明俄罗斯民族的特殊地位、特殊作用。同时，由于俄罗斯联邦内有很多以少数民族的名称命名的“共和国”，他们甚至提议恢复俄联邦境内的俄罗斯共和国。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不仅要求在《战略》中体现俄罗斯民族的立国作用，还要求通过修改宪法，以立法的形式明确俄罗斯族的作用和地位。为了要求联邦政府支持他们的观点，这些人甚至提出了“俄罗斯是俄罗斯人的俄罗斯”的口号^①。

另一种观点是“俄罗斯是所有人的俄罗斯”。持这种观点的人对新《战略》基本上是肯定的，但是认为在执行过程中应该采取必要措施，增进其可行性。针对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提出的在《战略》中突出俄罗斯族地位和作用的要求，其他少数民族也纷纷提出自己的看法。在参与草案讨论的过程中，他们坚持认为，在民族战略和政策中不能突出任何一个民族，因为这样做的结果不会构筑和谐的社会，而会导致国内民族关系的不稳定。针对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提出的“俄罗斯是俄罗斯人的俄罗斯”这一口号，邦达连科（Виктор Бондаренко）和古托夫（Дмитрий Гутов）组织了“所有人的俄罗斯”运动^②，他们反问道：难道柴可夫斯基（祖父是法国人）、齐奥尔科夫斯基（父亲为波兰人、母亲为鞑靼人），杜那耶夫斯基（犹太人）在俄罗斯没有地位吗？所以他们支持“俄罗斯是所有人的俄罗斯”的观点。更多其他民族的代表从自身利益出发，也坚决反对在国家民族战略中突出俄罗斯族的地位和作用，认为这有悖于民族平等的原则。为了增强《战略》在实践层面的可操作性，与会讨论的代表多次谈到应在国家电台黄金时段播出介绍俄罗斯各民族的节目，让俄罗斯各民族相互了解，由此增加对其他民族的尊重，同时还能帮助发展旅游业。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草案中关于“进行精神道德培养、协调友好的兄弟般民族关系”的措施，应当占有突出重要的地位。学

① Россия для русских, https://ru.wikipedia.org/wiki/Россия_для_русских

② Арт-проект Виктора Бондаренко и Дмитрия Гугова «Россия для всех». <http://russiaforall.ru/projects/1382091620>

者伊勃拉吉莫夫(М. Ибрагимов)还说,草案中还应该制定有效措施,打击伪造俄罗斯各民族历史以制造民族对抗的企图。他认为,“要想形成并巩固俄罗斯各民族的国际主义,可以通过提供资助科研项目的方式研究俄罗斯族对俄罗斯其他民族在社会、经济及文化发展中的贡献,以及研究其他民族对整个俄罗斯文明的贡献。”^①比如位于伏尔加河流域的莫尔多瓦共和国,截至2010年,共和国内人口最多的民族为俄罗斯族,共44万,莫尔多瓦族第二为33万,该共和国共有多达119个民族,但却是各民族和谐共处的典范,85%的受访者对当地民族关系的评价为“好”。^②讨论者认为,对于这种具有民族和谐共处典范意义的共和国,应该深入研究其原因,这可能有助于推动新《战略》的实质性实施。总的说来,否定的呼声不容忽视并值得深入探讨,尤其是在贯彻执行的过程中应引以为戒鉴。

(二) 对“俄国民族”这一提法的探讨

何为“俄国民族”?在提供讨论的《战略》草案中对“俄国民族”进行了界定:“俄国民族(即俄罗斯联邦多民族人民)是俄罗斯联邦属于不同民族、宗教、社会等的公民团体,他们能意识到自己的国家共性和与俄罗斯国家的政治法律联系”。莫斯科人文大学校长伊利英斯基(И. Ильинский)对“俄国民族”有过这样的表述:“这是几个世纪以来居住在俄罗斯境内的所有民族和部族,他们因共同的俄语和俄罗斯文化而连接在一起,但也没有减少自己的民族语言和文化,他们的共性还有国家和经济利益,具有共同的历史和对未来的美好向往。俄国民族不是一般的、单纯的,而是复杂的、独一无二的,这是很多民族构成的一个民族。”^③

一方面,学术界并不认为“俄国民族”的提出是一个创新,甚至并不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具有切实的可行性。伊利英斯基也认为,目前还不能说存在事实上的俄国民族,其主要原因是在俄罗斯多数民族和部族的意识里,极度

① В Грозном обсудили Стратегию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и РФ. 2012. 10.24 //www.grozny-inform.ru

② Екатерина Спиридонова. Успешная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Мордовии---пример для всей России. 24.10. 2014// izvmor.ru/news/view/17697

③ Ильинский И.М. О российской нации. Знание. Понимание// Умение. 2009. №3. www.rikmosgu.ru/publications/3559/4825/

缺乏统一和共同的民族利益。而俄联邦宪法规定的“承认意识形态的多样性”和“任何意识形态不能作为国家的意识形态，也不能强加于人”，因此在此条件下这一提法没有出路。而莫斯科大学乌法分校院长巴宾科（В. Бабенко）认为，《战略》草案中使用的“俄国民族”这个术语完全不可接受，因为这是重复不久前的不成功经验，之前在多民族国家试图建立统一的“苏联民族”。在俄罗斯通过这样的民族政策战略，会对独联体国家的局势产生负面影响。^①鞑靼斯坦共和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哈基莫夫（Р. Хакимов）2013年4月6日在《在线生意报》上向数百万网络用户宣布，“俄国民族是又一个乌托邦”。^②全世界俄罗斯人民大会在讨论《战略》时提到，草案作者没有发现“俄国民族”的概念在原则上与现代俄罗斯联邦体制根本不兼容。

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不论是俄罗斯族还是少数民族，都从自己的立场出发不愿接受“俄国民族”这一提法。并非所有生活在俄罗斯的人都愿意称自己为俄罗斯人，他们害怕失去自己的民族性。一些俄罗斯族人认为，俄罗斯国内有民族共和国、有民族自治州等民族区域，如果这些民族共和国不准备放弃自己的本民族认同，根本就谈不上“俄国民族”。

尽管在讨论中多数参与者都不赞同“俄国民族”这一提法，但最终在《战略》中得以保留下来，说明官方有意在各民族意识中培养民族认同的决心。目前，俄罗斯社会和当局在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下面临的政治任务，是设计并有针对性地形成新的俄国民族。

（三）移民及其所引发问题的应对

移民政策是民族政策的一部分。俄罗斯是继美国之后世界第二大移民输入国。以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为例，这里被称为俄罗斯民族政策的窗口，是俄罗斯民族问题的缩影。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是一个特殊的民族地区，这里

① Марина Шумилова. Экспертное сообщество Башкортостана обсуждает проект Стратеги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и РФ. 9.10.2012//www.bagsurb.ru/news/detail.php?ID=4122

② Княжев В.Г. Российская нация и её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идея. 20.5.2012.www.razumei.ru/lib/article/1897

除了有 126 个民族外，还聚集了大量被迫移民。根据俄罗斯联邦移民局制定的“安排被迫移民地区名单”，克拉斯诺达尔区属于不建议安排移民的地区，因为这里本身人口密度高，属于疗养区和边境地区，只有特殊情况才接收移民（家庭团聚、引进专家），而且国家对来该区的移民财政支持最少。但中亚国家和北高加索地区的动乱，使大批移民拥向这个温暖、富足的地区。统计表明，截至 2000 年 1 月 1 日移民局的登记，所有获得俄罗斯被迫移民资格的人有 4.5% 在该地区落脚，其中北高加索 22.2% 的移民都落户在此，这是北高加索地区被迫移民人口最多的一个地区。索契冬奥会体育场馆建设吸引了大量来自中亚的劳务移民，移民问题非常突出。而 2014 年的乌克兰危机，使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难民大批涌入相邻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截至 2015 年 3 月，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已接收了 4 万多名乌克兰被迫移民，当地政府一时无法安置数量如此庞大的难民，这对当地劳动力市场造成了不小的冲击^①。加上移民难以融入当地社会，三分之二的移民没有在该地区居住的合法依据，只能从事非法生意。这些问题如果处理失当，很可能会加剧俄罗斯国内的动乱局面。

随着移民的增多，移民犯罪也有增无减。例如，仅 2013 年，在克拉斯诺达尔的库班地区就发生 900 多起由外来人员实施的犯罪活动。针对俄罗斯全国出现的大量移民以及造成的严重经济、社会与安全稳定问题，大部分人要求国家严格移民制度，尤其是取消对独联体国家的免签证制度，以限制移民的大量涌入。俄罗斯执法机构和学术界也在探讨如何从根本上解决移民问题，是继续执行边缘化政策还是使其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来提高移民对当地语言和文化的了解？如何通过配额制控制移民的输入？如何打击非法移民？等等。许多俄罗斯民众对《战略》关于移民问题的定位和表述表示不理解，要求政府制定更为严格的移民管理政策，至少应该采取有效措施严厉打击移民犯罪活动，以确保俄罗斯国家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

^① Более 40 тысяч беженцев из Украины размещено в Краснодарском крае, 2015-03-10, <http://www.yugopolis.ru/news/social/2015/03/10/79819/ukraina-socialnaya-pomosh-bejency>

五、新《战略》的规划与可操作性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普京政府制定并实施的《2025年前俄联邦国家民族政策战略》，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引导性，同时也有在实践方面的困难。

首先，《战略》是国家从顶层设计方面对民族政策发展问题所作的一个宏观的导向性构想，还不完全是实质性、可操作、实践性强的专门法律文件。由对于《战略》草案的讨论可以看出，俄罗斯理论界对《战略》存有质疑。而在实践中，国家民族政策也是一项系统工程，它需要明确的、循序渐进的措施，需要资金保障，需要协调的信息支持，还需要与国家其他政策相协调。但目前要完全做到这些还有不少困难，所以说《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宣言性质。但《战略》的出台强调了国家对民族关系的重视，内容比较全面，不仅包含任务，还有达到主要目的机制，是有一定操作性的文件。正如《俄罗斯：民族问题》中所指出的，“国家政策不能成为官僚文件”，战略明确指定俄政府制定具体措施来实施政策。在任务中也细致地规定了执行政策的政治文化基础、机构、途径、方法，因而可以说是一部“行动指南”，不仅规划了俄罗斯整体的民族政策，对具体民族问题最突出的地区，如北高加索地区，也有着很强的调节作用。

其次，《战略》无法同时满足俄罗斯族人和非俄罗斯族人的欲求，“俄国民族”的提法难以在短期内被广泛认同。

应该说，新《战略》中的部分条款给予俄罗斯民族在文化等方面优于其他少数民族的优势地位，但这一点并不为俄罗斯民族所认可。俄罗斯著名社会活动家亚历山大·谢瓦斯齐扬诺夫（Александр Севастьянов）撰写了题为《国家民族战略，文件不是空洞而是有害》的文章^①，认为解决好俄罗斯人的问题是解决俄罗斯民族关系问题的关键，而该文件极大地损害了俄罗斯族的利益。作为俄罗斯族利益的发言人，他坦承对《战略》感兴趣的只有两件事：一是《战略》怎样考虑俄罗斯民族的权利和利益，第二它是否反映或加强俄罗斯族的立国作用。1996年的《俄联邦国家民族政策构想》中还有俄

^① Александр Севастьянов. Стратег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и, документ не пустой, а вредный. <http://www.apn.ru/publications/article27705.htm>. 07-12-2012

罗斯民族的立国作用这一重要论点，而目前草案将这个表述去掉是为了讨好民族共和国。他强调，必须在法律上保障俄罗斯族人的权利和利益，要达到对待其他民族一样的水平，而《战略》的起草人恰恰忘记了这一点。他提议，保证民族和谐的最好方法是在公共机构中实行按民族分配席位，保障每个民族有一定比例的代表。关于“俄国民族”的提法，他认为这个构想与联邦制度原则上是不兼容的，如果犹太人、车臣人、巴什基尔人都有自己的民族区域国家，还谈什么俄国民族？他坚信这些民族不会放弃自己的主权，也不会放弃自己独特的、与俄罗斯不同的民族认同。

不仅是学者不满，在不久前所做的一次“我的民族近 15-20 年损失很多”的问卷调查显示，持这个观点的多数是俄罗斯族人，占 64%。^①。不少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大谈俄罗斯族在国家发展史上的巨大作用和自身的损失，指责当前的民族政策没有考虑俄罗斯族人的利益。对此，普京的回答很明确，即不能不顾北高加索。他在《俄罗斯：民族问题》一文中直言：“如果你听到又有人开始呐喊不要再养活高加索了，等着吧，第二天就会有人说，不要再养活西伯利亚、远东、乌拉尔、伏尔加河地区、莫斯科郊区了。把苏联搞垮的人就是照着这个处方做的。”

非俄罗斯族也有很多的不满情绪。巴什基尔大学历史学教授库尔萨利波夫（М. Кульшарипов）撰写了《俄联邦国家民族政策战略：符合非俄罗斯民族利益吗？》一文，表达了非俄罗斯族人对《战略》的异议。首先，他认为《战略》的目的是在上层建立以“俄罗斯多民族人民”概念为幌子的某种“俄国民族”，就是说俄罗斯多民族人民应当融合在上述新的民族共同体当中，这种做法混淆了“民族”与“多民族人民”的概念；第二，用“民族文化自治”这个概念来替代民族共和国，然而这个概念只适合解决分散居住的民族社群问题，而对于有自己种族历史居住地的民族来说，民族文化自治是绝对不适用的，因为没有自己的国家性就不能解决与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有关的各种任务。因此，民族文化自治就是民族失去自己的国家性和民族认同感；第三，在第 23 条第 2 项中隐含的意思是取缔民族共和国，以省划分行政区

① Гаврилова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России: проблемы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Теория и практика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2013. №5

域从而形成一元国家；第四，针对建立“大的地区工业区”，作者认为，将非俄罗斯人赶入这些地区，不可能有实质性的自治，更不可能发展民族文化和语言；第五，认为第 22 条的“俄联邦各民族平等和自治”是一句空话，因为《战略》要保留“俄罗斯文化占优势”，使“民族平等”成为空洞的口号，更别说民族自治了；第六，第 22 条中有这样的表述：“每个公民有权自愿决定并指出自己的民族属性”，但是公民在怎样的情况下可以确定自己的民族？因为在俄罗斯护照上没有“民族”这一栏，所以这一条也落空了。总体上，该教授认为《战略》忽视了非俄罗斯族的自决权和国家联邦体制的原则，在最终实施过程中既不会成为俄罗斯民族关系和谐的促进因素，也不能保障社会的政治稳定，违背了非俄罗斯各民族的政治、社会经验和民族文化权利，因而是不可接受的。

六、余论

对于俄罗斯这样一个多民族大国，出台国家级民族政策是迫切和必需的。但因苏联时期在民族政策方面的失误，加上多年形成的民族矛盾使民族主义盛行，无论俄罗斯族还是少数民族都从维护自己的民族权利出发，希望在国家民族政策中体现和突出自己民族的利益，彼此之间的争论有时甚至是短期内难以调和的。特别是，俄罗斯民族主义者要求在《战略》中强调以法律形式确定俄罗斯族的特殊地位，这是其他民族难以接受。

《战略》在整合俄罗斯民族、维护民族团结、发展民族文化等方面进行了最大程度的努力，虽然还有不完善的地方，但俄罗斯民族问题的解决不可能因一纸公文而一劳永逸，还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变更解决方法，这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

【Abstract】 Ethnic issue is the most complicated one for Russia. After the Cold War, the Russian Federation Ethnic Policy Concept, proposed by the Yeltsin administration in 1996, is the first attempt to solve this problem in contemporary Russia, failing to achieve desired results. After Putin was reelected president, he

considered to issue new ethnic policy strategies. In “the Strategy of the State National Polic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for the period till 2025”, issued on 19 Dec 2012, it explains relations among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stipulating the goal, principle, priorities and task of Russian Federation national ethnic policies. Meanwhile, it also constructs mechanism to implement Russian Federation national ethnic policies, endeavoring to shape Russian national ethnic consciousness and reviving its glory as a great power.

【Key Words】 Russian Ethnic Issue, Russian Immigration, Russian Ethnic Policy Concept

【Аннотац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 являются самыми сложными проблемами в России. После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в 1996 году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Ельцина приняло «Концепцию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и», которая была первой попыткой разрешения данных проблем, однако не достигла ожидаемых результатов. После того, как Путин снова стал президентом, он взялся за новую стратегию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и. «Стратег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и РФ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25 г.», которую опубликовали 19 декабря 2012 года, разъясняла состояние меж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межэтн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определила цели, принципы, приоритетные направления и задач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создала механизм реализац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и,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пытаясь сформировать национальное самосознание России и вернуть РФ статус великой державы.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 России, проблемы мигрантов в России, концепц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

(责任编辑 肖辉忠)

俄政府对顿河哥萨克政策的历史演变*

杨素梅 高寒**

【内容提要】沙皇俄国时期，生活在顿河地区的哥萨克，即顿河哥萨克，人数最多、军事实力最强。俄国政府为了殖民扩张、卫戍边防，自16世纪下半期至19世纪末，对顿河哥萨克实行雇佣、降服、改革等一系列政策和措施，逐步将顿河哥萨克纳入俄国哥萨克统一管理体系，确立顿河哥萨克的社会地位。俄国革命时期，哥萨克阶层分化，在顿河地区存在三重政权（哥萨克的阿塔曼政府、临时政府的军事委员，以及工兵代表苏维埃）。1919年“非哥萨克化”政策的实施，哥萨克作为军事阶层的权利和义务被彻底取消。20世纪末以来，俄罗斯政府采取一系列哥萨克复兴政策，顿河哥萨克在新的政策环境下得到了发展。

【关键词】俄罗斯哥萨克 哥萨克军屯（区）改革 非哥萨克化 哥萨克复兴

【中图分类号】D751.2; K5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5)04-0058(31)

哥萨克是沙皇俄国时期一个独特的军事阶层，在俄历史上发挥过十分重要的作用。无论过去或是现在，俄政府都没有忽视这一特殊社会群体。1914年前，从俄国西南部的黑海沿岸至东部太平洋海岸，漫长的边境地区分布着

* 本论文为2012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6至20世纪20年代俄罗斯哥萨克历史研究”（项目批准号：12BSS026）、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俄罗斯哥萨克历史与文化研究”（项目批准号：12YJA85002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杨素梅，河南大学外语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高寒，河南大学外语学院本科生。

众多哥萨克分支。俄国政府哥萨克人生活区划分成 12 个哥萨克军区^① (область войска), 总数为 640 多万人。其中, 生活在俄国西南部顿河(Дон)流域的哥萨克, 即顿河哥萨克(донские казаки)军事实力最强, 人数最多, 占俄国哥萨克总人数的六分之一。^②

在 16-19 世纪的二百多年间, 根据不同的历史背景和国家需要, 俄国政府针对顿河哥萨克采取一系列政策和措施, 将顿河哥萨克由自由群体转变为独特的军事阶层, 使其成为俄国对外扩张的工具。在对外殖民扩张时期, 俄国政府采取优惠或强制措施, 将部分顿河哥萨克迁到高加索、西伯利亚等地区。这样, 在顿河哥萨克的基础上形成了多个哥萨克分支。19 世纪下半期, 随着俄国国内外战争的减少, 俄国政府开始分化哥萨克阶层, 一部分转变为俄国普通公民。俄国革命时期, 在顿河地区存在着三重政权, 哥萨克阶层分化。1919 年“非哥萨克化”政策的实施, 哥萨克作为军事阶层的权利和义务被彻底取消。而自 20 世纪末俄罗斯政府采取一系列哥萨克复兴政策以后, 顿河哥萨克在新的政治环境下再度崛起。本文就俄政府自 16 世纪至今针对顿河哥萨克实施的政策和措施加以历史分析, 以便深刻地认识现代俄罗斯哥萨克及其发展前景。

一、17 世纪 60 年代前的雇佣政策

(一) 顿河地区自由哥萨克的形成

在俄国史书中, 15、16 世纪的俄国南部草原地区被称为“荒原”(Дикое поле)或“哥萨克草原”(Казачья степь), 其中包括顿河流域。顿河位于俄罗斯西南部, 曲折向东南流经森林草原地带注入亚速海的塔甘罗格湾。

① 俄国时期 12 个哥萨克军区是: 顿河哥萨克军区、库班哥萨克军区、捷列克哥萨克军区、奥伦堡哥萨克军区、外贝加尔哥萨克军区、西伯利亚哥萨克军区、乌拉尔哥萨克军区、阿斯特拉罕哥萨克军区、谢米列奇哥萨克军区、阿穆尔哥萨克军区、乌苏里哥萨克军区和伊尔库茨克—叶尼塞河哥萨克军区。哥萨克军区在 1870 年前被称为军屯(земля войска)。

② Российский гуманитарны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в трёх томах) II. сост.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ий факультет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02. С.127-128.

顿河河床落差不大，河水从容、平静地流淌，是名副其实的“静静的顿河”。古时的顿河又叫伊凡湖（Иван озеро），在古希腊语中，称之为塔纳伊斯（Танаис），因顿河河口的希腊古城塔纳伊斯^①而得名，该城最早属于博斯波尔公国^②。顿河哥萨克是顿河流域较早的居民。在顿河地区，游牧民族为了获得更多的生存资料，相互侵袭和逐杀。在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下，部分游牧民族开始定居下来，成为顿河地区早期的居民。生活在顿河地区的居民把自己生存的地方叫做“博列”（Поле），即“自由”的地方，自称为“自由哥萨克人”（вольные казаки）。关于顿河哥萨克的起源问题，2008年版的《哥萨克百科全书》这样解释：“据考古文物和历史文献证明，顿河哥萨克的祖先早在青铜时期就生活在顿河地区。后来由于外来的入侵而被迫迁出顿河地区，直到15世纪末16世纪初又迁回顿河地区。11世纪时，顿河地区的居民有凯阿尔人（казары）、卡萨克人（касаги）、卡泽克人（казяги）等，这些古老的居民就是顿河哥萨克的祖先。由于波罗维茨人（половцы）的袭击，这些居民不止一次地离开顿河地区。13世纪由于蒙古鞑靼人的入侵，顿河地区归属金帐汗国。在金帐汗国统治时期，顿河地区成为客商^③集散地。自16世纪中期以来，顿河地区由迁回故乡的哥萨克人控制。”^④

16世纪在顿河地区已经形成大小不等的哥萨克自由群体，这些自由群体随着从俄国、波兰等地逃到顿河地区的人的加入而不断壮大。早期的顿河哥萨克被称为“荒原”上“无国界的人”、“自由的骑士”，其特点是来去自由、为生存而战。顿河哥萨克的祖辈主要以打猎、捕鱼和获取战利品为生。顿河哥萨克最喜欢狩猎，称之为“狂欢宴”。但无论打猎或是捕鱼都不可能一个人单独完成，因此自由的哥萨克常常几个人或更多的人自由结合成队伍，共同作业。他们出门打一次猎一般要一两个月，甚至整个冬天。19世

① 塔纳伊斯（Танаис）从公元前3世纪起成为希腊的殖民地，存在了700多年。塔纳伊斯曾是一座商业城市，向希腊提供粮食，向西徐亚人出售奢侈品。该城最初属于博斯波尔公国。

② 博斯波尔公国（Боспорское царство），在亚速海北岸顿河一带，存在于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4世纪，属于希腊殖民地。

③ 客商，即14-15世纪被称为“гости”的莫斯科富商在苏洛什（Сурож）港与拜占庭、意大利、土耳其等商人通商的集散地。

④ Губарев Г.В.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казачества. Москва: Вече, 2008. С.104-107.

纪顿河哥萨克历史学家瓦·苏哈卢科夫（В.Сухоруков）指出，“顿河哥萨克最初的生活半野蛮、随意。他们在草原、河湖和海上寻找生存所需的食物，最乐意的事情是打仗、袭击。”^①早期顿河哥萨克除捕鱼、打猎外，主要是抢劫和出征。战利品是顿河哥萨克生活的重要来源。为了获得更多的生活物质，顿河哥萨克四处打仗，出海抢劫。顿河哥萨克与四邻为敌，不但偷袭亚速夫人，还与土耳其人、鞑靼人、俄国人等打仗。在长期的对外抢劫、出征打仗过程中，逐渐建立起有组织的兄弟式军事团体，即顿河兄弟盟军（Донское братство）。^②早期顿河哥萨克的成员性别单一，只有男性才能加入顿河哥萨克，且不能结婚成家。顿河兄弟盟军最高首领被称为阿塔曼（атаман）。阿塔曼由哥萨克民主选举产生，任期一年。顿河兄弟盟军实行民主选举和自治的管理方式。这种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从16世纪下半期起，随着俄国在该地区建立政权机构而被改变。

自古至今，顿河地区的地理位置都十分重要。自15世纪开始国界之争后，顿河“荒原”成为波兰、土耳其、立陶宛、莫斯科公国争夺的目标，“荒原”变成“战争区”。但莫斯科公国称其为“上帝之路”，即通向海洋（亚速海、黑海）和穆斯林王国之路。^③16世纪时莫斯科公国的统治区域仅限于东欧的部分地区，国土面积约为280万平方公里。伊凡四世在位时期（1547-1584），俄国^④日渐强盛起来。在对外关系方面，1549年沙俄政府建立了俄国历史上第一个外交机构，即“外交衙门”（Посольская изба）^⑤，并制定了外交政策。打开南部出海口，即亚速海出海口，和争夺乌克兰、亚速夫等南部草原地区，是沙皇俄国对外扩张的目标之一。而亚速海一直掌握在土耳其奥斯曼帝国（1280-1922）手中。因此，妨碍沙俄向南扩张的主要敌人是土耳其。而沙皇俄国这只羽毛还未丰满的雏鹰，在16世纪末要对付正

① Сухоруков В.Д. Общежитие донских казаков в 17-18 столетиях.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Новочеркасск: Областная В.Д. типография, 1892. С.4.

② Глушенко В.Б. Казачество евразии: зарождение, развитие, интеграция в структуру россий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и. Москва: Вузовская книга, 2006. С.87-88.

③ Рыблова М.А. Донское братство казачьи сообщества на дону в XVI-первой трети XIX века. Волгоград: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лгоград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02. С.42-43.

④ 1546年伊凡四世加冕称沙皇，沙皇俄国诞生。

⑤ 林军：《俄罗斯外交史稿》，北京：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23页。

处于强盛时期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这只老鹰尚欠实力。为此，俄国政府常常招募各种人员为其打仗，增强军事实力。在南部边境，俄国政府建立一条防御线，即“界线”，它与流动的监视点和侦查点相结合。整个绵延数百公里的宏大军事—战略防御体系需要大量服役人员，而顿河地区的自由哥萨克人正符合俄国的需要。于是，俄国政府招募哥萨克人用作边防“城市”驻军，守卫鹿寨防线，建立防御性的“哥萨克村”（станция）。^①

（二）顿河哥萨克成为俄国雇佣军

俄国编年史中关于顿河哥萨克的最早记载是 1549 年。这一年伊凡四世在给诺盖王公尤苏夫的回信中提到，他希望顿河哥萨克为俄国沙皇服务，攻打克里木汗国的乌卢斯（Улус），不要做损害沙皇的事。^②在 1570 年接受沙皇的招募之前，顿河哥萨克作为雇佣兵已经开始为俄国而战。例如顿河哥萨克参加 1552 年俄国夺取喀山汗国的战争，受到伊凡四世的奖赏；1556 年，500 名顿河哥萨克在阿塔曼的带领下夺取阿斯特拉罕汗国，并使其并入俄国；1556 年，顿河哥萨克参加俄国进攻克里木的战争。顿河哥萨克为俄国派去两个会讲克里木语的哥萨克人，并帮助俄国摧毁克里木的刻赤城。除了为俄国打仗外，顿河哥萨克还为俄国提供各种帮助。1554 年，顿河哥萨克帮助俄国镇压反对俄国的伏尔加暴动，在海上为俄国提供有效的帮助。顿河哥萨克在战争中的英勇行为，使俄国沙皇认识到拥有一支这样军队的好处。俄国政府开始吸纳顿河哥萨克为其服务，实施优惠政策雇佣顿河哥萨克为其服役，定期向顿河哥萨克发放薪金、日用品和武器。1570 年，伊凡四世通过自己的使臣向顿河哥萨克送去招募书，在招募书中写道：

“1570 年 1 月 3 日。沙皇和莫斯科大公伊凡·瓦西里耶维奇向北顿涅茨哥萨克阿塔曼和哥萨克人下达的诏书，由派往亚速夫的使臣伊凡·彼得洛维奇转交。该诏书交给伊凡·彼得洛维奇。

① И.И. 斯米尔诺夫、А.Г. 马尼科夫等著：《十七至十八世纪俄国农民战争》，张书生、邹如山、郝镇华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37 页。

② История донского казачества. учебник для студентов высших учебных заведений. сост.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факультет Южного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Ростов-на-Дону: Изд. Южного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08. С.22.

以全罗斯沙皇和大公伊凡·瓦西里耶维奇的名义向北顿涅茨阿塔曼和所有顿河哥萨克下达圣谕。为了国事（沙皇）派伊凡·彼得洛维奇·诺沃西里佐夫（Иван Петрович Новосильцов）到亚速夫，途经顿河地区时请（顿河哥萨克阿塔曼）给予保护，（派哥萨克人）与他一起同行。在一切国事方面，你们要无条件地听从伊凡，为我们服务，我们为此奖赏你们。于莫斯科，7078年^①1月3日。”^②

这是顿河哥萨克接受俄国沙皇的第一份诏书。沙皇委托派往亚速夫的使臣诺沃西里佐夫将这封诏书转交给顿河哥萨克阿塔曼，并说服他们为沙皇服役，要求他们在关系俄国事务方面，一切听从诺沃西里佐夫的领导。1584年，伊凡四世又下达诏书，承认顿河哥萨克永久占据顿河地区。1614年，俄国使臣为顿河哥萨克兄弟盟军送去沙皇赐予的军旗。这样，自由的顿河哥萨克兄弟盟军成为俄国的雇佣军，并逐渐失去自由。

由于地理原因，顿河地区的哥萨克分为上游哥萨克和下游哥萨克。为了更有效地使顿河哥萨克为俄国而战，俄国政府还采取措施促进顿河上游哥萨克和下游哥萨克联合。譬如在称谓上，沙皇在向顿河哥萨克下达命令时这样称呼：“阿塔曼们和哥萨克们，即所有我们上游和下游村寨的哥萨克们……”。^③同时，俄国政府通过派遣上游和下游哥萨克联合行动或为完成某种任务共同出征，终于在17世纪20年代，上游哥萨克和下游哥萨克基本完成联合，组成统一的顿河军（Донское Войско）。顿河哥萨克生活区被称为顿河军屯或顿河哥萨克军屯（Земля Донского Войска或Донское Войско^④）。^⑤顿河哥萨克定期接受俄国的薪俸。为了南部边境的安全，俄国政府采取积极措施发展壮大顿河哥萨克队伍。譬如，17世纪30年代顿河哥萨克攻打亚速夫遭到重大损失之后，俄国政府招募内地一些自愿加入哥萨克的人到顿河地区补充顿河哥萨克军。自16世纪下半期起，顿河哥萨克军先后参加了俄国夺取喀

① 7078年是旧俄历年，即公历1570年。

② Лишин А.А. Акты, относящиеся к истории Войска Донского.Т.1. Новочеркасск: типография А.А. Карасева, 1894. С.1-2.

③ Там же. С.24.

④ 俄文中“Войско”一词是一个多义词，这里指代哥萨克生活区，即哥萨克军屯，也指哥萨克组成的军事组织，即哥萨克军。

⑤ Лишин А.А. Акты, относящиеся к истории Войска Донского.Т.1. С.24.

山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高加索地区、西伯利亚地区等战争，成为俄国殖民扩张的马前卒。

在 17 世纪 70 年代之前，顿河哥萨克具有很大的自由和自治权。有关顿河哥萨克事务，俄国政府通过外交衙门与顿河哥萨克阿塔曼保持外交性质的联系。顿河哥萨克通过派往莫斯科或其他地区的“夏季使团”(лёгкая станица)和“冬季使团”(станция зимовая)与俄国政府保持联系。顿河哥萨克“夏季使团”由阿塔曼、大尉和几名有战斗经验的年轻哥萨克组成。夏天，顿河哥萨克使团把各种消息送到沃罗涅日；冬天，把消息送到瓦卢叶夫克。使团向沙皇汇报边疆的状况，以及关于土耳其人、鞑靼人俘虏的情况，返回时为顿河哥萨克带回沙皇的命令。从 1672 年起，夏季使团仅由两名哥萨克组成，“冬季使团”则由阿塔曼和多名勇敢的哥萨克组成。每年冬天，使团到莫斯科请求会见沙皇，送上关于顿河哥萨克战功的呈条，同时，请求沙皇赐给顿河哥萨克所需的各种战斗用品和生活用品。他们对沙皇这样讲：“为了我们能永远地驻扎在您南部的边疆，为贵国在顿河地区服役，不被饥饿所困死，请赐给我们战备必需品。”^①顿河哥萨克使臣在莫斯科受到沙皇很高礼仪的接待。他们可以与沙皇一起进餐，向他索要赏赐。顿河哥萨克使团常常将沙皇的赏赐运回顿河哥萨克军首府。^②赏赐一般有铁、武器、火药、纸张、钟表、教会的书籍、呢绒布匹及面包等。这些物品向所有哥萨克人平均分发。在分发时，顿河哥萨克呼喊：“莫斯科的沙皇万岁！静静的顿河哥萨克万岁！”^③为了壮大顿河哥萨克军事队伍，抵抗南部强大的土耳其帝国，俄国政府将自愿加入哥萨克的人派到顿河地区。同时，俄国沙皇也不断加强自己在顿河地区的权力和地位，特别是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在攻打克里木汗国时，他要求顿河哥萨克绝对服从俄国军官的指挥。

① Харузин М.Н. Сведения о казацких общинах на Дону. Материалы для обычного права. Москва: Типография М.П. Щепкина, 1885. С.18-22.

② 顿河哥萨克军首府在不同的时期设在不同的地方：1622 年前为拉茨多尔城 (Раздор)、1622 年至 1637 年迁至莫纳斯德尔斯克城 (Монастырский городок)、1637 年至 1642 年在亚速夫城 (Азов)、1642 年至 1644 年在拉茨多尔城、1644 年至 1806 年迁到切尔卡斯克 (Черкасск)、1807 年至 1917 年在新切尔卡斯克 (Новочеркасск)。

③ Харузин М.Н. Сведения о казацких общинах на Дону. Материалы для обычного права. С.18-22.

虽然顿河哥萨克为俄国沙皇服役,接受沙皇的旨意,但顿河哥萨克的“野性”时常给俄国政府带来麻烦。17 世纪初,顿河哥萨克与俄国政府的关系比较紧张。在俄国“混乱时期”(Смутное время)(1598-1613),顿河哥萨克不但支持伪季米特里,而且组织起来反对俄国政府。1606 年 5 月,在伪季米特里一世被推翻后,顿河哥萨克又支持 1606-1607 年的波罗特尼科夫起义。此时俄国政府十分警惕顿河哥萨克,时刻关注顿河哥萨克的动向。1600 年,俄国政府在北顿涅茨建立帝王—鲍里斯城堡,守城的士兵禁止顿河哥萨克入城。在 1625 年沙皇的文书中规定,禁止顿河哥萨克自由地前往莫斯科和乌克兰诸城探亲和进行商业买卖,否则,“就要把你们投到监狱里”。^①但顿河哥萨克在关键时刻还是站在了沙皇一边。1613 年,顿河哥萨克派代表参加俄国的缙绅会议,有力地支持米哈伊尔·费多拉维奇·罗曼诺夫登上沙皇的宝座。因此,米哈伊尔·罗曼诺夫在执政初期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顿河哥萨克的措施。譬如,从 1613 年开始,定期地向顿河哥萨克发放军饷;1614 年,授予顿河军一面军旗;1615 年向顿河哥萨克下诏书,允许哥萨克人自由地到俄国各城镇探亲、经商等。^②罗曼诺夫沙皇的这些政策吸引了大批人参加哥萨克,促使顿河哥萨克队伍不断壮大。

自从 17 世纪 20 年代起,顿河哥萨克与莫斯科政府的矛盾不断激化。顿河哥萨克常常偷袭伏尔加,抢劫过往的俄国船只和商人,把伏尔加河地区的俄国人带到顿河地区。此外,他们还经常突袭土耳其和克里木汗国。这些行为影响到俄国政府的外交策略。17 世纪的俄国正处于崛起的时期,其在南部地区以防御为主,修建漫长的防御线,对外谨慎出兵。为了积蓄力量对付西部的战争,俄国政府竭力与土耳其保持正常的关系。1627 年,在莫斯科政权的压力下,阿塔曼在军事大会上宣布,禁止顿河哥萨克偷袭亚速夫和伏尔加河,对偷袭伏尔加河的行为采取严厉的措施,重者处以死刑。但是,制止顿河哥萨克袭击土耳其和克里木的行动很难,因为这影响到顿河哥萨克的利益——战利品是他们主要的生活来源。1625、1630 年,俄国政府在莫斯科逮捕不执行俄国命令的阿列克赛·斯达雷和纳乌克·瓦西里耶夫两个阿塔

① История донского казачества.учебник для студентов высших учебных заведений. сост.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факультет Южного Федеральнотг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61.

② Там же. С.62-63.

曼。当顿河哥萨克得知此消息后十分愤怒，1630年，他们杀死沙皇派到顿河地区的使臣伊·卡拉梅谢夫。^①

与顿河哥萨克关系的恶化，使急需服役力量的俄国政府很快认识到其利害关系。为此，莫斯科政府尽可能地不限制顿河哥萨克人的行动，有时还暗暗地给予其帮助。1632年，俄国政府恢复与顿河哥萨克的关系，被逮捕的顿河哥萨克阿塔曼被派到战场攻打波兰。俄国政府竭力迫使顿河哥萨克向沙皇宣誓效忠，但一直未能如愿。虽然被逮捕的两个阿塔曼代表各自的队伍被迫在莫斯科向沙皇宣誓效忠，但其他哥萨克人拒绝宣誓。自17世纪初顿河哥萨克不断掀起暴动和起义，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拉辛起义、布拉文起义、普加乔夫起义等。哥萨克起义的主要原因是，一方面顿河哥萨克企图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自由，另一方面又竭力最大限度地从沙皇那里得到好处和帮助。而俄国政府一方面最大限度地使顿河哥萨克为自己服务，另一方面又竭力制服这群“野马”，使其完全置于皇权控制之下。这种矛盾一直存在于俄国政府与顿河哥萨克关系发展中。

二、17世纪70年代至18世纪20年代的降服政策

（一）两次大起义后的强制措施

自17世纪顿河哥萨克每次与俄国政府冲突之后都会遭到俄国政府的沉重打击，作为一个自由群体的力量不断削弱，而俄国政权在顿河地区则不断加强。1671年的拉辛起义失败成为顿河哥萨克历史命运的转折点。

顿河哥萨克自古以来从不拒绝接纳从俄国或其他地区逃来的农民、农奴或其他流浪人，这一点也影响到顿河哥萨克与俄国政府的关系。1666年，俄国政府首次要求阿塔曼交出从俄国北部地区逃到顿河地区居住在霍别尔城附近的农奴和犯人。但是按照“顿河从不交出一个人”的传统，阿塔曼拒绝俄国巡捕的要求。1667年，爆发由顿河哥萨克拉辛领导的俄国农民反对沙皇专制起义。顿河哥萨克阿塔曼虽然不参与领导起义军，但实际上暗暗地

^① История донского казачества. учебник для студентов высших учебных заведений. С. 63.

帮助他们。1670年，当拉辛起义军进攻伏尔加地区时，莫斯科政府断绝与顿河哥萨克的交往。在1670年，俄国政府不再向顿河军发放军饷。为了压制顿河哥萨克，表示对顿河哥萨克的不满，莫斯科政府逮捕了到莫斯科磋商军饷一事的伊凡·阿维尔吉耶夫阿塔曼，并把他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沙皇政府开始采取措施限制顿河哥萨克的独立性。^①1671年，拉辛起义失败后，俄国政府在顿河地区实施残酷措施，强迫顿河哥萨克向沙皇宣誓效忠，使其完全臣服。对参加拉辛起义的哥萨克进行大屠杀、大移民，将大部分顿河哥萨克迁移到其他地区。在俄国沙皇的命令下，为了殖民扩张的需要，在被强制迁移的顿河哥萨克基础上相继形成捷列克家庭哥萨克（Терские Семейные казаки）^②、伏尔加哥萨克（Волдские казаки）^③、涅克拉索夫哥萨克（Некрасовские казаки）^④、莫兹达克哥萨克（Моздокские казаки）^⑤等分支。

彼得一世统治时期，俄国政府颁布了针对顿河哥萨克的法令：禁止顿河上游哥萨克接纳自由人和地主的雇农，或接纳俄国的政治犯；夏季使团和冬季使团在往返莫斯科和顿河的途中，搭救从俄国逃跑的人被认定为有罪；取消顿河军超出该地区的活动权力，禁止顿河军对外交往等。^⑥在行政管理方面，1708年，将顿河地区归并于亚速夫省管理。1707-1709年的布拉文起义失败后，俄国政府进一步限制顿河哥萨克的自由和民主。1716年，顿河哥萨克的事务不再由外交衙门处理，而交给参议院管理。1719年，顿河哥萨克和捷列克、雅伊克哥萨克事务转交外事委员会管理。从1721年开始，顿

① История донского казачества.учебник для студентов высших учебных заведений. С.66.

② 捷列克家庭哥萨克（Терские Семейные казаки）：1724年根据彼得一世的命令，从顿河哥萨克迁出1500个家庭，驻守捷列克河附近的基兹梁尔，逐渐形成了捷列克家庭哥萨克。

③ 伏尔加哥萨克（Волдские казаки）：1732年根据俄国政府的命令，从顿河哥萨克迁出1067个家庭，到伏尔加河地区驻守，逐渐形成了伏尔加哥萨克。

④ 涅克拉索夫哥萨克（Некрасовские казаки）：由布拉文起义失败后逃到库班地区的以阿塔曼涅克拉索夫为首的顿河哥萨克组合而成，该支哥萨克后来逃往土耳其等国。

⑤ 莫兹达克哥萨克（Моздокские казаки）：1770年从伏尔加河迁出500名哥萨克驻守新建的碉堡莫兹达克，逐渐形成了莫兹达克哥萨克。

⑥ Рыблова М.А. Донское братство: казачьи сообщества на дону в XVI-первой трети XIX века. С.52.

河哥萨克军被编入俄国军队中，由陆军委员会管理。^①1723年，顿河哥萨克民主选举阿塔曼的权利被取消，阿塔曼由沙皇委派，称之为委派阿塔曼（Наказной Атаман），以区别于“选举阿塔曼”。委派阿塔曼受命于俄陆军部（военная коллегия）。这样，从彼得一世开始，俄国政府打破了顿河哥萨克古老的生活习俗和民主选举方式，把顿河军转变为俄国的非正规军。

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俄国政府颁布种种法令，扩大贵族的权力，赐予贵族任意惩罚农奴的权力。俄国政府采取许多维护大贵族和大地主利益的政策，残酷剥削和压榨广大人民。为了防止顿河地区的农民起义，巩固专制统治，俄国政府加强对顿河地区的统治和压迫，最终爆发普加乔夫起义。哥萨克领导的农民起义再次动摇了俄国的封建统治。

18世纪60、70年代，俄国国内阶级矛盾十分尖锐，起义、暴动四起。农奴杀死地主，烧毁贵族的庄园。起义和暴动也波及南部哥萨克地区。1762年，叶卡捷琳娜二世废除贵族服役的义务，贵族获得特权，其领地及农奴可以世代继承。1765年，贵族又被赐予任意惩罚农奴的权力。他们可以任意处罚、拷打和关押农奴。在顿河地区，贫穷哥萨克对富裕哥萨克剥削、克扣薪饷的行为十分愤恨。不甘心被奴役的贫穷顿河哥萨克揭竿而起，于1773年爆发顿河哥萨克普加乔夫领导的农民起义（1773-1775）。当时，在顿河地区流传着一个谣言：彼得三世还活着，他能够把人们从贵族地主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为了获得人们的支持，1773年9月，普加乔夫以“好沙皇”彼得三世的身份领导举行起义。在这次起义中，顿河哥萨克人再次表现出其追求自由、反抗压迫的精神。

为了镇压起义军，叶卡捷琳娜二世派出大量部队与起义军决战。在喀山战役中，起义军因寡不敌众而遭到失败。普加乔夫因叛徒出卖而被捕，普加乔夫起义以失败而告终。此次起义导致俄国政府进一步加强对顿河地区的管制，无论在军事方面，还是在民事方面，俄国政府均针对顿河哥萨克进行一系列改革。叶卡捷琳娜二世残酷镇压普加乔夫起义后，在顿河地区实施强制移民和改革措施。叶卡捷琳娜二世强迫从顿河地区向库班河地区迁出3千户

^① Глушенко В.В. Казак, что в имени твоём: философия развития казачества. Ростов-на-Дону: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лот, 1999. С.6-7.

顿河哥萨克家庭，即 6 个 5 百人团，组成 12 个哥萨克村。这种强制措施遭到一些哥萨克人的反抗。据统计，这个计划最终仅迁移 1 千名哥萨克人，为此，48 位长老和 298 名哥萨克被捕，1645 人被鞭打。^①

（二）顿河哥萨克军屯改革

长期以来，顿河军的军衔与俄国军队军衔存在很大差异，而且，哥萨克兵服役的种类、年限也不确定。为此，俄国政府对顿河军的军衔和服役种类、年限等实施改革。从 1768 年起，顿河军屯的阿塔曼、团长被沙皇封为贵族。顿河哥萨克大会不再拥有招募新哥萨克人、选举行军阿塔曼的权力。顿河地区的社会权力和军事权力都集中在委派的阿塔曼和长老会的手中。阿塔曼和一些长老则利用自己的职位谋私利，霸道横行。同时，在长老会中派别林立，矛盾重重。为了阿塔曼的权杖，他们互相争斗。在顿河军屯中，掌握权力的上层人物霸占土地，而贫穷的哥萨克则必须不断地参加俄国对外的大小战争。这一切导致顿河地区社会的不公和阶层的大分化，顿河地区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在 1792 年顿河地区发生暴乱期间，5 支正在高加索边境的顿河哥萨克军团私自撤回顿河地区；1792-1794 年，顿河上游村寨集体暴动。^②这一切使俄国政府认识到，必须进一步加强顿河地区的改革和管制。

1799 年，沙皇下达命令，取消顿河哥萨克阿塔曼的称呼，改称官阶表中相应的军衔称谓，即长老（войсковой старшина）为少校（майор）、大尉（есаул）为骑兵大尉（ротмистра）、百夫长（сотник）为中尉（поручик）、少尉（хорунжий）为骑兵少尉（корнет）。^③1823 年，俄国沙皇命令顿河军队的各种官衔必须与正规军中相应的官衔一致。^④1828 年，经沙皇批准的哥萨克军衔有军士、少尉、百夫长、大尉、军事长老、中校和上校，而普通的

① Дубовиков А.М. Уральское казачество в системе казачьих войск д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России//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005. №.1. С.120-123.

② История донского казачества.учебник для студентов высших учебных заведений. С.115.

③ Харузин М.Н. Сведения о казацких общинах на Дону. Материалы для обычного права. С.24.

④ Савельев А. Трехсотлетие Войска Донского: 1570-1870 гг.: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донских казаков. СПб.:Типография М.О.Вольфа,1870. С.108.

哥萨克兵没有任何军衔，仍称之为哥萨克。这是最初的顿河地区的官衔。^①

在行政管理方面，顿河地区亟待建立一个有效的管理体系和各级管理机构。1774年6月30日，阿塔曼戈·博杰姆金公爵上报俄国政府，要求在顿河地区组建专门委员会，改革顿河军屯现有的组织机构和管理机关。他的请求得到沙皇的批准。很快，在戈·博杰姆金的倡议下，组建由顿河军屯长老会部分成员组成的委员会。戈·博杰姆金建议，限制顿河军屯阿塔曼的权力，并由政府监管。因此，他建议改变现有的管理模式，把顿河军屯的领导权划分为军事和民事两部分。为了解决土地问题，1775年建立专门的顿河军屯公署（Войское гражданско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其成员由顿河军阿塔曼、两个由政府任命的常务人员、四个从有名望的长老中选举出来的人员组成。戈·博杰姆金特别强调，阿塔曼和顿河军屯公署，必须依照俄国法律行使自己的权力，按照沙皇、陆军委员会和政府枢密院的命令办事。1775年2月15日，叶卡捷琳娜二世签发戈·博杰姆金提交的报告，承认顿河军屯公署的合法性。同时，女皇任命积极参加镇压普加乔夫起义、并在铲除伪沙皇的行动中表现突出的哥萨克阿·伊洛瓦伊斯基为顿河军屯阿塔曼。她还赐予顿河军屯阿塔曼与正规军相同的军衔。顿河军屯阿塔曼晋升为与正规军一样的上将军衔。^②

但是，由于缺乏监管，顿河军屯公署的权力越来越大，其成员越来越多地霸占军和村镇的土地，并将逃亡到顿河的人员变成自己的雇佣工。顿河军屯所有的权力主要集中在阿塔曼和长老会上层人物的手中。顿河军屯公署基本是由上将马尔德诺夫的亲属组成。顿河军屯的管理权如此集中，损害了俄国政府和众多哥萨克人的利益。顿河上层人物霸占土地的现象，不但影响顿河地区的经济基础，而且也危害哥萨克军队伍的稳定性。非哥萨克加入哥萨克或哥萨克退出哥萨克阶层的权利均由军屯公署行使。马尔德诺夫及其亲属和公署的其他官员很快变成顿河地区富裕的阶层。但他们并不满足现有的权力，开始竭力干预军事，企图夺取军事管理权，还不断对军屯阿塔曼阿·伊洛瓦伊茨基施加影响，干涉其活动。阿·伊洛瓦伊茨基无力对抗顿河军屯公

① История донского казачества. учебник для студентов высших учебных заведений. С.114-115.

② Там же. С.116-117.

署的专权行为，于 1797 年要求俄国陆军委员会主席改变顿河军屯的管理方式。但陆军委员会认为，公署仅是掌管民事方面的事务，不可能胜任军事方面的任务，他们没有能力制止和镇压各种农民暴动。因此，陆军委员会并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对公署加以限制。^①

顿河军屯公署的权力如此之大，严重损害着哥萨克人的利益和权利。为此，顿河老哥萨克们曾多次上书沙皇，要求改革顿河哥萨克军屯的管理方式，并提出许多改革方案和任命军屯阿塔曼的方法。但阿塔曼耶夫列莫夫、书记员伊·亚诺夫和委派的军代表都以不同的理由拒绝将这些提案递交给俄政府。1797 年，保罗一世命令解散顿河军屯公署，组建顿河军屯办公室（Войсковая канцелярия），而且其权力被缩减，成员也由军屯阿塔曼和长老组成。顿河军屯办公室从属于军事部，军事方面的事务归军事部管理。民事和刑事枢密院及相应部门承担。1800 年 7 月，保罗一世在顿河军屯设立检察院。^②

18 世纪末，顿河军屯从属于陆军委员会。通过陆军委员会向顿河军屯送达沙皇和枢密院的命令等各种文件。顿河军屯由陆军委员会调派军事任务，分发奖赏等。从 1802 年起，俄国建立部级管理机构，俄国最高的军事领导机关为陆军部。陆军部和军事部同时管理顿河军屯。在顿河军屯首府切尔卡斯克（1807 年迁到新切尔卡斯克）设立军屯阿塔曼领导的顿河军屯办公室和阿塔曼行军办公室。19 世纪初，军屯阿塔曼和顿河军屯办公室的一切活动都要听从政府和陆军部的命令和指挥。在政府的支持下，军屯阿塔曼和长老会在顿河军屯的地位得到加强。^③这样，俄国政府在顿河地区的管理进一步完善。

18 世纪下半期，俄国手工业、商业得到巨大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俄国初步形成，这种生产关系给顿河哥萨克的发展带来一定的冲击，顿河哥萨克军的战斗力明显下降。正如阿乌茨基所说，“资本私有化的发展和自然资源的开发，对哥萨克社会产生的影响比沙皇俄国限制其自由要严重得

① История донского казачества. учебник для студентов высших учебных заведений. С.25-126.

② Там же. С.18-119.

③ Там же. С.136-138.

多。顿河哥萨克开始衰落，特别是在俄国欧洲部分。”^①俄国政府为此而担心，迫使俄国政府加快对顿河军屯的管理方式进行改革。亚历山大一世（1801-1825）在位初期，俄国政府对顿河军屯实施集中管理。1802年亚历山大一世下达命令，组建顿河军、乌拉尔军和黑海军。根据该命令改组顿河军办公室。沙皇不再派行政官员监管军事办公室，但设立检察官的职务。顿河军事事务由军事部管理，民事归政府枢密院^②。但俄国政府在顿河地区的改革并不彻底，也不完备。因此，两年以后，又对军事办公室进行改革。顿河军办公室分为三个科，即军事科、民事科和经济科。同时，顿河军屯的一切军事事务由军部管理，内部事务归内务部管理，经济方面由财政部管理，刑事方面由司法部管理。^③

1804年，亚历山大一世要求枢密院调查顿河军的现状和历史，并向他写出报告，报告内容包括顿河地区贵族占有土地的情况，以及顿河军的管理与其他省份的差别等。为此，政府枢密院成立专门调查顿河事务的委员会，目的是从根本上了解和考察顿河地区的现状。但是，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状况，以及19世纪初俄国内外的各种战争使这个委员会未能发挥其作用。

1809年，陆军部大臣阿·阿拉克切耶夫向枢密院递交报告，要求制定和实施《哥萨克军屯和边防军管理条例》，但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实现。1810-1815年，虽然枢密院下发许多限制顿河地区贵族强霸土地、警告长老会不得专横的命令，也无济于事。俄国政府为了进一步加强对顿河地区的管理，保持顿河军的纯洁性和战斗力，1815年，下令禁止非哥萨克人加入哥萨克。1816年禁止顿河贵族和官吏买卖和使用从俄国内陆和其他省份逃来的农民等。

1818年，顿河军屯阿塔曼阿·杰尼索夫建议成立委员会，制订新的顿河军屯管理细则。他的提议得到俄国政府的肯定和支持。俄国政府决定借此进一步规范对顿河军的管理。

① Ауский С. Казаки, особое сословие. Москва: ОЛМА-ПРЕСС, СПб.: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Дом Нева. С.9-10.

② История донского казачества.учебник для студентов высших учебных заведений. С.119.

③ Там же. С.120.

1819年5月，亚历山大一世宣布组建顿河委员会。该委员会由顿河军屯阿塔曼杰尼索夫领导。其成员有陆军部上将阿·切尔内舍夫和司法部的弗·保卡尔斯基。政府要求他们在一年内制订《顿河军屯管理条例》。但是，委员会成员之间、中央代表之间尖锐的矛盾和斗争，使委员会的工作难以推进。1824年，委员会最终制定出顿河军屯管理条例草案，并提交给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审批。但是，1825年亚历山大的猝死和十二月党人起义，使俄国政府无暇顾及顿河军屯的改革。

尼古拉一世继位后，为了加强政府对哥萨克军屯的控制，于1827年取消军屯阿塔曼的职位，并在顿河军屯设立行政长官。但不久又恢复军屯阿塔曼的职位，并宣布全军屯阿塔曼的职位拥有继承权。委派阿塔曼的权利和义务，由1828年2月16日颁布的《关于顿河军屯管理条例颁布和实施前军屯阿塔曼和委派阿塔曼的权利和义务的暂行条例》加以规定。沙皇委派的阿塔曼服从军屯阿塔曼的指挥，但在军屯阿塔曼离职或死亡时，委派阿塔曼行使军屯阿塔曼的一切权利和义务。顿河军屯阿塔曼是全军屯的首长和军屯办公室主任。

18世纪末19世纪初，顿河军屯在军事和权力方面的改革，都是依据俄国法律实施和进行的，而顿河军屯的地方性和公民权利的改革并没有实施。虽然俄国政府取消顿河军屯选举阿塔曼的权力，但顿河哥萨克的民主制并没有完全根除，在实践中还保留了其他的民主体制。例如，村阿塔曼就是通过全村大会选举产生。顿河军屯的区、村镇的管理以及居民的日常权利、宗教文化等，还具有许多古老的特点。地方权力和管理机关为村公所和优惠村^①公所、村和优惠村法院。

在军屯办公室和地方权力、管理机关之间的中间管理机构是区侦查处。侦查处成立于1780年，是介于区中心和村之间的一个专门机构，在18世纪下半期约有4至11个。侦查处的任务为：寻找逃跑的农奴，并将其归还给原来的主人负责；刑事、赋税、劳役事务；管理桥梁和通信；收缴商业税收等。^②侦查处的人员经选举产生，一般是威信极高的人，同时是被顿河军阿

① 优惠村镇指俄国11-18世纪的一些村镇的居民在短期内可免除交税和服兵役的义务。

② История донского казачества.учебник для студентов высших учебных заведений. С.123-124.

塔曼和沙皇政权信任的人。侦查处的人员只能在自己所管辖的区内执行任务。

这样，通过实施一系列的强制措施，俄国政府对顿河军屯拥有了完全的领导权和管理权。顿河哥萨克成为俄国强有力的后备军和边境的卫戍兵。

三、18 世纪 30 年代至 19 世纪末顿河军区的改革

虽然自 17 世纪下半期俄国政府针对顿河哥萨克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但直到 19 世纪初，顿河哥萨克在俄国的社会和政治地位并未确定。没有一部关于顿河哥萨克在俄国的社会政治地位、服役期限、土地权等的法规条文，导致许多社会问题的产生。例如在顿河哥萨克村中，一部分村拥有的土地十分少，而另一些村占有大量的土地，但劳动力不足。富裕的顿河哥萨克成为地主，雇佣大量的农民，而一部分贫穷的哥萨克没有土地。随着从俄国内陆、乌克兰等地逃役而来的农奴、自由人的增多，在顿河地区形成农民阶层，而这些农民大多受雇于贵族、地主，或富裕的哥萨克。他们的生活十分不稳定。^①这一切都需要一部具体的法规对此加以解决和规范。为此，俄国政府对顿河军屯实施改革，规范对其的管理。

1819 年，顿河哥萨克组建制定顿河军屯管理条例的专门委员会。该委员会于 1835 年 5 月 26 日完成《顿河军屯管理条例》（Положение об управлении Донского Войска）（以下简称《条例》），并提交沙皇审批。尼古拉一世于当天签发该《条例》，并由圣彼得堡军事印刷厂印刷成册。《条例》共 544 页，分总则、军事管理、民事管理 3 部分，十分详细地规定了顿河军屯在军事、民事方面的管理方式和政策。1836 年 1 月 1 日，顿河哥萨克在新切尔卡斯克召开大会（Круг），阿塔曼宣布顿河军屯法律的诞生。

《条例》对顿河军屯管辖的区域加以界定，并确定了顿河军屯的行政称谓。顿河军屯为俄国一个省级行政区。^②顿河军屯，即顿河哥萨克生活区，俄文为“Земля Войска Донского”，缩写为“ЗВД”。顿河军屯被称为“Земля”

① Краснов П.Н. История донского казачества.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войска Донского. Москва: ЯУЗА, ЭКСМО, 2007. С.300.

② Краснов П.Н. История донского казачества.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войска Донского.С.305.

(屯)，而不像其他省称作“губерния”(省)；而下一级的管理单位被称为“округ”(区)，代替“уезд”(县)。《条例》规定顿河军屯的范围：军屯的面积为 14.5 万平方公里，北邻沃罗涅日省和罗斯托夫省，东至萨拉托夫和阿斯特拉罕省，南临黑海哥萨克军屯和亚速海，西接叶卡捷琳娜斯拉夫省、哈尔科夫省和沃罗涅日省。顿河军屯由顿河哥萨克人把守，外人不能随便进出。顿河军屯的土地归顿河哥萨克人所有。顿河军屯的土地被认为是顿河哥萨克的私有财产，可以互相买卖，但这种买卖只能在顿河哥萨克之间进行，不允许非哥萨克购买顿河军屯的土地。顿河哥萨克人的服役为终身制，禁止退出哥萨克阶层。这样，顿河哥萨克成为俄国一个独特的封闭的军事阶层。

《条例》将顿河军屯管理局划分为军事管理局和民事管理局两部分。无论军事管理局或民事管理局，都受委派的军屯阿塔曼领导。《条例》最终确认顿河军屯阿塔曼的称谓，委派军屯阿塔曼是顿河军屯的最高领导人。1835 年《条例》最终肯定军屯阿塔曼的继承权，不再通过大会选举，并授予沙皇委派的阿塔曼直接管理军队的权力，拥有军事权力和管理公民权。顿河军的权利划分为军权和民权。顿河军委任阿塔曼下设阿塔曼办公室、副官和军大尉。阿塔曼通过顿河军勤务处和军管理处发挥自己的作用和功能。

顿河军屯阿塔曼的职责主要是：负责法律和各种条文的实施，保卫顿河军屯的优惠条件和特殊性不被破坏，监督地方官员的工作，保护国家、军和村社财产的安全等 12 项。阿塔曼作为最高地方长官，每年必须巡查整个顿河军屯管辖区。如果一年不能巡查完，那么，两年内必须巡查完。每次巡查完，阿塔曼要向军区管理处提交公民事务巡查报告，向顿河军屯勤务处提交军事事务巡查报告。同时，提出纠正和改善的措施。^①

在军事管理方面，顿河军屯划为 4 个军事区（военный округ），即第 1、2、3、4 军区。每个军区由军区将军领导。军区将军根据军阿塔曼的推荐由军事部任命，任期三年。军区将军的任务是执行军阿塔曼和军勤务处的命令；登记和统计少年哥萨克、20 岁以上成年哥萨克的人数；分发哥萨克和官员的薪俸、服装、武器、马匹等。^②

① Положение об управлении Донского Войска. С-Петербург: Военная типография. 1835.С.1-8.

② Там же. С.35-37.

作为武装力量的顿河军共划分为 54 个团，均为非正规军。1835 年《顿河军管理条例》规定哥萨克军衔为下士、军士、下级准尉、少尉、百夫长、大尉、长老、中校和上校（委任阿塔曼）等。《条例》第二部分第九章规定，所有男性哥萨克，包括各级官员、贵族的孩子，从 17 岁开始在村寨服役，直到 19 岁。17-19 岁被训练的男子称为少年兵。少年兵年满 20 岁时，就必须注册为哥萨克，开始宣誓效忠沙皇，并自购战事装备，等待命令。该《条例》第十章规定哥萨克服役的年限。不同官职、不同出身的哥萨克其服役年限也不相同。一般服役年限为 25 年。《条例》规定，顿河军屯的军事审判权属于军事法庭委员会。每个值勤区和军团都设有自己的审判法庭。军事法庭委员会主席就是军屯委派阿塔曼，在其缺席时，由军勤务部长代替。军团由团长领导。

在顿河军屯民事管理方面，按照《条例》的规定，顿河军屯民事管理局由“军屯行政管理处”、“军屯法庭”（刑事法庭和民事法庭）、“军屯社会救济处”、“军屯医疗管理处”、“军屯邮政局”、“军屯代表委员会”、“军屯检察处和监察处”等组成。^①关于村镇的管理，《条例》规定，将村镇划分为两种，即哥萨克特别村镇和卡尔梅克人游牧区百人乌卢斯。每个村镇建立自己的行政管理处，公开选举村阿塔曼、两个监督员（长老）和两名文书（记事员）。两名文书中，一人编撰军事方面的事务，一人编撰民事方面的事务。这些村级官员每三年选举一次。^②

《条例》规定组建顿河哥萨克军屯代表大会。代表大会由各个区选举出自己的代表组成。代表大会的职责是选举民事管理方面的官员、讨论服兵役及相关事务、审查和颁发贵族证明等。^③《条例》规定，顿河军屯大会一年召开四次，分别为 1 月 1 日、5 月 9 日、8 月 30 日和 10 月 2 日。村大会召开的形式分为两种：全体大会和例会。全体大会主要就涉及全体村民的事务召开，而例会主要谈论村民的权利和义务，解决村民之间的纠纷等各种事务。

① Положение об управлении Донского Войска. С.369-370.

② Там же. С.408-409.

③ Там же. С.390-391.

村全体大会一般为一年三次，而例会每月召开一次。^①顿河军屯的官员根据军屯内部管理原则，每三年选举一次，当年的五月份开始，六月一日前结束，六月一日新当选的官员就职。而村寨有权选举自己的村寨阿塔曼、村法官和参加军法庭、刑事法庭及民事法庭的代表，每三年选举一次，一月一日选举，当日结束。^②

《条例》最终将顿河军屯纳入与俄国其他省份一样的管理体系中。如，整个军屯的邮件投递与俄国其他地区联合在了一起。在军事方面，顿河哥萨克的服役具有特殊性，不同于其他编制的军队。但出于战争等原因的需要，他们会随时编入其他省的军队。顿河哥萨克既是俄国的一种军事力量，也是一个复杂的生产主体。顿河哥萨克平时在军辖区服役，如守卫自己的区和村寨，维护区和村的治安等，也从事农田耕作等。而一旦发生战事，马上响应召唤，组织起来到军区外参加各种战争。^③

《条例》的颁布标志着顿河哥萨克从一个自由群体转变为俄国一个封闭的军事阶层。顿河哥萨克作为一个阶层，其特殊性主要表现为，在顿河军屯实施特殊的地区行政管理方式和特殊的军事管理方式。由于顿河哥萨克的战斗能力直接依赖于其生活习惯，俄国政府不得不考虑其生活特点，让顿河哥萨克保持独特的土地使用方式、自治权、独特的审判方式，以及有关组建军事团队、选举委派阿特曼领导下的各级军事长官等军事事务。顿河哥萨克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有着特殊的权利和义务、特殊的服兵役制度。顿河哥萨克不参加全俄缙绅会议，免除人头税和其他赋税。顿河哥萨克有使用军屯土地的权利，可自由使用顿河军屯的林地、牧场、湖泊、河流等。

俄国哥萨克军屯管理体系最终形成于 19 世纪 60、70 年代。在俄国大改革时期，逐渐实施非哥萨克化的措施。俄国政府有意将哥萨克转变为普通的公民，允许哥萨克退出该阶层，或到别处谋生。19 世纪下半期，顿河军屯的军事和民事问题由陆军部管理，由非正规军管理局（Гла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иррегулярных войск）监督。在德·米留金（Д. Милютин）任陆军部大臣时

① История донского казачества.учебник для студентов высших учебных заведений. С.126.

② Положение об управлении Донского Войска. С.416-421.

③ Там же. С.35-50.

(1861-1881), 俄国政府采取措施逐渐消解哥萨克的军事功能, 发展哥萨克作为公民的生活方式, 将其不断融合于其他居民中。到 1869 年, 大部分哥萨克军团被划归骑兵师, 为常规骑兵军。随着枪炮等火力武器的普及和不断复杂的军事形式, 部分哥萨克军转变为正规的骑兵军。高加索战争结束后, 俄国政府缩减哥萨克非正规军的数量。1870 年, 顿河军屯改称为顿河军区 (Область Донского Войска)。1879 年, 非正规军总管理局改为哥萨克军管理总局 (Гла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казачьих войск)。1898 年, 总管理局不再允许哥萨克代表进入军事委员会, 这样削弱了哥萨克地方行政机构与中央政府的联系, 顿河哥萨克的政治地位也逐渐降低。

三、20 世纪至今的非哥萨克化和复兴政策

(一) 20 世纪初顿河哥萨克的分化和非哥萨克化政策

19 世纪末, 俄国政府在哥萨克自治军区已经建立有效合理的管理机构。1905 年革命时期, 哥萨克忠于国家和沙皇, 镇压起义和革命。俄国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出现两个政权: 临时政府和工兵代表苏维埃。1917 年 4 月爆发第一次政治危机。引起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临时政府宣布俄国继续参加协约国的战争。6 月爆发第二次政治危机, 不久又爆发临时政府的第三次政治危机。在这个时期, 右翼分子指望哥萨克复辟, 而左翼则担心哥萨克反革命。因此, 他们在哥萨克地区积极地进行宣传工作, 竭力分化哥萨克阶层。

临时政府对待哥萨克的态度具有二重性。对哥萨克来说, 临时政府没有改变在哥萨克军区建立的自治选举制度, 即阿塔曼制; 而另一方面, 它又竭力使哥萨克部队和卫戍部队不听从阿塔曼的领导, 而接受临时政府的指挥。为了吸引哥萨克占到自己的一方, 临时政府在 1917 年 4 月 7 日公开承认“哥萨克对土地的权利, 以及哥萨克在历史中形成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但对土地的所有权要经过立宪会议颁布条文予以确认。”^①

^① Агафонов О.В. Казачьи войска России во втором тысячелении.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Кировская областная типография, 2002. С.200-201.

1917年6月初，在彼得格勒举行第二次哥萨克军区联盟大会。大会宣布：为了使俄国成为一个完整的民主共和国，并广泛地实施地方自治，哥萨克全力支持临时政府，反对无政府主义、布尔什维克党和国际共产主义，必须采取应有的措施反对他们的宣传活动；保护哥萨克人的生活方式。但是，在战争之后，哥萨克应该承担服役义务，并拥有不可侵犯的军区私有财产，包括耕地和其他的土地资源。

但随着俄国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哥萨克人竭力在哥萨克地区建立自己的政府，选举阿塔曼，成立哥萨克代表机关。在哥萨克军区，临时政府的实际威信也不断降低，而哥萨克代表机关的权威却不断增强。这样，在一些哥萨克军区，包括顿河哥萨克军区，存在三重政权：哥萨克阿塔曼政府、临时政府军事委员、工兵代表苏维埃。

哥萨克与苏维埃政府之间的斗争却很激烈。苏维埃政府在哥萨克和农民之间实施土地使用权利平等的路线，逐渐分化哥萨克，并宣传其目的是所有的俄罗斯人都平等拥有土地。而哥萨克人坚决捍卫自己原有的特权和优惠政策，竭力实施哥萨克完全自治，保护自己的土地权利。哥萨克人认为，他们有权利支配从祖辈继承下来的土地，因为他们是俄罗斯新土地的征服者、保护者和开垦者。双方斗争的结果，一是在外来人和哥萨克之间产生敌对情绪；二是在哥萨克地区滋生分离主义或独立主义。由于阶层分化及政治立场的不同，最终导致在内战初期哥萨克分化为几个阵营：一部分哥萨克成为旧俄国的拥护者，反对革命，参加白军，成为“白色哥萨克”；一部分哥萨克参加“绿色”阵营，即君主政体的拥护者，成为“绿色哥萨克”；而贫穷的哥萨克拥护革命，为苏维埃政权而战，参加红军，成为“红色哥萨克”。

在20世纪初，顿河哥萨克举行多次暴动和起义。他们在白军的支持下，建立顿河哥萨克共和国，但很快被苏维埃政府取缔。十月革命胜利后，哥萨克军被解散。根据1919年1月24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组织部（Оргбюро ЦК РКП(б)）发布的指示和命令，苏维埃政府开始对哥萨克的上层人物实施大规模镇压，目的是“彻底地消灭哥萨克”，对直接或间接地参加反对苏维埃斗争的哥萨克也实施同样的手段。^①1919年4月8日俄共（布）中央委员

① Кринко Е.Ф. Проблемы возрождения казачества: теория и практика. <http://ru.narod.ru>

会顿河委员会（Донбюро ЦК РКП(б)）通过《迅速取消和彻底地消灭作为一个特殊经济实体的哥萨克军区》的决议，开始对哥萨克采取“大分化”、“大棒政策”、“大移民”措施。^①1931年1月25日，在庫班地区实施哥萨克移民，9千户家庭近4.5万哥萨克，从黑海地区迁到无人居住的斯塔弗洛波利和萨利草原。1930-1931年间，仅北高加索地区就有30万哥萨克被迁徙到北方地区。同时，苏联政府规定，取消哥萨克服役权利，不允许哥萨克参加苏联任何一个兵种。^②这样，作为一个军事阶层的哥萨克就被取消。

（二）20世纪末至今的哥萨克政策

自20世纪80年代，随着苏联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特别是苏联解体前夕，哥萨克复兴运动迅速发展起来。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政府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和颁布法律条文对其加以规范和引导。

在苏联解体前夕，苏联政府已经认识到哥萨克复兴对社会和国家的影响。自1991年起，国家从规范顿河哥萨克复兴组织的活动着手，制定哥萨克组织建立的原则，规定哥萨克建立组织要到当地司法部门进行登记注册。1991年4月9日，苏共罗斯托夫区委突然通过《关于复兴顿河哥萨克传统运动的决议》，要求顿河军区哥萨克联盟、地区哥萨克组织“必须及时地向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报告自己的活动，同时通过区委员会分会、市委员会、苏联共产党区委，保持哥萨克组织与共产党、工人之间的联系，为复兴优秀的顿河哥萨克文化提供必要的、实际的帮助和支持”。^③这个决议引起一些哥萨克人的强烈反响。一些具有共产党员身份的哥萨克人开始远离“不合时宜”的哥萨克运动。顿河军区哥萨克联盟首领米·米·肖洛霍夫以健康原因为由提交退休申请书。虽然，政府已经认识到，一些哥萨克组织的活动已经对国家的稳定构成威胁，但苏联共产党对

① Щетнев Е.В. Рассказывание как социаль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проблема Голос минувшего// Кубанский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1997. No.1. С.18.

② Чернопицкий П.Г. О судьбах казачества в советское время. Кубанское казачество: проблемы истории и возрождения. Краснодар: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Кубан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1992. С.83-85.

③ Масалов А.Г. Возрождение казачества на Северном Кавказ в конце ХХ-ХХI века. Ставрополь: Изд-во СГУ, 2002. С.322-323.

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哥萨克复兴运动在苏联国内外不断继续扩大。

随着苏联的解体，哥萨克复兴运动达到一个高潮。只要有哥萨克后裔居住的地方就有哥萨克组织存在，包括移居国外的哥萨克侨民。1991年10月5-6日，顿河哥萨克在新契尔卡斯克举行第二届顿河哥萨克军区联盟大会。会议通过《关于恢复顿河共和国的决议》，恢复新切尔卡斯克作为顿河哥萨克首府的地位，统一哥萨克服装，选举苏联共产党区委员会第一书记的儿子谢·阿·梅谢梁科夫（Серге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Мещеряков）为顿河哥萨克军区联盟阿塔曼。1991年10月13日，恢复顿河亚历山大三世士官武备学校和哥萨克中学。一个月之后，顿河军区哥萨克联盟首领委员会宣布新契尔卡斯克顿河军区哥萨克联盟，为顿河共和国权利的合法继承者，通过《关于在哥萨克行动中政党和组织的作用》的决议。决议强调哥萨克在政治上的优先权，并禁止在哥萨克活动中成立任何政党和派别。1991年11月17日，顿河哥萨克宣布组建“南俄哥萨克共和国联盟”。3天之后，在新切尔卡斯克召开南俄哥萨克大会，宣布“南俄哥萨克共和国联盟”成立，并选举梅谢梁科夫为首领。大会还讨论组建哥萨克共和国过渡政府和创建哥萨克民族近卫军的问题。^①

由此可见，苏联解体后，顿河哥萨克复兴运动已经远远超出民间社会组织的范畴，更具有政治色彩，对权利的追求也不断增强。在这种情况下，1992年和1993年，叶利钦分别下达总统令，即《俄罗斯联邦法关于恢复被迫害人民哥萨克的实施措施》和《在俄罗斯联邦北高加索地区的边境和内地军队改革中给予哥萨克支持的命令》。总统令指出，凡认为自己为哥萨克后裔的公民，可以恢复和发展哥萨克传统的经营方法、文化习俗，或自愿加入哥萨克社会团体并服军役。哥萨克军团、哥萨克联盟军、哥萨克边疆军、哥萨克摩托队的职责和义务，应与俄罗斯联邦法规定的关于军队职责和军役相符合。^②

1991年末，在顿河罗斯托夫地区的哥萨克开始组建自己的权力机关。顿河军区哥萨克联盟的领导在12月向罗斯托夫地区人民代表委员会提出一

① Масалов А.Г. Возрождение казачества на Северном Кавказ в конце ХХ-ХХ I века. С.323.

② Агафонов О.В. Казачьи войска России во втором тысячелении. С.122.

系列要求，包括将“罗斯托夫地区”改为“顿河军区”或“顿河共和国”等。哥萨克取得区和市政财产中的办公地点、技术和设备，并免去其租赁费用和10年的税收，把罗斯托夫地区所有的渔场和牧场转交给他们经营。区苏维埃代表列·阿·伊万琴科（Л.А.Иванченко）（当时为国家杜马议员）对哥萨克的要求给予支持，并支持“恢复不合法地剥夺顿河哥萨克在俄罗斯联邦国家的民族形式”。但是由于地区检察院的抗议，所以通过的是比较折中的议案，即《支持第二届顿河军区哥萨克联盟大会通过的关于恢复顿河哥萨克权利的决议》。1992年6月15日发布的第632号俄罗斯联邦总统令《俄罗斯联邦关于“恢复被压迫种族”条例：恢复哥萨克的实施措施》指出，国家将支持哥萨克复兴。^①

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顿河哥萨克复兴运动不断壮大。1996年10月，在顿河哥萨克大会上，宣布成立大顿河军（Всеволокое Войско Донское），1997年7月18日，俄罗斯以总统令对此予以肯定。大顿河军拥有13.5万名哥萨克。其基本功能是：恢复哥萨克阶层，组织哥萨克为国家服役，开展对年轻哥萨克的爱国教育，发展哥萨克军校，保护哥萨克文化和传统，对服役前的哥萨克进行培训，接受俄罗斯军队的领导，帮助哥萨克人从事农业生产等。大顿河军继承和保护顿河哥萨克前辈留下的遗产，从事稳定局势的政治和社会活动。在白俄罗斯、德国、西班牙和乌克兰，该组织也委派了自己的代表。^②

为了更好地规范哥萨克复兴运动，使其有利于国家发展，在1996年的俄罗斯联邦总统令《关于吸收哥萨克人员参加国家或其他服务的规定》中指出，“按国家现行法律程序，吸收哥萨克为国家服务；保护俄罗斯联邦边境；生产和销售武装力量所需的农产品、原料和粮食。由国家执行机关负责安排哥萨克参加该总统令中所规定的服务种类。哥萨克是国家军队的储备力量。”1999年，俄罗斯政府通过“支持注册的哥萨克社会团体工作的计划和目标”。该《计划和目标》实施期限为1999年至2001年。其目的是有组织地安置哥萨克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哥萨克传统的经营活动，保障哥萨克地区社

① Агафонов О.В. Казачьи войска России во втором тысячелении. С.325-326.

② <http://www.russiancossacks.ru/index.php?id=2>

会和经济的稳定发展。^①

苏联解体后，在短短的十年间，俄罗斯政府针对哥萨克的复兴采取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颁布了相关的法规条文。一方面，国家承认和恢复哥萨克作为一个独特社会群体的社会地位和权利义务；另一方面，有效地规范了哥萨克社会组织的行为活动，使其纳入合法的有利于俄罗斯发展的道路。

20 世纪末，俄罗斯政府最终确定关于哥萨克复兴的国家政策。而 21 世纪初，哥萨克与国家的合作规模和范围急剧缩小，由政府出面组建的哥萨克服务机构也停止工作。这主要是因为俄罗斯政府的权力得到加强，控制了分裂分子的活动，长时间的政治危机逐渐消除，俄罗斯政府对公民在社会政治上支持的需求急剧减少。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造成哥萨克与国家的关系时而渐进，时而渐远。虽然新世纪的俄罗斯政局趋于稳定，但哥萨克问题仍是俄罗斯政府不能忽视的问题。为了引导哥萨克更好地为国家服务，使其成为俄罗斯强有力的后备军和边防军，2005 年 12 月 5 日，时任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第 154-ФЗ 号”文件《关于俄罗斯哥萨克为国家服役的规定》。该文件成为俄罗斯哥萨克为国家服役的基本法律基础，确立了俄罗斯哥萨克居民的权利和组织基础。2008 年 7 月 3 日，新上任的总统梅德韦杰夫签署《俄罗斯联邦针对哥萨克的国家政策指导思想》。该文件指出：“俄罗斯政府针对哥萨克政策的目的是：发展哥萨克为国家和地方服役；复兴和发展俄罗斯哥萨克的宗教和文化基础、家庭传统；培养哥萨克青年的爱国主义精神。”^② 该文件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针对哥萨克复兴的政策基础。

为了保障国家针对哥萨克政策的实施，2009 年 1 月 12 日，时任总统梅德韦杰夫签署“第 15-пп 号”总统令《关于建立俄罗斯总统直属哥萨克事务委员会》。根据该总统令，成立总统直接领导下的哥萨克事务委员会。委员会由边疆区区长、注册哥萨克社会团体阿特曼、著名的哥萨克学者等 50 人组成。委员会是“俄罗斯总统领导下的一个审议和咨询机关，其目的是实施

① Масалов А.Г. Возрождение казачества на Северном Кавказ в конце ХХ-ХХ I века. С.127-128.

② Официальный сайт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http://www.kremlin.ru/text/docs/2008/07/203446.shtml>

国家针对哥萨克颁布的政策。”^①很快，俄罗斯总统在 2010 年相继签署“第 168 号”《关于在国家注册的哥萨克社会团体中哥萨克军团的军徽和军旗》、“第 169 号”《关于在国家注册的哥萨克社会团体成员的官衔》、“第 170 号”《关于在国家注册的哥萨克社会团体成员的奖惩》、“第 171 号”《关于在国家注册的哥萨克社会团体中哥萨克军的军服、徽章》等总统令，详细规定了俄罗斯哥萨克社区的哥萨克军团的徽章、军旗、军服等事项，以进一步加强哥萨克社会团体的管理，并给予经济方面的保障。2011 年 4 月 19 日俄罗斯总统签署《俄罗斯联邦关于俄罗斯哥萨克为国家服役的修正案》，进一步修正补充俄罗斯联邦法中 2005 年“第 154-ФЗ号”、2008 年“第 49 号”、2009 年“第 23 号”《俄罗斯哥萨克为国家服役和其他类服务管理条例》的法律文件，进一步明确俄罗斯哥萨克成立社会团体的程序、发展模式、社会团体成员的义务和职责等。2011 年 2 月 20 日，俄罗斯总统直属的哥萨克事务委员会颁布《到 2020 年俄罗斯哥萨克发展战略规划图》，指出哥萨克发展的目的和任务，以及实现这些目的和任务的原则和方法等，为哥萨克发展制定长远发展计划。^②2011 年 10 月 21 日俄罗斯总统签署第“1396 号”《关于任命哥萨克军事团体阿特曼为高级官员的总统令》，之后各个地区哥萨克军团阿特曼都被升任为国家高级官员，享有与其他国家高级官员同等的待遇。自普京再次出任总统后，先后签署了“第 352-pp 号”、“第 369-pp 号”、“第 768 号”、“第 778 号”、“第 246 号”、“第 247 号”、“第 457 号”、“第 458 号”等总统令，修改了关于哥萨克社会团体的一些法令，增补俄罗斯联邦总统直属哥萨克事务委员会成员，任命哥萨克军团阿特曼，阿塔曼为国家高级官员，并制定《至 2020 年俄罗斯联邦针对俄罗斯哥萨克发展的国家战略方

① <http://www.kremlin.ru/text/docs/2009/01/211589.shtml>

② Каталог документов. Казачий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Аналитический Центр. <http://kazak-center.ru/index/0-100>

针》。^①不断兴起的哥萨克社会群体为俄罗斯提供了诸多方面的服务，如军事服役、治安巡逻等。2012年11月27日，身穿哥萨克传统军装的中央哥萨克军组成的巡逻队，开始出现在莫斯科街头和公共场所，协助警察维持莫斯科的公共秩序。^②

今日，俄罗斯人对“哥萨克”的理解并非一致。一些人认为，“哥萨克”指在国家注册的哥萨克社会团体成员（член казачьего общества, КО）；一些人认为，所有被称为“哥萨克的”组织成员都是哥萨克；另一些人认为，所有在俄国沙皇统治时期，即十月革命前的哥萨克及其后裔都属于哥萨克。因此，关于哥萨克的数量，至今尚无统一的官方数字。俄罗斯记者尼古拉·库切罗夫（Николай Кучеров）认为，如果按照1917年颁布的《消除阶层和公民等级法令》的规定，在俄罗斯就不存在哥萨克。因为哥萨克阶层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已经彻底消失。而那些认为，只要有“哥萨克的”一词的社会

① 详见：2012年7月31日签署“第N 352-pp号”《关于俄罗斯联邦总统直属哥萨克事务委员会成员的命令》（О составе Совета при Президенте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о делам казачества）、2013年10月4日签署“第369-pp号”《关于2012年7月31日按照俄罗斯总统指示组建的俄罗斯联邦总统直属哥萨克事务委员会成员的修正案》（О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й в состав Совета при Президенте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о делам казачества, утвержденный распоряжением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31 июля 2012 г. № 352-pp）、2013年10月7日签署“第768号”《关于哥萨克军事团体“大顿河军”阿特曼的总统令》（№ 768 Об атамане войскового казачьего общества «Всевеликое войско Донское»）、2013年10月17日签署“第778号”《关于1992年“第632号”关于采取措施恢复被取消的民族针对哥萨克的联邦法和1995年“第835号”关于在俄罗斯联邦注册的哥萨克社会团体的总统令》（О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й в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15 июня 1992 г. № 632 О мерах по реализации Закон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 реабилитации репрессированных народов" в отношении казачества" и в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9 августа 1995 г. № 835 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м реестре казачьих обществ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2014年4月16日签署“第246号”《关于伏尔加哥萨克军事团体阿特曼的总统令》（Об атамане Волжского войскового казачьего общества）、2014年4月16日签署“第247号”《关于伏尔加军事团体“中央哥萨克军”阿特曼的总统令》（№ 247 Об атамане войскового казачьего общества "Центральное казачье войско）、2014年6月23日签署“第457号”《关于奥伦堡哥萨克军事团体阿特曼的总统令》（№ 457 Об атамане Оренбургского войскового казачьего общества）、2014年6月23日签署“第458号”《关于授予西伯利亚哥萨克军事团体阿特曼戈·波利瓦洛夫为高级官员的总统令》（О присвоении высшего чина атаману Сибирского войскового казачьего общества Привалову Г.Н.）。参见 <http://kazakrossii.ru/index.php>

② <http://www.itar-tass.com/c15/581482.html>. МОСКВА, 26 ноября. /ИТАР-ТАСС/

团体成员就属于哥萨克，那么，哥萨克人数有 700 多万，因为未在国家注册的哥萨克组织和团体无法统计。而且，一些团体夸大自己组织成员的数量，又得不到官方认可。因此，较有说服力的数字是在国家注册的哥萨克社会团体成员的数量。俄罗斯联邦法“关于俄罗斯哥萨克公务”《ФЗ «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службе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казачества»》指出，俄罗斯哥萨克是指在国家注册的哥萨克社会团体。哥萨克社会团体是俄罗斯公民自愿组织的单位，其成员负有为国家提供服务的义务和责任。只有注册的哥萨克团体成员才能被国家承认为哥萨克。俄罗斯地区发展部（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региональ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是俄罗斯联邦处理哥萨克事务的全权代表机关。

在 2013 年 11 月 18 日举行的地区发展部会议上，国家民族政策司司长亚历山大·茹拉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Журавский）在其报告中指出，在俄罗斯联邦 72 个州区有 11 个国家注册的哥萨克社会团体，总人数为 50.6 万，包括“库班哥萨克军团”（Кубанское войсковое КО, 14.6 万人）、“大顿河哥萨克军”（Всевеликое войско Донское, 12.6 万人）、“中央哥萨克军团”（Центральное казачье войско, 7.5 万人）、“叶尼塞哥萨克军团”（Енисейское войсковое КО, 6.6 万人）、“捷列克哥萨克军团”（Терское войсковое КО, 3 万人）、“奥伦堡哥萨克军团”（Оренбургское войсковое КО, 2.5 万人）、“伏尔加哥萨克军团”（Волжское войсковое КО, 1.4 万人）、“外贝加尔哥萨克军团”（Забайкальское войсковое КО, 0.6 万人）、“西伯利亚哥萨克军团”（Сибирское войсковое КО, 0.6 万人）、“乌苏里哥萨克军团”（Уссурийское войсковое КО, 0.6 万人）、“伊尔库茨克哥萨克军团”（Иркутское войсковое КО, 0.45 万人）。^①由此可见，今日的俄罗斯哥萨克主要居住在俄罗斯南部边疆区，即传统的哥萨克居民区，主要分布于顿河、库班和捷列克等地区。但至今哥萨克不被多数人认同为一个民族。因此，在 2010 年俄罗斯全国人口普查时，只有 6.7 万人在“民族”一栏中填写为“哥萨克”。而大部分生活在传统哥萨克地区的人认为，不存

^① Николай Кучеров: Где живут казаки? Сколько в России казаков и в каких регионах они проживают? http://kvzn.zp.ua/?go=news&news_id=2538

在哥萨克族，而是根据自己的民族基因归入俄罗斯族、乌克兰族、鞑靼族、卡尔梅克族等。

综上所述，自 16 世纪下半期俄国政府通过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不断规范、加强对顿河哥萨克的管理，将哥萨克有一个自由社会群体转变为俄国一个独特的军事阶层、俄国殖民扩张的工具。哥萨克为俄国殖民扩张立下了汗马功劳。俄国从 1462 年的 43 万平方公里的内陆国，到 1553 年的 280 万平方公里的莫斯科大公国，再到 17 世纪末的 1700 多万平方公里的俄罗斯帝国，仅用 200 多年一跃成为世界上面积第一大国。俄国版图的迅速扩大，离不开哥萨克的军刀和马蹄，哥萨克是俄国扩张的急先锋。俄国殖民者每占领一个新地方之后便建立哥萨克军屯，这些军屯构成俄国边境上坚固的防御线。军屯制是俄国成为世界第一领土大国的主要手段之一。如今，针对哥萨克这一特殊群体，每一届俄罗斯政府均会颁布相应的法规和总统令，规范哥萨克的管理，努力使哥萨克社团的复兴在俄统一民族国家的框架内发挥积极功能。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Tsarist Russia, Cossacks living along the Don, known as Don Cossacks, had most people and the strongest military power. From latter part of the 16th century till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in order to expand colonies and garrison frontiers, the Russian government implemented a series of policies and measures such as employment, battling, and reform, gradually including Don Cossacks to Russian Cossack unified management system and accordingly establishing their social status. During the Russian Revolution, there was stratification among Cossacks and existed triple regimes (Cossack Ataman government, the military committee of provisional government and Soviet on behalf of workers and soldiers).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1919 “non Cossack” policy,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Cossacks, as a military class, were completely canceled. Since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Russian government has taken a series of Cossack rejuvenation policies and therefore the Don Cossacks rose again under the new political environment.

【Key Words】 Russian Cossacks, Reform of Cossack Troops, De-

Cossackization, Cossack Revival

【 Аннотация 】 Во времена Царской России живущее в Донском регионе казачество, донские казаки, было наиболее многочисленным и обладало наиболее мощной военной силой.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России в интересах своей колониальной экспансии и расширения пограничного гарнизона, начиная с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ы 16-го века и до конца 19-го века, осуществляло по отношению к донским казакам политику занятости, уступок, реформ и ряд иных стратегий и мер, донские казаки были постепенно включены в единую систему управл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их казаков, был установлен социальный статус донских казаков. В период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класс казаков был дифференцирован, в Донской области существовало тройственно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атаманско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военный комитет временн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и советы). В 1919 г.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реализации политики «расказачивания» права и обязанности казачьей военной иерархии были полностью отменены. С конца 20-го века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России стало проводить политику возрождения казачества, донское казачество стало возрождаться в новы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условиях.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Казачество России, реформа казачьих военных областей, расказачивание, возрождение казачества

(责任编辑 贝文力)

摩尔多瓦语言政策及相关问题分析*

张宏莉 赵静**

【内容提要】由于摩尔多瓦历史的复杂性和苏联时期语言政策的强制性，独立后的摩尔多瓦社会生活各领域存在着明显的“去俄罗斯化”倾向，并引发了一系列民族和社会问题：加告兹自治区和“德左”地区因语言问题与摩尔多瓦政府摩擦不断，联合主义势力渐强，双重国籍者数量持续增加。摩尔多瓦的语言政策，对处于欧洲与俄罗斯之间的摩尔多瓦国家的复杂走势，将产生微妙影响。

【关键词】摩尔多瓦语言政策 去俄罗斯化 俄语

【中图分类号】D715.15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5)04-0089(15)

由于地缘和历史渊源，摩尔多瓦共和国的俄语普及程度高。为了加强民族意识和民族文化认同，独立前后，摩尔多瓦通过《国语地位法》、《宪法》及《语言功能法》等法律法规，确立了摩尔多瓦语的国语地位，“去俄罗斯化”色彩浓厚（俄语为族际交际语）。与此同时，由于“比萨拉比亚”问题，民族主义者不仅追求民族独立，更希望与罗马尼亚合并。随着“脱俄入欧”步伐的加快，语言政策中的“去俄罗斯化”将得到进一步加强。本文力求在阐述摩尔多瓦语言政策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分析“去俄罗斯化”和“大罗马尼亚”意识对当今摩尔多瓦语言现状的影响及相关的民族和社会问题，并对语言政策的发展趋势进行简单预测。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原苏联国家语言现状与语言政策研究”（项目批准号：10YJA740125）的阶段性成果。

** 张宏莉，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赵静，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一、摩尔多瓦的语言政策

（一）苏联解体前的语言政策

自 1812 年俄国将位于德涅斯特河与普鲁特河之间的比萨拉比亚（今摩尔多瓦大部分领土）划入自己的版图后，俄语逐渐成为当地的通用语言和官方语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比萨拉比亚成立摩尔达维亚民主共和国，1918 年 4 月与罗马尼亚合并。1918-1940 年间，俄语在比萨拉比亚丧失官方语言地位。虽然罗马尼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强制语言政策（如从 1938 年开始禁止在公共场合说俄语、烧毁俄语书籍等），但效果并不理想，俄语仍然保留了通用语的功能。

1940 年 6 月，苏联将比萨拉比亚并入苏联版图。同年 8 月，在摩尔达维亚自治共和国和大部分比萨拉比亚的土地上，建立了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并加入苏联。1938 年 3 月 13 日，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在民族共和国学校必修俄语的决议》，要求中学毕业生必须掌握俄语。1940 年 8 月 12 日，刚刚成立的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就通过了该决议，并很快（同年 9 月 23 日）做出决定，从 1941 年 1 月 1 日起，摩尔多瓦语（以下简称“摩语”）的书写方式由拉丁字母改为基里尔（俄文）字母。这些变化意味着，苏联政府有意让少数民族学生尽快掌握俄语，使少数民族语言向俄语靠拢。

随后，苏联的语言政策明显偏重俄语，与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命运一样，摩语的生存空间遭到不断压缩，如从 1946 年起，许多农村学校开始用俄语教学，并把摩尔多瓦族学生从摩语学校转入俄语学校，摩语学校数量锐减。在苏共颁布《关于加强学校与生活联系和进一步发展国民教育制度纲要》（1959 年 11 月）后不久，摩共中央通过《关于改善共和国中学俄语教学状况和措施的决议》，要求把俄语教学质量提升到更高水平，并且要展现出“对俄语语言文学的热爱”。

20 世纪 60 年代，一大批作家公开要求确立摩语的国语地位、摩语书写转用拉丁字母。受此影响，摩政府同意各单位、组织及商店悬挂双语牌匾，用摩语书写街道、机构名称，恢复摩语报刊杂志的发行。

1976-1986年间，围绕摩语地位的斗争相对平和，原因有二：一是文艺活动家们要求确立摩语为国语的提议未得到广泛支持；二是政府继续打压摩语，如1940-1941学年基希讷乌的摩语学校为33所，1951-1952学年有11所，而1985-1986学年仅剩8所^①。

随着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争取赋予摩语国语地位的斗争步入新阶段。“摩尔多瓦人民阵线”把确立摩语的国语地位当做主要任务，与此同时，支持确立摩语及俄语双语地位的力量跃跃欲试。“双语法”的拥护者甚至在德涅斯特河左岸及右岸、别利齐市、基希讷乌市等地区举行反对将摩语确立为唯一国语的长期大罢工。其结果是，摩最高苏维埃通过《摩尔达维亚共和国国语地位法》（1989年8月）（简称《国语法》），规定摩语为国语，俄语为族际交际语。

（二）独立后的语言政策

摩尔多瓦共和国独立初期继续沿用1989年的《国语法》。为了强化新独立国家意识和民族文化认同，1991年通过的《摩尔多瓦独立宣言》明确提出，尽快将教育、公文事务、出版等领域使用的语言转为摩尔多瓦语（摒弃俄语）。1994年通过的《摩尔多瓦共和国宪法》，则再次确立了摩语的国语地位。

自1994年摩尔多瓦农业民主党上台后，放宽了前执政党人民阵线确立的语言政策，对俄语的打压略有松动，并对俄语的特殊地位进行了解释——不同于区域语言地位。另外，议会还通过有关对公务员进行国语培训、缩小国语考试人员范围、降低考试标准等决定。而在加告兹地区，摩语、俄语和加告兹语均为官方语言，俄语是合法的公文用语。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因确立摩语为国语而引发的冲突逐渐消减，摩政府通过《非主体民族公民国语学习纲要》，进一步加强国语的地位和使用范围，并对《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语言功能法》第7章和《国语水平测试方法》中公职人员的语言职责进行修订，要求国家机关、工

^① Шевченко Р. Политика и эволюц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языка в Молдове. С.269. 29. 11.2013. http://archive.nbu.gov.ua/portal/Soc_Gum%20/TiDF/2012_12/265_271.PDF

会、政治及社会组织、企业、科教、文化、医疗、交通等领域的领导“在工作中义务使用国语”，要求掌握国语的人员名单中，还包括大众传媒和对外经贸工作者。

2001年4月，摩共第一书记沃罗宁（Владимир Воронин）当选总统，赋予俄语官方地位的问题出现转机。2001年7月，宪法法院通过《少数民族及其组织法律地位法》，对少数民族在各级执行与诉讼机构、军队及公共秩序维护机构中相应的代表比例做出规定。不过，由于俄语居民的国语水平不高，其在权力机构中的相应代表资格并未得到落实。与此同时，该法重申了俄语成为官方语言的条件，这被视为在赋予俄语第二国语地位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2001年末，执政的共产党向宪法法院提交关于赋予俄语第二国语地位的法律草案，要求在摩境内自由地使用俄语，公民应该同时掌握摩语和俄语。然而，提高俄语地位的意图非但未得到社会支持，反而引发了民众的抗议。自2002年1月9日起，首都基希讷乌的数千青年学生多次举行集会，抗议教育部关于从小学2年级起（而非5年级）义务学习俄语（作为第二国语）的做法。之后不久，摩政府宣布取消上述决定。2002年5月，摩宪法法院否决了一系列有关户籍登记、少数民族人权及其组织的法律地位的法律草案，禁止在书写居民点及街道名称、户籍登记及起草文件时同时使用俄语与摩语。6月，宪法法院通过决议，宣布摩语为国家唯一国语，否决了议会有关俄语与摩语同为国语的草案。这就意味着，争取俄语第二国语地位的努力彻底失败。2013年3月底，执政的自由党甚至向议会提交关于剥夺俄语族际交际语地位的草案^①。

二、语言现状：俄语的使用范围逐渐萎缩

为了尽快摆脱苏联印迹，摩政府的各项政策均表现出明显的“去俄罗斯化”倾向。所谓“去俄罗斯化”，是指将俄语从某些人群的生活中排挤出去

^①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в Молдавии может потерять свой статус. 05.04. 2013. <http://news.mail.ru/politics/12620318/> 01.03. 2014.

或者彻底根除的过程^①。下文将从公文事务、教育、大众传媒和日常生活领域四个维度，分析摩尔多瓦的语言现状。

（一）公文事务领域：国语成为主要工作语言，俄语使用严格受限

独立后，摩语成为摩国家各机关单位的主要工作语言，俄语行使功能的领域逐渐被压缩。1989年9月通过的《摩境内语言功能法》第3章第10条规定：“国家权力机构、行政管理机构和社会团体的工作语言是国语，必要时可将文件译成俄语，上述机构要分阶段推行国语。”“各类通知、公告及广告的文本必须用国语书写，必要时附以俄语翻译”^②。然而，2002年5月通过的《摩宪法法院决议》却指出，2001年4月通过的《户籍法》及同年7月通过的《少数民族及其组织法律地位法》中有关语言的表述与《宪法》不符，居民点及街道名称、户籍登记及文件起草不能同时使用俄语与国语。

到了2012年，摩议会会对公文语言的规定更加严厉，明确要求，“在录入身份证的相关信息时只能使用国语；商店招牌、海报、公共交通工具的信息、广告等禁止用俄语书写；所有文件（包括出生证明、婚姻登记等）均用国语办理；医疗机构、法院及其他权力机关的所有信息必须用国语发布。”^③2013年7月，摩政府甚至以不符合相关行政法规为由，对使用俄语标语的示威游行处以罚款。^④随后，摩法院也以缺少俄语翻译为由拒绝接受俄语诉讼。至此，摩语完全占领了公文事务领域，俄语则被彻底排挤出了这一范围。

（二）教育领域：强行压缩俄语学校数量和俄语课程，大力培养学生的“大罗马尼亚”意识

独立后，摩尔多瓦实施了一系列教育改革，旨在提高国语在教育体系中

① 张宏莉、张玉艳：“语言法：塔吉克斯坦‘去俄罗斯化’的新发展”，《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0年第4期。

② Закон Республики Молдова от 1 сентября 1989 года № 3465-XI О функционировании языков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Республики Молдова. 22.03. 2014. http://base.spinform.ru/show_doc.fwx?rgn=3281

③ В Молдове из удостоверений личности уберут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24.06.2012. <http://glavnoe.ua/news/n103448>

④ В Молдове демонстрантов оштрафовали за плакаты на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31.07.2013. http://txt.rus.newsru.ua/world/31jul2013/a_ne_nado_bylo.html

的比重，强化主体民族文化意识。1995年颁布的《摩尔多瓦共和国教育法》明确规定，国语是所有院校的必修课。

近年来，俄语在教育领域的生存空间不断缩小。1999-2000学年，摩尔多瓦有近300所俄语学校和100多所双语学校，如今有240所俄语学校（不含“德左”地区）及84所双语学校。1999-2000学年，在各类中高等学校接受俄语教育的学生共17.52万，2009-2010学年为11.56万^①。在5至9年级的学生中，仅有60%的学生把俄语作为必修课；某些中学高年级（10至12年级）的学生只能把俄语作为第二外语选修。2011年7月，摩政府发布名为“优化”的项目，计划在2013年前关闭1044个班级和378所学校（大部分是俄语学校），更加表明了摩政府欲将俄语排挤出教育领域的态度。

（三）大众传媒领域：俄语传媒与日俱减，摩尔多瓦语传媒大幅增加

1995年10月，摩尔多瓦议会通过《广播电视法》，规定无论是国有还是私有广播电视台，国语节目不得少于节目总量的65%。2006年7月颁布的《摩尔多瓦共和国广播电视法》第11条做出进一步规定：2007年1月1日前，国有和私有电视台国语播出的信息分析类节目不得少于65%，2007年1月1日该指标应达到70%。从2010年1月1日起，必须保障播出的国语类电视节目不少于节目总量的70%，播出的国语类广播节目应不少于信息类节目总量的80%^②。目前，俄语类电视节目与广播节目的播出时间分别占国家电视台播出时间的15%和10%，仅有个别电视台部分转播俄罗斯电视台和电台的节目。

独立前后，摩境内俄语和摩语出版物数量形成鲜明对比。在1986年出版的1484种图书中，有950种（64%）俄语图书，平均发行量为1.18万册；而在2010年出版的2366种图书中，只有800种（33.8%）俄语图书，平均发行量仅为930册^③。1985年，摩语书籍和杂志的出版量分别占出版总量的

①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на рубеже XX-XXI веков. М.: Центр социального прогнозирования и маркетинга, 2012. С.66-67. 30.12.2013. http://window.edu.ru/resource/338/78338/files/Arefyev_A_2012.pdf

② Суляк С. Г.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в Молдавии// Русин. 2010. № 3. С.100-101.

③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на рубеже XX-XXI веков. С.64.

33.7%和 32%，1996 年该比例上升为 73.5%和 53%，^①2008 年为 71.6%和 58.3%，2013 年为 69.3%和 40%^②。

（四）日常生活领域：掌握俄语的人数不断下降，摩语普及程度大大提高

1989 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摩国内有 100.15 万人（23.1%）以俄语为母语，其中包括 55.7 万俄罗斯族人、22 万乌克兰族人、12 万摩尔多瓦族人、4.8 万犹太人及 1.1 万白俄罗斯族人；有 286.3 万人（66%）以摩语为母语或者第二语言，其中包括 11%的少数民族^③。根据 2004 年人口普查结果，以摩语为母语的人约 203 万（60%），以俄语为母语的人 38.28 万（11.3%），其中包括 97.2%的俄罗斯族人，2.5%的摩尔多瓦族人，31.8%的乌克兰族人，5.8%的加告兹人和 13.9%的保加利亚族人^④。另外，有 15.5%的居民经常讲俄语，58.7%的居民程度不同地掌握俄语；58.8%的摩居民经常讲摩语，81%的居民程度不同地掌握摩语^⑤。据调查，2012 年摩国内有 25 万人（7.1%）认为俄语是母语，有 170 万人（48.6%）掌握俄语，其中 50 万人（29.4%）主动掌握俄语，120 万人（70.6%）被动掌握俄语；有 180 万人（51.4%）完全不懂俄语^⑥。显然，以摩语为母语并且经常使用摩语的人数远远超过掌握俄语的人数。

三、语言政策引发的民族和社会问题

摩尔多瓦语言政策中的“去俄罗斯化”倾向，造成了不同群体间语言利益的差别和对立，并成为一系列民族和社会问题的诱因。

① Суляк С.Г.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в Молдавии. С.100.

② Anuarul Statistic al Republicii Moldova /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 Республики Молдова. 2014. Chişinău, 2014. С.218.

③ Шорников П.М. Статус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и граждан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в Молдавии: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 вопроса// Русин. 2007. № 3(9). С.36.

④ Сайненко А.П.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языковой ситуации в Республике Молдова. 13.07.2013. <http://tnu.podelise.ru/docs/index-328458.html>

⑤ Там же.

⑥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на рубеже XX-XXI веков. С.432.

（一）加告兹独立，因语言问题与摩政府关系微妙

20 世纪 80 年代末，“摩尔多瓦人民阵线”的拥护者不仅支持摩语成为国语，而且强烈要求摩与罗马尼亚合并。这一行为引起加告兹人的不满。加告兹人遂以本民族语言、文化和民族传统受到歧视而宣布独立。1994 年 12 月，摩议会通过《加告兹法律地位法》，称加告兹是摩尔多瓦的一部分，是具有特殊地位的自治地区，加告兹人可在权限范围内解决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当摩尔多瓦独立地位发生变化时，加告兹人有权自治。该法还规定：“摩尔多瓦语、加告兹语和俄语是加告兹的官方语言，（国家）保障加告兹境内官方语言和其他语言发挥功能。”^①

近几年，作为“地方自治体”的加告兹与摩政府在语言问题上的摩擦仍然不断。2011 年，加告兹约有 10% 的中学毕业生未通过“罗马尼亚语言文学”科目的考试。按照摩教育部规定，此类考生一年内不得重考，颁发给这些学生的毕业证书必须标明未通过此项考试的信息^②。而加告兹当局则决定，给学生颁发的毕业证书不标明此项考试成绩。如上文所述，摩政府在 2013 年前优化（即关闭）学校的计划，加告兹的俄语学校也在其列。为此，加告兹当局打算以立法方式加以抵制^③。2013 年底，摩宪法法院裁定罗马尼亚语为国语及官方语言，也引起了加告兹人对政府的强烈不满和对加告兹族被同化的担忧。2014 年初，加告兹自治区举行公投，70.42% 的人参与投票，其中 98.09% 的人支持加告兹保持自治地位（以便在摩尔多瓦“独立地位发生变化”时有权自决），1.9% 的人表示反对^④。摩中央政权认为公投非法，并就此展开调查，使该地区的紧张气氛陡然加剧。

（二）“德左”成立，加入俄联邦愿望强烈

早在 1989 年，宣布摩语为唯一国语的《国语法》就引发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俄语居民的强烈不满。随后推出的《摩尔多瓦语回归拉丁书写法》及

① 顾志红：《摩尔多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年，第 234 页、第 33 页。

② Гагаузия и Молдова спорят о роли румынского языка. 31.08.2011. <http://newsland.com/news/detail/id/770356/>

③ Гагаузия намерена запретить Молдавии закрывать школы в автономии. 09.01.2012. <http://regnum.ru/news/1486301.html>

④ Итоги референдума в Гагаузии. 02.03.2014. <http://www.regnum.ru/news/1762107.html>

联合主义（要求摩罗合并）主张，甚至引发了该地区摩尔多瓦族居民担忧被边缘化的争议。1990年9月，德涅斯特河沿岸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①（简称“德左”）宣布成立。虽然摩政府与“德左”当局进行了多次会晤，但是双方的矛盾至今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时常因语言问题而不断升级。例如，2004年7月，“德左”当局关闭了当地教授罗马尼亚语的学校，不久摩政府就做出回应，对“德左”企业实施经济制裁。

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居民对俄语的感情深厚，并视其为自己宝贵的文化财富。2002年的一项社会调查显示，俄语是该地区乌克兰人熟练掌握的第一或第二语言，就连右岸地区的乌克兰人也坚决支持赋予俄语官方语言的地位，他们甚至坚决反对将农村学校的授课语言由俄语转为乌克兰语^②。其他少数民族，如保加利亚族，也视俄语为其保持社会文化地位及民族文化认同的基础。基于此，该地区居民倾向于同俄罗斯及乌克兰保持友好而紧密的联系。2006年，“德左”举行全民公投，97.1%的投票者支持该地区独立并成为俄罗斯联邦的自由邦，94.6%的投票者反对放弃独立而成为摩尔多瓦的一部分^③。有73.3%和57.6%的问卷被调查者希望“德左”与俄罗斯及乌克兰保持友好紧密的关系^④。另外，该地区绝大多数人拥有双重国籍，拥有俄联邦国籍的德涅斯特人超过15万^⑤。2014年初，“德左”最高苏维埃主席布尔拉（Михаил Бурла）甚至向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纳雷什金（С.Е. Нарышкин）提出加入俄罗斯联邦的请求^⑥。

① 德涅斯特河沿岸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Приднестровская Молдавск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ПМССР)）于1990年9月2日宣布成立，1991年11月5日更名为德涅斯特河沿岸摩尔达维亚共和国（Днестровская Молдав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ПМР)），中文常简称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德涅斯特河沿岸，亦称德涅斯特河东岸共和国、德涅斯特河左岸共和国、德左共和国或“德左”。

② Шорников П.М. Статус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и граждан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в Молдавии: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 вопроса// Русин. 2007. № 3(9). С.41.

③ Приднестровье. 29.03. 2014. <http://traditio-ru.org/wiki/Приднестровье>

④ Колосов В.Д, Заяц Д.В. Молдова и Приднестровь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е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ые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разрешения конфликта// Вестник Евразии. 2001. № 1. С.111.

⑤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на рубеже XX-XXI веков. С.76.

⑥ СМИ: Приднестровская Молдав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намерена войти в состав РФ. 18.03.2014. <http://www.echomsk.spb.ru/news/politika/smi-pridnestrovskaya-moldavskaya.html>

（三）“联合主义”势力大增，摩罗合并呼声高涨

摩境内“联合主义”及双重国籍问题与由来已久的“比萨拉比亚”问题息息相关。13-14世纪，罗马尼亚人在该地区建立了瓦拉几亚、摩尔多瓦和特兰西瓦尼亚三个公国。比萨拉比亚占摩尔多瓦公国领土的大部。18世纪初，俄国开始南扩。1812年奥斯曼土耳其战败，将比萨拉比亚割让给俄国。1918年，比萨拉比亚通过与罗马尼亚统一的决议。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比萨拉比亚被划入苏联势力范围。1940年，罗马尼亚将比萨拉比亚割让给苏联，随后又将比萨拉比亚夺回。1944年，苏联重新占领了该地区。“比萨拉比亚”问题的曲折性与复杂性，使摩境内的民族主义者不仅追求民族独立，同时还致力于回归自己的母国，要求实现罗摩统一。

很有意思的是，1989年的《国语法》及《语言功能法》确立摩语为国语，1991年的《独立宣言》则宣布罗马尼亚语为国语，1994年的《宪法》又规定摩语为国语。显然，在摩尔多瓦的法律体系中，摩语和罗马尼亚语之间的关系极其微妙。事实上，有关摩语和罗马尼亚语是否同属一种语言的纷争不断。学术界普遍认为，“摩尔多瓦语”这一名称不过是罗马尼亚语在摩尔多瓦共和国的一个政治性称呼，有关语言和民族性的分歧主要存在于各政治势力之间。而且在摩尔多瓦的历史教育中，也因各派立场的不同而有不同的主张。自由党、自由民主党和同盟党主张讲授罗马尼亚历史，而民主党和共产党则认为应该讲授摩尔多瓦共和国历史。联合主义者正是利用法律表述上的不一致，积极推进摩罗合并。苏联解体后，罗、摩两国政界一直存在主张统一的力量，以求“借助罗马尼亚进入欧洲，借助欧洲加入罗马尼亚”。1999年，在罗马尼亚开始加入欧盟谈判和摩尔多瓦国内能源危机的背景下，摩尔多瓦政界又再次提出摩罗合并问题。

罗马尼亚方面一直希望两国合并。2006年，罗总统伯塞斯库（Traian Basescu）与摩总统沃罗宁会面时，提议摩罗联合成为一个国家，同时加入欧盟。2013年底，伯塞斯库重申这一提议。基于此，摩民族主义者大力宣传摩罗合并思想。2011年，一个罗马尼亚和摩尔多瓦的非政府组织联盟，推出名为“2012行动”的公民纲要，旨在“提高对罗马尼亚和摩尔多瓦两

国统一的重要性的认知度”^①。

近几年，在罗马尼亚方面的支持下，摩境内与罗合并的呼声愈加强烈。“联合主义”与反对派摩擦不断，2012年3月25日，联合主义者与摩尔多瓦主义者之间在首都基希讷乌发生冲突^②。2013年底，摩宪法法院终审裁定，摩尔多瓦的官方语言为罗马尼亚语，同时正式承认摩尔多瓦的国语为罗马尼亚语^③。这既是联合主义在实现摩罗统一道路上取得的重要成果，也是其继续推进摩罗合并的有利因素。

（四）双重国籍数量持续增加，未来走向扑朔迷离

由于“比萨拉比亚”问题，在摩独立之初，罗马尼亚虽然承认其为独立国家，但是仍然强调罗摩属同一个民族，讲同一种语言。2000年6月通过的《国籍法》允许双重国籍的存在，“摩公民不因获得他国国籍而失去本国国籍”^④。与此同时，罗马尼亚也为摩公民重获罗国籍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在出生时取得的国籍不得被取消”；“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罗马尼亚’时期曾经拥有罗马尼亚国籍者及其后裔无需放弃外国国籍，无需移居罗马尼亚，即可通过简易程序重获罗马尼亚国籍”。2009年第36号政府令更是将重获国籍的资格从“前公民”的第二代后裔延至第三代后裔，并取消了在罗马尼亚境内连续居住的限制^⑤及罗马尼亚语面试的要求^⑥。因此，在摩尔多瓦经济每况愈下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摩居民开始积极申请罗马尼亚国籍。根据官方资料，1994-1999年，摩司法部国籍管理局发放了29.91万份申请他国国籍的证明材料。截至2010年，摩境内共有90多万摩尔多瓦人拥有罗

① “罗马尼亚与摩尔多瓦统一运动”，28.03.2014. <http://zh.wikipedia.org/wiki/>

② В Кишиневе произошли столкновения между румыноунионистами и молдавски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иками. 26.03.2012. <http://regnum.ru/news/polit/1513542.html>

③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м языком Молдавии признали румынский. 30.12.2013. <http://lenta.ru/news/2013/12/05/language/>

④ Закон Республики Молдова от 2 июня 2000 года. № 1024-XIV. О гражданстве Республики Молдова. 23.03. 2014. http://base.spinform.ru/show_doc.fwx?rgn=3258

⑤ 董希晓：“摩尔多瓦共和国公民重获罗马尼亚国籍现象解析——兼评索罗斯基金会调研报告”，《国际论坛》，2013年第11期。

⑥ Румыния упростила предоставление гражданства жителям Молдавии. 29.10.2009. <http://afn.by/news/i/126719>

马尼亚国籍^①。据2009年摩尔多瓦议会选举结果，1/4的新当选议员拥有罗马尼亚国籍。精英人士获得罗国籍，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摩未来的政治走向。虽然罗摩统一问题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内解决，但是双重国籍者的大量存在无疑加大了罗摩统一的潜在可能性。

四、语言政策发展趋势

（一）俄语地位面临艰难挑战，“去俄罗斯化”程度加剧

独立以来，摩境内的俄罗斯族居民数量持续减少，从1989年的56.4万降至2010年的15万，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从13%降至4.3%。同时，以俄语为母语的居民数量也持续下降，从1989年的100.15万减少至2004年的38.28万。另外，俄语居民的语言水平下降。一方面，如前所述，俄语类电视广播节目比例缩减，俄语图书出版量下降，使得俄语居民的语言水平难以继；另一方面，在教育领域，俄语教学困难重重，俄语学生缺乏必要的学习条件：（1）师资不足，2009-2010学年摩境内共有1512名俄语教师，到2012年仅有200名；（2）课时压缩，学习俄语的课时数随着年级的增高而递减，如一年级、二至四年级、五至七年级、七至九年级及十至十二年级的周学时分别为8、7、6、5和2小时；（3）教材稀缺，一是学生使用的俄语教材大多与摩教育部教学大纲不符，二是学校禁止使用俄罗斯的教材^②。

摩政府实行的一系列“去俄罗斯化”政策已取得显著成效，摩语的普及程度大幅度提高。据2004年人口普查的资料，熟练掌握摩语的俄罗斯人的比例已经从1989年的11%增至27.4%。而根据社会民族调查数据，1993-2007年间，城市的俄罗斯族居民不同程度掌握摩语的比例从21%增至43%，超过一半的俄罗斯族青年掌握摩语^③。

近年来，摩多数居民对待俄语的态度有所好转，支持提高俄语地位的呼

①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на рубеже XX-XXI веков. С.432. 06.12.2013. http://window.edu.ru/resource/338/78338/files/Arefyev_A_2012.pdf

② Там же. С.69-70.

③ Остапенко Л.В, Субботина, И.А. Русские в Молдаве: социально-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2011. № 5. С.62.

声不断。摩社会政策研究所 2012 年 5 月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54.1% 的摩居民支持赋予俄语第二国语的地位, 其中包括 44.5% 的摩尔多瓦族人^①。由此可见, 摩主体民族也大体上同意在国家公共生活领域使用俄语, 即赋予俄语第二国语的地位。

但是, 与摩多数居民的宽容态度相反, 摩政府在各个领域的“去俄罗斯化”倾向并未减弱, 提高俄语地位几乎成为一部分人的奢望。如在公文领域, 俄语的使用空间一再被压缩。独立初期, 允许公文在必要时用俄语书写, 商品名称、商标、说明书同时使用国语和俄语, 到了 2012 年, 所有公文、广告、信息等禁止用俄语书写。

(二) “脱俄入欧”步伐加快, “大罗马尼亚”意识增强

近年来, 摩尔多瓦加快了“脱俄入欧”的步伐, 试图逐渐减少对俄罗斯的依赖, 进而向西方靠拢, 最终实现“重返欧洲”的目标。2012年3月, 执政联盟联合推举的无党派人士尼古拉·蒂莫夫蒂(Николай Тимофти)当选总统。执政联盟奉行“一边倒”的亲西方路线, 把加入欧盟作为外交优先方向。2013年11月, 摩尔多瓦在“东方伙伴关系”维尔纽斯峰会期间, 与欧盟草签准成员国协定。这表明, 摩尔多瓦与欧洲的距离越来越近, 远离俄罗斯的步伐日渐加快。

摩政府近年来的政治走向直接影响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各领域的政策越加朝着有利于政治走向的方向发展。例如, 2006年7月27日摩议会通过的《摩尔多瓦共和国电视广播法》就明确写道: “摩尔多瓦加入欧盟后, 所管辖的广播电视单位要为欧洲节目提供至少51%的播出时间。”^②又如, 在双重国籍问题上, 尽管摩共在执政期间曾试图培养国民的民族身份认同感, 反对“亲罗马尼亚”倾向, 谴责罗方试图通过一系列措施实现“大罗马尼亚”的愿望, 但是近几年摩政府在公民重获罗马尼亚国籍这一敏感问题上较为宽容, 不仅默认了这一政策, 还为申请人提供各种便利, 如开具入籍相关证明、

① Суляк С.Г. Молдавия и русский мир: возможно ли возвращение?// Русин. 2012. № 3(29). С.20.

② Кодекс телевидения и радио Республики Молдова от 27 июля 2006 года. №260-XVI. 23.03. 2014. http://base.spinform.ru/show_doc.fwx?rgn=13869

允许罗马尼亚增设领事机构等等。显然，摩政府允许甚至支持公民重新获得罗马尼亚国籍，进而成为欧盟公民，以期早日加入欧盟。

同样，为了达到政治目标，摩政府加快了“大罗马尼亚”进程，最终承认摩语与罗马尼亚语同属一种语言。如上文所述，在摩尔多瓦相关语言的各种法律法规中，有关国语名称的表述在摩语和罗马尼亚语之间变幻不定。文字游戏已然成为各政治势力较量的手段：摩语为国语，意在强调摩尔多瓦的独立性，摩尔多瓦与罗马尼亚分属两个独立主权国家；罗马尼亚语为国语，则表达了“脱俄入欧”、与罗马尼亚合并的愿望。2013年，以自由党为主的部分议员上诉宪法法院，要求裁定《宪法》中对官方语言的规定与《独立声明》的文本内容表述不一的情况。宪法法院则以《独立声明》是《宪法》的法律及政治基础，任何法律法规都不得与《独立声明》的原则相冲突为由，最终裁定摩尔多瓦的国语和官方语言均为罗马尼亚语。

为了实现摩尔多瓦与罗马尼亚最终的合并，联合主义者不仅推动摩政府承认摩语与罗马尼亚语的同一性，而且鼓动摩主体民族在新一轮的人口普查中，将自己的民族属性登记为罗马尼亚族并指明自己的母语为罗马尼亚语^①。他们认为，这种做法既有利于获得罗马尼亚国籍，也有利于摩早日加入欧盟（因为罗马尼亚语、英语及法语是欧盟的官方语言）。摩尔多瓦的语言政策，对处于欧洲与俄罗斯之间的摩尔多瓦国家的复杂走势，可能会产生微妙的影响。

【Abstract】 Due to complex history of Moldova and mandatory language policies during the Soviet era, there existed obvious tendency of “Derussification” in all aspects of social life in Moldova after its independence, which triggered a series of ethnic and social problems: because of language problems, municipality Gagauziya and Transdnestrian Moldovan Republic had a lot of friction with the government of Moldova. Federationists gradually increased, leading to more people with dual nationalities.

^① Граждане, назвавшие себя румынами на переписи, будут в приоритете при получении румынского гражданства. 20.05.2014. http://www.terra.md/ru/news/moldova/grazhdane_nazvavshie/default.aspx

【Key Words】 Moldova Language Policy, Derussification, Russian

【 Аннотация 】 В связи со сложной историей Молдовы и принудительной языковой политикой в период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после обретения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в различных областях социальной жизни Молдовы существует очевидная тенденция дерусификации, что вызвало ряд этнических и социальных проблем: из-за языковых проблем между Гагаузией 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м Молдовы, а также между Приднестровским регионом 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м Молдовы часто возникают трения, унионизм набирает силу, число лиц с двойным гражданством увеличивается.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язык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 Молдовы, дерусификация,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责任编辑 贝文力)

全俄罗斯圣徒拉多涅日的谢尔吉崇拜 经久不衰原因探析*

赵小华**

【内容提要】东正教是基督教三大分支教派之一，也是俄罗斯人民信仰的主要宗教。而在东正教的信仰实践中，圣徒崇拜自古以来便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拉多涅日的谢尔吉（Сергий Радонежский，1314-1392）是十四世纪罗斯著名的宗教人物，也是广大东正教徒最为崇拜的全教会圣徒之一。在21世纪的今天，圣谢尔吉在俄罗斯人民心目中所具有的影响力仍然不减。究其原因，主要有如下五个方面：谢尔吉自身崇高的修行和道德品质；谢尔吉为罗斯国家统一、解放事业所做出的重要贡献；谢尔吉—圣三一修道院——俄罗斯民族和宗教的圣地；圣谢尔吉作为俄罗斯世俗政权庇护者的“政治身份”；以及俄罗斯东正教信徒对待圣徒的功利主义性心理。正是这些因素的共同推动，使得拉多涅日的谢尔吉经受住了历史大潮的考验，在广大俄罗斯东正教徒心目中仍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关键词】俄罗斯东正教 俄罗斯圣徒崇拜 谢尔吉崇拜

【中图分类号】D751.2;K5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5)03-0104(29)

在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圣徒名册上，圣徒的数量多得简直令人眼花缭乱。但是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在俄罗斯教会史上，尤其是俄罗斯国家的发展史上，所具有的影响力却都十分微不足道，而且通常是在刚刚册封之后会吸引大量

* 本文为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科研启动基金资助项目“拉多涅日的谢尔吉在俄罗斯文化史上的地位研究”（项目批准号：201401056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意见，文章的不足由作者负责。

** 赵小华，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俄语系，讲师。

信徒，随后便逐渐为人们所遗忘。然而，俄罗斯著名修道院谢尔吉—圣三一修道院的创立者拉多涅日的谢尔吉却是个例外。数个世纪以来，俄罗斯东正教信徒对他的热情始终不减。每天都有来自俄罗斯各地，甚至是海外的信徒，到圣三一修道院去祈祷，亲吻和抚摸他的干尸匣，以此来表达对他的深深崇敬之情和祈求他的祝福与帮助。其行传也被多次改写加工和编入编年史中。根据俄罗斯当代历史学家康·亚·阿韦里亚诺夫（К.А. Аверьянов）的统计，仅从十六世纪至今，叶皮凡尼版的谢尔吉行传就已被改写十余次。而且在众多的改编者中，还不乏叶卡捷琳娜二世、莫斯科都主教费拉列特、莫斯科和全罗斯牧首阿列克西一世（Алексий I, 1877-1970）这些重量级人物的身影。^①不仅如此，在俄罗斯全国各地，数个世纪以来献给谢尔吉的教堂的数量也十分可观。“俄罗斯教堂网”数据库的统计数据表明，截至2012年10月28日，全俄一共有664座教堂^②是献给圣谢尔吉的。而在俄罗斯前二十位最常见的教堂名字排行榜中，谢尔吉的名字位居第十位。^③可以说，围绕着这一名字已经形成一种特别的崇拜，甚至是某种意义上的谢尔吉情结。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2000年初，当一位记者决定通过互联网问卷调查，为俄罗斯众圣徒的受欢迎程度进行排序时，所得出的结果是：拉多涅日的谢尔吉与萨罗夫的塞拉芬（Серафим Саровский，约1753-1833）并列被评为“最被需要的”的圣徒。^④2008年，在俄罗斯电视台、俄罗斯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社会舆论基金会三家单位联合发起的题为《俄罗斯的名字：历史的选择》的全民评选中，谢尔吉作为一名宗教人物，虽未荣登榜首，却遥遥领先，跻身于榜单的前列。而2014年，为纪念谢尔吉诞辰700周年，俄罗斯联邦财政拨款65亿卢布，在全国范围内举办了数次规模较大的研讨会和纪念性活动来纪念他，甚至还为此专门出版了关于谢尔吉的百科全书。谢尔吉崇拜为何能够如此经久不衰、保持强大的影响力？

① Аверьянов К. А. День города: праздник московских святых. 02.09.2011. <http://www.nsad.ru/articles/den-goroda-prazdnik-moskovskih-svyatyh>

② 其中包括设有祭坛的教堂（храм）和不设祭坛的小教堂（часовня）。

③ 前九位依次是：圣尼古拉、圣母骈滕、圣三位一体、喀山圣母圣像、圣母安息、天使长米哈伊尔、先知伊利亚、圣母诞生、主易容教堂。<http://temples.ru/names.php?ID=310&RegionID=0&Count=50&nopage=1>

④ Аверьянов К. А. День города: праздник московских святых.

一、谢尔吉自身崇高的修行和道德品质

十四世纪是罗斯国家实现统一和获得民族独立的重要时期。在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帮助下，莫斯科公国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实力日益雄厚，并最终积聚足够的勇气和力量向蒙古统治者发出挑战，赢得了具有转折性意义的库里科沃战役的胜利。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莫斯科公国的胜利并不只是莫斯科政治家和都主教们的功劳。在人们看不见的精神道德领域，以拉多涅日的谢尔吉为首的罗斯众修士默默地以自己的一言一行来提升罗斯人民因内忧外患双重作用而急剧下降的精神道德水平，教育他们要互助互爱，停止彼此间的敌视和克服对外来敌人的恐惧。正是这种精神道德的复兴，加上罗斯国家政治和经济的复兴，才使得罗斯能够最终结束内讧，摆脱蒙古鞑靼的桎梏和立陶宛的困扰，实现国家的统一与独立。

拉多涅日的谢尔吉于1314年出生在罗斯托夫的一个没落贵族家庭，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徒。父母虔诚的信仰和罗斯托夫浓厚宗教氛围的熏陶，使得谢尔吉从小就笃信上帝。童年时期他就已经开始持守十分严格的斋戒和反复诵读福音书等教会书籍。

处于内外枷锁双重桎梏、自由丧失的条件下，青年时代的谢尔吉曾想远离俗世，遵循福音书的教诲，静心修道，以此来追求自己内心的自由。因此，他最初选择了一块叫玛科夫卡（Маковка）^①的荒野作为自己的隐修地。谢尔吉修行的环境十分恶劣，浓密的森林里，野兽经常出没，冬季则风雪交加，严寒难耐。而他每天的生活就是不间断的祷告、阅读圣书和从事一些体力劳动。食物也只有面包和水。^②就这样，为实现自己的修道理想，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谢尔吉一住就是数年。此外，谢尔吉还将其所建立的第一座教堂献给了象征着自我献身和团结一致精神的圣三位一体，“希望

① 在俄语中，Маковка一词具有教堂圆顶、罂粟果等含义。

②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使用传统手段与肉体作斗争时，谢尔吉从来都不曾陷入禁欲地主义的极端：戴铁枷锁、站在柱塔上修炼等。他的禁欲手段就是祈祷、斋戒和劳动。俄罗斯当代学者尼·谢·鲍里索夫认为，这一点充分体现了谢尔吉人格的根本特征：能够一直保持着个人的尊严，不丧失人类的面孔。这一特征使他没有走上“为了耶稣”而行乞的道路，没有被癫狂行为的黑暗力量所俘虏。他不仅尊重他人，也尊重自己本身。Борисов Н.С. Сергей Радонежский. М.: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2009. С.49.

人们在看到它时，能够战胜对外侵敌人的恐惧，停止彼此间的自相残杀”。^①

如同马太福音中所言：“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马太福音 5:14）。虽然很少与外界交往，谢尔吉的修行事迹却很快在周边地区的修士中传播开来，并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因为，在那个外有蒙古鞑靼桎梏、罗斯王公又内讧不断的年代，谢尔吉崇高的修行品质，勤劳、谦卑和温顺，以及其对信仰的坚定和执著，在深受多重灾难折磨、对自己力量早已失去信心的罗斯人看来，是十分罕见和不寻常的。于是，便开始有修士陆续不断地来到玛科夫卡，请求与他一同修道。

后来，随着追随者的不断增加，谢尔吉带领大家成立了圣三位一体修道院，^②领导大家开始正式的修行生活。修士们每天生活的主要内容是祈祷、体力劳动、参加圣餐仪式、画圣像或是抄书等。谢尔吉在各个方面都为大家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无论是担任院长前，还是在担任院长后，^③谢尔吉都能够一如既往保持自己温厚、谦卑的本色，对所有人都充满爱，全心全意奉献自我。用与其同时代的人话来说，谢尔吉就如同是修士们“买来的奴隶”：“他帮助新来的修士建房子、托运原木、挑水、自己用手工磨盘磨面、烤面包、煮粥、剪裁和缝制衣服、鞋等。每逢举行圣餐仪式时，

① 美国哲学家巴勒斯·杜汉（Берроуз Данэм）曾指出，“圣三位一体理念中所蕴含的关系形式……是人与人之间友好关系建立的理想原型……和而不同——这正是圣三位一体所象征的含义。” Данэм. Б. Герои и еретики(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западной мысли). М., 1967.С.131. 转引自 Борисов Н.С. Сергей Радонежский. М.: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2009. С.57.

② 今日谢尔吉—圣三一修道院的雏形。

③ 谢尔吉虽是圣三一修道院的建立者，却并不是它的首任院长。性情谦和温顺的谢尔吉不愿意担任院长的职位，他认为“当院长的愿望是贪图虚荣（追名逐位）的开始和根源”，“自己还需要学习，与其去领导和管理他人，更愿意去向他人学习。”而当时圣三一修道院的修士没有一个人拥有神职，因此，圣餐仪式都是邀请邻村神甫来主持。后来，当曾为谢尔吉举行落发礼的米特罗凡在玛科夫卡定居下来后，便由他来负责。米特罗凡因此也成为修道院的第一任院长。米特罗凡去世后，在圣三一修道院修士的“威胁下”以及沃里尼亚的阿法纳西（Афанасий Волинский）主教的极力劝说下，谢尔吉才最终同意出任院长一职。参见赵小华：《浅析谢尔吉·拉多涅日斯基在俄罗斯历史文化中的地位》，硕士论文，北京：国家图书馆馆藏中文资源，2010年，第18-20页。

谢尔吉也总是第一个来到教堂，最后一个离开。”^①谢尔吉还教导弟子们要团结一心，互相帮助，保持心灵和肉体的纯洁。“爱他人要真诚；进食斋戒的食物和水；特别是要用谦逊的美德修饰自己，不要忘记施舍恩惠，要做善事，避免矛盾和纷争；不要把尘世的荣耀作为人生目的，取而代之的是要期待来自上帝的奖励和天国永恒的幸福。”^②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谢尔吉谨遵福音书的教诲，对邻人充满了爱，并将劳动看做是造福于邻人的重要方式。^③那时，修道条件虽然十分艰苦，修士们经常面临着饥饿的威胁；举行圣餐仪式时，教堂里的蜡烛用完后只能用桦树枝来代替；抄书纸用尽了就用桦树皮来替代等等，但在谢尔吉的带领和熏陶下，修士们都能够忍耐坚持，互助互爱，潜心修道。

关于这一点，俄罗斯教会历史学家伊·科·斯莫里奇（И.К. Смолич）在其著作《俄罗斯修道制度：出现、发展、本质（988-1917）》中曾指出，古罗斯宗教性最为典型的特点是：不是宗教信仰体系本身，而是这一体系的载体的精神榜样作用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在自己的基督教世界中，信徒们总是生活在这些榜样以及形象，也就是圣徒和圣像的包围之中，是这些圣像与圣徒让宗教体系（教义与信仰）变得活跃起来，并将信徒们引向真正的宗教生活。^④拉多涅日的谢尔吉便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大家树立了个人修道的崇高榜样，他也因此成为了大家竞相学习和效仿的楷模。

此外，十四世纪中叶，为使修士成为东正教徒完美生活的榜样，提高东正教会的社会威望和帮助莫斯科王公实现罗斯的统一，在基辅与全罗斯都主教阿列克西（Алексий，约1292/1305-1378）的支持下，谢尔吉身负巨大压力，率先对其创建的圣三一修道院的修道生活方式进行了改革。他将修道院

① Никон Рождественский. Житие Преподобного и Богоносного отца нашего Сергия Чудотворца и Похвальное ему слово, написанное учеником его Епифанием Премудрым. Сергиев Посад, 1908. С.49.

② Кренов К.В. Российские судьбы: жизнеописания, факты и гипотезы, портреты и документы в 30 книгах. Изд. Новатор, 1996. С.94.

③ 这也是谢尔吉对罗斯人道德面貌产生重要影响的原因之一。

④ Смолич И.К. Русское монашество.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 Развитие. Сущность(988-1917). М.: ЦНЦ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1997. С.48-49.

之前实行的半集体式修道模式废除，^①取而代之的是引入较为严格的修道模式——集体式修道模式。该修道模式规定：修士必须遵从修道院院长的管理；每天的修道内容是共同劳动和祈祷；所有人的服装、食物都是统一分配的，任何人不得拥有私有财产。其主要目的在于培养修士们之间的兄弟情谊和实现集体救赎。它改变了先前实行半集体式修道模式时修士之间的关系模式。修士们不再是一个个单独的修行个体，而是所有修士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谢尔吉的领导下，圣三一修道院修士集体的整体精神面貌都得到很大的改善和提升，修道院也真正成为了“天使之家”。

在罗斯国家处于四分五裂、尚未实现统一的背景下，作为古罗斯高尚道德品质的载体，广大修士们之间这种和谐融洽的关系，对罗斯人民的心理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

如果说按照东正教传统，圣徒是指精神和道德上绝对纯洁、完美无瑕，并将自己全部献给上帝的人的话，那么谢尔吉毫无疑问完全符合这一定义。他终其一生身体力行遵循和贯彻着基督教信仰中所追求和推崇的谦卑、仁慈、和谐、博爱、奉献自我等美德，成为俄罗斯人崇高的精神道德楷模。俄罗斯二十世纪著名宗教哲学家帕维尔·弗洛连斯基将其称为“俄罗斯的守护天使”。^②的确，正是谢尔吉将关于团结统一、追求最高理想以及福音书中所倡导的对邻人的爱等深刻的宗教道德思想带入了俄罗斯人的生活。“拉多涅日的谢尔吉的名字不仅是俄罗斯历史上富有教益的、令人可喜的一页，而且是罗斯人民民族道德内涵的鲜明特征。”“他使俄罗斯人想起自己使政治复兴变为可能的道德复兴，并牢记一个法则——就是依靠道德的力量可以战胜一切敌人。”^③

① 与集体式修道模式相比，半集体式修道模式具有很大的缺点。首先，这种修行方式严重地降低了修士们的修道质量。没有统一的修道院章程的约束，修士们很容易草率地完成各种修行活动，而将时间荒废在无用之事上；其次，由于每个人的财产都归自己所有和支配，由此产生的贫富不均会使修士之间嫉妒横生，而这极不利于和谐修道氛围的营造。

② Флоренский П.А. Троице-Сергиева Лавра и Россия. <http://nesusvet.narod.ru/ico/books/floren.htm>

③ Ключевский В.О.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портреты. Деятел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М.: Правда, 1990. С.75.

二、谢尔吉为罗斯国家统一、解放事业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因为在罗斯人民中拥有较大的影响力，拉多涅日的谢尔吉也成为世俗统治者所求助的对象。受莫斯科公国大公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或是基辅和全罗斯都主教阿列克西之托，德高望重的谢尔吉曾多次充当和平使者，奔走于各公国之间，调解纠纷，化解矛盾，使众多的封邑公国逐渐团结在莫斯科公国的周围，共同反对蒙古鞑靼人的统治。

1359年伊凡二世去世后，苏兹达里公国王公德米特里·康斯坦丁诺维奇（Дмитри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1322-1383）和伊凡二世九岁的儿子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为争夺弗拉基米尔大公宝座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然而，莫斯科王公家族的内讧却被罗斯托夫公国王公康斯坦丁·瓦西里耶维奇（Константин Васильевич，1312-1365）所利用。1363年，他趁王权斗争激烈进行之时，从汗国获得了统治整个罗斯托夫公国的封诰。这意味着他将罗斯托夫城奉献节方向^①——本属于侄子安德烈·费多洛维奇（Андрей Федорович）的领地据为己有。受到莫斯科支持的安德烈决定寻求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大公的帮助。此外，在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与其叔叔之间的王位争夺战中，康斯坦丁·瓦西里耶维奇是支持他叔叔，也就是苏兹达里公国王公德米特里·康斯坦丁诺维奇的。所以，一旦康斯坦丁·瓦西里耶维奇将整个罗斯托夫纳入其统治范围之内的话，对德米特里大公也将十分不利。鉴于此，基辅和全罗斯都主教阿列克西决定派遣使者去劝说康斯

^① 罗斯托夫公国存在于13-15世纪。1207年，罗斯托夫城从弗拉基米尔—苏兹达里公国独立出来。除了中心城市大罗斯托夫（Ростов Великий）外，该公国还包括雅罗斯拉夫、乌格利奇（Углич）、莫洛加（Молога）、别洛奥泽罗（Белоозеро）和乌斯秋格（Устюг）。罗斯托夫公国的第一位王公是康斯坦丁·弗谢沃罗维奇（Константин Всеволодович）。1216年，在成为弗拉基米尔大公后，康斯坦丁将罗斯托夫公国的各城市分封给了自己的儿子们。此后，雅罗斯拉夫、乌格利奇和别洛奥泽罗等城市先后成为了独立的公国。1277年，别洛奥泽罗公国王公格列布·瓦西里科维奇（Глеб Василькович）将罗斯托夫公国与自己的公国统一了起来，但是没有持续多久。1285年，在无子嗣的乌格利奇王公罗曼·弗拉基米罗维奇（Роман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去世后，乌格利奇公国也成为了罗斯托夫公国的一员。尽管如此，罗斯托夫公国内部的分封趋势还在继续。1328年，罗斯托夫城区被划分为奉献节（Сретенская часть）与鲍里斯—格列布（Борисоглебская часть）两部分。

坦丁放弃其对罗斯托夫城奉献节方向领地的占有。经过考虑，阿列克西决定派谢尔吉前去游说。

在接受阿列克西的委托后，谢尔吉便动身前往罗斯托夫，与康斯坦丁进行了单独交谈。在照顾到罗斯托夫王公自尊心的同时，谢尔吉向康斯坦丁分析了其侵占行为对于莫斯科与罗斯托夫两公国之间关系的发展以及整个罗斯国家统一事业的影响。最终，在谢尔吉的再三劝说下，康斯坦丁同意放弃独立封地的权利。1364年，他决定将统治权让给安德烈·费多罗维奇，自己则离开罗斯托夫到乌斯秋格居住。^①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金帐汗国“分化罗斯王公”外交的一个失败。因为，从十四世纪六十年代初起，汗国便开始赋予罗斯托夫公国王公越来越多的权力，希望将其从莫斯科公国的影响下分化出来，并构成可以与之抗衡的新力量，而康斯坦丁的退出则意味着汗国为分化罗斯托夫与莫斯科之间关系所做的努力化为泡影。

1385年秋，应莫斯科大公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的请求，已经70岁高龄的谢尔吉再次踏上劝和的旅程。这次，他的使命是去说服梁赞公国王公奥列格·伊凡诺维奇放弃与莫斯科大公之间的隔阂。奥列格与德米特里大公之间的纷争由来已久。1381年，奥列格撕毁与德米特里大公之间关于共同反对鞑靼人的合约，并在脱脱迷失侵袭莫斯科城时给予其协助。作为报复，1382年，德米特里派兵洗劫了梁赞城。而奥列格也没有善罢甘休，养精蓄锐之后，他决定以牙还牙。1385年3月25日，在报喜节那天，他暗中靠近德米特里的世袭领地——科洛姆纳城，利用城里军队庆祝节日之际，发动突袭并将其洗劫一空。^②奥列格的侵袭马上就得到了德米特里的回应。但由于奥列格做了精心的准备，莫斯科一方最终全军溃败。1385年夏，不甘示弱的德米特里又派军队去攻打梁赞。^③

与梁赞公国之间的这种拉锯战与莫斯科欲实现罗斯国家统一和解放的战略是背道而驰的，这样只会造成两败俱伤，让他人得利。例如，莫斯科

① Косоруков А.А. Строитель вечного пути России: Сергей Радонежский. М.: Беловодье, 2009. http://svitk.ru/004_book_book/15b/3336_kosorukov-stroitel_vehnogo_puti.php#_Тoc86072708

② Борисов Н.С. Сергей Радонежский, М.: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2009. С.208.

③ Там же. С.209.

在与梁赞交战中的失利就大大地激励了诺夫哥罗德人。他们开始拒绝向德米特里大公缴纳黑松树税（чёрный бор）^①和承认东正教会都主教为地方法庭的最高审判官。此外，诺夫哥罗德的水上强盗也开始到伏尔加河沿岸地区活动，抢劫莫斯科大公的领地。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德米特里不想再继续无休止地流血斗争。于是便率先向奥列格提出和解的请求，并派遣使团进行谈判。但是奥列格十分明白，此时的德米特里比他更需要和平，因此便提高谈判的筹码，这使得谈判陷入僵局。最终，德米特里不得不再次求助于德高望重的谢尔吉。

关于这一事件，尼康编年史中记载道：“九月，德米特里大公到位于拉多涅日的圣三一修道院拜访谢尔吉院长；在向上帝和圣母祈祷完毕后，德米特里宴请了修士们并发放了施舍物。此后，他开始请求神圣的谢尔吉院长，希望院长能够代表他去说服奥列格王公和解。”^②谢尔吉当时虽然年事已高，但是因为深刻明白形势的迫切性，便同意了。此后，编年史接着讲道：“那年秋天，在圣诞斋期，神圣的拉多涅日的谢尔吉院长独自一人代表莫斯科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大公，到梁赞奥列格·伊凡诺维奇王公那里去进行和谈。在此之前，德米特里曾派遣多人去与奥列格进行谈判，但都没有取得成功；神圣的谢尔吉院长，神奇的长老，用温顺的话语与奥列格王公谈论了和平与爱对心灵的益处；最终，深受感动的奥列格大公放下了自己的凶残，变得温顺起来，并真心在神圣的长老面前感到忏悔，同意与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大公签署世代友好协议。而谢尔吉则带着荣耀回到莫斯科大公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那里。”^③谢尔吉与奥列格之间的交谈结束了莫斯科与梁赞之间持续近 20 年的敌对状态。双方都做出了妥协和让步。此外，两国的友好关系还以奥列格之子费多尔与德米特里大公之女索菲亚 1387 年的联姻而固定下来。^④

① 14 世纪下半叶至 15 世纪，为支付金帐汗国向罗斯额外索取的贡赋，莫斯科大公向诺夫哥罗德地区的土地和小手工业所征收的特别税。

② ПСРЛ. т. XI. СПб, 1897. С.86-87.转引自Косоруков А.А. Строитель вечного пути России Сергей Радонежский. М.: Беловодье, 2004. http://svitk.ru/004_book_book/15b/3336_kosorukov-stroitel_vehnogo_puti.php#_Точ86072708

③ Косоруков А.А. Строитель вечного пути России Сергей Радонежский.

④ Борисов Н.С. Сергей Радонежский, М.: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2009. С.211.

在莫斯科不断崛起，欲将罗斯土地统一到自己旗下和摆脱蒙古鞑靼桎梏的背景下，谢尔吉的几次调解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促进了莫斯科公国作为罗斯国家统一事业领导者的地位的巩固，加快了罗斯国家的统一进程。与此同时，谢尔吉的调解也制止了大规模流血事件的发生，使得罗斯百姓能够和平安稳地生活。

除了作为和平的使者去调解罗斯王公内部的纠纷和矛盾之外，谢尔吉还是著名的库里科沃战役的精神之父。谢尔吉的祝福和预言赋予了库里科沃战役以神圣的宗教性质，罗斯所有参战军人不仅是罗斯大地的保卫者，也是为信仰献身的受难者。这使得罗斯全体将士，上至王公贵族，下至普通士兵都备受鼓舞。“在库里科沃原野上，保卫基督教和罗斯民族的事业与莫斯科的政治事业融合在了一起。而在这种联系的不可分离性中，圣谢尔吉给予了罗斯国家的统一者——莫斯科王公以祝福。”^①

14 世纪下半叶，莫斯科公国的日益壮大让金帐汗国感到十分不安。为制约其发展，金帐汗国于 1371 年将赐予弗拉基米尔大公的封诰转封给其宿敌特维尔公国的王公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333-1399）。^②但是影响力蒸蒸日上的莫斯科王公德米特里并没有顺从汗国的决定，而是以重金贿赂马迈汗的使臣萨雷—霍德扎（Сары-ходжа），将事情平息下去。^③

如果说，1371 年，心怀不臣之心的莫斯科德米特里大公是在金钱的帮助下，成功挑战了金帐汗国可汗的权威的话，那么到 1374-1375 年，他则以实际行动公开向金帐汗国的统治者提出挑战。1374 年，德米特里大公停止向汗国支付贡赋。第二年，在马迈汗重新将大公封诰转赐给特维尔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后，十分愤怒的德米特里集结了大量军队，迫使

① Федотов Г.П. Глава 8. Преп. Сергий Радонежский// Святые древней Руси. <http://www.vehi.net/fedotov/svyatyce/08.html>

② Боханов А.Н., Горинов М.М. Глава 13. В борьбе за единство и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Русь в конце XIV — середине XV в//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конца XX века. М.: АСТ, 2001. http://www.gumer.info/bibliotek_Buks/History/Bohan/61.php

③ 弗拉基米尔的居民也只承认德米特里大公的统治是合法的。这一方面是因为，从十四世纪五十年代末起，在罗斯人眼里，金帐汗国的威望由于其国内连续不断的政变和内讧事件而被强烈动摇；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莫斯科公国的实力和莫斯科大公的威望在不断增长。

米哈伊尔主动求和，并承诺永远放弃对莫斯科、弗拉基米尔大公国、诺夫哥罗德等公国的野心，必须帮助德米特里反对蒙古人，以及在自己公国境内为诺夫哥罗德的商品开辟自由通道等等。^①这是自 1252 年安德烈·雅罗斯拉维奇大公（Андрей Ярославич, 1221-1264）统治以来，罗斯大公首次公开反对汗国的统治。它让当时在位的马迈汗明白，德米特里绝不会再像钱袋伊凡一样，对金帐汗国唯唯诺诺俯首称臣了，于是决定要狠狠地惩罚他。

经过精心准备后，马迈汗向罗斯发动进攻。他集结了伏尔加汗国所有的军队，雇佣了希瓦人、亚斯人和布尔塔斯人，还争取到黑海沿岸的热那亚人的帮助。^②此外，他也得到梁赞公国奥列格王公和立陶宛雅盖洛大公的支持。在准备向莫斯科进军的同时，他还与条顿骑士团签署了和约，来保障自己的后方安全。^③

1380 年春，得知马迈汗前来讨伐的消息后，莫斯科德米特里大公公便开始招募军队，准备给予反击。最终，德米特里大公成功集结的军队数量有 10-15 万人。这在罗斯历史上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④尽管如此，德米特里大公当时却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因为根据历史学家最为保守的统计，马迈大军的数量至少要比德米特里多 1.5 倍。^⑤虽然作为正在形成的俄罗斯国家的核心，莫斯科公国已经变得非常强大，然而毕竟敌我力量悬殊，谁都无法预测战争的结局，而一旦战争失败，蒙古人又将会给罗斯带来无数新的灾难。因此，为了获得普通民众的支持，增强所有参战将士迎战的信心和

① Черепнин Л.В. Духовные и договорные грамоты великих и удельных князей XIV-XVI вв. М., Л.: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1950. С. 25-28.

② 转引自 Геллер М.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Т.1.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ИК”, 1997. С. 127.

③ 后来，由于迟到，亚盖洛的军队并没有参加战役。

④ Костомаров Н. И. Русская история в жизнеописаниях ее главнейших деятелей. Кн 1, М, 1990. С.59. 转引自 Карунин Е.А.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ое наследие Сергия Радонежского (духовно-нравственный аспект воспитания): дис...канд.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их наук(13.00.01). М.: Москов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открытый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ИМ. М.А. Шолохова, 2000. С.63.

⑤ Скрынников Р. Г. Святители и власти. Л.: Лениздат, 1990. С.66.

决心，德米特里大公决定求助谢尔吉，请他为即将发生的战役祝福。^①

1380年8月18日，在几位罗斯王公的陪同下，德米特里前往圣三一修道院请求谢尔吉为即将发生的战役祈祷祝福。作为一名修士，谢尔吉向来反对流血牺牲，因此，他最初劝说德米特里无论如何都要避免战事的发生。但当得知罗斯人已竭尽全力，而敌人却仍不满足时，谢尔吉坚定不移地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等待他们的只能是最终的毁灭，而你呢，伟大的王公，将会得到来自上帝的帮助、恩惠和荣耀。”“不要恐惧，去和这些不信神的战斗吧，上帝会成为你的助手和庇护神的。”^②之后，谢尔吉为德米特里举行了祝福仪式。此外，为了坚定德米特里的信心和鼓舞士气，他还违背教会禁止出家人动武的规定，指派自己的两位弟子亚历山大·佩列斯韦特（Александр Пересвет）和奥斯利亚比（Ослябь）随大公一同征战。诚然，在体力和武功方面，两位修士未必能在多大程度上增强俄方军队的实力。但是，在中世纪教会在人们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背景下，这两位修士身着带有十字架图案的修士服参战，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当时的人看来，这是上帝给罗斯人祝福的有力见证。”^③

1380年9月8日，在顿河旁的库里科沃原野上，罗斯军队同马迈大军发生了激烈的交锋。按照传统，战役从双方勇士的单独决斗开始。身材高大的佩彻涅格人切里别伊与亚历山大·佩列斯韦特各手持长矛，展开了生死对决。最终，两人同归于尽。之后数小时的战斗中，马迈汗又投入众多兵力来攻打罗斯人。在最后的激烈决战中，蒙古军的主力被彻底击溃，马迈汗落荒而逃，罗斯人则赢得了最终的胜利。

库里科沃战役后，谢尔吉的威望在整个罗斯大大提高。在罗斯人眼中，他已成为激励和鼓舞罗斯人民与敌人进行斗争的民族英雄。虽然谢尔吉并没

① 一直以来都在给予德米特里大公以强有力精神支持的罗斯东正教会，此时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1378年2月都主教阿里克西去世后所引发的混乱形势，使教会丧失了将罗斯人民团结起来对抗马迈汗大军的能力。

② Кренов К.В. Российские судьбы: жизнеописания, факты и гипотезы, портреты и документы в 30 книгах. М.: Новатор, 1997. С.85.

③ Никитин А.Л. Александр Пересвет и Сергей Радонежский,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 статьи, основания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мифологемы и факты/Александр Пересвет и Сергей Радонежский. <http://library.narod.ru/saga/osnova305.htm>

有亲眼看到罗斯国家的彻底解放，但是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后来人打下了坚实的精神和道德基础——罗斯人民开始相信自己的力量，并坚信只要大家团结一心，一切困难和敌人都是可以战胜的。“一百年来，一提到鞑靼人的名字，罗斯人都会战战兢兢，如今他们却鼓起勇气站起来反抗奴役者。他们不但在自身找到了起来反抗的勇气，而且还到辽阔的草原上去迎击鞑靼人的大军，组成坚不可摧的人墙扑向敌人，并将其葬送在自己的尸骨下。是什么让罗斯人获得如此勇气去做他们祖辈甚至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我们只知道的是，谢尔吉为罗斯军队的统帅祝福，鼓励他不要迟疑，英勇地去同敌人作斗争。而这位年轻的将领则是在谢尔吉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人的代表之一。”^①

三、谢尔吉—圣三一修道院——俄罗斯民族和宗教的圣地

在十四世纪中下半叶东北罗斯修道生活的改革中，以谢尔吉为首的圣三一修道院所扮演的是领头羊的角色，并被认为是莫斯科公国最重要的修道院。在此后的历史发展中，随着俄罗斯国家的统一，修道院自身宗教、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实力的增强，其逐渐发展成为全俄罗斯的宗教与民族的圣地。

自 1392 年谢尔吉去世到十五世纪初，圣三一修道院的发展延续了先前的传统，在经济上依旧是自给自足，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1408 年 11 月，叶基盖依的入侵^②则成为圣三一修道院历史命运的转折点。修道院各方面的实力，尤其是经济实力此后迅速膨胀。这主要是因为，1408 年之后，为修复和重建被毁的修道院，尼康院长打破了圣三一修道院不敛财的传统。他不仅开始积极收取他赠地产，还主动去购买与修道院相毗邻的村庄和田

① Ключевский В.О.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портреты. Деятел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М.: Правда, 1990. С.75.

② 1408 年 11 月，蒙古军队的万户长叶基盖依（Едигей）率大军突袭了莫斯科，并将其周边的城市和乡村一烧而尽。圣三一修道院此次也未能幸免于难，被蒙古人彻底毁掉。参见 Приселков М.Д. Троицкая летопись(реконструкция текстов). М., Л.: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1950. С.468.

地。^①而在谢尔吉成为圣徒后，^②向修道院赠送地产的人就更多了。这两方面因素使得早在十五世纪六十年代圣三一修道院所拥有的地产规模就已非常庞大。那时，它在 15 个县拥有 80 多个建有教堂的大村庄。^③而到十六世纪中叶，修道院已经在四十个教区拥有 200 个村庄，比其他任何一个修道院都多。^④不仅如此，它还积极开展各种贸易活动，其商船甚至为此远赴国外。

在经济实力不断膨胀的同时，在伊凡四世统治期间，由于其大力支持，圣三一修道院的政治地位也急剧上升。^⑤1561 年，圣三一修道院院长被升为修士大司祭，并在莫斯科都主教区众修道院院长行列中，占据首位。由此，圣三一修道院作为莫斯科公国最重要修道院的地位也得到了官方的正式承认。从那时起，没有一件重要的教会或是国家事务是没有圣三一修道院修士大司祭参与的。^⑥

十七世纪初，在混乱时期的反侵略斗争中，圣三一修道院的修士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而这又进一步巩固了其在俄罗斯百姓心目中的威望。1608 年，在彼得·萨佩加（Пётр Сапега）和亚历山大·利索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Лисовский）的带领下，欲打劫圣三一修道院财富的波兰—立陶宛联军，在向莫斯科挺进时，将其围困 16 个月，直至 1610 年 1 月才解除。^⑦获得自由后，修道院并没有为了保全自己而对莫斯科的局势袖手旁观，而是成为米

① 在谢尔吉在世或是刚刚去世的一段时期里，圣三一修道院都不曾主动地去获得地产。参见 Клосс Б.М. 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Т.1. Житие Сергия Радонежского. М.: Язык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1998. С.66-67.

② 首先是作为圣三一修道院的地方圣徒，而后是全教会圣徒。

③ Алексеев А.И. Под знаком конца времени. Очерки русской религиозности конца XIV – начала XVI вв. СПб.: Алетейя, 2002. С.225.

④ Черкасова М.С. Землевладение Троицы-Сергиевы лавры в 15-16 веках. М., 1996. С.198-199.

⑤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伴随着修道院财富和地产的增长，以及修道院对国家政治事务参与度的增加，修道院的修道纪律也受到了影响。到 16 世纪，先前严格的集体式修道模式逐渐被破坏，修士之间开始出现差异和区别，以至于富人在加入修道院时，仍旧保留其对自己财产的控制权，并获得优先待遇。参见 Ханагова И.Г. Троице-сергиев монастырь в обществ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жизни Руси XV – XVI вв. Автореферат дисс. на соиск. уч. степ. канд.истор. наук, Москва, 1993.

⑥ Клосс Б.М. 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Т.1. Житие Сергия Радонежского. С.72.

⑦ Ермакова С.О. Троице-Сергиева лавра. М.: Вече, 2004. С.5.

宁和波扎尔斯基第二民兵团的据点之一。圣三一修道院的修士们，不仅在精神上给予解放者们支持，还在物质上给予其以实在的帮助，如准备食物、救治伤员、给避难者提供食宿等等。圣三一修道院修士在混乱时期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为保卫祖国所作出的牺牲，使修道院的威望和名气剧增，进一步巩固了其作为俄罗斯民族圣地的地位。这使得后来该修道院的人无论是去哪里，在路上都能够畅通无阻。^①而 17 世纪中叶，当安提阿东正教会修士大辅祭、旅行家、作家保罗·阿列普斯基（Павел Алеппский, 1627-1669）从安提阿来圣三一修道院访问时，就曾提到：“早在其自己的土地上，他就已听说每个到此朝拜的人的罪恶都会被原谅。”^②不仅如此，这一时期，修道院的经济实力也达到了空前规模，可谓“富可敌国”。在莫斯科、诺夫哥罗德、特维尔、下诺夫哥罗德等许多城市，它都拥有会馆、商业网点、盐场、渔场和海狸场。所有这些使得十七世纪俄罗斯东正教会牧首尼康在对俄国富有的修道院进行排行时指出：“我国有三座最富有的修道院。第一座是圣三一修道院，它的规模最大，实力最雄厚。第二座是著名的基里尔—别洛泽尔斯克修道院，第三座则是索洛维茨修道院。”^③圣三一修道院作为俄罗斯民族和宗教圣地的地位，在十七世纪初的事件后，已经变得坚不可摧。十八世纪中叶（1744），根据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Елизавета Петровна）的命令，圣三一修道院又获得了大修道院（Лавра）的地位。^④

然而，随着十八世纪下半叶叶卡捷琳娜二世世俗化改革^⑤的展开，圣三一修道院各方面的实力都被严重削弱。此前，修道院的地产达到了其发展

① Архимандрит Макарий (Веретенников). Патриотическое служение Троице-Сергиевой Лавры в Смутное время. 15.10.2009. http://www.mpda.ru/regent/site_pub/103373.html

② Paul of Aleppo, *The Travels of Macarius, Patriarch of Antioch*, trans. F.C. Belfour (London: oriental translations fund, 1828), 转引自 Dr. Scott Kenworthy, *The Heart of Russia: Trinity-Sergius, Monasticism and Society after 182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Washington, DC: Wilson Center Press, 2010, p.25.

③ 转引自戴桂菊著：《俄国东正教会改革（1861-1917）》，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 144 页。

④ Голубинский Е.Е. Сергей Радонежский и созданная им Троицкая Лавра. М.: Воскресенье, 2007. С.119.

⑤ 1746 年 2 月 26 日，叶卡捷琳娜二世签署了世俗化改革宣言。此次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没收教会地产、取消部分修道院以及确定一些主教区和修道院的补贴。

的顶峰。^①那时，它一共拥有 20 余万公顷土地和分布在 45 个教区的 10 万余名男农奴，并且对很多修道院都具有司法审判权。^②叶卡捷琳娜的世俗化改革则剥夺了圣三一修道院的大部分地产和农奴，取而代之的是给予其经济补贴。这使得圣三一修道院的经济基础结构发生了改变。1764 年改革前，地产收入是其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而改革后，国家补贴则成为其主要收入来源。^③

除了在经济上对圣三一修道院进行限制外，叶卡捷琳娜还取消了它对其他修道院的司法审判权。改革前，圣三一修道院的下属修道院一共有 17 所。改革后，只剩下司提反-马赫尼茨修道院（*Стефано-Махрицкий монастырь*）还由其管辖。^④总的来说，叶卡捷琳娜的世俗化改革给圣三一修道院的政治和经济实力都带来了重创。当然，圣三一修道院并不是一个个例，在叶卡捷琳娜的世俗化改革中，俄罗斯所有修道院都同样受到了打压。

十九世纪，在俄罗斯修道生活整体得到复兴的背景下，1821 年，在费拉列特（*Филарет*, 1782-1867）当选为莫斯科都主教和圣三一修道院院长后，修道院也开始了它的复兴之路。在费拉列特的领导下，修道院的经济活动重新繁荣起来，并用所积累的财富修建了新的学校、医院和救济所等机构。修士和见习修士的数量也大为增加。而随着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铁路的开通，来此地朝圣的信徒数量也迅速增长。此外，修道院自己印刷并广泛分发的宣传册“圣三一之页”（*Троицкие листки*），也让谢尔吉及其修道院的名声更为远扬，吸引来更多的朝圣者。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朝圣者到谢尔吉的

① 混乱时期，由于长期被围困以及大量领地被波兰军队践踏，圣三一修道院的财富下降很多，但是很快，到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统治的下半期，其实力就已完全恢复。参见 Голубинский Е.Е. *Сергий Радонежский и созданная им Троицкая Лавра*. С.128-129.

② Dr. Scott Kenworthy, *The Heart of Russia: Trinity-Sergius, Monasticism and Society after 1825*, p.26.

③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 19 世纪末。

④ Dr. Scott Kenworthy, *The Heart of Russia: Trinity-Sergius, Monasticism and Society after 1825*, p.27.

干尸匣前、显灵圣像和客西马尼园长老住处祈祷、朝拜。^①

到二十世纪初，圣三一修道院仍旧是俄罗斯最富有的修道院之一。那时，修道院拥有自己的印刷厂、两座宾馆，生产玩具、烛台、十字架等物品的手工作坊、商铺、马厩等。与此同时，修道院还在继续修建新的隐修楼、商店、劳动设施等。日俄战争期间，修道院附属医院还曾为救治前线撤下来的伤员做出过重要贡献。

1917年的十月革命打断了俄罗斯众多修道院的发展步伐，圣三一修道院也不例外。根据1918年1月23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关于教会同国家分离和学校同教会分离》的法令，圣三一修道院里成立了劳动合作社。1919年11月4日，修道院的修士被迫迁至契尔尼夫隐修区（Черниговский скит）和客西马尼隐修区。所有教堂和隐修室都被查封。^②1919年11月10日，谢尔吉耶夫镇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决定将圣三一修道院关闭，以解决医院、学校、儿童机构建设场所严重不足的问题。^③1920年，根据人民委员会的决议，修道院被改为历史与艺术博物馆。^④1929年，修道院附近的最后一批隐修区也都被关闭。^⑤1940年2月，修道院的建筑群被当局宣布为国家自然保护区博物馆。^⑥

卫国战争结束后，修道院迎来了转机。由于俄罗斯东正教会在战争中表现出高度的爱国热情，国家对待它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圣三一修道院的宗教生活也随之逐渐复兴。1946年，根据政府决议，修道院转交给俄罗斯东正教会自己使用，牧首阿列克西一世任院长，古里（Гурий）修士大司祭担任副院长。1948年，莫斯科神学院也重新回到修道院，并开始正常运

① 由于圣三一修道院自己很少对朝圣者的数量进行统计，所以有关这一问题的信息也十分有限，我们只能大概地对其进行把握。目前现存的报告有两份：一份撰写于农奴制改革前的1859年，另一份则成书于一战期间的1915年。根据前一份报告，到修道院进行朝拜的信徒大概有23万人。而后一份关于1915年朝觐者人数的报告，则表明至少有30万人到该修道院进行朝拜。参见：Dr. Scott Kenworthy, *The Heart of Russia: Trinity-Sergius, Monasticism and Society after 1825*, p.185.

② Лаврская летопись. XX век. <http://www.stsl.ru/#ad-image-0>

③ Города Подмосковья. М., 1980. Кн. 2. С.201. 转引自 Лаврская летопись. XX век.

④ Лаврская летопись. XX век.

⑤ Там же.

⑥ Макаровская Г.А. К вопросу о реставрации архитектурного ансамбля Троице-Сергиевой лавры в 1920-1990 гг. http://www.musobl.divo.ru/mus_hnrest3.html

转。^①从那时起，修道院便重新成为俄罗斯东正教信仰的中心。尽管如此，由于苏联官方意识形态的限制，修道院的发展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仍受到重重限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叶，戈尔巴乔夫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使长期受到压制的俄罗斯东正教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在俄罗斯东正教会和广大东正教信徒宗教生活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圣三一修道院也因此获得了新生。随着修道生活的正常化，圣三一修道院开始重新以各种方式来对其建立者进行纪念。1992年9月25日，在谢尔吉去世六百周年之际，修道院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此外，各种与谢尔吉生命历程有关的场所，也得到重建和保护。例如，谢尔吉出生并度过自己童年时代的罗斯托夫城的瓦尔尼察镇（Варница）获得重建。^②该镇在苏联时期，由于当地的圣三位一体—瓦尔尼察修道院（Троице-Варницкий монастырь）被关闭，而逐渐走向衰败。

今天，圣三一修道院里建有众多的机构，其中包括附属的牧首区印刷中心、牧首区建筑修复中心、朝圣者中心、圣像画以及刺绣—缝纫手工作坊等。^③如同其在十五至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所曾扮演的角色一样，它仍旧是俄罗斯国家重要的精神文化中心之一，从事着传教、出版、慈善、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的活动。

总体来看，圣三一修道院的发展壮大与圣谢尔吉崇拜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而是双向的互动关系。一方面，修道院的发展和壮大促进了谢尔吉崇拜的不断巩固和传播；另一方面，圣谢尔吉崇拜的经久不衰，反过来又保证了圣三一修道院作为俄罗斯民族和宗教圣地的地位。作为民族历史的重要参与者，谢尔吉的事迹以及修道院的发展史已经存在于俄罗斯人民的民族集体意识中。一家主流报纸曾刊登过一位记者的文章，该文章对修道院的评论不乏批判之辞，但是与此同时，作者不得不承认的是：“无论处于修道院的哪个角落，你都会感觉到俄罗斯历史的伟大时代，都会感到与人民和历史事件紧密相连。在这个意义上，可能就是对于那些非

① 1919年，莫斯科神学院被解散，其教学场所被用于开办电工培训班。参见 Лаврская летопись. XX век.

② Голубинский Е.Е. Сергей Радонежский и созданная им Троицкая Лавра. С.458.

③ Там же. С.459.

信徒而言，圣三一修道院的意义早已超出了其作为杰出建筑遗产的意义，因为它代表着数个世纪里俄罗斯人民的精神存在。”^①

四、圣谢尔吉作为俄罗斯世俗政权庇护者的“政治身份”

库里科沃战役之后，谢尔吉作为精神领袖的地位，在莫斯科公国已经变得不可动摇，而其所创建的圣三一修道院的影响力也随之增长。然而，谢尔吉及其修道院并没有因此而获得莫斯科大公家族的特殊庇护。前文中我们讲到，1408年蒙古人入侵后，为重建被毁的修道院，修道院的尼康院长开始大规模购买荒地、村庄。不仅如此，为了获得各种优惠和特权，他还主动与各公国王公家族交好，其中既有修道院所在地的领主——拉多涅日的安德烈·弗拉基米罗维奇支系，^②也包括曾长期与莫斯科为敌的特维尔公国伊凡·米哈伊洛维奇王公家族。^③与此相反的是，直到尼康去世时，修道院与莫斯科世俗统治者之间的关系都比较疏远。无论是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大公自己，还是他的儿子瓦西里一世，至少是在1415年以前，都不曾给予圣三一修道院任何豁免权，馈赠土地就更不用提了。^④直到十五世纪二十年代初，或是在谢尔吉被宣布为圣三一修道院的地方圣徒后，^⑤瓦西里一世才相继将伊凡诺夫山（Иванова гора）和克利亚济玛（Клязьма）地区的捕鱼权，以及位于克利亚济玛的两个工厂赐予它。^⑥

① Буланже М. Бытие и быт лавры: Троице-Сергиев монастырь полон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ей// Новое время. 2003. Vol.44. С.28-29.

② 安德烈·弗拉基米罗维奇王公支系与修道院关系密切，曾多次向其赠送村庄和土地。参见 Клосс Б.М. 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Т.1. Житие Сергия Радонежского. С.68; Рыбаков Б. А. Вкладная книга Троице-сергиева монастыря. М.: Наука, 1987. С.29.

③ 1410年，尼康曾前往特维尔去祝福特维尔大公伊凡·米哈伊洛维奇与其侄子伊凡·鲍里索维奇和解。参见 David B. Miller, *Saint Sergius of Radonezh, his Trinity Monastery, and the Formation of Russian Identity*,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2010, p.78.

④ Греков Б.Д. Акты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ой Руси конца XIV---начала XVI вв. Т.1.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1952. С.41-43.

⑤ 由于瓦西里一世的赠与文书上没有标明具体日期，只是写了1425年以前，所以我们也无法确定这些赏赐行为的具体日期，只能根据前后文推算大概是在1423-1425年间。

⑥ Греков Б.Д. Акты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ой Руси конца XIV---начала XVI вв. Т.1. С.47-48.

到瓦西里二世统治时期，莫斯科大公家族与圣三一修道院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质的飞跃。在其继位之初的几年里，为了取悦修道院的修士和圣谢尔吉本身，^①瓦西里二世就曾多次颁发赏赐文书，赠予其大量土地、村庄以及采盐权等各种特权。除采取上述行动外，瓦西里二世还亲自到圣三一修道院进行朝拜，以此来表达其对圣谢尔吉的虔诚崇拜之心。由此，也开启了俄罗斯世俗统治者到圣三一修道院进行朝拜（царские богомольные походы к Троице）的传统。^②

1432年9月25日，在谢尔吉去世纪念日，刚刚获得封诰、从汗国返回的瓦西里二世首次来到修道院进行朝拜，^③并赠予其位于别热茨克高地（Бежецкий верх）的普利谢基（Присеки）和维尔戈什（Вилгощ）两个村庄。^④1439年9月25日，瓦西里二世再次来到修道院进行朝拜，并将位于佩列亚斯拉夫县的斯瓦特科夫村（Сватковское Село）赠与修道院。^⑤不仅如此，瓦西里二世的母亲索菲亚·维托夫托芙娜（Софья Витовтовна, 1371—1453）也曾多次向圣三一修道院馈赠礼物和地产。在白湖的马丁尼昂（Мартинаан Белозерский, 1400—1483）^⑥1447—1455年担任圣三一修道院院长期间，瓦西里二世家族与圣三一修道院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亲密。为了取悦圣谢尔吉和感谢马丁尼昂院长给予自己的有力支持，瓦西里二世家族向圣三一修道院馈赠了数份地产和多项豁免权。根据大卫·米勒的统计，在马丁尼昂担任院长期间，莫斯科大公家族一共向圣三一修道院颁发了23份豁免权证书，其中瓦西里二世自己颁发的有16份，索菲亚·维托夫

① 因为，信徒们普遍认为，赠送的礼物和金钱越多，其与圣徒之间的关系就越为亲密，那么其请求得到实现的机会也就越大。

② 转引自 Лаврская летопись. XV век. <http://www.stsl.ru/history/xv-vek/>

③ 1431年秋，瓦西里二世与尤里·德米特里耶维奇王公一同带着礼物，前往汗国去争取大公的封诰。最终，在大贵族弗谢沃洛日斯基的帮助下，瓦西里二世获得封诰。与此同时，尤里则获得对德米特罗夫（Дмитров）的统治权。

④ Греков Б.Д. Акты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ой Руси конца XIV—начала XVI вв. Т.1. С.65-66.

⑤ Там же. С.107.

⑥ 马丁尼昂是瓦西里二世的忏悔神父。在王权斗争中，他使修道院的修士们站在了瓦西里二世一方。与此同时，他对瓦西里二世的影响力也非常大：在担任圣三一修道院院长时，曾指责他不听从自己的意见。

托芙娜 4 份，瓦西里的妻子玛利亚则是 3 份。^①

瓦西里二世对圣三一修道院如此慷慨，并多次亲自前往修道院进行朝拜，并不完全出于虔诚之心。之所以会发生这种变化，主要是因为，在 1425 年瓦西里一世去世后，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即瓦西里二世与其叔叔加利奇和兹韦尼哥罗德王公尤里·德米特里耶维奇为争夺大公宝座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而就在这一时期，在尼康院长的领导下，圣三一修道院经过多年的恢复与发展，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都得到了极大地增强。此外，瓦西里二世的竞争对手——加利奇和兹韦尼哥罗德王公尤里·德米特里耶维奇是谢尔吉的教子，也是圣三一修道院的庇护者。一直以来，其与圣三一修道院的关系十分密切，修道院的几乎所有重要活动，包括谢尔吉去世二十周年纪念活动、谢尔吉干尸挖掘仪式以及新圣三位一体石教堂的建设等，他都亲自参加，并给予大力协助。在尤里去世后，他的儿子德米特里·舍米亚卡（Дмитрий Шемяка, 1420-1453）也曾多次向圣三一修道院馈赠各种特权和地产。^②这使得修道院的修士们对该王公家族支系心存好感。因此，为了掌握斗争的主动权，瓦西里二世也不得不给予圣三一修道院特别的重视，希望在与尤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家族的斗争中，同样能够获得该修道院修士的支持和借助谢尔吉的神圣光环来增加自己的威望。

在与对手进行斗争的过程中，瓦西里二世曾不止一次求助于圣三一修道院。1442 年，他迫使圣三一修道院济诺维（Зиновий）^③院长去说服德米特里·舍米亚卡及其朋友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停止向莫斯科进军。^④最终，在济诺维院长的调解下，双方在圣谢尔吉的干尸匣前起誓和解。^⑤时隔四年，瓦西里二世不得不再次向谢尔吉及其所创建的修道院求助。1446

① David B. Miller, *Saint Sergius of Radonezh, his Trinity Monastery, and the Formation of Russian Identity*, p.74.

② Греков Б.Д. Акты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ой Руси конца XIV—начала XV вв. Т.1. С.120-122.

③ 圣三一修道院的第四任院长，1432—1443 年在任。

④ 1441 年，瓦西里二世撕毁了与德米特里·舍米亚卡先前订立的合约，派兵到乌格利奇去擒捕他。然而，由于事先得知消息，德米特里·舍米亚卡成功逃到了别热茨克高地。作为报复，他联合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王公一起去进攻瓦西里二世。参见 Зимин А. А. Витязь на распутье: Феодалная война в России XV в. М.: Мысль, 1991. С.95.

⑤ Клосс Б.М. 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Т. 1. Житие Сергия Радонежского. С.71.

年，瓦西里二世到圣三一修道院朝拜，希望谢尔吉的神圣性能够帮助其以沙皇的身份重新获得新生，而其支系的统治地位也得到合法化。^①此次事件源于 1445 年瓦西里二世在苏兹达里附近与喀山可汗兀鲁·穆罕默德（Улу-Мухаммед, ?-1445）之子作战失败，并被擒为俘虏一事。^②那时，根据传统的继承秩序，莫斯科的政权应由德米特里·舍米亚卡接手。但是瓦西里二世却与蒙古人达成协议，同意支付二万五千卢布作为赎金，来换取自己的自由。11 月 17 日，在蒙古人军队的护送下，瓦西里二世回到莫斯科，德米特里·舍米亚卡则被迫离开那里，退到了乌格利奇。然而，舍米亚卡并没有因此而善罢甘休。为了蛊惑人心，舍米亚卡散布谣言说，瓦西里二世与喀山可汗达成了一项义务沉重的协议：允许可汗作为沙皇来统治莫斯科和其他城镇，他自己则去统治特维尔。^③这使得很多大贵族、商人和神职人员代表纷纷倒向舍米亚卡一方。因此，为了缓解民众的不满情绪，1446 年 2 月 12 日，在两个儿子——伊凡和尤里王公，以及一个规模不大的随从队伍的陪伴下，瓦西里二世前往圣三一修道院，以此来表达其对修道院及其显灵者谢尔吉的干尸的敬意。^④

瓦西里二世的这次朝拜之行，可以说是一次公开的赎罪仪式。他在为给百姓带来的不幸而表示歉意。通过这一公众性的忏悔行动，瓦西里公开地表明，在圣谢尔吉的调解下，他获得了上帝的祝福与原谅。^⑤然而，让瓦西里二世意想不到的，就在其前往圣三一修道院朝拜期间，德米特里·舍米亚卡乘机夺取了他的大公宝座，抢占了财产，并将他的母亲、妻子和大贵族们囚禁起来。与此同时，舍米亚卡还派遣了一支以莫扎伊斯克公国伊凡王公（Иван Можайский）为首的军队，到圣三一修道院去擒拿瓦西里二世及其儿子。尽管在得知消息后，躲进圣三位一体大教堂里的

① David B. Miller, "The cult of Saint Sergius of Radonezh and its political uses", *Slavic review*, 1993, Vol.52, p.688.

② Зимин А.А. Витязь на распутье: феодальная война в России XV в. С.104.

③ Черепнин Л.В. Образование Русского централизован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 XIV-XV веках.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0.С.768-771, 787-808.

④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русских летописей. 26:200. 转引自 Зимин А.А. Витязь на распутье: феодальная война в России XV в. С.110.

⑤ David B. Miller, "The cult of Saint Sergius of Radonezh and its political uses", p.689.

瓦西里二世以《圣母向谢尔吉显灵》圣像^①和圣谢尔吉的名义起誓，他没有打算去伤害任何人，而别人也没有理由来伤害他，他最终还是被德米特里·舍米亚卡的部队俘虏，并被带回莫斯科。^②三天后，德米特里·舍米亚卡下令将瓦西里二世弄瞎，并将其流放至乌格利奇。然而，德米特里·舍米亚卡的胜利并没有持续太久。1447年2月17日，在获得圣三一修道院马丁尼昂院长的祝福后，瓦西里二世率军重返莫斯科，夺回了自己的宝座，并于1453年，赢得了王权争夺战的最终胜利。^③尽管在上述事件中圣谢尔吉及其修道院并没有给予瓦西里二世以有效的庇护，让舍米亚卡屈服，我们从中却可以看出，圣谢尔吉在瓦西里二世心目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分量。这使得他在危急关头选择躲进谢尔吉干尸的安放地——圣三位一体大教堂里，并以谢尔吉的名义发誓，希望以此来震慑和感化自己的对手。

除了求助于圣谢尔吉以及圣三一修道院的威望来对付敌人外，在谢尔吉的干尸匣旁，瓦西里二世还经常以“亲吻十字架”的隆重形式，来巩固其与对手或是盟友的契约和联盟。此外，也是在瓦西里二世统治时期，在圣三一修道院的圣三位一体大教堂里，为大公宝座继承人举行洗礼逐渐发展成为莫斯科大公家族的一项传统。例如，1440年1月22日，济诺维院长便为伊凡·瓦西里耶维奇，也就是未来的伊凡三世举行了洗礼仪式。^④1479年4月4日，罗斯托夫的大主教瓦西昂（Вассиан Ростовский）和帕伊西·雅罗斯拉沃夫（Паисий Ярославов）院长为未来的瓦西里三世——瓦西里·伊凡诺维奇主持了洗礼仪式。^⑤1530年9月4日，还是在该教堂，未来的伊凡四世接受了约夫萨夫·斯科里皮岑（Иофсаф Скрипицын, ?-1555）院长的洗礼。^⑥在洗礼程序结束后，受洗婴儿被放到圣谢尔吉的干尸匣上，以此寓意圣谢尔吉是未来沙皇的庇护者和保护者。也正是因为这种联系，伊

① 该圣像是瓦西里二世从谢尔吉干尸匣上取下的。

② 圣三一修道院的几位修士参与了德米特里·舍米亚卡擒获瓦西里二世的行动。戈卢宾斯基认为，这可能是由于舍米亚卡的父亲尤里·德米特里耶维奇曾是圣三一修道院的庇护者，给过修道院的发展许多支持。

③ Зимин А.А. Витязь на распутье: феодальная война в России XV в. С.148.

④ Лаврская летопись. XV век. <http://www.stsl.ru/history/xv-vek/>

⑤ Там же.

⑥ Лаврская летопись. XVI век. <http://www.stsl.ru/history/xvi-vek/>

凡雷帝对圣谢尔吉以及圣三一修道院有着特殊的信仰。与自己的先辈相比，伊凡四世去圣三一修道院朝觐的次数不仅更为频繁，而且为了表达虔诚之心，赎回曾犯下的众多罪恶，伊凡四世曾多次步行至圣三一修道院进行朝拜。^①为了朝拜方便，1556年，伊凡四世还下令在圣三一修道院，以及位于莫斯科通往圣三一修道院途中的皇村，修建多座行宫。^②此外，在出征奔赴战场前和从战场归来时，伊凡四世通常也都会到圣谢尔吉的干尸匣前进行祈祷。例如，1552年，在奔赴喀山时，为了请求圣谢尔吉的祝福和帮助，伊凡雷帝拜访了圣三一修道院。而就在夺取喀山之前，他还在献给圣谢尔吉的行军教堂里进行祈祷。胜利夺取喀山后，伊凡四世则吩咐在斯维亚日斯克（Свияжск）建立一座修道院，献给圣谢尔吉。在从喀山返回莫斯科后，伊凡四世又再次造访圣三一修道院，并向圣谢尔吉表示了感谢。^③

由于“神圣事物天生具有传染性，其神圣性品质可以转移到凡俗对象的身上。”^④因此，在东北罗斯，相对于其他世俗法庭而言，圣谢尔吉干尸所在的圣三一修道院具有更大的精神道德权威。它的地位也授予去那里寻求帮助的人以特殊的权力和威望。所以，我们看到，为了取悦圣谢尔吉和圣三一修道院的修士，瓦西里二世家族不仅向圣三一修道院馈赠大量礼物和地产，他们还通过亲自到圣三一修道院进行朝拜、在谢尔吉干尸匣所在的圣三位一体大教堂里为王位继承人举行洗礼，在谢尔吉干尸匣前“亲吻十字架”来巩固契约或是联盟等各种方式，来寻求和分享圣谢尔吉神圣光环的庇护。由此，圣谢尔吉便逐渐发展成为其“家族”圣徒和世俗大政权的庇护者。

① 通常情况下，沙皇及其随从只是在朝拜之行的开始和结束部分才徒步行走，而大部分路途则是使用十分舒适的交通工具。参见 Владимир Рогоза. Как российские цари на богомолье ездили? 20.01.2009. <http://shkolazhizni.ru/archive/0/n-24210/>

② 动乱时期，位于修道院以及从莫斯科到圣三一修道院公路沿途的行宫，几乎都被波兰人摧毁。17世纪20年代，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下令重建这些宫殿。而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则在已修复的众多行宫的基础上，下令新建了一座。参见 Голубинский Е.Е. Сергей Радонежский и созданная им Троицкая Лавра. С.338.

③ Рерих Е.И. Сергей Радонежский. Восход. 2013(4). <http://rossasia.sibro.ru/voshod/article/33880>

④ 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16-418页。

圣谢尔吉的这种政治身份也决定了其不会像俄罗斯东正教会其他许多圣徒一样，渐渐被人们遗忘。即使改朝换代，其与世俗政权之间的这种关系也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对于罗曼诺夫王朝的统治者而言，到圣三一修道院朝拜已经成为其彰显皇威、虔诚信仰以及祈求上帝对其特殊庇护的仪式。而为了维护政权的合法性，此后俄罗斯历史上的统治者不得不多次求助于圣谢尔吉。例如，在十九世纪末俄罗斯社会陷入严重危机的背景下，^①为表达对俄罗斯东正教会圣物的信仰和崇敬之情，将教会与沙皇专制统治紧密联系在一起，1883年，亚历山大三世夫妇不仅到圣三一修道院进行朝拜，还访问了客西马尼隐修区。此外，亚历山大三世还对1892年谢尔吉逝世五百周年声势浩大的纪念活动寄予厚望，希望通过对圣谢尔吉的纪念，人们能够重新追忆俄罗斯中世纪历史的辉煌，重申“俄罗斯人民的统一在于东正教与沙皇专制统治的统一”的执政理念。^②

五、俄罗斯东正教信徒对待圣徒的功利主义心理

威廉·詹姆斯在其《宗教经验之种种》一书中，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论断：“我们拥护的神，是我们需要的并能利用的神”。^③詹姆斯的这一观点恰好可以用在俄罗斯东正教信徒对其圣徒的崇拜上。在广大东正教信徒看来，圣徒之所以为圣徒，首先是因为他们能够创造奇迹，能够在信徒陷入困境时出手相助。正是出于这种功利主义心理，信徒们在寻求圣徒的帮助时，

① 1861年农奴制改革以后，俄国的土地所有制发生了质的变化，资本主义工业发展迅速。但是，俄国的政体却丝毫没有发生改变。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导致俄国社会陷入错综复杂的冲突之中。惶恐不安的亚历山大三世政府为了维护沙皇专制制度，在推行反改革政策的同时，还采取各种措施来加强意识形态宣传，扶持对国民精神意识具有重要影响的东正教会的发展。而其扩大俄罗斯东正教会影响力所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举行各种宗教庆典活动，渲染宗教气氛。拉多涅日的谢尔吉逝世五百周年的纪念活动，便是该措施框架下的一项活动。参见戴桂菊：《俄国东正教会改革（1861-1917）》，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44-175页。

② Dr. Scott Kenworthy, *Memory Eternal: The Five Hundred Year Jubilee of St. Sergius of Radonezhmore*, https://www.academia.edu/1220588/Memory_Eternal_The_Five_Hundred_Year_Jubilee_of_St_Sergius_of_Radonezh

③ 威廉·詹姆斯：《宗教经验之种种——人性之研究》，唐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331页。

往往会去找名气较大的圣徒，认为名气大的圣徒具有更大的“法力”。因此，无论是对于俄罗斯国家的世俗统治者，还是对于广大平民东正教信徒来说，早已蜚声国内外的谢尔吉都是一个最佳的崇拜对象。对于世俗统治者而言，具有崇高精神道德威望、并在俄罗斯国家统一与解放事业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谢尔吉及其所创建的修道院，可以赋予其政权以更大的权威和神圣性，可以帮助其解决棘手的政治问题。而对于广大平民东正教信徒来说，相对于其他很多圣徒，谢尔吉也更具有权威性，这并不只是因为上述历史原因，而是因为他创造了很多的奇迹。换句话说，就是谢尔吉持续不断的“创造奇迹”的能力在吸引着他们。因为，根据美国学者罗伯特·格林（Robert Greene）的研究，在整个俄罗斯帝国时期，人们最经常去朝拜的场所，是那些被认为对信徒最慷慨，也就是创造奇迹最多的地方。^①而俄罗斯教会历史学家德·伊·罗斯季斯拉沃夫（Д.И. Ростиславов）的研究则表明，仅十九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每年到圣三一修道院进行朝拜的人数都不少于 30 万人。^②当然，这一数据或许并不能够被看做是典型，因为这是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俄罗斯修道生活复兴背景下所进行的统计。但它至少说明，圣三一修道院对于广大信徒的吸引力是十分巨大的，而这首先要归功于谢尔吉的“显灵能力”。

的确如此，在谢尔吉去世后的数个世纪里，其“创造奇迹”的能力并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逐渐枯竭，相反，其所创造的奇迹数量仍旧十分可观。根据美国学者斯科特·肯沃（Scott Kenworthy）的研究，仅在十九世纪第一个十年到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一个世纪里，谢尔吉所创造的奇迹就大约有 60 例。^③这 60 个谢尔吉显灵案例所涉及的人口群体、社会阶层以及地域分布范围都非常广泛：男女老幼都有；社会阶层各不相同，从农民到工人，从商人到贵族；所覆盖的地域范围也十分广阔，从西部圣彼得堡、维尔纽斯到东部的西伯利亚。与此同时，他们所求助的问题也多种多样。其中既有关

① Robert H. Greene, *Bodies Like Bright Stars: Saints and Relics in Orthodox Russia*, De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2010, p.45.

② Ростиславов Д.И. Опыт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об имуществах и доходах наших монастырей. СПб.: Типография Морского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в главном адмиралтействе, 1876. С.104-105.

③ Dr. Scott Kenworthy, *The Heart of Russia: Trinity-Sergius, Monasticism and Society after 1825*, p.197.

于生理疾病、魔鬼附体问题的，也有涉及沉迷于女色、吸烟、酗酒等不良嗜好的。这些奇迹一方面说明谢尔吉是个全能的奇迹制造者，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另一方面，来自不同年龄群体、阶层、地域的人都来求助于谢尔吉的事实也表明，圣谢尔吉崇拜已经穿越了民族、地域、阶层的界限，将俄罗斯庞大帝国各个阶层的群体联系在了一体，成为这些人共同认同的“圣徒”。

此外，圣徒神力具有“与时俱进性”的特点。信徒们认为圣徒自身的“神力”是不受时代限制的。所以，他们总是会根据自己的需求，赋予圣徒以各种各样的新技能。这使得圣徒们能够紧跟时代步伐，及时地对人们的心理需求作出回应，并给予其以相应的抚慰。这一点在圣谢尔吉这里也得到了体现。在谢尔吉所创造的奇迹中，有一些便是与社会历史变迁所带来的新问题有关的。例如，有一位商人因其生意在 1905 年的革命中被彻底摧毁而陷入绝望，并曾一度想自杀。但是，因为他非常信任圣谢尔吉，于是便决定步行到圣三一修道院去向谢尔吉的干尸求助。然而，在去修道院的途中，陷入万分绝望的他却走进了树林，准备上吊自杀。正当他要结束自己的生命时，一位“神奇的长老”从林中走出来，并向他做了一个威胁的手势，然后便消失在丛林深处。而这个动作就足以动摇其自杀的念头。他飞奔向圣三一修道院，并跪倒在圣谢尔吉的干尸匣前，失声痛哭感谢圣徒（他认为林中的长老正是圣谢尔吉）救了他的命。在进行忏悔和参加完修道院的圣餐仪式后，这位商人便离开了修道院，但是此时的他已经感觉焕然一新，十分平静了。^①

总的来说，一方面，对于广大平民东正教信徒来说，其对待圣徒的功利主义心态使得他们在选择所崇拜的圣徒时，通常倾向于名气较大、显灵能力较强的圣徒。而圣谢尔吉恰恰就是这样的一位圣徒。他不仅具有崇高的修行和道德品质，而且在东正教会修道制度的发展和俄罗斯国家的统一与解放事业中都曾扮演过重要的角色。更为重要的是，在其去世之后，他还“创造了数量可观的奇迹”。这对于渴望奇迹的广大东正教信徒而言，则是十分具有吸引力的。另一方面，为了及时回应时代所提出的新挑战，以满足教徒们的宗教需求，给予其一定的心理安慰，圣谢尔吉自己也紧跟时代步伐，不断更

① OR RGB, f.766, k.2, d.4, II.24-26. 转引自 Dr. Scott Kenworthy, *The Heart of Russia: Trinity-Sergius, Monasticism and society after 1825*, p.204.

新自己的“奇迹库”。从这个意义上讲，广大教徒的需求又是谢尔吉神力提升的根本动力所在。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圣谢尔吉与广大教徒之间的这种积极互动是使得数个世纪以来人们对他的崇拜始终不断、经久不衰的重要因素之一。

结 语

综上所述，拉多涅日的谢尔吉之所以能够获得广大信徒经久不衰的崇拜，其中既有个人因素和历史因素的影响，也有政治因素的参与，亦有民众宗教心理因素的作用。因为谢尔吉生前曾在罗斯国家的政治、宗教和精神文化生活中扮演过重要的角色，其在去世后才能够名正言顺地成为众人所颂扬的对象，并最终被神化，变为能够创造奇迹、给予莫斯科公国和未来的统一俄罗斯国家以庇护的圣徒。正是这些因素的共同推动，才使得圣谢尔吉逐渐成为俄罗斯最为著名的圣徒之一。此外，不仅是对于俄罗斯东正教信徒，就是对于那些非教徒的俄罗斯人而言，谢尔吉的名字也已经成为一个民族认同的符号，在对他的崇拜中，所包含的不只是对各种神迹的渴望，还有其对俄罗斯国家历史的追忆和崇高精神道德境界的向往。

【Abstract】 As one of the three branches of Christian, the Orthodox is also the main religion for Russians. In the practice of Orthodox faith, worship of saints has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part since ancient times. Laduonier Serigius Lavrain Sergiev(1314-1392) was a famous religious figure in Rus in the 14th century, who was also one of the most favorites for numerous Eastern Orthodox Christians. Even today in the 21st Century, St. Sergiev still has similar influences in the eyes of Russians. The reasons mainly include the following five aspects: Sergiev's own lofty practice and moral quality; Sergiev's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national unity and liberation of Rus; Trinity-Sergius Lavra in Sergiev Posad is shrine of Russian nation and its religion; Sergiev's "political role" as patron for Russian secular regime; and Russian Orthodox believers' utilitarian psychology

towards disciples. It is just promoted by these factors that Laduonier Serigius Lavrain Sergiev could stand the test of history and still have great influences among most Russian Orthodox believers.

【Key words】 The Russian Orthodox, Worship of Saints in Russia, Worship of Sergiev

【 Аннотация 】 Православие является одной из трёх ветвей Христианства и основной религией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В практике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веры поклонение Святым издревле занимает очень важное место. Сергей Радонежский (1314-1392) является известным религиозным деятелем четырнадцатого века на Руси и одним из святых, которому поклоняется большинство православных верующих. В XXI веке влияние Сергия в сознании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не убывает. Причина этому скрывается в основном в следующих пяти аспектах: высокие духовные и нравственные качества Сергия; важный вклад Сергия в дел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единства и освобождения; основание Сергием Свято-Троицкого монастыря — российской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и религиозной святыни; Преподобный Сергей обладал «политическим статусом» покровителя светского режима в России; а также утилитарная психология русских православных верующих в отношении к Святым. Именно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е со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данных факторов привело к тому, что Сергей Радонежский выдержал испытание истории и до сих пор оказывает больш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сознание большинства русских православных.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Русское Православие, поклонение Святым в России, поклонение Сергию

(责任编辑 阎德学)

比较经济研究**多维视野下的中俄、中澳资源合作比较研究***

杨佩桦 侯敏跃**

【内容提要】中国与俄罗斯和澳大利亚的能源、矿产资源合作已成为我国与两国经济关系乃至整体关系的支柱。近年来,中国与俄、澳两国在能矿资源领域的合作不断拓宽,在石油、天然气、煤炭、核能、铁矿、电力、可再生能源、能源勘探、能源开发、能源精加工等领域的合作深入发展。从合作条件、状况、问题与前景四方面对中俄、中澳资源合作进行比较研究,旨在汲取其中的经验教训,以期对指导我国的对外资源合作、保障我国资源稳定供应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有所裨益。地理位置毗邻以及互补的资源供需结构、资源禀赋、经济结构和战略,共同构成中俄、中澳资源合作的动因和条件,中俄、中澳资源合作虽然存在差异和各自的问题,但中俄、中澳资源合作的继续拓展和深化前景可期。

【关键词】中俄能源合作 中澳资源合作 中俄、中澳资源合作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D815**【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5) 04-0133(39)

中国与俄罗斯和澳大利亚的能源、矿产资源合作已成为我国与两国经济关系乃至整体关系的支柱。近年来,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与俄、澳两国在能矿资源领域的合作不断拓宽,在石油、天然气、煤炭、核能、铁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俄与中澳(大利亚)资源合作模式的比较研究”(项目批准号:11JJDGJW006)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意见,文章的不足由作者负责。

** 杨佩桦,华东师大外语学院讲师;侯敏跃,华东师大外语学院教授、华东师大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副主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矿、电力、可再生能源、能源勘探、能源开发、能源精加工等领域的合作也在深入发展。对中俄、中澳资源合作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其利弊得失、汲取其经验教训，对指导我国的对外资源合作、保障我国资源稳定供应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一、中俄、中澳资源合作动因与条件比较

（一）互补的资源供需结构

1949至2012年中国一次能源生产与消费详见图1。图1揭示，自新中国成立到1990年代初，我国能源生产基本能满足国内能源消费需求，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粗放的发展方式，自1992年起，我国每年的能源消费量开始超过能源生产量，1993年首次成为石油净进口国。进入21世纪后，能源消费更是增长迅猛，过去十年间，能源消费量翻了一番多。2009年，我国首度成为煤炭净进口国。2010年，中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为24.32亿吨油当量，占世界能源消费总量的20.3%，较之2009年增长了11.2%^①，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一次能源消费最多的国家。中国目前所处的重工业化时期、持续加速的城市化进程与巨大的人口数量、中国作为世界制造基地的地位，共同促使中国的能源生产与消费不断快速增长。当国内能源产量满足不了能源消费需求时，中国就不得不将目光投向国外。

俄罗斯地大物博，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在主要自然资源方面能自给自足的大国之一，也是全球重要的能源生产与出口大国。俄极低的人口密度也为其资源输出提供了条件，其生产的逾7成石油、约3成天然气和约4成煤炭用于出口。

澳大利亚拥有丰富的能矿资源、先进的能矿勘探开采技术、强大的能矿生产能力以及较少的人口。这就意味着其能矿产量远大于消费量，能有大量多余的能矿产品可供出口，且其出口量逐年递增。

中国能矿资源供不应求与俄、澳资源供大于求的这一互补的状况构筑了中俄、中澳资源合作的供需背景与合作内驱力。

^① BP,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June 2011*, London: BP, 2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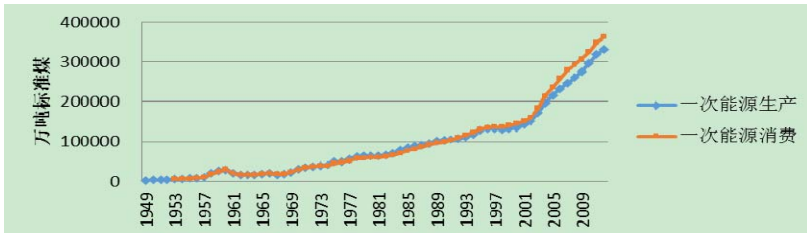


图 1 中国一次能源生产与消费（1949~2012）

数据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所供数据整理绘制而成。

（二）互补的资源禀赋

比较中、俄、澳三国的资源禀赋，可看出中俄、中澳之间的互补性。

表 1 中、俄、澳资源禀赋比较（截至 2013 年末）

	中国			俄罗斯			澳大利亚		
	世界排名	储量	储采比	世界排名	储量	储采比	世界排名	储量	储采比
石油（亿吨）	14	25.0	11.9	8	127.0	23.6	29	4.0	26.1
天然气（万亿立方米）	13	3.3	28.0	2	31.3	51.7	11	3.7	85.8
煤炭（亿吨）	3	1145.0	31.0	2	1570.1	452.0	4	764.0	160.0
铀矿（万吨（可采铀））	10	12.0	—	6	21.7	—	1	117.4	—
铁矿（亿吨）	4	230.0	—	3	250.0	—	1	350.0	—
铜矿（万吨）	6	3000.0	—	6	3000.0	—	2	8700.0	—
铝土矿（亿吨）	7	8.3	—	—	—	—	2	60.0	—

数据来源：石油、天然气、煤炭数据根据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June 2014* 所供数据整理计算所得；铀矿数据根据 *Uranium 2014: Resources, Production and Demand* 所供数据整理所得；铁矿、铜矿、铝土矿数据根据 *Mineral Commodity Summaries 2014* 所供数据整理计算所得。

1. 资源数量和储采比

尽管中国拥有丰沛的能矿资源，但并非所有矿种都储量丰富，即使一些矿种资源量丰富，但一旦计算人均资源拥有量时便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一方面，我国石油、天然气、铁矿、锰矿、铬铁矿、铜矿、铝土矿、钾盐等重要矿产或短缺、或探明储量不足，无法满足国内需求。另一方面，中国巨大的人口数量意味着，即使矿产资源总量丰富，矿产资源的人均拥有量也很少。

例如，我国人均煤炭拥有量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 50%，人均石油、天然气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1/15 左右^①。

而俄、澳的大多数能矿资源无论从数量（包括总量和人均数量）还是从储采比看，都名列世界前茅，具有可持续发展的优势（见表 1）。上表显示，尽管中国是一个能源和矿产资源储量大国，但其资源储采比远低于俄、澳的水平，难以持续满足国内不断攀升的能源消费需求。

2. 矿藏规模

我国的矿产矿床以中、小型矿和坑采矿居多，而大型、超大型矿和露采矿较少。拥有大型、超大型矿床的大多是钨、铝、锑、镍、铅锌、稀土、石墨、菱铁矿等矿产，而一些重要的支柱性矿产，如铁、铜、铝、金、石油、天然气等，却多为中小型。这一因素制约了矿产开发的规模，难以形成较大产量。

相较而言，俄石油储量集中在大型矿床中，天然气储量密集于特大型矿床，铁矿储量集中在大型矿床。澳大利亚有不少矿藏属于大型甚至超大型，如南澳州的奥林匹克坝矿是世界级的矿床。矿藏规模直接影响矿产开发的规模，中国与俄、澳矿藏规模的这一差异，意味着资源开发效率和经济效益的差距。

3. 资源质量

我国多数矿石的品位较低，贫矿多、富矿少，且以成分复杂的共生、伴生矿居多。金矿、钾盐、石油、铅矿、锌矿的质量为中等，而煤炭、铁矿、铜矿、锰矿、铝土矿、硫矿、磷矿的品位很差。我国有 80 多种矿产是共生、伴生矿，以有色金属最为普遍。以上两大特点增加了矿产开采和加工的技术难度以及成本。

事实上，俄原油质量低于中东，其东部地区的煤炭灰分含量高、发热量不高^②，因此质量并非中国自俄进口原油和煤炭的主因。

相比之下，澳多数矿石品位较高。以澳输华数量最多的两种能矿产品铁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国新办）：《中国的能源状况与政策》，北京：中国国新办，2007 年。

② 俄罗斯一般将发热量较高的煤炭出口至欧洲和日本，而把远东地区的中低品位煤炭输往中国和韩国。

矿石和煤炭为例，我国 95%以上的铁矿为贫矿，含铁量 30%左右，而澳铁矿石品位高，含铁量超 60%；我国的煤炭品位较差，而澳黑煤具有灰分低、硫分低、热值高的优点。

4. 资源开采条件

我国大多数铜矿、镍矿和铝土矿都是坑采，可露天开采的矿产较少；煤炭资源的地质开采条件也较差，大部分需井采，只有极少量可露采；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地质条件颇为复杂。

相较而言，俄、澳的资源开采条件较好。仅以煤炭为例，俄远东地区的煤炭储量有约一半可露采，全澳约 79%的黑煤矿藏是露采矿^①。较之井采，露采具有建设速度快、易于开采、劳动生产率高、成本低、劳动条件好、安全性高、矿石回收率高等诸多优点。

5. 资源产区与加工消费区地理分布

我国矿产资源分布不均衡，产区与加工消费区错位。我国部分重要矿产的分布非常集中，而主要的能源消费地区集中在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资源赋存与能源消费地域之间存在较大距离。因而大规模、长距离的北煤南调、西煤东运、西电东送和南磷北调的能源资源流向特征和能源运输格局将长期存在^②。

俄能源矿产在各经济区均有探明储量，但主要集中在毗邻中国的东部地区——西西伯利亚、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其输华油气资源主要采自东西伯利亚及远东沿海地区。

澳各种能矿资源多分布于沿海地区，距离其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区域较近。此外，澳四面环海，非常便于将这些分布于沿海地区的能矿产品从港口输往世界各地，尤其是资源丰沛的西澳州距东亚相对较近，处于向中、日、韩等亚洲重要资源进口经济体输送资源的有利地位。

① Geoscience Australia, *Australia's Identified Mineral Resources 2012*. Canberra: Geoscience Australia, 2013, p.20.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中国国新办）：《中国的能源状况与政策》，北京：中国国新办，2007 年。

（三）资源运输条件

其一，比较中澳两国国内各自的资源运输基础设施。将我国煤炭资源区的煤炭运到消费区，主要依靠铁路、公路、沿海和内河水运，尤以铁路运输为主，煤炭运输占据近一半的全国铁路运力。近几年我国铁路建设速度相对于煤炭产量的增速显得缓慢，导致我国煤炭铁路运力的不足成为制约我国煤炭产量的一个瓶颈。而澳大利亚的港口和铁路运输设施都较为完备，便于能矿产品的运输和出口。

其二，分析俄、澳的对华运输线路。俄大部分煤炭出产地位于远东地区，从地理位置来说对华出口相对便利。我国自澳大利亚进口的能矿产品都经海路运至我国东部沿海的能源消费地区，不必转运。造船和建液化天然气接收站，较建管道的花费少许多，既节省成本，又避免了管道运输可能造成的沿途环境问题、损耗和对管道安全的担忧。此外，经海运进口的澳大利亚能矿产品不经过马六甲海峡，沿途并非海盗经常出没之海域，风险较小^①。除安全因素外，澳较其他如巴西等资源供应大国距离中国更近，这一地缘优势能节省运费、降低中国的进口成本，因此使澳资源出口更具有竞争力。

（四）互补的经济结构

我国与俄、澳在经济结构上存在较强的互补性。中国经过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发展，在耐用消费品和机械制造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被称为“世界工厂”。由于对外贸易的发展，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可用于购买资源品和进行海外投资。俄罗斯是资源出口型国家，可用其资源密集型产品交换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澳大利亚也是资源出口型国家，除能矿产业外，农业和服务业也较发达，并在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技术研发方面具有优势。但其制造业较弱，竞争力不强^②。中俄、中澳在经济结构方面有各自的比较优势，使我国与两国在能矿资源贸易、投资以及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技术合作成为可能。

① 侯敏跃、韩东涛：“中俄、中澳能源合作比较研究——合理性、有效性、可持续性探析”，《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1期，第106-124页。

② 同上。

（五）资源政策条件

1. 中国资源战略与政策变迁

中国的能矿资源战略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 1978 年为首个阶段。受当时国家管制的内向型保护贸易政策影响，这一阶段我国采取的是自给自足的资源战略。这一战略意味着不依赖他国资源，大力勘探与开发本国现有资源。旧中国的石油工业非常薄弱，石油消费基本依靠进口。1959 年 9 月，我国发现大庆油田，并于次年投入开发建设。到 1963 年，我国在石油供应方面终于基本做到自给自足。1964 年起，我国又相继发现山东油田和天津大港油田。到 1965 年，我国的原油和石油产品全部能够自给。至此，我国的能源供应实现了自给自足。然而这一时期资源战略的缺陷亦逐渐显现。自给自足的资源战略需不断开源，片面强调经济发展的后果是国内现有能矿资源难以可持续发展，环境持续恶化。

第二阶段是自国家决定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 1978 年至 2000 年。其时，我国的对外贸易政策采取的是开放型的适度保护贸易政策。该阶段我国的资源战略也需作出相应调整。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中国石油需求量不断攀升，国内石油生产的增长速度开始滞后于石油消费的增速。1993 年，我国成为成品油净进口国；1996 年，又变为原油净进口国。此外，仅以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为例，中国这三种能源资源的储采比均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难以维持长远发展。这时我国的能源战略开始向综合能源效率战略过渡，同时也扩大了能矿资源勘探开发的对外开放及合作。1982 年起，我国将石油工业对外开放，开始利用海外资金与技术来合作勘查开发我国油气资源，大大增加了资源产量。此外，我国于 1999 年 8 月颁布的《关于当前进一步鼓励外商投资的意见》明确表示，会加大对外商投资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鼓励外商投资企业技术创新、扩大国内采购^①。

第三阶段是从 2000 年迄今，我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实行的是与国际接轨的管理贸易政策。尤其是 2001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开始从有限范围内的开放转变为全方位的开放。2000 年以来，我国日益需要从国外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中国国新办）：《中国的能源状况与政策》，北京：中国国新办，2003 年，第 9 页。

进口能源与矿产资源，以解决国内的资源供需矛盾，降低能矿生产成本和提高能矿生产效率。因此，现阶段我国奉行的是能源与经济协调发展以及立足国内资源与拓展国际合作并举的战略。这一战略在一些政策文件中均有阐述。2003年12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我国首部矿产资源政策的白皮书——《中国的矿产资源政策》。白皮书指出：中国将主要依靠开发本国的矿产资源来发展经济，同时也将扩大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的对外开放与合作；中国高度重视环境保护以及矿产资源的合理利用与可持续发展。2006年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十一五”规划纲要》，以及2007年12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的能源状况与政策》白皮书，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的能源发展战略。其基本内容是：“坚持节约优先、立足国内、多元发展、依靠科技、保护环境、加强国际互利合作，努力构筑稳定、经济、清洁、安全的能源供应体系，以能源的可持续发展支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①。其中“加强国际互利合作”就是指能源发展应从仅仅依赖国内资源的自给自足转变为国际化战略，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在能源领域与国际能源组织和世界各国通力合作，以达到互利共赢的目的。2012年10月国务院新闻办新发布的《中国的能源政策（2012）》延续了该能源政策和目标。2014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再次重申了“立足国内战略”与“拓展能源国际合作”的政策取向，即：将国内供应作为保障能源安全的主渠道，牢牢掌握能源安全主动权；同时加强国际能源双边、多边合作，坚持投资和贸易并举、陆海通道并举，加强俄罗斯中亚、中东、非洲、美洲和亚太五大重点能源合作区域建设，在开放格局中维护能源安全^②。俄罗斯和澳大利亚正位于我国重点能源合作区域内。

2. 俄罗斯资源战略与政策变迁

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的苏联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政策，能源工业便由此快速发展。丰饶的资源外加迅速发展的能源工业，使得苏联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国新办）：《中国的能源状况与政策》，北京：中国国新办，2007年，第9页。

② 国务院办公厅：《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4-11/19/content_9222.htm

完全可以实行自给自足的能源战略，并有盈余的油气资源供出口创汇。然而，过度强调自给自足和粗放地大规模开发本国资源，引起资源储量下降、开采条件恶化、开采成本上升等问题，从而导致其油气产量增速放缓乃至减少，进而打击国民经济。1991年苏联的解体更令其能源产业雪上加霜。

俄罗斯的国土尽管较苏联时期缩小了不少，但仍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步入90年代后，俄能源经济逐渐融入全球能源体系。1992年9月、1995年5月和1995年10月，俄联邦政府相继颁布了《俄罗斯在新经济条件下能源政策基本构想》^①、《2010年前俄罗斯联邦能源政策主要方向》及《俄罗斯能源战略基本原则》，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增加能源储备、确保国民获得可靠的能源供应。可惜的是，由于其市场经济改革并不彻底，上述政策制定的目标大多未能达成。

进入普京领导时期，为适应新世纪国内外的新形势，俄联邦政府于2003年8月批准了首个较为完整的国家能源战略——《2020年前俄罗斯能源战略》。横跨欧亚大陆的俄罗斯，其能源开发历来是重西部、轻东部，其东西伯利亚与远东地区巨大的油气资源潜力未得到充分利用。该战略提出要努力实现能源销售市场多元化，使出口到亚太地区的石油份额从当时的3%提升至30%，天然气的份额则增加到15%。2009年，俄政府批准了《2030年前能源战略》。该战略的目标是：完全融入世界能源市场并最大限度地有效利用俄罗斯的资源潜力，巩固其在国际能源市场上的地位，使国家经济从中获取最大收益。其在维护全球能源安全方面的国家能源政策的基本方针是：保持与能源传统消费国的稳定关系，同时与新兴能源市场建立稳固的合作关系，而其新兴能源市场正是亚太能源市场。俄明确指出，要把开发远东和东西伯利亚能源资源作为未来能源国际开发之重点，使其成为面向中国、日本、韩国、印度等亚太市场的战略基地，从而实现其能源出口多元化的战略目标。根据该战略的预测，其西西伯利亚地区（秋明州）的石油产量到2030年将在2008年基础上减少8%，而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萨哈林州）的石油产量至2030年将在2008年基础上分别增加10倍和2倍多；从比重看，西西伯利亚地区石油产量的全国占比将从2008年的65%降至2030年的55%，而

^① 该构想是俄独立后首份较为系统的能源政策文件。

东西伯利亚地区石油产量的占比则从基本为 0 升至 13%，成为第二大产油带。另据预测，俄西西伯利亚北部的纳德姆-普尔-塔兹（Nadym-Pur-Taz）天然气产量到 2030 年将跌至 40%，而亚马尔半岛地区和巴伦支海的什托克曼（Shtokman）气田的比重将分别增至 30%和 5%^①。2014 年，俄颁布了《2035 年以前俄罗斯的能源战略》，提出要把输出到亚太地区的能源比重提高到 28%，其中石油和石化产品增长到 23%，原油增加至 32%，天然气提升到 31%^②。

俄转而实施“东方战略”，即面向东方的能源战略，积极开拓亚太地区（尤其是东北亚的中、日、韩）的能源市场，对俄而言，其益处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鉴于俄西部严峻的安全环境、欧洲国家进口多元化的战略转变，以及欧美日对俄实施的制裁，发展亚太能源市场有利于俄摆脱对传统的欧盟市场的过分依赖，增加油气资源出口渠道，适当抵消制裁对俄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保障俄能源出口安全。其二，拓展资源饥渴且对外依存度极高的亚太市场，有助于俄搭上亚太地区经济高速发展的顺风车，扩大资源出口数量，实现自身经济乃至政治利益。其三，开拓亚太市场有利于俄开发其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资源，带动上述地区的经济发展，促使其资源型经济在国内各地区得到均衡发展。对中国而言，其益处在于：首先，为我国资源进口多元化战略增加了一个近邻供应国。其次，俄管道气进入中国市场有利于我国增加同他国（包括澳大利亚）天然气合同谈判时的筹码，并使亚洲天然气消费国有望摆脱液化天然气高昂的溢价。最后，通过向韩国扩建管道，我国由单纯的天然气进口国转变为天然气中转国，有助于我国加强天然气基础设施建设。

鉴于日本正对俄实施制裁，韩国的资源需求与版图辽阔的中国不可同日而语，因此，中国作为亚太市场的重要一员，自然成为俄“东方战略”的重要合作对象。俄能源外交重心的东移与我国“立足国内”和“拓展能源国际合作”的战略，为两国扩大资源合作创造了战略上的有利条件。为贯彻俄罗

① 本村真澄：“俄罗斯 2030 年前能源战略——实现的可能性和不确定性”，《俄罗斯研究》，2010 年第 3 期，第 53-80 页。

② 余家豪：“俄罗斯的亚洲能源战略”，<http://news.bjx.com.cn/html/20150122/583899.shtml>

斯“面向东方”的能源战略，中俄双方于 2009 年正式批准了《中国东北地区同俄罗斯远东及东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规划纲要》。同年年末，时任总理的普京批准了俄《2025 年前远东和贝加尔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俄自 2011 年起通过“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石油管道”一期的支线“斯科沃罗季诺-漠河石油管道”，开始对华输油，年供应规模 1500 万吨。待“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石油管道”二期完工后，俄出口至亚洲的石油在其石油总输出中的比例将进一步大幅提高。除石油贸易外，2014 年 11 月，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总统普京的共同见证下，两国石油天然气公司签订了《关于万科油田项目合作的框架协议》，中石油获得俄开发中的万科油田 10% 的股权，进入俄石油的上游开发领域。

在天然气合作领域，历经十余年的谈判，2014 年 5 月，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与俄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签订了《中俄东线供气购销合同》，约定俄自 2018 年起通过中俄天然气管道东线，从俄远东萨哈林地区恰扬金气田与科维克金气田向中国东北供气，年输气 50 亿立方米，且逐年提升并最终达 380 亿立方米，合同期限为 30 年。同年 10 月，中俄政府签署了经东线对华输气的最终协议。2015 年 5 月，俄总统普京批准了该协议。另一方面，2014 年 11 月，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签署了《关于通过中俄西线管道自俄罗斯联邦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供应天然气领域合作的备忘录》及《关于沿西线管道从俄罗斯向中国供应天然气的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俄将从其阿尔泰共和国把西西伯利亚气田生产的天然气输至中国新疆，年供气 300 亿立方米，未来可提升至 1000 亿立方米，合同期为 30 年。俄计划在 2015 年完成签署通过西线对华供气的政府间协议。至此，中俄双方已敲定从俄输气的东线、西线两条线路，俄今后每年对华输送共 680 亿立方的天然气。

3. 澳大利亚资源战略与政策变迁

澳大利亚资源战略与政策的一大主题是资源安全，其资源安全战略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①。第一阶段自 1960 年代至 1980 年代初，澳实行的是

^① James L. Hay, “Challenges to Liberalism: the Case of Australian Energy Policy”, *Resources Policy*, 2009, No.34, pp.142-149.

国家主义资源安全战略。该战略倡导优先开发和利用本土的能源及替代能源，降低对于进口能源的依赖度，通过独立发展与自给自足来避免其经济受国际能源价格涨跌之影响，维护自身资源安全。1973 年以后的数届政府认为有必要对澳能矿资源的出口进行控制，以确保国家利益^①。在此期间，澳政府主要通过充分利用本国资源、调控资源价格、限制他国投资等具体政策措施，加快本土工业化进程、限制能矿资源的出口，减少其经济对资源品出口之依赖。

随着 1980 年代能源价格、欧佩克对石油价格影响力双双下降，以及 1983 年起澳大范围解除原先的经济管制使经济趋于自由化，澳政府认为，资源开发者的商业利益并不违背澳国家利益，资源安全与国际资源市场的关系相辅相成，且资源供应的多元化有助于减少资源供应中断的风险、确保资源供应的安全。政府应根据市场需求开发能源，无论国内抑或国外的资源消费者，其竞争都应在一个自由的市场环境中进行。因此，1980 年代初到 21 世纪初的第二阶段，澳奉行的是有所放松的自由主义资源安全战略。为贯彻这一战略而采取的政策措施包括：允许资源开发商自由经营，将资源基础设施私有化，施行多边主义的贸易政策，解除能矿业投资限制，宣传开放国内外市场以维护资源安全的理念等。自由主义能源安全战略的实施极大促进了这一时期澳能矿产品的输出。

然而，自由主义资源安全战略在 21 世纪初至今的第三阶段开始受到挑战。2009 年，澳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表示，外资对澳重要矿业公司的投资比例将被限制在 15% 以内，对澳中小型或新矿业项目的投资比例也要低于 50%^②。当年对中澳两国关系造成极大冲击的一个事件就是，2009 年 6 月，力拓董事会在澳国内一片反对声中撤销了四个月前中国铝业以 195 亿美元增资力拓的交易推荐，转而与同为澳矿业巨头的必和必拓就合资经营西澳铁矿石生产项目签订了非约束性协议^③。中铝注资力拓败北的诸多原因之一，

① Richard H. Snape, Lisa Gropp and Tas Luttrell, *Australian Trade Policy 1965-1997: A Documentary History*, St Leonards: Allen & Unwin, 1998, p.204.

② 彼得·史密斯：“澳大利亚：外国投资者持股比例不宜超过 15%”，<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28939/?print=y>

③ 陈玉明：“中铝与力拓 195 亿美元交易夭折 力拓将付分手费”，2009 年 6 月 5 日，<http://finance.sina.com.cn/g/20090605/12596310244.shtml>

就是澳大利亚对于自身资源安全的考虑。此外，大幅上涨的资源价格以及持续缩减的资源储量也迫使澳大利亚通过政府干预以维护本国资源安全。

除资源安全外，澳资源战略与政策的另一主题，是其资源经济的可持续发展。2004年6月，霍华德政府发布了澳能源白皮书——《确保澳大利亚能源未来》，提出了提高能效、利用可再生能源、开发新技术以减少低排放能源的生产成本等政策^①。能源白皮书之后，澳政府还制定了其他一系列有关能源的政策和法案，如“亚太地区清洁发展与气候伙伴关系”（2006年）、《2007年国家温室气体与能源报告法案》（2007年）、《澳大利亚气候变化政策》（2007年）等。2008年12月，澳政府又颁布了气候变化白皮书《碳污染减排方案：澳大利亚的低污染未来》，提出了澳大利亚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中期和长期目标。其中，中期目标是到202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0年的基础上减少5%至15%，长期目标则是到205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0年的基础上降低60%^②。

2012年11月，澳新版能源白皮书《能源白皮书2012——澳大利亚能源转型》发布。新版白皮书规划了澳向更清洁高效的能源经济模式转变的政策框架，力图构建一个安全、灵活、高效的能源体系，以达到下述三大目标：其一，为全体澳大利亚人民提供稳定、可靠和价格合理的能源；其二，挖掘澳能源出口增长的潜力；其三，开发利用清洁、可持续的能源^③。显然，澳政府决心致力于维持澳大利亚资源出口大国的地位，提高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技术以保护环境。

然而，澳政府的减排决心在实施碳税问题上受到了考验。2011年11月，澳工党以微弱优势使参议院通过了持续争论四年的碳税法。根据碳税法，碳排放税将分两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的实施期限为2012年7月1日至2015年7月1日，对全国500家最大的碳排放企业强制征税。第二阶段是自2015年7月1日起，转向碳排放交易机制，与国际碳交易市场挂钩，价格根据市

① Department of the Prime Minister and Cabinet (DPMC), *Securing Australia's Energy Future*, Canberra: DPMC, 2004, p.17.

② Attorney General's Department (AGD), *Carbon Pollution Reduction Scheme: Australia's Low Pollution Future (White Paper)*, Canberra: AGD, 2008, pp.4-8.

③ Department of Resources, Energy and Tourism (DRET), *Energy White Paper 2012: Australia's Energy Transformation*, Canberra: DRET, 2012, p.xvii.

场情况自由浮动。澳政府的目标是，到 2020 年，碳排放较 2000 年下降 5%，到 2050 年更要减少 80%。虽然该法案已正式成为法律，但仍受到澳反对党、碳排放企业和相当一部分民众的强烈反对，理由有三：首先，征收碳税将增加澳能矿企业成本，减少其利润空间，降低澳能矿企业竞争力。而由于能矿产业是澳经济的支柱，因此最终会打击澳经济。其次，征收碳税还会打压国际投资者的热情，使他们对投资澳能矿产业倍加谨慎。再次，征税企业为保持利润将不得不把负担转嫁给消费者，进而影响民众生活。碳税的开征显示了当时的澳工党政府对减缓气候变化的决心，以及对能源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视。但是，果不其然，随着碳税自 2012-2013 财年正式开征，受碳税重压的资源企业纷纷将上升的成本转嫁到产品价格中，抬高了澳民众的生活成本，引起诸多不满。自由党—国家党联盟领袖托尼·阿博特借助这一情势胜选澳总理后，尽管面临工党和绿党的重重障碍，废除碳税立法仍于 2014 年 7 月以微弱优势在澳参议院获得通过，执行了才两年的碳税法被正式废除。

事实上，除资源战略外，澳大利亚多年来制定的外交战略也突出了其对“融入亚洲”的重视，认为澳应为全球尤其是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稳定可靠的资源供应，继续参与国际双边及多边资源合作，特别是更有效地同中国和印度进行合作。澳“融入亚洲”的战略与中国“立足国内”和“拓展能源国际合作”的战略，为双方深化资源合作提供了战略上的保障。

综上所述，中国资源供不应求与俄、澳资源供大于求这一互补的供需结构，构成了中俄、中澳资源贸易和投资合作的动因；中俄、中澳互补的资源禀赋构成了中俄、中澳资源合作的禀赋基础；中、俄、澳的地理位置构成了中俄、中澳资源合作的运输条件；中国用劳动密集型产品交换俄、澳的资源密集型产品，这一互补的结构构成了中俄、中澳资源合作的经济条件；出于资源安全考虑的中国资源进口多元化战略与俄、澳资源出口多样化战略恰好互补，中、俄、澳三国资源战略目标都由传统的强调资源的产、供、需向资源、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转变，这些都奠定了中俄、中澳在资源贸易、投资、技术领域进行合作的政策基础。

二、资源合作状况比较

中国与俄、澳互补的供需结构和资源禀赋决定了中俄、中澳资源合作的模式大体呈现单向性。从能矿产品贸易方面看，除原油是中澳彼此互有进口，绝大多数资源品是中国自俄、澳进口。从投资角度看，基本都是中国企业投资于俄、澳矿业。尽管俄、澳同为中国重要的资源合作伙伴，但因俄、澳两国在资源结构、管理制度、产销方式、地缘位置等方面存在差异，中俄、中澳的资源合作领域和结构不尽相同。比较中俄、中澳历年来在能矿资源各领域的合作实践，可以发现，中澳资源合作开始得更早，且其现实路径模式无论是广度抑或是深度都更为成熟。

中俄资源合作领域以能源为主，包括石油、天然气、煤炭等，合作重点是油气，尤其是石油，合作结构比较单一。以中俄贸易金额衡量，1995年石油占比为66.61%；1997-2008年间，石油占中俄能源合作总额的比重始终在95%以上，最高达2008年的99.82%；2009-2012年，中俄煤炭资源合作发展迅速，石油占比下降到9成左右^①。

相比较而言，中澳资源合作领域更宽，涉及的资源从铁矿、铜矿、铝土矿等矿产品逐渐扩展到煤炭、石油等能源产品，再到液化天然气、铀矿等清洁能源领域，乃至可再生能源领域。

（一）合作领域、方式与内容

中俄、中澳资源合作方式均趋于多样化，包括资源贸易、矿业投资、合作开发、能源技术合作等。中俄、中澳在石油、煤炭、天然气、核能、铁矿等领域都有合作，然而合作形式与内容有所不同。

1、石油

在石油领域，中俄、中澳均有相关合作，但石油合作是中俄能源合作的主体领域，且合作形式较为多样，如石油贸易（包括原油和成品油，且俄对中国为净出口）、输油管道建设、油田合作开发及合资炼油、“贷款换石油”等。1970年代前我国石油基本自给自足，自1990年代起自俄进口石油。根

^①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库（<http://unctadstat.unctad.org>）所供数据整理并计算所得。

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近年来，俄输华石油呈快速增长态势，截至 2012 年末，中俄石油贸易增至 226 亿美元，俄对华出口量为 2430 万吨，较之 2011 年增长 4.2%，占俄石油出口总量的 7.92%和中国石油进口总量的 8.57%，俄罗斯与中国成为彼此的第三大石油贸易伙伴。在输油管道建设方面，两国一直将其视为彼此石油资源合作的重点方向之一，但发展历程较为曲折。早在 1990 年代，两国就着手对管道建设领域的合作事宜进行磋商。但时隔二十年后的 2010 年 12 月，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石油管道中国支线才全线贯通，这条输油管道每年向中国供应原油 1500 万吨。该输油管道增强了中俄能源合作，促进了亚太地区稳定可靠的能源市场的形成，推进了俄能源出口的多元化进程。在油气合作开发项目上，中俄两国的能源企业一直在积极谋划石油行业的下游领域合作。近几年有代表性的合作项目有：2005 年 7 月，俄罗斯石油公司与中石化签署了有关建立合资企业共同参与俄远东“萨哈林-3 号”项目中维宁油气田开发的协议；2006 年 3 月，中石油集团与俄罗斯石油公司宣布在 2006 年底前组建合资公司，经营上游业务；2006 年 8 月，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完成了对俄罗斯乌德穆尔特石油公司的收购，总交易额为 35 亿美元；2006 年 7 月，中石油购买俄罗斯石油公司的股份。随着中国企业参与到俄油气开发的上游阶段，中俄石油贸易方式也从单纯的“贸易油”拓展到“分成油”。“贷款换石油”等方面。在 2008 年末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国际原油市场量价双双暴跌，俄能源企业资金匮乏，中国利用这一契机，凭借自身庞大的外汇储备，于 2009 年 4 月与俄罗斯签订了价值 250 亿美元的“贷款换石油”协议，中国分别向俄管线巨头俄罗斯石油运输公司（Transneft）和国有石油企业俄罗斯石油公司（Rosneft）提供 100 亿和 150 亿美元贷款，作为交换，俄需在逾 20 年内向华输送 3 亿吨石油。2013 年 3 月，中俄再次签订“贷款换石油”协议，俄石油公司将把每年对华原油供应量提高一倍至 3100 万吨，俄石油公司则将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获得 20 亿美元贷款。^①。

由于澳石油资源并不丰富，因此石油合作在中澳资源合作中所占份额很

^① 新华网：“再签‘贷款换石油’俄对华原油出口将翻番”，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3-03/25/c_124497845.htm

小，合作形式也停留在单一的石油贸易上，主要包括原油贸易及液化石油气贸易。中、澳原油资源都无法满足本国消费需求，都需从国外进口，由于中澳地理位置临近，以及原油品种与炼油厂匹配等因素，两国间的原油贸易互有进出口，呈现双向性，但澳对华是净出口。而液化石油气方面则是中国自澳进口。2010—2011 年度，中国从澳进口液化石油气 2.56 亿升，是仅次于日本的澳第二大液化石油气出口目的国。

2、煤炭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煤炭生产国、消费国和进口国；俄、澳则是世界主要煤炭生产国和出口国^①。加上前文所述的合作动因与条件，故而煤炭合作也是中俄、中澳资源合作的重点领域之一。中俄煤炭合作方式主要有煤炭贸易与煤炭合作开发。在煤炭贸易方面，中俄煤炭合作表现为俄对华输出。尤其是近几年，俄输华煤炭呈较快增长趋势。2012 年俄煤炭出口第一目的国是中国，出口额达 20.8 亿美元，出口量逾 1800 万吨，占俄煤炭出口总量的 15.23%。在煤炭合作开发方面，鉴于中俄煤炭通道的运输能力是影响双方煤炭贸易的重要因素，因此中俄双方在修建铁路、公路等煤炭运输通道、购买矿产挖掘设备等方面积极进行磋商。2012 年 12 月，《中俄煤炭领域合作路线图》出台，有力地推动了中俄煤炭项目合作开发的进程。根据路线图，卡拉坎投资公司（Karakan Invest）将与中煤矿山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开发位于克麦罗沃州别洛夫区的卡拉坎煤矿，中煤集团和神华集团将与耶弗拉兹集团（Evraz）和俄罗斯燃料工业公司一起参与开发俄两个大型煤矿，神华集团与 En+ 集团共同开发俄东部地区的煤炭资源。

较之中俄煤炭合作，中澳煤炭合作方式更为多样，除煤炭贸易与合作开发，还包括中国对澳煤业的投资及两国煤炭领域的技术合作。在煤炭贸易方面，中国从澳输入煤炭数量整体呈上升趋势。数据显示，中澳煤炭贸易量高于中俄煤炭贸易量。2014 年中国输入煤炭总量 2.91 亿吨，前四大煤炭进口来源国分别为印度尼西亚（进口量 1.06 亿吨，占比 36.5%）、澳大利亚（9450 万吨，占比 32.5%）、俄罗斯（2539 万吨，占比 8.7%）和蒙古（1927 万吨，

^① 其中澳大利亚是全球最大煤炭出口国。

占比 6.6%)^①。在投资方面，澳丰富优质的煤炭资源、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以及健全的法律制度，对中国企业投资澳煤业构成吸引力。中企投资澳煤业成功的案例主要有：兖州煤业出资 32 亿美元并购澳菲利克斯矿企、华能集团收购麦卡瑟煤炭公司在蒙托电煤工程中所拥有股权的一半、兖州煤业澳洲子公司兖煤澳洲公司与澳大利亚格罗斯特煤炭有限公司合并、重庆煤炭集团与脉冲能源公司（Pulse Energy）合资建造和运营四个电厂等。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煤电企业赴澳进行煤炭资源的勘探、开发和利用，中澳煤炭投资领域的合作形式也变得越来越灵活多样，无论是独资、合资，还是并购、参股，中澳两国在煤炭领域进行着卓有成效的合作。在煤炭领域技术合作方面，中国在设备制造和澳大利亚在能源技术^②方面的优势互补，双方在能矿资源领域长期以来良好的贸易合作奠定了两国间能源技术合作的基础。多年来，中澳两国在煤炭领域展开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技术合作，其中以下五个合作项目尤其令人瞩目：中国重庆煤炭集团与澳脉冲能源共建清洁煤电厂、华能集团与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关于燃烧后碳捕集技术的合作、林克能源在华技术合作项目、中海油与澳阿尔托纳资源共同投资煤制油项目、兖州煤业与美国博地能源在澳技术合作。总体而言，中澳煤炭技术合作的主要形式，是双方企业在中国或澳大利亚共建电厂或合资企业，由中国制造电站设备，澳大利亚提供先进技术。

3、天然气

中国目前的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仍然以煤炭为主，根据中国未来的能源发展战略以及环境方面的要求，提高天然气在中国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是发展趋势。目前，中国主要的天然气进口国为土库曼斯坦、卡塔尔、澳大利亚以及印度尼西亚等。过去二十年，关于中俄天然气领域的合作，进展非常缓慢，双方谈判主要聚焦于天然气管道建设和天然气价格方面。相比之下，中澳天然气合作，尤其是在液化天然气方面的合作成效显著。2009 年中亚管道天然气开始输入中国之前，中国进口的天然气是液化天然气。有一定规

① 中国经济新闻网，“2014 年印尼为中国煤炭最大进口国”，<http://www.cet.com.cn/nypd/yw/1468795.shtml>

② 包括集成干燥气化联合循环发电技术、燃烧低浓度煤层气产生清洁能源的技术、燃烧后碳捕集技术、煤炭地下气化技术、气液转换技术、间接煤制油技术等。

模的进口始于 2006 年 5 月澳首船液化天然气抵达广东大鹏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①。自此，中澳液化天然气贸易大幅提升。在 2006-2013 年的 8 年间，澳方累计向中国供应廉价液化天然气 324.7 亿立方米，占该时间段内中国进口液化天然气总量的 35.8%。

中澳液化天然气合作，不仅限于双方的贸易合作，还在于双方在天然气产业诸多相关方面的合作，中澳在该领域的合作堪称两国资源合作模式多元化的绝佳范例。双方签署的液化天然气合作协议不仅仅是简单的贸易合同，还包含中方上游参股、“中澳天然气技术伙伴关系基金”等合作方式，内容包括天然气的液化处理、造船、运输、再气化、配送、工程设计和采购等各环节，是涉及液化天然气全产业链的全方位、多层次的合作。

4、核能

中俄核能合作主要体现在核电站建设、核燃料供应、科技交流、人员培训等多方面，其中标志性的合作成果落在江苏田湾核电站。作为全球重要的铀矿生产国，澳大利亚并不消费本国生产的铀，只进口少量低浓缩铀，用于核科学与技术组织的澳宝研究反应堆。加上澳实行无核化政策，故其核原料全部用于出口。因此，中澳核能领域的合作主要表现为铀矿贸易和中国对澳铀矿的投资。由于铀矿的特殊性，我们暂时无法获得大量澳铀矿出口市场的具体情况。但从 2008 年澳铀矿出口市场的情况可以看出：当年，中国大陆是澳第六大铀出口市场。在中国企业对澳铀矿投资上，中澳企业合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如中钢集团与皮皮尼矿业公司（PepinNini Minerals，简称“PNN 公司”）签署合资企业协议，同时注册成立中钢南澳铀矿公司和中钢 PNN 管理公司，共同开发多种铀矿项目；中广核铀业发展有限公司收购了澳能源金属公司 66% 的股份，是中国企业首次收购海外铀矿开采公司，也是中国企业在澳大利亚买下的第一座铀矿。

5、其他矿产

除能源领域外，中俄、中澳也在矿产资源方面积极合作。中俄方面，两国合作开发金矿、金刚石矿、锡矿、铅锌矿、铝矾土矿、乌多坎铜矿和伊尔

^① 侯敏跃、韩冬涛：“中俄、中澳能源合作比较研究——合理性、有效性、可持续性探析”，第 106-124 页。

库茨克的钾岩矿；中澳方面，在铁矿石、铜、镍、铝等矿产资源上的合作也是双边资源合作的重点，合作形式主要表现为双方的矿产贸易以及中国对澳矿业的投资。事实上，中澳资源投资合作形式从 1980 年代中后期中澳公司在澳共同组建合资企业起步，已逐步发展到全资收购、控股收购、小额参股、组建合资企业等各种形式。

技术合作方面，中俄尚无系统全面的能源技术合作。相较之下，多种合作机制为中澳合作提供了广阔的平台。中澳能源技术双边合作机制有“中澳能源合作联合工作组”、“中澳能源资源合作双边对话机制”、《中澳贸易与经济框架》、“中澳气候变化伙伴关系”、“中澳煤炭峰会”、“中澳洁净煤技术联合协调小组”（简称“JCG”）、“中澳 JCG 伙伴关系基金”等。具体合作模式则涵盖对能源技术的联合研究、组建合资公司后由一方提供先进的能源技术等。

（二）运输方式

中俄、中澳资源贸易的运输方式各有千秋。澳大利亚输华资源品的运输方式是海洋运输。而我国自俄进口石油的运输方式主要包括以下三种：一是海运，即通过俄罗斯在欧洲和远东地区的港口输往中国。海运的优势在于成本低、运力大；劣势在于航速慢、受气候条件限制。另一种是铁路运输，即：俄西伯利亚安加尔斯克的南苏霍夫—卡雷姆—后贝加尔斯克—中国内蒙古满洲里，俄安加尔斯克的南苏霍夫—纳乌什季边防点—蒙古苏赫巴托尔—中国内蒙古二连浩特，俄格罗杰科沃—中国绥芬河这三条线路。铁路运输的益处是运力大、速度较快、安全性高、受气候限制较小；弊端是运输成本较高、建设费用高且周期长。此外，因中俄两国铁路轨道间距不同，故过境时要进行换装，由此制约了运力的提高。第三种是管道运输（见图 2）。管道运输的优点在于成本较低^①、运量大、耗能少、占地少、安全可靠、受气候影响小、管道建设费用低且周期短；缺点在于灵活性差、运量不足时运输成本显著上升。

① 管道运输成本高于海运，但远低于陆运。



图 2 中俄石油天然气管道路线^①

地缘毗邻是中俄、中澳资源合作的刚性优势。中俄两国地理位置相邻，中澳也同属亚太地区。较之中东和西北非这两大中国资源进口来源地，俄、澳资源丰沛且距离中国较近，其优势在于能缩短资源品运输时间、减少运输成本、降低运输风险。

（三）相互依赖的对称性

中俄、中澳的资源合作有两种可能的合作模式，即单边依赖合作模式或双边相互依赖合作模式。其中，单边依赖合作模式分为两种——需方主导的单边依赖合作模式和供方主导的单边依赖合作模式。对中俄、中澳资源合作而言，需方主导的单边依赖合作模式是指，俄或澳对华资源出口占其资源总出口的比重较大，而自俄或澳资源进口占中国资源总进口的比重较小，从而导致俄或澳对中国的资源消费市场具有依赖性，双边资源合作由中国主导；供方主导的单边依赖合作模式则是指，中国自俄或澳的资源进口占中国资源总进口的比例较高，而俄或澳对华资源出口占俄或澳资源总出口的比例较低，从而导致中国对俄或澳的资源供给具有依赖性，双边资源合作由俄或澳方主导。而双边相互依赖合作模式意为，作为资源消费国的中国与作为资源生产和出口国的俄或澳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不相上下，相互依赖较为对称。下文拟分别对中俄、中澳资源合作中双方相互依赖是否对称作一分析。

现阶段中俄资源合作主要呈现以下两大特点：其一，对称性。近二十年

^① 资料来源：互动百科，<http://www.baik.com/wiki/>

来，中国自俄进口能源在中国能源总进口的占比在震荡中缓慢增长，已从 1995 年的 0.67% 升至 2012 年的 7.95%^①，但比重不大。与此同时，俄对华能源出口额在俄能源总出口中的占比也逐步上升，从 1995 年的 0.1% 增至 2012 年的 6.57%^②，但比例也不高。事实上，俄能源出口主要目的地仍是发达国家，尤其是欧盟地区。在俄欧能源合作中，欧盟对俄能源极为依赖，使俄能够利用自身能源供应的主导地位对欧盟形成一定制约。而中俄能源合作中彼此的依赖较为对称，俄无法利用所谓“能源武器”掣肘中国。其二，稳定性。一方面，中俄两国国内政局和外交关系都比较稳定，且中俄两国互为战略合作伙伴，双方政府在两国能源合作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另一方面，不同于俄欧能源合作，由于中俄地理位置毗邻，能源运输不受邻国因素影响。因此，中俄资源合作属于双边相互依赖合作模式。

现阶段中澳资源合作主要呈现以下两大特点：第一，对称性。从贸易方面看，总体而言，除原油与液化石油气外，中国自澳资源进口在中国资源总进口中占比较大，尤其是氧化铝，中国自澳进口量占进口总量的逾九成，对澳极为依赖；与此同时，澳对华资源出口占澳资源总出口的比重也不小，特别是铁矿石，澳输华铁矿数量占澳铁矿输出总量的比例高达约 70%。然而中澳铁矿石贸易是一例外。由于全球铁矿供应几乎由澳大利亚力拓、必和必拓以及巴西淡水河谷这三大巨头垄断，因此中国在中澳铁矿石贸易中处于劣势地位，使得每年进口大量铁矿的中国，在 21 世纪的最初十余年间，面对三巨头的无理涨价只得屡屡被迫接受。从投资方面看，中国需要投资澳能矿业以锁定更多上游资源，确保资源供应的持久稳定，而澳大利亚也需要中国的资金以获得更大的发展。就深度而言，中澳资源贸易与投资的数量和金额在波动中呈整体上升趋势，两国相互依赖日渐加深、难以分割，尤其在液化天然气领域，双方已形成齿轮型密切结合的关系。得益于资源品贸易在双边贸易中所占的相当大的份额，中国保持着澳大利亚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第一大进口来源地的地位。第二，尽管中铝增资力拓失败为两国关系带来不小的波澜，但中澳资源合作总体比较稳定。一方面，中澳两国国内

①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库 (<http://unctadstat.unctad.org>) 所供数据整理并计算所得。

② 同上。

政局与外交关系均较为稳定，双方政府在彼此的资源合作中也发挥了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中澳同属亚太地区，地缘位置的较为邻近为资源运输提供了诸多便利。鉴于此，中澳资源合作也属于双边相互依赖合作模式，双方彼此需要、互为依赖，关系较为对称。

需要指出的是，煤、油、气在中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对中澳资源合作的影响不同于对中俄能源合作的影响。在中俄能源合作中，油气在中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的占比越高，中国对俄依赖就越深。然而，由于中澳资源合作的范围更广，涉及的能矿资源更多，因此煤油气在中国能源消费结构中比例的变化对中澳资源合作的影响是颇为复杂的，可谓挑战与机遇并存：中国减少煤炭和石油在能源消费结构中占比的努力，虽会对中澳煤炭与原油贸易构成冲击，但会给两国间更为洁净的天然气和铀矿贸易发展带来契机，也会为双方加强清洁煤技术和可再生能源技术领域的合作创造有利条件。

综上，中俄、中澳资源合作皆为比较对称的互相依赖的合作模式，但不同点在于，中澳资源合作比中俄资源合作关系更加紧密、互为依赖程度更深。

（四）合作主体与机制

合作主体与机制牵涉到政府在资源合作中所起的作用。由于俄、澳在资源市场经济体制上有所不同，故而中俄、中澳资源合作机制存在差异。

中俄两国都处在转型期，由于中俄两国市场经济制度不够成熟、国有经济成分占比较大，需要双方领导人或政府更多的参与、支持并协调双边资源乃至经济合作，因此中俄资源合作由两国政府主导并推动。1996年4月俄总统叶利钦访问中国期间，中俄签署了《中俄联合声明》及《两国关于共同开展能源领域合作的协定》等14个双边合作文件，正式揭开了中俄能源合作的大幕。随后几年间，中俄又签署了一系列能源合作协议，包括《从俄联邦东西伯利亚地区铺设天然气管道和开发科维克京斯克凝析油田备忘录》

（1997年11月）、《关于铺设从伊尔库茨克州科维克京斯克气田到中国的输气管道的技术经济依据总协定》（1999年2月）、《俄罗斯统一电力公司与中国国家能源公司签署的电力合作协议》（1999年2月）等。尽管这一时期俄积极主动地要求同中国进行资源合作，但该阶段中国经济发展对能

源的需求尚未达到饥渴的地步，双方能源合作进展不快。

2001年7月，中俄签署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巩固了两国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也促进了双方的经贸合作关系。迈入新世纪，中国石油消耗飙升，俄罗斯则为了减少对欧盟市场的依赖而开始实施“面向东方”的能源出口多元化战略。然而，该时期中俄能源合作却进展缓慢，双方谈判的管道运输线路从“安大线”、“安纳线”到“泰纳线”，一再更改，这反映了俄对国家利益的考量。

中俄能源合作在2006年取得较大进展。该年4月，中俄石油管线计划实施，“泰舍特—斯科沃基诺—大庆”输油管线计划动工。同年，中石油与俄气签署天然气供应备忘录，俄同意从东、西两条线路向中国每年输送680亿立方米天然气。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猛跌的国际油价重创了俄经济。为应对动荡的国际局势，中俄两国政府于该年建立了副总理级能源谈判机制。2009年6月16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与俄总统梅德韦杰夫发表了关于《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10周年的联合声明。如今，中俄能源合作已从单纯的原料进出口贸易关系逐步发展为全方位的投资开发合作伙伴关系，合作领域也从石油、电力贸易及核电站建设扩大至煤炭、发电站建设与可再生能源等领域。

2013年3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访俄，两国首次提出中俄“能源战略合作关系”的概念。访问期间，两国政府就电力、天然气输送、石油勘探、开采、销售和炼油等方面签署了一系列重要协议。在天然气合作方面，经过多年的谈判，中俄双方最终达成备忘录。其中指出，俄罗斯将在30年间，经由东线每年向中国出口天然气380亿立方米。实际上，中俄能源合作的意义不仅限于双边能源和经贸关系，更具有区域乃至全球影响。中俄能源合作已跨入以互利双赢、深化合作的新时期。

除上述双边合作机制外，中、俄两国也在上海合作组织与金砖国家的合作框架下深化彼此的合作。2006年俄总统普京提出在上合组织框架内组建“能源俱乐部”，一则可促进俄罗斯同中亚各国的能源投资合作，二则能进一步开拓中国能源市场。基于资源禀赋的互补性，金砖国家能源合作机制也在不断形成，对俄中资源合作形成推动作用。

中国是世界最大能源消费国且资源自给率较低，俄是世界主要能源生产和出口国，这两大邻国已互为彼此能源战略调整后的重点合作对象。中俄资源合作恰好能巩固双方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政府主导的合作模式下，中俄资源合作机制具有系统性，利于集中商讨两国关心的资源合作问题。

同样，中澳也互为战略伙伴。2006年，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与澳总理霍华德达成共识，建立两国领导人定期互访与会晤机制，及时就双边关系中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2008年，我国外交部长杨洁篪访澳，与澳外长史密斯共同启动首轮中澳战略对话。在2013年前，两国关于资源合作的政府间对话、谈判层级较中俄的低，功能性不够显著，有针对性地解决合作问题的能力较弱。但可喜的是，2013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海南博鳌会见澳总理吉拉德，两国宣布构建相互信任、互利共赢的战略伙伴关系，并建立总理年度定期会晤机制。需要指出的是，此次随吉拉德访华的还有澳外交部长卡尔、贸易部长埃默森和国防部长史密斯，澳对对华关系的愈益重视可见一斑。澳大利亚是世界主要资源生产与出口大国，中国则是全球资源消费与进口大国，加上两国同属亚太地区，使得双方自然而然地成为彼此资源合作的重点对象。两国的经贸合作（包括资源合作）无疑是双方战略伙伴关系的推进器，而双方战略伙伴关系反之亦成为两国经贸合作深入发展的重要保障。

不同的是，澳拥有市场经济制度的优势，故而中澳资源合作呈现政府引导、企业主导的模式，企业才是合作主体，中澳资源合作采用以市场交易为主的方式，由企业自主决定并协商能矿产品的进出口。但是，双方的战略伙伴关系与政府的鼎力支持为两国在能矿资源领域开展深入合作提供了有力保障。首先，中澳两国政府都通过制定积极有效的促进政策，来为企业营造良好的合作环境。我国的资源政策已从改革开放前的自给自足的资源战略转变为能源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并鼓励我国企业“走出去”，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在能源领域与国际能源组织和世界各国通力协作。而澳新版《能源白皮书 2012——澳大利亚能源转型》提出，除为全澳公民提供稳定、可靠和价格合理的能源外，另两大目标就是挖掘澳大利亚能源出口增长的潜力，以及开发利用清洁、可持续的能源。中澳两国的整体资源战

略与政策可谓不谋而合、互补互利。两国针对可再生能源所制定的具体法律法规和发展规划，也为双方在该领域的合作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中国方面的法律和规划有：2006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以下简称《可再生能源法》），围绕《可再生能源法》制定的一系列配套政策（包括：《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和费用分摊管理试行办法》、《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收入调配暂行办法》、《电网企业全额收购可再生能源电量监管办法》、《节能发电调度办法》等），2007年9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2012年8月发布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澳方的法律和规划则包括：《2004年澳大利亚能源市场法案》、《2006年能源效率机会法案》等综合性能源法，以及更有针对性的、为达到《可再生能源目标》而制定的《2000年可再生能源（电力）法案》、《2000年可再生能源（电力）（大规模发电短缺收费）法案》、《2010年可再生能源（电力）（小规模技术短缺收费）法案》、《2001年可再生能源（电力）规章》等。

其次，有些重大项目合作的顺利进行，离不开双方政府的鼓励和参与。1980年代中澳铁矿贸易的发展离不开两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与积极推进。1983至1986年，双方领导人接连互访，每次高层会晤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铁矿贸易与投资。澳联邦政府和西澳州政府也对我国首个液化天然气项目——广东大鹏项目的决策起到了推动的作用。此外，不少项目合作协议的签署有双方政府领导人参加。例如，2003年10月，胡锦涛主席访澳期间，同霍华德总理见证了两国签署《关于中澳天然气技术伙伴关系基金管理执行的谅解备忘录》。2010年6月21日，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澳总理陆克文一同见证了中海油与澳阿尔托纳资源共同投资煤制油项目协议以及《中国国家能源局与澳大利亚资源、能源和旅游部关于加强能源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的签订。

此外，中澳双边合作机制为两国资源合作提供助力。除“中澳高层经济合作对话机制”和“中澳年度战略对话机制”外，专门的双边能源合作机制包括“中澳能源合作联合工作组”、“中澳能源资源合作双边对话机制”、“中澳气候变化伙伴关系”，以及煤炭技术领域的双边合作机制等。较之中俄资源合作机制，中澳资源合作机制类型多样，但比较松散，各机制间有待

加强沟通与协调。

（五）决策与管理机制

俄能源决策机制比较分散，联邦政府、主管部门、地方政府、油气利益集团之间存在利益博弈，因此俄在能源合作谈判、协议签署、合同执行等方面常受多方牵制。中石油被迫退出收购斯拉夫石油公司以及中俄石油天然气管道建设久拖不决，都是受上述因素影响的结果。虽然以上问题短期内难以解决，但双方正努力尝试突破困境，比如“上游换下游”，以股份方式共同组建合资公司等。

相比之下，澳市场经济制度较为发达，在政府层面主要有联邦和州两级政府的决策机制，各级政府负责国家、州或地区产业发展规划和指导原则的制定，为产业进步提供政策支持，对重大投资项目进行审核。但企业的规划、生产、贸易、投资、对外合作等具体运营事务，由企业自行负责，政府不去干预。政府与企业间职责界限明晰，管理机制相对成熟。

三、主要问题与困难比较

（一）“资源诅咒”对俄、澳经济增长的冲击

俄、澳两国经济均倚重资源，资源输出占对外贸易的比重都很大。俄、澳不少学者认为，两国都在遭受“资源诅咒”，即所谓的“荷兰病”；也有学者认为，俄、澳两国并未完全陷入“诅咒”中，但确实对其经济增长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冲击^①。资源型经济对两国造成了以下两大不利影响：

其一，资源依赖型经济引致产业结构不合理。俄、澳资源品出口占各自总出口的比例均高达约7成。尽管俄、澳通过大量的能矿产品出口获得了巨额的外汇收入，资源部门的发展吸引了大量资本与劳动力流入，但却导致其他领域资本和劳动力减少，使得其他出口部门的贸易条件恶化、融资成本高涨、竞争力下降。

^① 侯敏跃、李沛：“资源经济和‘资源诅咒’关系初探——基于俄罗斯和澳大利亚的案例研究”，《世界经济研究》，2013年第11期，第80-86页。

其二，国内经济较大程度上依靠资源业推动，意味着其经济命运取决于资源业的兴衰。资源品在出口中的比重过大，使得俄、澳资源经济发展对资源产品的价格波动非常敏感。国际资源品价格向来具有不确定性。过去数十年间，世界资源产品的价格一直处于震荡中，尤其是能矿产品的价格都有过大幅波动。资源品价格的波动使得俄、澳资源品出口的实际收益随之增加或缩水，令其经济发展较为被动。此外，主要资源出口市场的需求情况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这两个资源出口国经济的发展。另外就澳大利亚而言，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持续十年的对澳矿业投资热潮已开始降温。摩根大通的一份报告预计，澳矿业投资放缓将持续数年之久，矿业投资下滑将加速显现^①。西澳银行（Bankwest）首席经济学家兰福德指出，服务业等部门发展势头不够强劲，难以弥补矿业投资下滑的缺口，从而加大了澳经济未来的不确定性。澳央行也认为，非矿业部门拯救经济的希望很渺茫^②。

由此可见，过分依赖资源型经济这种发展模式的隐忧在于，一旦资源业这根支撑俄、澳经济的擎天大柱开始动摇，消费、服务业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其他经济推动力一时间却难以弥补资源业低迷造成的缺口，俄、澳经济便会面临风险。因此，俄、澳都有经济转型的需要。曾任澳总理的陆克文就曾指出，澳资源繁荣期已近尾声，澳经济走到发展的十字路口，并提出“经济转型将是今后澳大利亚经济政策的核心议题”，同时提出将澳经济发展从当前依赖矿产、能源为主的模式向服务业等领域主导模式转变。

除上述共同点外，俄、澳资源出口的依赖对象有所不同。2014年3月起，欧盟和美国以俄支持乌克兰东部民间武装为由对俄实施了多轮制裁，涉及俄金融、能源、军工等领域，对俄经济发展造成冲击。俄出口市场过度依赖欧盟国家的弊端表现得十分明显。

而澳大利亚则过度依赖中国对其产品的进口，尤其是对其能矿产品的进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增长提速，中国对于澳资源需求愈趋旺盛，澳对华贸易依存度也不断提高。自1972年中澳建交以来，两国经贸合作持续

① 中国金融信息网：“美媒：投资数据凸显澳大利亚经济前景不确定”，<http://world.xinhua08.com/a/20130828/1238339.shtml>

② 同上。

发展。从 2009 年起，中国超过日本成为澳最大的出口市场，当年对华输总额占澳对外输出总额的 21.6%。多年来，中国一直是澳最大的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国。作为澳大利亚最大的两个出口目的地，如今中国与日本占澳出口总额的比重分别高达逾 1/3 和近 1/5，而居于澳出口市场第三至五位的韩国、美国、印度所占的百分比仅为个位数。在澳输华产品中，能矿产品一直占据主力地位。中国近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对资源产生大量需求，带动了澳大利亚出口贸易的发展。但是，过分依赖中国市场使得澳大利亚经济极易受中国资源需求变化的掣肘。有鉴于此，2013 年，时任澳总理的陆克文在其发表的题为《转型中的澳大利亚经济》的演讲中提及：“全球经济在经历最缓慢的复苏，中国的资源热潮结束了。由于中国对澳大利亚的经济、就业以及提高生活水平的机遇具有重大影响，现在我们是时候适应挑战了。”陆克文认为，2013 年将是澳经济贸易发展告别此前依赖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分水岭。尽管目前澳向中国出口的资源与贸易商品量依旧在不断增加，但陆克文指出，澳大利亚的收益却呈相反趋势，已下降 25%。陆克文强调，由于中国资源需求的繁荣时期已接近尾声，因此，澳经济发展必须寻求多元化的途径。通过在基建、食品生产、制造业领域创建更多就业岗位，加强其他服务业领域的发展，而不是孤注一掷地以矿产和能源为重来盘活澳大利亚未来的经济发展^①。除了经济发展多样化，还需拓宽出口渠道，不要把鸡蛋都集中放在少数几个篮子里，使出口市场多元化，才不致受少数几个国家资源消费变化的制约。

（二）“中国威胁论”

俄、澳两国舆论界均有“中国威胁论”，即担心中国正在掠夺其资源，并对中国企业投资俄、澳资源业心存疑虑，担心中国会最终控制其资源，具体表现如下：

俄能源公司不愿让中国油企参与竞拍俄石油企业股份。俄能源政策研究所所长弗拉基米尔·米洛夫表示：“俄罗斯对外国在自然资源领域直接投资

^① Kevin Rudd's National Press Club Address, "The Australian Economy in Transition: Building a New National Competiveness Agenda", <http://australianpolitics.com/2013/07/11/kevin-rudd-national-press-club-address.html>

进行限制首先考虑的是‘中国因素’。”^①再以中俄“安大线”夭折为例。2000年，中俄达成协议，合作修建一条自俄西伯利亚地区安达尔斯克至中国东北大庆的石油管道（安大线），总长约2400公里，计划由中石油集团、俄尤科斯石油公司和俄管道运输公司共同承建，2005年铺设完工，每年向华输送2000万吨石油，然后逐步增至3000万吨。然而，一方面随着该项目的推动方尤科斯公司被政府收购，俄方对输油管道的战略安全考虑加大；另一方面，中俄石油管线合作的进展使得同样身处远东且能源需求强劲的日本坐立不安并开始介入，于是“安大线”陡增变数。在日本的介入下，俄同意再建一条安达尔斯克到纳霍德卡的石油管线（安纳线），甚至于2003年9月宣告废除“安大线”计划。但在几轮试探性谈判和达到初步战略目的后，日本并未兑现之前对俄的承诺。于是在2004年3月，俄石油运输公司公布了远东石油管道新方案：建设一条从东西伯利亚泰舍特到俄远东港口纳霍德卡、全长4000余公里的“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石油管道（泰纳线）。与“安纳线”相比，“泰纳线”方案有两处明显变化：第一，起点改到泰舍特，以便最大限度地靠近东西伯利亚和亚库特的油田；第二，改变了“安纳线”紧贴贝加尔湖北侧的设计，向北后撤150公里，以避免石油管道对贝加尔湖生态的可能影响。与此同时，中国并不仅仅寄希望于俄罗斯，全长962.2公里、西起哈萨克斯坦阿塔苏东至中国阿拉山口的中哈石油管道于2006年5月正式对华输油，标志着中国首次实现以管道方式从境外进口石油。经过漫长的谈判和建设，中俄石油管道终于在2010年9月全线竣工，并于2011年1月1日投入运行，每年输华1500万吨原油，为期20年。“泰纳线”使俄不必把目标市场锁定在中国一个用户，而是可以同时向日本、韩国甚至美国输出。俄在输油管线上的摇摆态度和一再更改，体现了俄在坚持国家安全利益至上的同时力求使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尽管中澳两国的经贸关系不断发展深入，但由于两国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存在巨大差异，近年来，中国实力的增强被澳部分官员与学者视为正在全面崛起，并由此担心中国的崛起会威胁澳安全。澳政府2009年版的《国防白

^① 宋魁：“中俄石油天然气合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中国能源网，<http://www.china5e.com/show.php?contentid=150029>

皮书》明确表达了对中国军事实力增长的担忧^①，被媒体视为“中国威胁论”的表现。如今，“中国威胁论”仍以不同的方式存在于澳大利亚，主要表现在澳方对中国投资澳矿业的矛盾心态。澳知名经济学家伊恩·哈珀表示：“正是‘同中国的密切联系’使得澳大利亚避免陷入西方国家在危机爆发后普遍遭受的经济衰退”，另一方面他也提出，澳大利亚应当重新审视“1975年外国投资法案”，尤其是“国家利益”条款，以适应“变化了的情况”，应对中国国有企业的大规模投资。^②部分澳大利亚人认为，澳大利亚已成为“中国后院的采石场”^③。澳各方对中国对澳矿业投资表示担忧，主要是因为这些投资的中国公司多为国企和“主权财富基金”。此外，这些中国国企往往通过国有大银行、以极低的利率为其收购澳矿企进行融资。澳民众最为担忧的，是中国的投资可能造成中国控制澳资源，尤其是其能矿资源。在他们看来，一旦如此，中国企业会因中国政府的压力而不遵从商业运营的规则，对资源品的供应与定价施加影响，甚至使澳本土企业丧失资源定价权。因此，在中澳资源合作进程中，不时会出现一些反对的声音甚至是阻挠的行动，这一立场尤其体现在中国企业投资澳能矿领域上。以中铝增持力拓股权为例，澳一些反对者以担心中国控制澳大利亚国家资源为由，呼吁澳政府阻止该项收购。当时澳大利亚独立参议员尼克·色诺芬辩称，澳大利亚应该卖牛奶而非奶牛，同理，澳应该卖矿石而不是矿山^④。尽管中铝增资力拓败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澳担心资源被中国控制确实是重要原因之一。

当然，以上仅为部分澳大利亚人的论调，对于中澳资源合作，尤其是中国对澳能矿领域的投资，也有学者持理性客观的态度，认为在欢迎中国投资的前提下可适当采取自我保护的防御措施。例如，有观点认为，澳政府自2008年2月起对外国国有企业直接投资实施更为严格的审查并非“资源民族主

① Department of Defence, Australian Government, 2009, *Defending Australia in the Asia Pacific Century: Force 2030 (Defence White Paper 2009)*, Canberra: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② 傅云威：“中国在澳大利亚投资陷迷局‘中国威胁论’升温”，《中国证券报》2010年6月1日，http://www.cs.com.cn/xwzx/04/201006/t20100601_2455075.htm

③ Neil Hume, “Australia: Mine, all mine”, *Financial Times*, June 17, 2012, <http://www.ft.com/cms/s/0/f88223fe-b6d7-11e1-8c96-00144feabdc0.html#axzz2pDKPdGey>

④ Reuters, “Rio Tinto-Chinalco political opposition mounts in Australia”, March 18, 2009, <http://www.mineweb.com/mineweb/content/en/mineweb-base-metals?oid=80430&sn=Detail>

义”行为，而只是针对中国国有企业潜在的战略性行为所采取的防御措施，体现的是“资源自由主义”^①。

对我国而言，在政府层面，可采取以下几方面的举措：其一，提升政府管理机构对澳投资的协调和指导，避免企业盲目投资、扎堆投资、无序投资，尽可能减少对澳投资可能引发的争执和舆论漩涡。其二，鼓励更多私企投资澳矿，使投资主体多样化；对澳投资时，少一些对当地大型矿企的投资，多一些对较小规模矿企的投资；少一些控股收购和全资收购，多一些小额参股和组建合资企业。在企业层面，一则应加强与澳方的沟通，及时消除误解，从而有效提高投资澳矿的成功概率；二则应加强对澳资源战略、政策法规、投资环境等的研究和了解，以便提高对澳投资方案的可行性。

（三）资源价格分歧

中俄、中澳资源贸易近年来能够稳定增长，一定程度上源于中国与两国签订的长期购销合同。现有的中俄、中澳资源合同的价格安排，相当一部分是长期的固定价或半固定价。尽管这种长期购销合同为中国以低于现货的价格长期稳定地获得资源供应和为俄、澳能矿资源找到稳定的消费客户作出了贡献，也尽管长期合同有助于稳定市场，避免资源价格大幅涨落，但是，一旦国际市场现货价格剧烈波动，双方就会产生价格争议，影响合作的顺利开展。

例如，2004年中俄为期7年价值60亿美元的“石油换贷款”协议、2009年中俄为期25年价值250亿美元的“石油换贷款”协议，均执行固定或半固定定价，协议签署后，因国际石油价格上涨，俄方要求价格补偿，双方在价格问题上产生了矛盾。

又如，2003年中海油与澳高庚液化天然气项目签订购买液化天然气的框架协议，后因谈判时中方难以接受澳方提出的报价而被迫放弃。中海油痛失高庚气项目给我国的启示是：据理力争、讨价还价应适可而止，片面追求己方利益而不顾对方利益诉求将驱使对方转而寻求其他合作伙伴，导致合作

^① Jeffrey D. Wilson, “Resource nationalism or resource liberalism? Explaining Australia’s approach to Chinese investment in its minerals sector”,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1, Vol. 65, No. 3, pp.283-304.

失败。无论是贸易、投资还是技术协作，要想维持长期稳定的合作，必须努力创造双赢的局面。

此外，中澳两国矿业集中度的差异使得我国议价能力薄弱。经过多年大规模的收购兼并，目前澳矿业集中度已很高，矿工规模也很大。全球三大矿业巨头中，除巴西的淡水河谷集团，另两家——力拓和必和必拓公司——都是澳大利亚矿工。力拓与必和必拓这两大巨头在澳处于垄断竞争地位。相比之下，中国矿业集中度较低，多数矿工规模不大，彼此之间竞争激烈。因此双方在议价过程中，处于垄断地位的澳方往往掌握着主导权，而产业集中度较低的中方无法形成合力与澳方协商，只得被动接受澳方定价，使得进口成本陡增，损失巨大。鉴于此，在国内，我们需要逐步通过资源整合、兼并重组，提高矿业集中度，规范矿企市场行为，以便以一致的行动应对议价挑战；在国际上，我国能矿企业应进一步实施国家“走出去”的战略，投资澳大利亚矿业，进入产业链的上游，拥有澳能矿企业的部分股权，这样即便澳矿价格高企，中国企业上升的资源购买成本也能从投资的股份分红中获得一些补偿。

（四）外部竞争因素

中俄、中澳资源合作也受外部竞争因素和国际资源市场变化的影响。

首先，美国在中俄、中澳资源合作中既是干扰因素，也是有利因素。一方面，美国向来把中俄资源合作视作是对美全球能源战略及地缘战略的威胁。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在 2005 年呈递给国会的报告中指出：“中国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特别是对石油进口的依赖，对美国构成了经济、环境和地缘战略等方面的挑战”。^①为了应对中国，美国曾以美俄能源合作为由，极力阻挠中国与俄罗斯、中亚等国能源合作计划的实施，挑拨双边、多边关系，通过控股、参股等形式，控制对华供应的俄罗斯和中亚源头。^②目前中国资源进口的运输通道都在美国及其盟友军事存在的覆盖和控

① 王联合：“竞争与合作：中美关系中的能源因素”，《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2 期。

② 韩立华：“中俄能源合作若干问题探索”，《西伯利亚研究》，2006 年第 2 期。

制之下，中澳资源合作或多或少会受到美国因素的干扰。另一方面，21世纪以来，随着美国页岩气开采技术渐趋成熟，页岩气革命对国际能源格局造成冲击或许是中俄、中澳资源合作的一个利好因素。第一，美国与俄、澳争夺天然气贸易伙伴将使俄气、澳气乃至全球天然气价格降低。第二，随着欧洲气源来源的多元化，对俄气的依赖性会有所下降。天然气市场供求局势的这个变化，将促使俄对中国市场更加重视。第三，随着页岩气开发技术逐渐成熟，中国丰富的非常规能源储量将有望得到开发利用，力图在国际能源格局的变动中把握主动权的俄、澳会考虑进军中国页岩气市场。

其次，从消费方看，中国自俄、澳进口资源品的过程中，面临着来自他国的竞争，尤其是来自欧盟、印度、日本和韩国的竞争。以日本为例，中俄石油管道“安大线”的流产，在很大程度上是日本搅局的结果。由于担心中国控制东亚能源供给权，为了与中国争夺俄油气资源，日本充分利用自身的资金和技术优势向俄提供资金支持与技术援助，以便获取俄油气资源。日澳资源合作早于中澳资源合作，且日本曾保持澳最大资源贸易伙伴地位多年。2003年中海油与澳高庚液化天然气合作项目败于日本，就是两国能源竞争的一大例证。面对竞争，我国企业应具有审时度势的智慧，理性决定采取何种对策。事实上，除面临他国竞争外，我国企业之间也有竞争。比如，武汉钢铁、鞍山钢铁、宝山钢铁与中国钢铁曾为并购西澳皮尔巴拉地区的一座铁矿竞相出价，使得收购价格提高了1/3^①。有鉴于此，我国企业互相间竞争时应努力避免恶性竞争，以免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四、资源合作前景比较

尽管中俄、中澳资源合作中存在上述问题和困难，但总体而言，中俄、中澳资源合作前景看好。

对中国而言，随着资源约束矛盾逐渐加剧，我国的资源进口依赖度日益加深，资源供应安全问题渐趋突出。为实现资源进口来源的多元化，保障国

^① 邓瑶，“中钢高价续约力拓铁矿”，《21世纪经济报道》，2010年12月3日，<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01203/00369047532.shtml>

家资源安全，巩固并加强与俄、澳的资源伙伴关系是我国必然的战略选择。

中俄两国互为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深化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两国外交全局和对外关系中都占优先的战略地位。在国家关系这一大前提下，中俄经济关系包括双边资源合作有望继续发展。无论从中俄要素互补性抑或是资源开发的国际化看，中俄合作开发俄西伯利亚和远东的自然资源是 21 世纪中俄资源合作的新热点之一。然而，较之中澳资源合作，中俄资源合作尚处于初级阶段，具有进一步丰富的巨大空间。就合作广度而言，目前中俄资源合作主要在能源合作领域，而能源合作又集中在油气贸易领域，未来可向电力、煤炭和矿石等领域扩展。从合作深度而言，现阶段中俄资源合作以能源贸易为主，兼具合作开发，未来还可拓展至能源技术合作乃至整条产业链的合作。以资源品贸易为主的合作方式易受国际资源供求格局和各国政治因素影响，而共同投资和技术开发有利于使合作双方利益一致，加强合作的持续稳定。当前，俄在欧洲和西西伯利亚地区的油田已过开采峰值，而位于远东的东西伯利亚地区虽蕴藏着丰饶的油气资源，但尚未步入实际勘探开发阶段。在勘探开发与管道修建等方面，俄需要合作伙伴的资金和技术支持，这为中国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此外，中俄资源合作受政府主导，企业间自主合作有待加强。

虽然澳政府 2009 年版的《国防白皮书》指责“中国威胁”，但随着两国资源合作与经贸关系的深入发展，澳大利亚从中国的经济发展中收获颇丰，对中国的态度经历了调整和改变。2013 年的新版《国防白皮书》中，澳不再视中国为威胁，而是欢迎中国的崛起。毕竟，中澳两国在资源领域是友好的合作关系而非敌对的竞争关系。而鉴于前文所述 2012 年 11 月澳政府发布的《能源白皮书》制定的能源目标包括了挖掘澳大利亚能源出口增长潜力以及开发利用清洁和可持续的能源，我们有理由相信，澳大利亚在全球能源供应格局中将继续扮演重要的能源供应大国的角色，也将继续对缓解中国的资源供需矛盾作出有益贡献。而澳大利亚对中国也愈益重视。2014 年 4 月，澳总理托尼·阿博特亲率澳史上最大规模代表团访华。代表团成员除澳联邦贸易投资部长、小企业部长、政府高级官员外，还包括 600 余个企业与行业高管。访华期间，澳政府同时于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举办了首届“澳

大利亚周·中国”活动，通过逾 90 场经贸活动，以期促进双边贸易合作。下图是对澳大利亚未来的能源消费、生产和净出口所作的预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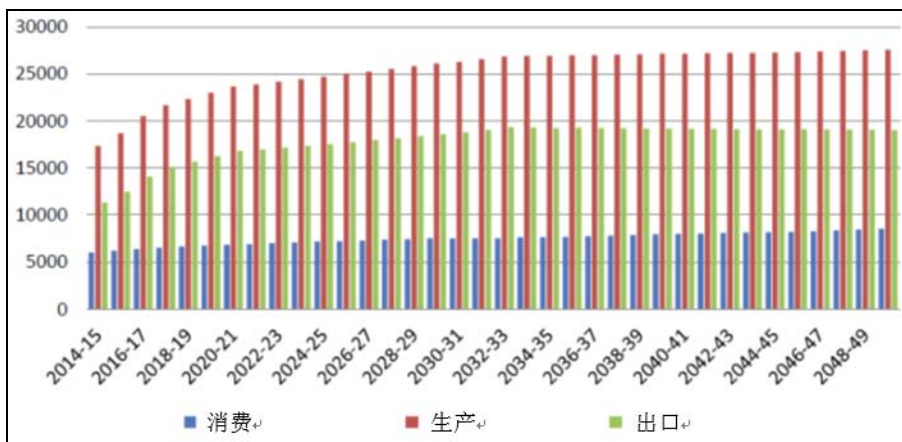


图3 澳大利亚未来能源消费、生产和净出口预测^① (单位: 拍焦耳)

资料来源: Arif Syed, *Australian Energy Projections to 2049-50*, Canberra: Bureau of Resources and Energy Economics, 2014, p.42.

由于澳大利亚人口增长相对缓慢以及经济结构向服务业倾斜，未来 35 年，澳大利亚能源消费将稳步缓慢增长。与此同时，澳大利亚能源生产总量（不包括铀生产）将以 1.3% 的年均速度增长，至 2049-2050 财年，将达 27567 拍焦耳（见上图），增速快于其能源消费增速。到 2049-2050 年度，澳能源消费占能源生产（不包括铀生产）的比重将从 2014-2015 年度的 35% 降至 31%^②。此外，亚洲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印度与中国）以及中东地区对能源的需求将成为未来世界能源需求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为满足国际能源消费持续增长的需求，澳大利亚能源生产将持续增加，因此，在未来 35 年，澳大利亚的能源净出口量也将继续稳步攀升。

未来中澳能矿资源合作仍有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的空间，合作路径的发展方向是：第一，进一步完善中澳资源贸易与投资的合作机制；第二，中澳资

① 此图不包括铀数据。

② Arif Syed, *Australian Energy Projections to 2049-50*, Canberra: Bureau of Resources and Energy Economics, 2014, pp.41-42.

源贸易有望持续增长，但需双方秉承互利双赢的理念，确定能矿产品的合理价格，以使双方的资源贸易具有可持续性；第三，中国企业有望继续对澳能矿业的投资，各能矿产品领域可借鉴中澳在液化天然气领域全方位合作的成功经验，争取在能矿产业的上、中、下游展开广泛而深入的合作，使中澳双方结成密不可分的利益共同体，有利于友好合作的持续进行；第四，鉴于澳大利亚的基础设施日益成为其能矿产品出口持续增长的瓶颈，因此，除收购澳矿企和直接投资澳矿山项目外，我国企业还可参与澳当地与矿产项目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如配套的港口和铁路建设，以充分利用我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优势，继续扩大投资领域；第五，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以及提高能源效率以优化能源消费结构，这个共同的目标将促使两国进一步加强双方在能源技术领域的合作。

五、结论

综上所述，地理位置毗邻以及互补的资源供需结构、资源禀赋、经济结构和战略，共同构成中俄、中澳资源合作的动因与条件。但中俄、中澳资源合作的现实状况存在差异。从合作领域与结构看，中俄资源合作领域以能源为主，合作重点是油气，尤其是石油，合作结构较单一；而中澳资源合作领域更宽，包括铁矿、铜矿、铝土矿等矿产品，煤炭、石油、液化天然气、铀矿等能源产品，以及可再生能源等领域。从合作方式看，虽然中俄、中澳资源合作方式都在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但中澳资源合作方式明显比中俄资源合作更为多样。从合作主体与机制看，中俄资源合作由政府主导；而中澳资源合作是政府引导、企业主导。从决策和管理机制看，俄能源决策机制比较分散；而澳市场经济比较发达，决策与管理机制更为成熟。此外，中俄、中澳在资源合作中相互依赖的关系均较为对称，但中澳间彼此依赖的程度高于中俄间的依赖程度。中俄、中澳资源合作均面临俄、澳“资源诅咒”冲击、“中国威胁论”、资源价格分歧与外部竞争因素等难题，我们应及时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以期使彼此的资源合作健康发展。

概而言之，俄、澳对缓解中国的资源供应压力起到了积极作用，为中国

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中国也为俄、澳带来巨额的经济收益，尤其是促成了澳大利亚的矿业繁荣。但由于能矿资源合作不仅属于经济范畴，还是涉及国家安全（包括资源安全）的战略问题，因此，中俄、中澳资源合作中政府的参与势所必然。中俄、中澳资源合作与经贸关系的发展，可对改善双边政治关系、增加互信发挥有益作用；而改善和提升的中俄、中澳政治关系和双边互信，反过来也会推动中国与俄、澳两国资源合作乃至整体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形成良性循环。总体而言，中澳资源合作较中俄资源合作顺利，并形成多层次、多元化、多渠道的相互依赖的互动格局，但中俄、中澳资源合作继续拓展与深化均前景可期。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经济合作在国家关系中的份量日趋提升；而国际关系的核心是国家利益。因此，中俄、中澳能矿资源合作关系乃至中俄、中澳整体关系，都离不开对国家利益的关照。学会换位思考以理解对方的合理利益诉求，通过适当的求同存异的努力保障互利共赢，有助于中俄、中澳能矿资源合作长久而健康地发展。但由于国家利益并非一成不变，其内涵会随着时代发展和具体情势而演变，且对其的判定具有主观性，因而尽可能客观、全面地考量中俄、中澳资源合作中涉及的多重因素显得尤为必要。

【Abstract】 Sino-Russian and Sino-Australian cooperation in energy and mineral resources, which has been gaining increasing momentum in recent years, has become a backbone for China's respective relations with them in general and in economy in particular. This article is intended to conduct a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the two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s mainly from four aspects: cooperation conditions, status quo, problems, and prospects, so as to be conducive to China's further collaboration with foreign countries, its stable supply of resources,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its economy. The findings of the study tell that these two relationships share similar cooperative motivations and conditions, with differences in their modes and difficulties. Nonetheless, both have a promising future.

【Key Words】 Sino-Russian cooperation in energy, Sino-Australian cooperation in energy and mineral resources, comparison between Sino-Russian

and Sino-Australian cooperation in energy and mineral resources

【 Аннотация 】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ое и китайско-австралий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 сфере энергии и минеральных ресурсов стало столпом двусторонних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и в целом двусторонн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Китая с данными странами. В последние годы двусторонне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Китая с Россией и Австралией в области энергетики и минеральных ресурсов по-прежнему расширяется,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приобрело своё дальнейшее развитие. В данной статье проводится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двустороннего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ого и китайско-австралий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сфере ресурсов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условий, состояния, проблем и перспектив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а также извлечённых уроков, что может послужить руководством для Китая по иностранному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в сфере ресурсов, гарантии стабильных поставок ресурсов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 устойчивому развитию. Настояще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показывает, чт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положение, структура взаимодополняющего спроса на ресурсы, обеспеченность ресурсам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структура и стратегия в совокупности являются мотивацией и условиями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ого и китайско-австралий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сфере ресурсов, существуют различия и свои проблемы в двустороннем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с данными странами в сфере ресурсов, однако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ое и китайско-австралий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 сфере ресурсов будет по-прежнему расширяться и углубляться.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 сфере энергии, китайско-австралий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 сфере ресурсов,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ого и китайско-австралий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сфере ресурсов

(责任编辑 肖辉忠)

成败之间：战后苏联新卢布改革 与中国金圆券改革比较研究*

王小龙**

【内容提要】二战后，中苏两国在经济背景上都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但在政治和军事背景上则不同：苏联已经获得良好的国内和平环境，而国民党政府先是“备战”，之后又“养战”，并由此导致财政状况的恶化和经济政策的混乱。苏联1947年的新卢布改革与中国1948年的金圆券改革基本思路和主要内容相同，区别之处是金圆券改革的某些具体措施更为激烈。新卢布改革对金圆券改革的决策和具体实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通过新卢布改革与金圆券改革的比较，可见后者的失败在于在“天时”与“人和”上均犯了大错。

【关键词】苏联币制改革 苏联新卢布改革 金圆券改革

【中图分类号】D815**【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5) 04-0172(31)

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70周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给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种下了经济方面的恶果。战争结束后，各国普遍面临不同程度的经济困难，“二战使几乎所有文明国家的商品价格都大幅上涨，无论是工业国还是农业国，也无论是参战国还是中立国”^①，长期积累并继续加剧的通货膨胀，是战后世界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制约因素。因此，战争结束后如何控制和消减通胀，成为许多国家亟须解决的重要课题。战后初期，

* 感谢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罗曼诺夫（Alexander V. Lomanov）首席研究员和博罗赫（Olga Borokh）研究员，以及复旦大学吴景平教授对本文的批评和指正；感谢清华大学蔡乐苏教授对本文写作的帮助；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建议。文责自负。

** 王小龙，清华大学高校德育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学院理论报告团讲师。

① “The Role of War in Modern Infl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977, Vol.37, No.1, p17.

比利时、希腊、波兰、南斯拉夫、法国、荷兰、丹麦、挪威、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芬兰、苏联、西德、东德等国家，都先后进行了币制改革。^①之后许多国家也纷纷效仿，在本国推行规模或小或大、力度或轻或重的改革政策。战后的苏联作为综合实力仅次于美国的大国，其币制改革在国际上备受关注。世界主要国家的媒体都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和评论^②，尤以中国为甚^③。战后初期，国民党政府统治区域也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在国际上掀起币制改革浪潮之时，国民党政府内部对于是否进行币改、何时进行币改、怎样进行币改等问题，均有重大分歧：一部分人因对币改副作用及其可能带来的风险而心存顾虑，而另一部分人则指望通过币制改革来整顿经济而跃跃欲试。对于决策者而言，因疲于战后接收、政治谈判、军事动员等其他事务造成的分心，^④且对于两种意见一时难以取舍，故对于是否币改、何时币改等问题举棋不定。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终于颁布法令，宣布进行币制改革，史称金圆券改革。这场改革很快以失败收场，成为国民党政府在大陆完全失败前倒下的一块关键的多米诺骨牌。

关于战后世界主要国家币制改革的研究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对几个不同国家的币制改革进行比较研究^⑤；另一种是对单一国家的币制改革进行具体

① 鲍文熙：“二次大战后各国币制改革评述”，《银行周报汇编》，1948年第44期。

② 津津：“美人看苏联的币制改革”，《银行通讯》，1948年第29期。原文摘译自《美国新闻杂志》。

③ 据不完全统计，1947-1948年间中国境内刊发关于苏联1947年币制改革文章的经济类刊物有：《经济评论》、《经济通讯》、《工商天地》、《时代经济》、《银行通讯》、《经济周报》、《银行周报》、《金融周报》、《资本市场》、《中央银行月刊》等，详见下文。

④ 时人评论道：蒋介石“在政治上关心对付旁的政党，特别是共产党，超过他对经济建设的关心”，故而在战后初期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的重视程度是远远不够的。参见：《何廉回忆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266页。

⑤ 中文的代表性成果如贺水金对德国、中国通货膨胀和币制改革的对比研究（贺水金：“中、德两国恶性通货膨胀之比较研究”，《社会科学》，2007年第8期；贺水金：“德、中币制改革——‘新马克思奇迹’与金圆券改革失败之比较研究”，《上海经济研究》，2010年第9期）。需要指出的是，贺文此处与金圆券币改比较的德国币改非二战后的币改，而是一战后的币改。另外，Niall Ferguson & Brigitte Granville也曾做过苏、德通货膨胀情况和币制改革的比较研究（Niall Ferguson & Brigitte Granville, “Weimar on the Volga: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Inflation in 1990s Russia Compared with 1920s Germany”,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000, Vol.60, No.4.）但研究对象分别是一战后（1920）的德国和解体前夕（1990）的苏联。

研究，例如关于苏联^①、中国^②币制改革背景、原因、措施、影响的研究，总体上后者多于前者。

目前鲜见对二战后苏联与中国币制改革进行比较研究的成果。二战后苏联与中国的币制改革处于同一时代，面对相似的时代主题，它们在实施背景、具体措施等方面有许多相同之处；但二者结果迥异，一成一败都对两国之后的发展命运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以 1947 年苏联新卢布改革和 1948 年中国金圆券改革为考察对象，通过比较，研究二战后中苏币制改革的异同及相互关系。

① 关于苏联 1947 年币制改革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1948 年至今，苏联和俄罗斯学者进行了比较详细的研究，以已译成中文的代表性成果为例，就有 Я·А·克隆诺特的《战后苏联的币制改革》（作家书屋，1951 年）、А·Д·古沙科夫的《苏联货币流通史略》（科学出版社，1959 年）、В·С·格拉申科的《苏联货币流通与信用》（中国金融出版社，1984 年）等。俄文代表性成果有：Сост. Доброхотов Л.Н, Колодежный В.Н, Пушкарев В.С, Шепелев В.Н. Денежная реформа в СССР 1947 года: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2010; Крединс Н.Е. Денежные реформы в СССР 1922---1924 годов и 1947 года// Финансовый менеджмент. 2001. №.6.; Год 1947-й. Денежная реформа// Родная газета. №.43(227), 13 декабря 2007 г., полоса 24. 英文代表性成果有 В. Alexandrov, “The Soviet Currency Reform”, *Russian Review*, 1949, Vol.8, No.1, pp. 56-61; Franklyn D. Holzman, “Soviet Inflationary Pressures, 1928-1957: Causes and Cure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60, Vol.74, No.2, pp.167-188.等。值得指出的是，20 世纪 40 年代末 50 年代初，由于现实需要，无论在国民党统治区还是新中国，都有大量研究苏联 1947 年币制改革的文章，如本文上下引注所示，此处不赘述。

② 关于中国 1948 年币制改革的研究，也可以追溯至改革实行之初，例如 1948 年中国经济研究所编著的《新币制—金圆券》（华夏图书出版公司，1948 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学术界在研究民国经济史时，也涉及 1948 年币制改革的问题。改革开放以后，研究更加深入，代表性的成果，例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著的《法币、金圆券与黄金风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 年）、季长佑的专著《金圆券币史》（江西古籍出版社，2001 年）、李金铮的论文“旧中国通货膨胀的恶例——金圆券发行内幕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 年第 1 期）、吴景平的论文“金圆券政策的再研究”（《民国档案》，2004 年第 1 期）、张皓的论文“王云五与国民党政府金圆券币制改革”（《史学月刊》，2008 年第 3 期）等。中国域外的英文代表性成果有 J. R. Kaim, “China’s New Currency”, *Far Eastern Survey*, 1948, Vol.17, No.20, pp.238-241; Andrew Chung Huang, “The Inflation in China”,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48, Vol.62, No.4, pp. 562-575) 等，距今年代均较远。

一、币制改革的背景

（一）战争给中苏两国带来的严重通货膨胀

中国和苏联同为战胜国，在战争中都受到了严重破坏，付出了巨大牺牲。在某种程度上讲，苏、中分别是长期牵制和对抗德、日法西斯的最主要力量。经济萎缩、产业不振、民生凋敝，地区间恢复发展水平严重不平衡等，是战后中苏两国经济社会都同样呈现出的景象。据统计，战争期间，苏联“仅直接的战争支出就达 551 亿卢布，而由于战争所带来的损失相当于 679 亿卢布。被占领地区的财产损失为该地区全部财产价值的三分之二”。对此，苏联学者感叹道：“一个国家这样的支出和损失的数字，在世界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①德国元帅施欠尔那格尔在向希特勒提出的特别备忘录中说：“25 年，这便是俄国要恢复我们所造成破坏的时期。”^②具体在财政金融方面，就是财政收支的不平衡和通货膨胀。为了解决巨大的战争开支问题，政府主要通过征税、超量发行货币和战争经费筹集动员等方式，来解决收支不平衡的问题。“苏联在战争期间，广泛地开展了以物质和财政援助前线的群众运动。居民为战争的需要，自愿缴款达 94.5 亿卢布，占整个直接战争支出的 18%；而居民的税款支付总额为 270 亿卢布，占整个国家收入的 26.4% 以上和整个直接战争支出的几乎一半”。^③到 1944 年，苏联预算收入已经可以弥补支出，但同时可以看到，苏联人民的付出和牺牲是巨大的。据估计，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流通中的货币量增加了三倍。^④战争期间，苏联实施了固定价格制度，但由于货币发行量的增加以及商品供应的紧缺，“……引起了集体农庄市场上物价的大幅上升，与战前水平相比上涨了 9-12 倍”。^⑤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战后初期。与苏联相比，中国在战争中也遭受了巨大损失。据统计，日本

① [苏]B·C·格拉申科主编：《苏联货币流通与信用》，李念斋译，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84 年，第 170-171 页。

② 王金存：《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七十年——苏联经济发展史》，北京：北京出版社，1991 年，第 194 页。

③ [苏] B·C·格拉申科主编：《苏联货币流通与信用》，第 171 页。

④ 同上。

⑤ 《苏联货币流通与信用》，第 172 页。

全面侵华战争期间（1937-1945年），中国有930余座城市被占领，直接经济损失达62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①战争期间，由于沿海地区城乡相继陷落，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关税、盐税、统税三大税收和其他税收大幅度下降，使得政府收支严重不平衡。^②为了应对这一问题，政府虽然实行了战时统制经济政策，但仍难以填补财政的巨大亏空，不得不采取超发货币的措施。到1945年底，法币发行额已达10319亿元，大大超出了市场所需的货币流通量。法币贬值，通货膨胀形势严峻。需要指出的是，战后初期，随着日占沦陷区被逐渐收复，法币流通区域扩大，超发的货币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缓解，物价出现短时期区域性的下降。^③然而，为了发动内战，国民党政府继续超发货币。到1946年底，法币发行额增至37261亿元，一年之后，又迅速攀升至331885亿元。到1948年金圆券改革前夕，法币发行额竟史无前例地高达663万亿元。^④总之，战后初期，尽管程度有所区别，但中苏两国均面临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

（二）战后苏联财政状况的好转与中国财政状况的恶化

尽管战争给两国经济均带来严重创伤，但战后两国经济形势的变化却有很大差异。据苏联财政人民委员部的官员回忆，早在1943年底，斯大林有感于当时通货膨胀的压力，就开始考虑币制改革的相关问题。^⑤到了1944年，苏联党和政府已经着手整理经济，不仅尽量避免更大的损失，而且开始为恢复经济做准备。1944年之后，苏联国民收入开始增加，工业总产值甚至已经基本恢复到了卫国战争前的水平，具体的经济发展指标如下表：

①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人权状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2-3页。

② 张宪文：《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32页。

③ 汪朝光：《1945-1949：国共政争与中国命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89页。

④ 季长佑：《金圆券币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9页。

⑤ Год 1947-й. Денежная реформа// Родная газета. №.43(227). 13 декабря 2007 г. полоса 24.

表 1 战争年代苏联经济发展主要指标（以 1940 年为 100）

年份	1941	1942	1943	1944	1945
国民收入	92	66	74	88	83
工业总产值	98	77	90	104	92
其中军事工业 人民委员部	140	186	224	251	—
农业总产值	62	38	37	54	60
货运量	92	53	61	71	77
商品零售额	84	34	32	37	45

资料来源：[苏]雅·阿·约夫菲、列·巴·兹洛马诺夫：《苏联社会经济发展统计资料手册（1917-1977）》，北京：求实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2 页。

与苏联相比，中国战场直到 1945 年初仍然面临紧张局势，不仅是军事意义上的，也有经济层面的危机。虽然从 1938 年开始抗战就已经进入相持阶段，但此时国统区经济形势并没有好转。特别是在 1943-1945 年间，用于社会民生的财政支出逐渐减少，导致国统区经济特别是社会民生发生严重困难。主要原因是国民党政府此时军务费用的大规模增加。据统计，国民党政府 1943-1945 年间的军事开支呈直线上升趋势，为全面抗战以来之最。

表 2 1942-1945 年国民党政府军务费用实际支出数及占总岁出的百分比

年份	总岁出（百万元）	军务费（百万元）	占总岁出百分比
1942	24,511	15,216	62.1%
1943	58,816	42,943	73.0%
1944	171,689	131,081	76.3%
1945	1,215,089	1,060,196	87.3%

资料来源：杨荫溥：《民国财政史》，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 年，第 103 页。

一些人认为，从 1944 年开始，国民党正面战场开始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故军务费开支陡增是理所当然。1944 年 2 月，蒋介石在南岳军事会议上提出，“我军向敌反攻决战的阶段——第三期抗战开始的时候到了”，倘若“敌不先来进犯，而我们到了五六月间，准备完成之后，必须堂堂正正地实行反攻”。但实际上这一时期国军并没有开展相比于之前时期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且仅有的几个军事行动也并非原先早有部署的战略计划，而基本上是被动的应对措施，最后取得的成效也不尽如人意。近年来学术界甚至对国民党正面战场是否存在一个战略反攻阶段抱有怀疑。正如时任国军高级将领的张

发奎所言：“在整个抗战中，我们一直采取守势。在战争快结束时，我首次负责发动大规模攻势，可惜攻势刚开始，战争就结束了。”^①因此，国民党政府此时大量增加军务费用开支，意欲何为？去向何在？或者说，此时仍将财政支出大量投入军事行动，而忽略了同时应该重视的经济民生的恢复，是否为一个战略失误？如果说在 1944 年，可能并未能预见到战争胜利之日来得如此之快，而继续作打持久战的准备；但到了 1945 年，在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之时，政府应该努力平衡军事开支和经济恢复开支，并逐步向恢复经济倾斜。可见，与苏联政府在 1944 年就开始逐步采取经济恢复措施不同的是，国民党政府此时仍在拼命扩大军事开支，其目的是准备发动内战。

为准备和进行内战而造成的沉重军事开支负担，是形成财政赤字的一个重要原因。“1945 年度军事开支所占岁出百分数竟高达 87.3%，与该年度高达 87.7% 的财政赤字正相吻合。可见，财政上几乎占九成的赤字，正是军事开支所造成的。岁出上每十个钱中九个钱是用在军事上面，使财政上每十个钱中的九个钱没有着落。这就是这一时期国民党政府财政一个最基本的特点。”^②时任财政部长俞鸿钧在向“国大”作的报告中坦陈：政府 1946 年财政总收入法币 12791 亿元，总支出却达到了法币 55672 亿元，财政赤字高达法币 42881 亿元。^③1947 年财政总收入法币 138300 亿元，财政总支出 409100 亿元，财政赤字迅速上升至法币 270800 亿元。^④实际上，上述的数据可能也是有一定水分的。例如同一时期的数据，时任中央银行总裁的张佳璈就给出了不同的版本，比俞鸿钧版高出了不少。他的统计数据显示，1946 年军务费支出占总岁出的 59.9%，1947 年为 54.8%，1948 年金圆券改革之前（1-7 月）攀升至 68.5%。^⑤当然，当时的知识界和媒体也作了估算，结果显示情况更为糟糕。^⑥到了 1948 年下半年金圆券改革前夕，财政赤字竟高达 900

① 张发奎：《蒋介石与我——张发奎上将回忆录》，香港：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 年版，第 398 页。

② 杨荫溥：《民国财政史》，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 年，第 103-104 页。

③ 俞鸿钧：《财政金融施政报告》，1948 年 4 月 13 日。

④ 孙健：《中国经济史近代部分（1840-1949）》，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 71 页。

⑤ 张公权：《中国通货膨胀史》，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 年，第 102、103 页。

⑥ 杨荫溥：《民国财政史》，第 170-172 页。

万亿元之巨。^①从某种程度上讲，财政恶化已经使国统区的经济陷于崩溃的边缘，引起了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与国民党政府不同的是，苏联政府在战后就合理调整财政分配，减少军务费用支出，很快实现了国家预算的平衡，并将大量财政支出投入到国民经济和社会民生的恢复发展之中。据统计，1946-1948年，苏联财政预计收入超过支出43.7亿卢布，比1944-1945年多4倍以上。国家财政预算的完全平衡，被认为是顺利进行币制改革最重要的前提。^②“由于国民收入额不断增加与国家预算顺利执行的结果，……也就使得有可能在1947年12月实行币制改革，取消一切食品与工业品配给制度。”^③

（三）币制改革前苏联经济政策的计划性与中国经济政策的无序性

1945年8月，苏联党和政府责成国家计委编制恢复和进一步发展国民经济的第四个五年计划。第四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恢复战争破坏的地区，使工业和农业达到战前的发展水平，然后再大大超过战前水平。^④战争甫一结束，苏联最高苏维埃就通过了《苏联国民经济恢复与发展的五年计划（1946-1950）法规》，把经济恢复和发展作为战后国家的中心工作，提出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要达到的几项任务，其中包括“在最近期间取消凭券购物制度”、“巩固国民经济中的货币流通与信用关系”^⑤，并在“提高人民生活的物质与文化水准的计划”中，要求“保证各种商品价格的不断降低”^⑥、“在1946与1947年间实行由居民的凭券购物转变而为发展的苏维埃贸易”。^⑦1946年3月，苏联第二届最高苏维埃第一次大会通过了《苏联国民经济恢复与发展的五年计划（1946-1950）》，正式提出了相关任务（作为工业生产之后的第二项重要任务），那就是“使农业以及生产消费品的工业高涨起来，以保证苏联各族人民的物质幸福，并在国内造成主要消费品的富足。

① 盛慕杰：《中国近代金融史》，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85年，第288页。

② 《苏联货币流通与信用》，第174页。

③ 中共中央办公厅编：《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资料汇编》，第2册，第1690页。

④ [苏]琼图洛夫：《苏联经济史》，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12页。

⑤ 中共中央办公厅编：《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资料汇编》，第2册，第1483-1484页。

⑥ 同上，第1512页。

⑦ 同上，第1516页。

必须超过国民收入的战前水准以及国民消费的水准，在最近的将来取消配给制度而之以开展着的标准的苏联商业。特别注意日用消费品生产的扩大，利用逐步减低物价的方式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准。这些任务，反过来又要求巩固货币的流通及苏联的卢布。”^①具体地，“在 1946 年，拟取消面包、面粉、谷物以及通心面的配给制度，而在 1946 年和 1947 年期间，其他一切商品的配给制度亦拟取消。在废止配给制度及不断减低物价的基础上开展的苏维埃商业，必须将巩固货币的流通，并大大增加苏维埃卢布在国家全部经济生活中的意义。”^②可见，苏联政府从一开始就把币制改革置于国民经济恢复发展的全盘计划之中，并在币制改革前就进行前期准备工作，以保证币制改革能按时顺利地展开。这些前期准备工作，主要表现为合理调整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产品的比例，大力促进农产品和日常手工业品的生产，以满足市场上的商品需求，降低物价，消化通胀。战争结束后第一年，苏联工业基本上就已由战时体制改变为平时体制。例如 1946 年日用必需品工业的出产，已比 1945 年提高了 20%。进入 1947 年，工业生产及基本建设的速度发展迅猛，连续四个季度均比前一季度增加百分之十二以上，最高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到 1947 年第 4 季度，苏联工业产量已经达到了战前 1940 年平均每季度工业生产量的规模。国民经济恢复的速度超过了计划的规定。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国库收入也不断增加。^③这些政策有比较充分的计划性、准备性，为之后币制改革工作的顺利展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反观中国国民党政府这一时期的经济政策，特别是其中的金融政策，则可以用“混乱无序”一词来概括。战后国民党政府面临着对沦陷区的经济接收和恢复全国经济的双重任务。金圆券改革之前，“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其核心是通过开放金融市场，稳定币值，重建统一的经济体系，恢复经济活力。”^④这一时期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政策，实际上是由宋子文主导实施的。宋

① 中共中央办公厅编：《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资料汇编》，第 2 册，第 1557 页。

② 同上，第 1569-1570 页。

③ [苏]Я·А·克隆诺特：《战后苏联的货币改革》，晦闻译，上海：作家书屋，1951 年，第 50、51、53 页。

④ 汪朝光：“战后初期中国经济恢复与重建的若干问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 年第 4 期。

子文早年留学美国学习经济，先后获得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学位，可谓美国自由经济的“学院派”。此外，借助于宋子文与美国政商界的关系，国民党政府可以更好地获得美国的经济援助。然而，从这一时期推行的经济政策来看，却并非完全遵循自由主义经济的理念和原则。事实上，1946年到1947年间，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政策“不太按常理出牌”，常常“忽左忽右”。例如，在所有制政策上，偏重于对国有企业的扶持，大力发展国家垄断企业，而常常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甚至牺牲民营资本的利益，这种政策明显不符合自由主义经济的理念，而被诟病为“经济左倾”，“比苏联还苏联”。但在金融政策上，却主张完全开放货币市场，推行金融自由化。实际上，国民党政府这一时期经济政策的矛盾和混乱是有社会历史背景的。战后中国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局势和环境，比美国或苏联都更为复杂和险峻。无论美国抑或苏联，战后国内基本实现和平，经济恢复是最主要目标；而战后中国却仍然被内战的乌云笼罩，实际上由“战后”（对外）又走入了“战前”（对内）。故而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政策，就一直在“恢复建设”心态和“备战”“养战”心态中徘徊，以至于左右摇摆不定，时而“学苏联”，时而“学美国”。这一时期国民党的金融政策便是如此。实际上在战后初期，从某种程度上讲，围绕是否要进行币制改革的争论，在本质上是一场经济政策的“左右之争”。初期争论的结果是，以宋子文为代表的“美国派”占了上风，决定不考虑实施币制改革计划，而是马上结束金融管制政策，代之以开放金融市场计划；通过开放黄金外汇市场买卖，回收过量发行的法币，以实现稳定通货的目的。该政策实施后不久就酿成了1947年轰动海内外的黄金风潮。法币非但没有稳定，物价反而暴涨如洪，百姓生计遭受严重损害而不得不为了“反饥饿”而走上街头。这标志着宋子文金融开放政策的破产。“事实证明，开放黄金外汇市场是宋子文施政期间最引起众人非议、并最终彻底失败的一项政策。除了消耗大量黄金外汇储备由官控转为‘民有’，并引发了国民党统治的经济政治危机之外，这一政策不仅未能取得宋子文当初设想的效果，而且成了他下台的导火索。”^①上海黄金风潮以后，蒋介石要求宋子文按以下原则拟定挽救局势的方案，即：停止出售黄金，宣布调整汇率，冻结上海的工资在1月

^① 汪朝光：“简论1947年的黄金风潮”，《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4期。

份的水平上，控制粮、棉、燃料等物价。宋子文表示异议，蒋命令宋执行，称其正在为过去几个月的错误政策，比如出售黄金，付出代价，不得不承受其后果。^①这表明，经此一役，蒋介石对宋子文那一套已不再信任；加上国共已由局部冲突发展为全面内战，蒋介石急于扭转经济局面为军事斗争作准备，故转而支持采取严厉统制、速战速决的经济措施，于是便又倾向于推行币制改革了。

二、币制改革的措施及其效果

（一）苏联 1947 年新卢布改革的措施及其效果

由于长期战争的损害，战争胜利前后，苏联各地普遍存在物资紧张特别是食品短缺的现象，在有些地区甚至非常严重。时任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给中央领导人的多份报告显示，在配给制度下，由于粮食减产造成的供应不足、通货膨胀造成的物价上涨，以及地方官员非法挪用和挥霍救助基金的行为，造成了许多地区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②战后初期，一方面，苏联许多地区发生了严重旱灾和作物歉收，人民生活遭遇困难，特别是农民的生活一度陷入困境。另一方面，货币贬值，且国家负债较重，战时遗留的内债尚未得到有效的兑付和清理。一些地区的百姓要求政府及时兑付债券，支付现款，甚至直接援引苏联宪法的规定，写信给财政部长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要债”。^③由于灾害的原因，币改不得不往后推迟了一段时间。^④随着灾情的缓解，特别是新的五年计划实施以后，苏联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速度明显加快。在商品市场方面，产品供应量有所提高，但通胀压力仍然很大，这表明苏联既到了实行币制改革的“可能性”时机，也到了实行币制改革的“必要性”节点。1946 年下半年，苏联政府开始拟定币改计划方案。1947 年 4 月

① 吴景平编：《宋子文政治生涯编年》，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521 页。

② 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19 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 732、734 页。

③ 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30 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 5 页。

④ Крединс Н.Е. Денежные реформы в СССР 1922---1924 годов и 1947 года// Финансовый менеджмент. 2001. №.6.

3 日，苏联财政部长兹韦列夫向斯大林报告币制改革的有关情况：“用于兑换将要提供近 600 亿卢布的银行券和国库券。若按 5:1 比值来兑换货币，货币总量将减少 480 亿卢布，发到居民手中的新币为 120 亿新卢布。……兑换货币时，需合理地重新估价居民的货币积累，它们主要是居民在战争年代存入储蓄所、国家银行的积蓄，战争期间未曾度假而发给的补偿证明以及 1938 年的债券。由于币制改革，国家债务将减少大约 700 亿卢布，其中因发行新币减少 520 亿卢布（包括遗失和下落不明的卢布近 40 亿），因居民存款和储蓄而减少 160 亿卢布。……新币发行应该在废除凭证供应制的时候及时进行，以便公开交易能按统一价格执行，这在一定程度上能使广大劳动阶层在兑换新旧货币时的损失得以补偿，同时减少商品流通时可能出现的一些暂时困难，防止形成收益投机和维护新币的信誉。”^①斯大林基本同意这一实施方案。1947 年 12 月 14 日，联共（布）中央和苏联政府发布《关于改革币制及取消配给制的决议》，这标志着新卢布改革的正式开始。

币制改革的主要思路是“发行十足价值的新币，并且废止……价值低贱的旧币流通”。按照《决议》，苏联政府于 12 月 16 日发行 1947 年版的新卢布（见附图 1）。对于现金，“现在通行的货币现款兑换新币，其比率为旧币十卢布兑换 1947 年版式新币一卢布”。对于银行存款，则根据数额实行差别变更，一般分为三个阶梯：第一，“凡不超过三千卢布的存款，仍照其票面价格不加变动，即按照一比一的比率重新估值”；第二，“凡不超过一万卢布的存款，其中三千卢布仍照其票面价值作为存款，不加变更，余款则按照新币二卢布对旧币三卢布的比率重新估值”；第三，“凡超过一万卢布的存款，其中一万卢布按照上述第二条规定的比率重新估值作为存款，余款则按照新币一卢布对旧币二卢布的比率重新估值。”对于“各团体的合作机关以及各集体农场的经费及活动存款”，则特别规定“将按照新币四卢布对旧币五卢布的比率重新估值”。此外，与币制改革并行，政府还决定取消供应品配给制，除集体农场市场外，“实行食品及工业日用品单一的低廉的国家零售价

^① 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3 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 653 页。

格”，采取积极干预的手段人为降低物价。^①上述方案公布后，除了对个别措施有所调整和补充（例如个别地区为加快币改进程压缩了兑换期限）之外，苏联的这场新卢布币制改革基本照章执行。

苏联 1947 年的新卢布改革基本达到了消减通胀、控制物价的目的，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②按照一些经济学家的估算，币制改革使市场货币总量由原来的 436 亿卢布下降到 140 亿卢布。^③“如果单从蒸发市场上超额的货币量来说，币制改革的目的达到了；总的来说，币制改革为国家金融的稳定创造了条件。”^④从当时苏联官方的角度看，对这次币改的成效是非常满意的。时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的莫洛托夫，在 1948 年 11 月发表的《在新的浪潮中》的演说中认为：“我国在十月革命三十周年纪念日之后所实现的一个最重要的措施，便是币制改革，以及同时取消居民供给方面的购物证制，并对工业品和粮食品规定一种划一的、降低了的固定价格。这个决定帮助了迅速消减在战争时期发生的通货膨胀现象所产生的恶果，并为国民经济加速发展造成了有利的前提。由于固定粮食品和工业品零售价格降低，以及合作社商业和集体农庄市场上价格随着降低的结果，卢布购买力已提高了一倍……可见，币制改革以及国家在改良贸易方面所进行的措施，大大促进了工人和职员物质生活水准的提高。”^⑤时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的马林科夫指出：“苏联政府在 1947 年年底货币改革与废除配给制以后，降低了消费品的价格。物价的降低，使人民在一年中节省了将近 860 亿卢布……物价降低……提高了卢布的购买力并改善了苏联卢布对外币的汇率。工人与知识分子的实际收入增加了，农民为购买工业品所必须支付的款项减少了。”^⑥“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消费品的价格曾三次减低。人民从第一次减低物价获益约 860 亿卢布，

① “苏联政府与联共中央关于改革币制及取消配给制的决议全文”，《新闻类编》，1947 年第 1628 期。

② Данилов А.А., Пыжиков А.В. Рождение сверхдержавы: СССР в первые послевоенные годы. М.: РОССПЭН, 2001. С. 214.

③ Попов В.П.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1946---1953 гг. Тамбов, 2000.

④ История мировой экономики/ Учебное пособие/ А.Н. Маркова, Н.С. Кривцова, А.С. Квасов и др.; под ред. проф. А.Н. Марко-вой. - М., 2000. С. 75.

⑤ 中共中央办公厅编：《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资料汇编》，第 2 册，第 1633-1634 页。

⑥ 同上，第 1641 页。

从第二次减低物价又额外获益约 710 亿卢布，而从最近第三次减低物价人民至少获益 1100 亿卢布。”^①时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的布尔加宁则在演讲中说：“大家知道，苏联政府曾实行货币改革，连续降低物价，1950 年第三次降低了日常用品的零售价格。这就进一步加强了苏联的卢布并提高了它的购买力。还在 1949 年时，平均工资与薪金（以物价计）即比战前增加了 24%。农民的收入相应地提高了 30%。”^②到了 1951 年 4 月，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和苏联中央统计局发布的《苏联第四个五年计划执行的总结》，特别归纳了货币改革的意义，分别包括降低物价，提高工人、知识分子和集体农庄成员的生活水平，以及提高卢布的国际汇率。^③“1946–1950 年的五年计划所提出的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任务，由于实行了货币改革而成功地得到解决，它巩固了货币流通和国民经济中的信贷关系。这首先促进了经济杠杆——价格、信贷、利润、经济核算作用的巩固和提高。”^④也就是说，在官方的话语中，这次币制改革是成功的。但是，从社会大众的角度看，这次币制改革也有不足甚至利益受损。一方面，币改造成了部分民众的损失。许多较早获悉币改政策措施的“消息灵通人士”，成功规避了币改的风险并将可能的损失降到最小（例如，1953 年苏联检察机关在调查贝利亚时，发现他于 1947 年币制改革时，曾指示助手将存款分开多个账户储蓄，从而避免估值时遭受更多损失^⑤）。但许多普通民众则在担忧和惊慌中四处奔波，而币改造成的利益损失却在很大程度上要由他们来买单。另一方面，币改及相应的降价措施，使得粮食产品价格下降的幅度远远大于工业产品下降的幅度，扩大了业已存在的“剪刀差”，使得农民为改革做出了更多的牺牲。“不幸的是，在这次重大的政策调整中，农业经济的发展被置于最底层，而不得不再次担负起缴纳

① 同上，第 1648 页。

② 中共中央办公厅编：《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资料汇编》，第 2 册，第 1671 页。

③ 同上，第 1691 页。

④ 《苏联货币流通与信用》，第 180 页。

⑤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резидиума ЦК КПСС от 1 июля 1954 г. о проекте обвинительного заключения на П.А. Шария, С.С. Мамулова, Б.А. Людвигова, Г.А. Ордынцева, и Ф.В. Муханова. Источник: Политбюро и дело Берия. 2012. С. 646-664. Архив: РГАСПИ. Ф. 17. Оп. 171. Д. 475. Л. 1-35. Копия. Машинопись.

‘贡赋’的重任。”^①当然，任何改革都会有牺牲，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都会有所满足，也会有所损害。“在苏联，货币改革自不免要作某些牺牲，但这种牺牲的大部分是由国家担负起来，仅很小的部分由全国人民担负。就全国大多数人民言之，这种短时的损失马上会由物价的降低得到了补偿。”^②总体而言，苏联社会底层特别是农民的牺牲虽然较大，但基本还是在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在当时看来，这些牺牲是难以绝对避免的。总之，苏联 1947 年新卢布改革在宏观意义上是成功的，不仅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通货膨胀，使得国民经济从战时的紧张混乱局面中恢复过来，而且还在于它的顺利实施令苏联在国际金融竞争中掌握了主动。币制改革后的苏联领导人踌躇满志，斯大林甚至说：“我们这次胜利说明，获得了胜利的是我们苏维埃社会制度。”^③

（二）中国 1948 年金圆券改革的措施及其效果

黄金风潮爆发不久后的 3 月 21 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说：“去年一年中我们中国经济上所遭遇的困难，各位同志都明白，用不着细说。本来去年八月外汇率变更以前，我们中国经济的情形，已经渐渐好转，物价渐趋平稳，民生亦渐趋安定。于是财政当局乃决定变更汇率，鼓励输出，以期收支平衡，然后改变币制，而谋整个经济的复兴。但究竟因为我们对于经济的措置，缺乏经验，不能在变更汇率的同时把握时机，断然改革币制，以致后来国产货物，因汇率提高而涨价，同时美金黑市亦不断上涨，遂形成今年年初经济紊乱的现象。这是本人应该向各位同志引咎的。”^④由此可见，蒋介石将之前金融政策失败的教训，归为延误时机而不及时进行币制改革。鉴于各方对是否要进行币改仍顾虑重重，一方面，蒋介石故作镇静，以期稳定局势。1948 年 4 月 9 日，蒋介石在国民大会作施政报告时说：

① 沈志华主编：《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中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年，第 556 页。

② 《战后苏联的货币改革》，第 81 页。

③ 中共中央办公厅编：《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资料汇编》，第 2 册，第 1469 页。

④ 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 22 卷，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 年，第 49 页。

“但是今天我们中国的经济是不是已经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像共党所宣传的，即将趋于崩溃呢？抑或今天我们经济上种种纷乱和不安的现象，是由于我们本身的心理所造成呢？为答复这个问题，我今天可以将国家财政经济的数字，坦白地告诉大家。截至三月底，我们法币发行总额，不到七十万亿。照目前美金牌价折合，只要一亿八千五百万美元，即可将全部的法币收回。（如照所谓黑市价格，则只需一亿二千万美元）然而我们政府存在中央银行和其他国家行局的美金，尚有二亿八千万美元，而上月国务会议决定将资源委员会、中纺公司以及招商局等各一部分的资产，以及敌伪产业和赔偿物资拨交中央银行，随时可以变价抵押的总数约为四亿美元。两者合计，已有七亿美元。最近美国国会通过的援华贷款，尚不在内。由此可知，我们法币的准备，非常充足，金融的基础非常巩固。金融基础的巩固，就证明我们经济的基础并未动摇。现在人心惶惶，以为经济即将趋于崩溃，这完全是受了共党及其宣传工具的影响，对政府失了信心，因而造成了自己害自己的恐慌心理！各位今天听了本人负责的报告，就可以祛除这种无谓的疑虑了。”^①另一方面，蒋介石也令人作币改的准备，分别指示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财政部长王云五等人研究币改的可行性方案。对于宋子文、俞鸿钧等长期浸淫于经济学的专业人士，蒋介石显然颇有戒心，而对于王云五则特别的青睐。在考虑财政部长任职时，他强调“此席须由与金融界无关系而能大公无私者来担任”^②。王云五于1948年5月被任命为财政部长。到任后，他力主推行增加税收、裁并机构和改革币制三项措施，^③对于第三项工作，王云五直言，“早在一年以前，我已认为只有改革币制，才能挽救财政经济日趋恶化的局势”^④，因此将主要精力放在研究和制定币改方案上。王云五币改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严重依靠美援，一心想依靠美国贷款平衡稳定财政，从而实现币改成功。据他回忆，“我在那时候，强调借美国的币制贷款而改革币制；而且

① 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442-443页。

② 王云五：《王云五文集·第六卷·岫庐八十自述》，上册，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547页。

③ 王寿南：《王云五先生年谱初稿》，第二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619页。

④ 王云五：《王云五文集·第六卷·岫庐八十自述》，上册，第564页。

认为美国对于我国目前最有效的援助，莫如协助改革币制的贷款。……当美国决定，并获得我国赴美代表的报告，知币制贷款无望后，我便转向自力改革币制，俟初步此功，再求外援继续维持的方面。”（原文如此，“方面”或为“方案”之笔误——引者。）^①从此时蒋介石日记中可见，蒋介石对于包括王云五方案在内的各种办法也是犹豫不决的，后来任蒋介石侍卫长的郝伯村在解读蒋当年6月的日记时写道：“经济情势危殆，蒋公早有察觉，但迄无有效办法，亦无经济智囊”，“蒋公智囊，迄无真知灼见、勇敢坦陈的经济专家”。^②思来想去，蒋介石最终采纳了王云五的币改方案。1948年8月19日，蒋介石签发《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宣布实行财政经济紧急措施。同时政府发布《金圆券发行办法》、《人民所有金银外汇处理办法》《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等，正式实施币制改革。

《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主要内容为“三个限期”：第一，以十足准备发行的金圆券为本位币，限期收兑已发行的法币和东北流通券；第二，限期收兑人民所有的黄金白银银币和外国币券，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第三，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在国外的外汇资产，逾期予以制裁。^③这次财经紧急处分政策，实际上条条直涉普通百姓的资产利益，且政策语气及执行意志均十分激烈和强硬。发行金圆券（见附图2）是这次币改的核心内容。依据《金圆券发行办法》，金圆券为本位币，“每圆之法定含金量为纯金零点二二二一七公分（公分是当时的一种计量单位，1公分等于100公毫，固下用公毫。）”，“十足流通行使”，“发行准备中必须有百分之四十为黄金白银及外汇，其余以有价证券及政府制定之国有事业资产充之”。金圆券发行后，“法币及东北流通券停止发行，所有以前发行之法币以三百万圆折合金圆一圆，东北流通券以三十万圆折合金圆一圆，限于‘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即一九四八年，下同。——编者注）十一月二十日以前无限制兑换金圆券。”“金圆券发行总额以二十亿元为限”，中央银行需将每月发行额报财政部和金圆券发行

① 同上，第549页。

② 郝伯村：《郝伯村解读蒋公日记》，台北：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第353页。

③ “总统颁令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银行周报》，1948年第35期。

准备监理委员会检查后公告。^①依据《人民所有金银外汇处理办法》，人民持有的黄金、白银、银币和外国币券，均要在“民国”三十七年九月三十日以前兑换为金圆券。其中黄金按纯含量每市两兑给金圆券二百圆；白银按其纯含量每市两兑给金圆券三圆；银币每元兑给金圆券二圆；美元每元兑给金圆券四圆；其他外币按照中央银行外汇汇率兑给金圆券。^②为配合金圆券改革，政府还采取实行限定物价，命令全国各地各类物价和工资价格按 1948 年 8 月 19 日以前的水平冻结，派驻经济管制督导员赴全国各地监督限价令。

上述方案公布实施后的头几周，币改似乎初见成效，但很快物价又大涨，加上为了应对战争经费的激增，和解决由此产生的严重财政赤字问题，国民党政府不断增加金圆券的发行量，以至于逼近发行办法规定的发行限额。此时国民党政府内许多人仍把希望寄托在美国援助上，认为美国不会见死不救。当年 11 月 13 日，蒋介石以总统令的形式公布《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将金圆券的法定含金量降低为每圆为纯金四点四三四公毫（大约相当于之前的 1/5），将金圆券兑换法币和东北流通券的比率分别调整为一比三百万和一比三十万，没有在办法中明确规定金圆券的发行总额，而改为“另以命令定之”，^③这实际上相当于不设限额而随时改变发行量。在接下来的 1949 年里，金圆券变得毫无信誉可言，给百姓带来深重的灾难，以至于民众鄙视，甚至一些地方当局也拒收，已然成了废纸。这场声势浩大的金圆券改革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其败绩惨状，罄竹难书。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目睹此劫，戏作《哀金圆》诗一首：“赵庄金圆如山堆，路人指目为湿柴。湿柴待干尚可爨，金圆弃掷头不回……金圆数月便废罢，可恨可叹还可哈。党家专政二十载，大厦一旦梁栋摧。乱源虽多主因一，民怨所致非兵灾”。其中特别还有几句直讽王云五：“金圆之符谁所画，临安书棚王佐才”，“睦亲坊中大腹贾，字画四角能安排”，“备列社会贤达选，达诚达矣贤乎哉”……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原因不仅在于军事，更在于经济政策的失败。1949 年，宋子文在与杜勒斯的谈话中就谈到：“不要忘记，虽然国民党政府犯了不少大大小小

① “金圆券发行办法”，《银行周报》，1948 年第 35 期。

② “人民所有金银外汇处理办法”，《银行周报》，1948 年第 35 期。

③ “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银行周报》，1948 年第 48 期。

的错，但是我们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状况。我们同日本打了八年仗，然后又立刻开始了与共产党的内战。通货膨胀注定会更加严重，而失控的通货膨胀必然会使民心丧失、贪腐泛滥。”^①陈立夫认为，“我们已先替共产党把人民都变成了无产阶级，这是我们财政上犯的大错误”，而军事和财政上的两大失败，“是我们为什么要到台湾来的最大原因”。^②蒋介石也间接承认了金圆券改革的失败，及其对国民党丧失政权的巨大影响。他在《苏俄在中国》中写道：“到了第三任行政院，于三十七年八月，乃采取了金圆券改革币制计划，以致币信每况愈下。于是共党乘机大肆其反动宣传，煽惑人心，动摇社会。尤其对于各大都市的金融与经济，施展其有形和无形的各种破坏手段，最后影响了全国金融紊乱，物价的波动，乃使通货膨胀的趋势益加恶化，而无法遏止。于是军公人员的生活更见艰苦，而军执风纪就不能保持其抗战时期的水准。我们反共斗争之所以遭致失败，这实是其最大原因之一。这一失败，无论是主观上的错误，或客观的情势所造成，都值得我们重加检讨和警惕的。”^③实际上，无论蒋介石如何闪烁其词左右言它，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其决策的失败。

（三）两国币改措施及其效果的同异

苏联 1947 年新卢布改革和中国 1948 年金圆券改革有很大的相似性。从总体上看，二者的基本思路都是通过发行新币、限时兑换旧币的方式消除通胀，并通过政府强制限价的方式人为降低和控制物价。那么，中苏币制改革的不同之处主要在哪些方面呢？

第一，新卢布改革根据银行存款及持现款数额实施差别兑换率，而金圆券改革则实行统一兑换率。实行差别兑换率主要是为了分流各阶层在币制改革中的损失，合理“摊派”不同社会阶层的牺牲，倾斜保护低收入者。苏联在实施这一政策时尽管也未能完全制止投机，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社会底

① 吴景平：《风云际会：宋子文与外国人士会谈记录（1940-1949）》，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83页。

② 陈立夫：《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第337、338页。

③ 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9卷，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年，第195页。

层特别是城市贫民的损失，特别是能使民众产生相对受益的心理，容易赢得一部分人的支持。而金圆券改革采取一刀切的兑换率，表面上看贫者富者同样受损，而富者受损似乎更多，但民众早已对政府及既得利益者失去信任且充满戒心，故而更容易引起恐慌和反感。其实，据王云五后来回忆，他也曾考虑过差别兑换率。“又查各国改革币制时，对于旧币兑换新币，往往采取两种办法，一是将旧币冻结一部分，借以减少流通，一是采取差别兑换率，对工人或贫苦者采取较优的兑换率，而对持有大量旧币者则采取一般的兑换率。这两种办法，我都考虑过，认为在我国目前殊难施行，且无此必要。所谓殊难施行者，因人民所有的旧币存在银行者占极少部分，冻结不易生效，如待其兑换时再行冻结一部分，则来兑者定必化整为零，在户籍还没有办理妥善之时，如对于持有大量旧币的人冻结其一部分，不仅将化整为零，徒增兑换手续之麻烦，而且鼓励人民作伪，亦殊失策。至采行差别率的兑换，其弊亦正相同。况且那时候我国流行的旧币虽已达天文数字，而估计其兑换价值，仅当美金五千万万元左右，其总值较诸人民手上所持有的金银外币实微不足道，故冻结政策在我国如必须采行，宁对于外币，而不必对于法币。”^①

第二，新卢布改革并未强制收兑人民持有的黄金、白银等硬通货，而金圆券改革则明令以金圆券收兑金银等“天然货币”，又由于金圆券的贬值，使得这种收兑相当于没收。现代国家在确立币制时，一般都会禁止以金银做直接流通货币，而通过发行纸币和其他金属币的方式代之。苏联在1924年币制改革以后，仍发行了各种银质辅币，到1947年币制改革前后，政府同样进行兑换，但未强制收兑，更未明令禁止居民持有其他金银制品。对于金圆券改革实行的强制收兑金银，既得利益集团成功进行了规避，大部分金银外汇被转移到国外，致使资金大量外流，这加剧了经济的崩溃。而其他普通民众的资产，则实际上任由当局宰割。据一般估计，从币制改革开始到1948年10月底，仅仅两个月的时间，共搜刮到黄金165万两，白银900余万两，银元2300万枚，美钞、港币各数十万元，约合美元汇价2亿元。^②“社会各

① 王云五：《王云五文集·第六卷·岫庐八十自述》，上册，第574页。

② 项怀诚：《中国财政金融通史：中华民国卷》，北京：中国财经出版社，2006年，第150页。

阶层，从富商大贾到平民百姓，都被蒋介石集团用金圆券狠狠敲了一笔。……没有这 2 亿美元，就像王云五日后所说的那样，台湾恐怕要吃香蕉皮了。就此点而言，王云五对蒋介石真是‘功不可没’。”^①翁文灏后来认为，王云五原想收回市面上的黄金外钞，其用意是要充实金圆券的准备金。然而蒋介石后来却令中央银行直接移存台湾，由其自行支配，其他任何人不得动用。整个收金措施，一方面使许多持有少量黄金以勉强维持生活的百姓遭受重大损失，另一方面为了兑付更多的金银发行了过量的金圆券，酿成新的通胀和抢购风潮。这些都是翁、王等人始料未及和无法控制的。^②

第三，新卢布改革虽然以发行新币为主要内容，但并未改变货币名称，而金圆券改革则以新发行的“金圆券”代替“法币”，改变了法定货币的名称。按币改设计者的初衷，乃欲以“金圆券”之“金”表明货币的“足值”，但在长期以银为主要通货的中国，这非但没有奏效，反而令人生疑，而最终由于其迅速贬值而完全不被信任。这里我们还可以再比较苏联 1922 年发行的“切尔文券”（金卢布），和国民党当局 1949 年发行的“银元券”的信誉。切尔文券是苏联 1922-1924 年第一次币制改革时发行的货币。这次改革以发行切尔文券为主要内容，也规定切尔文券的含金量，并将其与沙俄时期发行的金卢布相比拟。^③在这次币制改革中，苏联政府虽然也改变了法定货币名称，以“切尔文券”（金卢布）兑付旧卢布（又称纸卢布），但俄国在历史上曾实行金本位制，且沙俄时代发行的金卢布曾有良好信誉，故百姓在认知上更易于接受，产生信任。而中国到了 1949 年李宗仁代理总统时期，虽发行了“银元券”，表面上与中国传统银本位契合，又似乎要引导人们将其与民初足值的银元券相联系，但苦于蒋介石集团已将搜刮到的金银几乎尽数运往台湾，“银元券”的准备金严重不足，只是垂死挣扎罢了。

比较苏联 1947 年新卢布改革和中国 1948 年金圆券改革可见，其基本思路相似，主要内容相同，只是金圆券改革的一些具体措施比新卢布改革更为激烈，无怪乎有人批评其“比苏联还左”。

① 巴图：“1948 年国民党币制改革内情”，《百年潮》，2000 年第 2 期。

② 李学通：《翁文灏年谱》，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 年，第 347 页。

③ 王小龙：“苏联 1922-1924 年的货币改革：回顾与评价”，《欧亚经济》，2014 年第 3 期。

三、新卢布改革对金圆券改革的影响

(一)新卢布改革引发的社会关注和舆论压力对推动金圆券改革的影响

1947年12月19日，苏联新卢布改革的决议公布4天后，由苏联大使馆新闻处编印的《新闻类编》就将其全文译载，同时还配发了题为《苏联币制改革与废止配给制度的重大意义》的文章。该文主体部分来源于《真理报》的社论，其结论也几乎全部援引社论的结语：“这些都是事实。这些事实再度说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对资本主义占着最大的优越性，证明苏维埃社会制度与国家制度的伟大胜利的力量；配给制的废止和苏维埃贸易的发展，必将由此改进对民众的供应，必将对国家整个经济生活产生好影响，对于进一步增长我们伟大国家的实力，及其向共产主义的顺利前进，必将有所贡献。”苏联新卢布改革的新闻传到中国后，国内报刊杂志即大力报道和评论，一时间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除了《中央日报》、《民国日报》、《申报》、《大公报》等国统区主流报纸报道以外，许多政论性期刊也纷纷刊载文章加以评论，还有许多经济类的学术性期刊对新卢布改革进行研究。

表3 1947-1948年部分期刊杂志报道、评论、研究新卢布改革的情况

序号	作者	标题	刊物
1	本报	“苏联整理币制”	《经济评论》1947年第13期
2	姚铁心	“苏联之币制改革”	《世界月刊》1947年第8期
3	本报	“苏联实行币制改革”	《经济通讯》1947年第50期
4	本报	“苏联实行改革币制 物价急跌人民欢欣”	《经济通讯》1947年第50期
5	家驹	“苏联的币制改革”	《经济通讯》1947年第50期
6	又五	“苏联的币制改革”	《新合作》1947年第12期
7	金岭	“论苏联币制改革”	《工商天地》1947年第6、7期
8	董明之	“苏联币制改革有国际意义吗？”	《创世》1948年第11期
9	吴清友	“一九四七年的苏联币制改革”	《时代经济》1948年第3期
10	贝山	“苏联币制改革的观察”	《新中华》1948年第1期
11	本报	“苏联实施币制改革”	《东方杂志》1948年第1期
12	纪芬	“苏联币制改革与取消配给制之意义”	《新声》1948年第9、10期
13	王国生	“苏联改革币制”	《社会评论》1948年第58期

14	本社（社论）	“苏联改革币制难以效法”	《银行周报》1948年第6期
15	宁静（翻译）	“苏联币制改革的结论”	《经济周报》1948年第9、10期
16	奕铭	“苏联币制改革及取消配给制度之认识”	《银行通讯》1948年第27期
17	吴清友	“论苏联的币制改革”	《经济周报》1948年第1期
18	本报	“苏联实行币制改革特辑”	《资本市场》1948年第1期
19	李士亭	“苏联经济新措施——实行币制改革取消配给制度”	《金融周报》1947年第26期
20	吴清友（翻译）	“苏联的预算·信用及货币”	《银行周报》1948年第30期
21	吴清友	“论苏联的货币制度”	《中央银行月刊》1948年第2期
22	马尔古斯	“取消配给制与货币改革对于苏联劳动者之影响”	《新闻类编》1948年第1634期
23	比尔曼	“苏联货币是世界上最稳定的货币”	《新闻类编》1948年第1666期

通过对这些评论和研究的分析，可以看到，当时中国社会舆论对新卢布改革主要有三种态度：

一是褒扬其成效，认为中国应该效法。如《经济通讯》的文章认为，苏联实施币制改革以后，“产业工人与公务员的购买力立刻被提高了，而政府并没有增重什么负担，只有在战时积蓄有大量钞票的投机家略有损失，政府以一纸命令便把他们过剩的购买力降低了十分之九，他们的损失即产业工人及薪工阶级之所得。历史上还有比这样的币制改革更公平，更合理，更成功的吗？……这一次苏联的币制改革实在是世界货币史上改革币制之最辉煌的成就，也足为中国将来实施改革币制的借镜。”^①《工商天地》的文章认为，“这次苏联改革币制，是十分成功的……在今天饱受通货膨胀之苦的中国人看来，诚有天堂地狱之感。”^②《社会评论》的文章认为，“从苏联的改革币制，我们可以获得宝贵的启发与借镜。好的技巧，如差别兑换率等，我们不妨考虑是否可以施行于中国。又如改革之前的经济混乱，如何防止。改革后其损失应如何避免转嫁到善良的老百姓头上等等，均应顾虞周到。尤其应该注意的是，改革币制并不只是意味着改革币制，必须配合一切财政或经济政策上的措施，始能奏效。语曰：‘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在目前我国正考虑改革

① 家驹：“苏联的币制改革”，《经济通讯》，1947年第50期。

② 金岭：“论苏联币制改革”，《工商天地》，1947年第6、7期。

币制的前夕，谨为文叙述苏联的改革币制，以就教于邦人君子。”^①

二是否定其成效，并认为中国不可效法。如《新声》的文章认为，在这场币制改革中牺牲的，并不是如同《决议》所说的那样是各类投机分子，“事实上，只要有点常识的人就知道，在苏维埃拥有大量购买手段的人——所谓投机分子——只是那享有特权的官僚，包括托拉斯的上层分子和集体农村中的‘百万富翁’，只有他们才深刻察觉苏维埃通货的危机，并首先知道这一改革的来临，那么当然也只有他们才是发动‘囤积’和‘抢购’的祸首。他们在‘改革’之前，已预先把旧卢布换成货物了，换一句话说，苏维埃的特权官僚早已在‘改革’之前把损失尽可能的转嫁掉了。改革法令本身也不是在打击投机的官僚，而是在‘改革’所引起的损失中，尽可能进一步维护特权官僚的利益。它虽然规定‘目前流通中的以及民众手中的货币’，以十对一换算，但对于银行存款者及公债债权人都极力降低这个换算率，由一对三竟至一对一。谁也知道，在苏维埃国家中持有巨额存款和公债券的只能是少数暴发户和特权官僚。那些广大的靠每月一百至几百卢布工资和可怜的配给品过日的下层工农分子，是享受不到这种优待的。但手头上持有卢布现款的人却是广大的下层消费者，他们是苏维埃购买力的泉源，他们由于消息不灵通和缺乏特权，在‘改革’前夜多数是来不及‘购货’的，因此他们也就是‘十对一’的主要牺牲对象。”文章的结论是：币制改革的成果只是暂时的，“广大下层人民今天所得到的暂时的安慰将迅速丧失它的价值，新的不满与新的危机就必然要采取更猛烈的形式爆发出来。”^②

三是比较客观地评论其利弊，但认为由于国情不同，中国不能效法。《银行周报》的社论最具代表性。文章认为，“苏联改革币制的方法是十分激烈，各国对之毁誉迥异，只是观察的焦点，多不就方法本身探讨，而仅就其可能结果评判之。实际上，这一币制改革的特点，亦即其基本原则，是阶级原则，改革令上明明白白的规定，对于各种经济地位不同的人，予以差别待遇。……苏联改革币制的基本原则既标着阶级差别，所以其内容就是借改革以实行没收。该国当局并不否认这点，而称之为‘打击暴利分子’，亦即打击掌握多

① 王国生：“苏联改革币制”，《社会评论》，1948年第58期。

② 纪芬：“苏联币制改革与取消配给制之意义”，《新声》，1948年第9、10期。

量旧卢布者。如果没有苏联那样的经济制度，这种方式的改革币制是不可能施行的，即使施行，亦不能生效，或者效果却会相反。”

这三种态度中，以第一种最为常见，且有一定的影响力。

除了国民党统治区域媒体的报道，中共的媒体也对新卢布改革进行大力宣传。以当时的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为例，1947年12月19日，该报头版分别以《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无限优越 斯大林日丹诺夫下令改革币制 苏联人民生活提高两倍》和《国家威力增强物质生活上升 苏联人民欢欣自豪》为题进行了报道。之后，更是连续发表多篇评论予以宣传，认为“苏联这次货币改革，是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改革有着本质的区别。后者是以牺牲人民大众的利益，以克服本身的经济危机为唯一的目的；因此，这种货币改革的结果，必然引起百物上涨、实际工资的降低、劳动人民生活的更趋恶化等。但前者的目的是稳定币值，并进一步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准和繁荣国民经济。……苏联的货币改革和取消配给制，说明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世界上最好和最巩固的一种制度，它标志着苏联已完全恢复战前的和平幸福生活；同时也为挣扎在资本饥饿制度下的人民，照明着斗争的道路。”^①“苏联配给制取消以来的三个多星期中，全苏各地物价普遍降低。……街上拿着配给券等待买东西的漫长行列消失了，人民现在可以随心所欲选买东西，苏联人民已开始了新的更丰足的生活了。”^②“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府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注意增加食品与消费品的供应。而在资本主义国家，通货不断膨胀，物价不断上涨，千百万工农大众的生活水平不断下跌；这证明苏维埃制度为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有利条件，因而得以不断增进人民福利，但资本主义国家则反此。”^③与此同时，《人民日报》也对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政策开展大规模批评：“第一、蒋匪政府的经济危机已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蒋币已实在很难继续维持下去；第二、过去一年中蒋匪政府一连串的‘紧急措施’完全破产。蒋匪政府要办‘货币改革’，决非为着‘稳定物价’，而是更大规模掠夺蒋区人民的新阴谋。这个阴谋的实现，就

① “苏联经济新改革轰动全世界 给资本主义国家饥饿人民照明了道路”，《人民日报》，1947年12月24日。

② “取消配给制人民生活更丰足 苏联物价普遍降低”，《人民日报》，1948年1月18日。

③ “国民经济迅速发展 苏联再次降低物价”，《人民日报》，1948年4月16日。

将使得蒋管区人民现所持有蒋币的价值化为乌有，从而蒋管区人民手中一点少得可怜的生活资料更加集中于四大家族之手，俾从事内战以延缓其最后崩溃的命运。”^①“截至去年年底，蒋匪纸币发行总额，已超过一百万亿元，形成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并暴露出蒋匪最近喧嚷‘货币改革’的一个真正意图，即是企图于山穷水尽之时，以新骗术来继续压榨蒋区人民的血汗。”^②

借助于媒体的关注，当时的政治界、知识界人士和社会大众，很容易在中苏的强烈对比中，感受到中国经济状况的混乱和国民党政府的无能，许多人由此倾向于学习苏联的币改经验。这些给国民党政府带来决策压力，特别是为国民党政府内部的币改派提供了有力的民意支持。到了金圆券改革陷入危机之后，许多媒体又借苏联币改的成就反衬金圆券改革的失败，这给当局造成更大的压力。蒋介石在1948年11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最近军事与经济形势，皆濒险恶之境，一般知识人士，尤以左派教授及报章评论，对政府诋毁污蔑，无所不至。盖人心之动摇怨恨，从来未有如今日之甚者。”^③

（二）苏联计划经济政策及其币改措施对金圆券改革设计者的影响

据王云五回忆，“我到任后，立即开始此项计划，而且无日不是念兹在兹。首先我就财政部中的主管人员，分别查询，并令检呈所有关于改革币制的旧案和意见；其次我便利用前此不甚重视、而实际上拥有不少对于币制有研究的人员和资料。我的方法，是尽量听取他们的意见，而一点没有表示我的意见。偶然有出题目征取意见的必要时，我也只将有关征取意见之一点，托辞属人研究，却没有透露全盘的关系。此外我还从财部秘书处资料室所，剪贴保存历年国内关于改革币制的资料，合计起来，连部内部外关于改革币制的意见文件，不下七八十种。”^④也就是说，除了他人协助收集资料外，王云五对大部分人虽然听取意见，但避免表示自己的意见，更严防他人知道自己的计划。王云五此举不仅是由于自己十分自信，而且也与当时财政部官员

① “记者评蒋匪‘货币改革计划’ 蒋匪经济危机没法治又要新花头害民卖国”，《人民日报》，1948年1月29日。

② “蒋匪大量印票子掠夺人民血汗 形成严重恶性通货膨胀 蒋区物价去年一年涨了十五倍”，《人民日报》，1948年2月4日。

③ 张秀章编：《蒋介石日记揭秘》，下册，北京：团结出版社，2007年，第773页。

④ 《王云五文集·第六卷·岫庐八十自述》，上册，第564页。

的渊源有关。“财部本是孔宋天下，孔宋虽未负实际责任，但部内人员大部分仍为孔宋旧部，潜势力犹在，以王之关系而论，与孔宋从无往来，更谈不到其他，而对京沪平津一带金融巨头亦无接触。”^①王云五不想，也不可能依靠孔宋旧部参与币改设计，因此只有自己操刀。

不久之后，王云五草拟了一份《改革币制平抑物价 平衡国内及国际收支的联合方案》（即金圆券币改的总体计划方案）交行政院长翁文灏审阅。翁阅后为慎重起见，邀王一道面呈蒋介石详细汇报。蒋阅后基本表示同意，又令翁、王联合俞鸿钧、严家淦、刘攻芸、徐柏园一起研究具体办法。币改基本方案是王云五制定的，虽然之后蒋介石指定了其他几人参与方案的完善工作，但基本思路还是贯彻王云五的主张。王云五后来也对人回忆说：“金圆券办法，系本人独创，并无人授意。”^②因此，王云五应是金圆券币改当然的主要设计者。

王云五本非学经济出身，过去更无领导金融，主持币改之经验，他的很多知识，有的是靠过去翻译和主编经济类书籍时的积累，有的则是现学现卖。从王云五过去经济方面的知识储备中，可见其对于苏联经济管理体制的好感。抗战时期，王偶然在美国大使馆看到一本苏联工农业管理的书籍就大感言之有理，并亲自翻译。1945年5月，王云五所译《苏联工农业管理》^③一书出版，在译序中王云五盛赞苏联经济建设的成就，并认为：“苏联在不满二十年间，而有此成就，其因素固多，然归纳之，不外两项，一为其对于工业化之方针坚决，二为工农业效率之增进。”王云五还分析道：“对于第一项，……笔者无赘言之必要，惟愿国人注意其二三要点。一则确认工业化为致强之道，不惜节衣缩食，易取机器；更不惜牺牲一切，从事工业建设。二则由国家计划委员会作贯彻全国之计划，虽初时手续微嫌过繁，旋逐渐简化，并由过分之集中而渐采分区的计划，又从纯粹的计划而进一步作实施的检讨。……”^④其实，在抗战全面爆发前，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中就收

① 侯颜璧：“王云五被赶出财神府”，《人物新丛》，1948年第1期。

② 阮毅成：“与王云五先生谈金圆券”，《传记文学》，第45卷第2期。

③ [美]比安士译：《苏联工农业管理》，王云五译，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年。

④ 《王云五文集·第五卷·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下册，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883-884页。

录了《苏联计划经济问题》^①一书，其中就有专章论述苏联的货币。抗战全面爆发后，王云五曾主编一套“苏联小丛书”，内就有《苏联之货币与金融》、《苏联第二次五年计划》，以及《苏联之国际贸易》等书。王云五对苏联一些经济政策的关注和认同并不是偶然的、个别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曾有一股“苏联热”，许多中国人把苏联当做中国学习的榜样，甚至成为其时的“世风”和“普遍呼声”。^②尽管四十年代以后，中国经济思想开始出现由崇尚苏联计划经济向美国自由经济回归的趋势，但坚持效仿苏联计划经济的国家经济干预论者仍然有较巩固的根基，特别是在战争的阴霾未完全消散的情况下仍然掌握着足够分量的话语权。在某种程度上，战后关于是否应进行币改、何时进行币改、怎样进行币改等问题的争论，也是关于主要向计划经济学习还是向自由经济学习之分歧的重要表现。需要指出的是，主张向苏联计划经济制度学习而增强国家干预经济论者并非认同社会主义，“这种推崇带有强烈的功利性或工具性色彩”，^③只是由于钦羨苏联的建设成就，由目的回溯手段寻找应对现实的解决方案，而不多问姓“资”姓“社”。在当时的国民党政府里，秉承这样的工具主义的不乏其人，其主要表现就是本身没有扎实的经济知识，更没有坚定的经济学理论的价值立场，而常常根据某一时段的实际需要选择不同的具体经济措施，进行技术性的利用。王云五便是其中的一个重要代表。于是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在不同时期往往有相互矛盾的经济主张。王云五在就任经济部部长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本人对经济行政毫无经验，此次应政府之召，出长经部，一切从头学起。”^④1946年5月23日他在接受采访时称：“中国不能实施物价管制，因政府无执行之能力，唯在人民守法，而政府有充分执行权力之国家，始能使用物价管制办法。中国只需增加生产，输入机器，即能发展工业……”^⑤而到1947年国民党政府实施经济紧急措施，开始管制物价后，王云五又解释道：“战时实行

① 李炳煊、沈磨：《苏联计划经济问题》，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

② 张太原：“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独立评论〉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

③ 阎书钦：《国家与经济：抗战时期知识界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论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209页。

④ 《中央日报》，1947年5月22日。

⑤ 《民国日报》，1947年5月24日。

物价管制各国皆然。……抗战胜利后，政府停止物价管制，完全由人民自由买卖。……而我国停止管制物价后，金融市场一度波动，各项物价猛烈飞涨，尤以最近之情况尤甚。政府始觉有恢复物价之必要。”^①也正是在国民党把中国带入战争、宋子文的经济政策遭遇挫折的情况下，工具性地实施带有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色彩的政策，就又成了当时统治者和币改设计者的选择。新卢布改革的实施先于金圆券改革，二者的基本思路和主要内容又大致相同，金圆券改革设计者很可能吸收了苏联新卢布改革的一些经验，而有所模仿。

四、由中苏比较反思金圆券改革之误

第一，对比两国的改革背景，可见其主要差别在于政治军事环境的不同。二战之后中苏两国面临的经济形势相似，单从经济背景看，两国都有实行币改的必要性。但从政治军事背景看，苏联国内政治上没有公开和有实力的反对派，也没有面临军事内乱的威胁，反而由于国际上政治军事环境的紧张，更促使其加紧实行币制改革，为国际竞争战略做准备，这构成了苏联实行币改的可能性。相比于苏联，中国当时的政治军事环境非常严峻，具体讲，就是中国逐正在步陷入内战。事实上，前面叙述的财政状况恶化与经济政策混乱等经济背景都有一个大前提，即战争的准备及爆发。如若是为服从经济环境的压力而必须进行币改，那就应当准确把握时机，争取在政治军事压力相对小的时候及时实施。总之，内战与币改不应同时进行，二者只能择其一：要么避免内战而抓住机会先实施币改，要么在内战爆发之后就缓行币改，静待战后再寻找时机。事实的情况是，国民党政府之前因肆意准备内战而未及时实施币改，而在内战已经爆发的情况下却又匆忙实施币改，这是在“天时”选择上犯了大忌。

第二，对比两国的改革措施，可见二者基本内容相似，但金圆券改革在某些具体措施上更为激进，因而更容易激起民众的恐慌和反感。金圆券改革堪称用完全政治手段干预金融的典型案列。苏联学者认为，苏联的币制改革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币制改革的不同之处在于：“苏维埃国家一面使流通中的

^① 王云五：“对实施经济紧急措施方案说明”，《群情月刊》，1947年第2期。

货币数量与国民经济周转的需要相符合，一面又有计划地规定着促进此项周转的范围、形式及一切经济条件。”^①也就是说，尽管苏联的币制改革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政府利用行政权力干预经济的行为，但仍然尊重基本的经济规律，特别是之前一段时期就努力发展生产，增加财政收入，尽量减少财政赤字，控制货币发行额度，为币制改革做好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反观国民党政府的金圆券改革，在财政赤字已然非常严重的情况下，还通过政治威力强制推行币改，妄图毕其功于一役。这种“蛮干”的做法若想获得成功，无异于天方夜谭。事实上，在收支严重不平衡、货币发行量得不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实施币制改革，无异于以毒攻毒。后人评论说：“此际，蒋公以处理金融危机为重点，然金融危机乃由于政府收支入不敷出，形成恶性通货膨胀，非用政治手段所可解决。”^②解决通胀问题并非绝对不能用币制改革的方式，但其中也有政治干预的多少、轻重之分，也更需要在遵循经济规律的前提下谨慎实施。国民党政府这剂药方下得过了猛了，这是在“人和”上犯了大错。总之，国民党政府的金融政策在价值本质上没有坚持人民的立场，并不以维护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目标，这应是金圆券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



附图 1 苏联 1947 年版 100 卢布



附图 2 中国 1948 年版金圆券 100 圆

【Abstract】 After WWII, both the Soviet Union and China encountered serious inflation economically, but politically and militarily, the situation were different. The Soviet Union had already obtained good peaceful domestic environment, while the Kuomintang government first “prepared for war”, then

① 《战后苏联的货币改革》，第 61 页。

② 郝伯村：《郝伯村解读蒋公日记》，第 359 页。

“supported the war”, and thus led to financial deterioration and chaos in economic policies. For the new ruble reform of the Soviet Union in 1947 and China’s currency reform in 1948, their basic concept and main content are the same and the difference lies in that some specific measures of the latter are more intense. Actually, the former had certain influences on the latter. Through the comparison of currency reform in these two countries, it could be found that the failure of the latter is due to big mistakes on “the time” and “the unity with the people”.

【Key Words】 Soviet Currency Reform, Soviet New Ruble Reform, China’s Currency Reform in 1948

【Аннотация】 Посл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Китай в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м развитии столкнулись с серьезной инфляцией, но в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 военной сфере были отличия: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достиг благоприятного мирного состояния внутри страны, в то время как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Гоминьдана сначала «готовилось к войне», а затем «поддерживало войну», что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привело к ухудшению финансового положения и хаосу в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е страны. Советская денежная реформа нового рубля 1947 г. и китайская денежная реформа «золотого юаня» в 1948 г. были схожи в своём основном содержании и обладали одной базовой идеей, разница заключалась в том, что некоторые из конкретных мер реформы «золотого юаня» были более интенсивными. Новая рублёвая реформа оказала определенн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принятие решений и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е конкретных мер реформы «золотого юаня». Путём сравнения реформы нового рубля и реформы «золотого юаня», очевидно, что провал последней в том, что была совершена большая ошибка между «временем» и «народной поддержкой».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Советская реформа денежной системы, советская реформа нового рубля, реформа «золотого юаня»

(责任编辑 肖辉忠)

俄罗斯研究 (双月刊)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RUSSIAN STUDIES

2015 年第 4 期

(总第 194 期)

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华东师范大学

主编：冯绍雷

出版：《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地址：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 A403

邮编：200062

电话：021-62233816；021-62238113

传真：021-62232113

电子信箱：russiastudies@163.net

排版：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电脑室

印刷：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发行：本刊编辑部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1009-721X

网络电子版代理：中国知网

网址：www.cnki.net

· 公开发行 ·

ISSN 1009-721X



定价：30.00 元